马列毛主义者基础书单之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路线和党的建设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 编

2023

声明

本 pdf 文件由志愿者制作，内容搜集自 telegram 频道“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其频道链接是 t.me/proletarianstruggles。

编者简介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是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机关报。我党主张社会主义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本报作为全国性质的政治报，通过建立代办员网络、进行全面的政治鼓动，宣传革命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逐步做到巩固的思想一致，组织中国共产主义者和无产阶级群众。

斗争报将力图对一切引起关注和争论的斗争事件按马列毛主义的精神进行评论，坚决批判各种机会主义思想，将科学社会主义灌输到工人运动当中。

联系方式

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先锋队，是从民族主义者、自由派到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等一切资本主义政党的敌人。因此，无耻的机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政客们必然会用尽各种办法攻击我们党，可以预见到阶级敌人的其中一种手段就是**表面上假扮成支持我党**的口吻，**事实上却肆意编造谣言来歪曲我党的主张**，甚至**冒充我党党员发表反动言论，把我们从未说过的话强行按在我们头上**，把我党抹黑成打家劫舍、杀人放火的赤匪或者极端“左”倾的疯狂迫害知识分子的红卫兵，借此欺骗恐吓小资产阶级群众远离和仇视无产阶级革命派，迫使群众对我们党的纲领和主张保持一无所知的状态。有鉴于此，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预先发布下列联系方式和 GPG 公钥，以便广大群众能够直接联系我党和了解我们的立场，摆脱资产阶级的谎言。

我们的**公开群组**对所有进步群众开放，只要不发表反动言论都可以留在群内。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审查每一个加入群组的人的真实身份，不可能把警察、自由派、机会主义者等等绝对排除在公开群组以外，这些反革命分子必然潜藏在群众里伺机而动。因此，各平台的**公开群组**里鱼龙混杂，**群成员的言论仅能代表发言者个人，任何意义上都不能代表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立场**。不论在墙内还是墙外，只有我们在《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和《佳士工人声援团官网》上公布和验证过的宣传平台能够代表我们党的正式立场，除此之外，不要相信任何自称能代表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骗子。

一、网站

佳士工人声援团官网

jiashigrsyt1.github.io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

proletarianstruggles.github.io

proletarianstruggles.wordpress.com

二、邮箱

佳士工人声援团联络邮箱

jiashigrsyt@protonmail.com

斗争报邮箱

douzhengbao@protonmail.com

三、Telegram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频道

https://t.me/proletarianstruggles

“声援佳士工友”群组

https://t.me/JSshengyuan

管理员电报账号

https://t.me/jsgrsyt

https://t.me/zgmzdzygcd

四、Matrix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频道

https://app.element.io/#/room/#proletarianstruggles:matrix.org

“声援佳士工友”群组

https://app.element.io/#/room/#JSshengyuan:matrix.org

管理员 Matrix 账号

https://app.element.io/#/user/@jiashigrsyt:matrix.org

https://app.element.io/#/user/@mcpc:matrix.org

五、Keybase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团队

https://keybase.io/team/douzhengbao

管理员 Keybase 账号

https://keybase.io/jiashigrsyt

六、XMPP

“声援佳士工友”群组

jsshengyuan@conference.conversations.im

管理员 XMPP 账号

jsgrsyt@conversations.im

mcpc@yax.im

七、GPG 公钥

https://keybase.io/jiashigrsyt/pgp_keys.asc

https://proletarianstruggles.files.wordpress.com/2023/11/pgp_keys.asc

https://jiashigrsyt1.github.io/pgp_keys.asc

目录

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1]......1
注释：......14
《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序言......17
注释：......18
《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后记......19
注释：......24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和团体向全党代表大会的报告的问题......26
一 工人运动及其历史和现状......28
二 地方社会主义者小组的历史，社会民主党人的出现，他们内部的派别斗争......28
三 地方委员会、地方团体和小组的组织情况......30
四 地方工作的性质、内容和范围......31
五 同其他种族和其他民族的革命的（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的）团体的关系......32
六 印刷所、交通联络和秘密工作的安排......33
七 在工人阶级以外的其他居民阶层中的联系和活动......33
八 非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和反政府派的状况，对待它们的态度......35
注释：......35
《关于"组织委员会"成立的通告》后记[1]......39
注释：......42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事[1]......45
注释：......59
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1]......70

序言......70
注释：......73
（一）代表大会的准备......73
注释：......75
（二）代表大会上的派别划分的意义......76
（三）代表大会的开始。——组织委员会事件......79
注释：......87
（四）“南方工人”社的解散......87
注释：......90
（五）语言平等事件......90
注释：......97
（六）土地纲领......98
（七）党章。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104
（八）火星派内部分裂以前关于集中制问题的讨论......112
（九）党章第 1 条......115
注释：......135
（十）无辜被加上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的人......137
注释：......148
（十一）继续讨论党章。总委员会的组成......149
注释：......154
（十二）党章讨论的结束。中央机关成员的增补。《工人事业》代表的退出......154
（十三）选举。代表大会的结束......167
注释：......193

（十四）代表大会上斗争的一般情况。党内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 193
注释：......206
（十五）代表大会以后。两种斗争方法......207
注释：......225
（十六）勿因小别扭而妨碍大快事......225
注释：......235
（十七）新《火星报》。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236
注释：......264
（十八）稍微谈谈辩证法。两个变革......267
附录　古谢夫同志和捷依奇同志的冲突事件......271
注释：......279
我们争取什么？[1]......280
注释：......287
进一步，退两步......292
注释：......301
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312
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1]......317
注释：......318
致俄共中央[1]......320
注释：......320
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321
注释：......323
莫斯科征收党员周的总结和我们的任务......324
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初稿......328

注释：......330
关于清党......333
注释：......334
关于清党和入党条件......336
关于接收新党员的条件......337
1 致莫洛托夫同志......337
2 致莫洛托夫同志......337
3 致莫洛托夫同志......338
注释：......339
就惩处犯罪的共产党员问题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1]......343
注释：......343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345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及其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提纲）......354
一、总则......354
二、关于民主集中制......355
三、关于共产党人的工作义务制......356
四、关于宣传鼓动......361
五、关于政治斗争的组织工作......367
六、关于党报......372
七、关于党组织的一般结构......376
八、关于合法工作与非法工作的结合......379
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论党章第一条）......384
注释：......391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392
关于单纯军事观点......392
关于极端民主化......395
关于绝对平均主义......396
关于主观主义......397
关于个人主义......398
关于流寇思想......399
关于盲动主义残余......400
注释：......400
反对本本主义......402
一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1]......402
二　调查就是解决问题......402
三　反对本本主义......403
四　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404
五　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405
六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406
七　调查的技术......407
注释：......409
反对自由主义......411
改造我们的学习......414
一......414
二......415

三 417
四 419
注释： 421
整顿党的作风 422
注释： 436
反对党八股 438
注释： 450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453
注释： 457
关于建立报告制度 458
关于健全党委制 461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463
注释： 466

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1]

列宁（1902 年 9 月）

亲爱的同志：我很高兴满足您的要求，对您所写的《圣彼得堡革命党的组织》（您指的大概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彼得堡的工作组织）草案提出批评。您提出的问题很重要，不仅圣彼得堡委员会的全体委员，甚至所有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应该参加讨论。

首先，我完全同意您对原先的（您称之为“联盟式的”）组织“联合会”之所以不适用所作的解释。您指出先进工人缺乏认真训练和革命教育，工人事业派[2]十分高傲十分顽固地用“民主”原则来维护所谓的选举制，工人不积极参加活动。

总之：（1）缺乏认真训练和革命教育（不仅工人如此，知识分子也是如此）；（2）不恰当地过分地采用选举原则；（3）工人不积极参加革命活动，——的确，这不仅是圣彼得堡党组织的主要缺点，而且也是我们党许多其他地方组织的主要缺点。

据我对您信中所谈的组织草案的一些要点的了解，我完全同意您对组织任务的基本看法，而且也赞同您的组织草案。

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应当特别强调全俄工作的任务和全党的任务。这一点，您的草案第 1 条是这样表述的：“《火星报》[3]是党的（而不仅是一个委员会或者一个区的）领导中心，它在工人中间有固定的通讯员，并且同组织的内部工作有密切的联系。”我只想指出一点：报纸可以而且应当成为党在思想上的领导者，应当对理论上的道理、策略原则、一般组织思想和全党在某个时期的共同任务加以阐发。运动直接的实际领导者，只能是专门的中央组织（姑且称之为中央委员会吧），它亲自同所有的委员会保持联系，它包括了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所有优秀的革命力量，并处理一切全党性事务，如分发书刊，印发传单，调配力量，

指定某些人或某些组织管理专门机构，准备全俄游行示威和起义，等等。鉴于必须严守秘密和保持运动的继承性，我们党可以而且应当有两个领导中心：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前者应担负思想上的领导工作，后者则应担负直接的实际的领导工作。这两个组织的行动统一，它们之间必不可少的团结一致，不仅应由统一的党纲来保证，而且应由两个组织的组成人员（两个组织即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之间应当完全协调一致）以及它们经常举行定期联席会议来保证。只有这样，一方面，中央机关报才可以不受俄国宪兵的破坏，保证其一贯性和继承性；而另一方面，中央委员会才可以经常在所有重大问题上同中央机关报协调一致，并且可以相当自由地直接处理运动中的一切实际问题。

因此，章程第 1 条（根据您的草案）最好是不仅指出党的什么机关应当成为领导机关（当然，指出这一点是必要的），而且要指出地方组织应给自己提出一项任务：为建立、支持和巩固那些中央机构积极工作，而没有这些中央机构，我们党是无法作为一个政党存在的。

其次，您在关于委员会的第 2 条中说，委员会应当“领导地方组织”（也许最好是说，领导“党的全部地方工作和所有地方组织”，至于具体措辞，我就不多谈了），委员会的成员中应当既有工人，又有知识分子，把他们分成两个委员会则是有害的。这种看法无疑是完全正确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应当是一个，它的成员应当是完全自觉的、愿意完全献身于社会民主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特别努力使尽可能多的工人成为完全自觉的职业革命家并且进入委员会。[注：应当努力使那些在工人群众当中联系最多和“名声”最好的工人革命家参加委员会。] 既然委员会是单一的，而不是双重的，委员会成员本人是否认识很多工人，就具有特殊的意义。为了领导工人中发生的一切事情，要什么地方都能去，要认识很多人，要有各种门路，等等，等等。因此，委员会中应当尽可能包括工人运动中工人出身的所有主要带头人。委员会应当领导地方运动的一切方面，管理党

的全部地方机构、人力和物力。委员会应当怎样组成，您没有讲，也许这里我们也同您的意见一致，认为在这方面未必需要作出特别规定；委员会怎样组成，这是各地社会民主党人的事情。不过也许应该指出，委员会必须根据多数（或者三分之二等等）委员的决定来补充委员，应当注意把自己联络的关系交到可靠的（革命态度上）安全的（政治意义上）地方，注意及早培养候补者。一旦我们有了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新的委员会就应当在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的参与和同意下组成，委员尽量不要搞得太多（这些人的水平要比较高，对革命工作的专业要比较精通），但是也要有足够的人数，以便管理各方面的事务，保证进行充分的磋商，切实执行决议。如果委员人数相当多，经常集会有危险，那么可以从委员会中再选出一个人数极少（例如 5 人或者更少）的专门指挥小组，其中一定要有书记和最有实际指挥一切工作才干的人参加。特别重要的是这个指挥小组一定要有候补者，这样在一旦遭到破坏时工作才不致中断。指挥小组的活动及其成员等，都要由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批准和决定。

其次，在谈了委员会之后，您又提出一些委员会的下属机构：（1）辩论会（“优秀的”革命家会议）；（2）区小组及（3）每个区小组下设的宣传员小组；（4）工厂小组；（5）由该地区各工厂小组代表组成的“代表会”。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往后建立的所有的机构（除了您谈的以外，应当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机构）都应该隶属于委员会，必须成立区小组（指很大的城市）和工厂小组（无论何时何地）。但是，在某些细节上我不完全同意您的意见。例如关于“辩论会”，我认为这样的机构完全不需要。“优秀的革命家”全都应当参加到委员会中去或者担任各项专门的工作（印刷，交通联络，巡回鼓动，组织身分证办理处、反特务和反奸细小组或军队工作小组等等）。

“会议”既要在委员会中间召开，又要在每个区、每个工厂小组、宣传员小组、职业性（织工、机械工、制革工等）小组、大学生小组、写作小组等中间召开。有什么必要为召开会议设立专门机构呢？

其次，您要求给“所有愿意写稿的人”提供向《火星报》直接投稿的机会，这是完全合理的。只是不应把“直接”二字理解为把到编辑部去的路线和编辑部的地址都告诉“所有愿意写稿的人”，而是说一定要把所有愿意写稿的人的信件转交（或转寄）给编辑部。编辑部的地址要使相当多的人知道，但并不是告诉所有愿意写稿的人，而只能让那些可靠的和擅长做秘密工作的革命者知道——比如，在一个区里不是把地址只告诉一个人，但也只是告诉几个人；还应当使所有参加工作的人和各种小组有权把自己的决定、愿望和要求既向委员会反映，也向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反映。如果我们能保证做到这一点，即使不成立“辩论会”这种不灵便、不保密的机构，同样也能做到让全体党的工作者进行充分的磋商。当然，还应当尽量举行人数尽可能多的各种活动家亲自参加的会议，不过这里的问题是要严守秘密。各种大会和会议在俄国只能作为例外偶尔召开，并且要极其谨慎，只许“优秀的革命家”参加，因为大会一般容易混进奸细，参加大会的人也容易受到特务跟踪。我想也许最好这么办：在可以召开大型的（比如说，30—100 人）会议时（例如夏天在森林中或者在特意找到的秘密住宅里），让委员会派一两名“优秀的革命家”去，并且注意参加大会的人选，也就是说，比如邀请尽量多的工厂小组的可靠成员参加等等。但是这些会议不要固定化，不要列入章程，不要定期召开，不要让每个与会者都了解其他所有参加大会的人，即了解到他们全都是小组的“代表”等等；正因为如此，我不仅反对设立“辩论会”，而且也反对设立“代表会”。为了代替这两个机构，我想大致提出如下的原则。委员会应该注意召开有尽可能多的实际参加运动的人和一般工人出席的大型会议。开会的时间、地点、理由和人员都要由委员会确定并且负责秘密地安排。当然，这丝毫不

限制工人们在郊游地和森林中举行不拘形式的会议等等。也许，章程里不提这一点更好一些。

其次，关于区小组。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区小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做好分发书刊的工作。我认为，区小组主要应该是委员会和工厂的中介人，甚至多半是传递人。区小组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做好秘密散发委员会的书刊的工作。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因为如果保证区的专门的书刊投递员小组同该区所有的工厂、该区尽量多的工人住宅保持经常联系，这对于举行游行示威和组织起义有重大意义。迅速地做好书刊、传单和宣言等等的传递工作，以及使整个代办员网都习惯于这项工作，就等于给未来的游行示威或起义做好了一大半准备工作。等到群情激昂、发生罢工和骚动的时候再投递书刊，就为时已晚了。这种工作只有逐步进行，每月必定进行两三次，才能够养成习惯。如果没有报纸，也可以而且应当分送传单，无论如何不要使这个散发书刊的机构无事可做。这个机构应当力求完善，做到一夜之间就能使圣彼得堡的所有工人都接到通知，也可以说，都动员起来。只要经常不断地把传单从一个中心传递到比较小的中介人小组，再由中介人小组分给书刊投递员，这项任务就决不是什么空想。我认为，区小组除了作为纯粹中介人和传递人以外，它的管辖范围不应该扩大到其他职能方面去，或者确切些说，在扩大时应该特别小心谨慎，否则只会对工作的秘密性和严整性有害处。区小组当然也可以开会讨论党的一切问题，但是地方运动的一切共同问题只应由委员会来决定。只有传递和散发工作的技术问题才允许区小组独自处理。区小组的成员应当由委员会确定，就是说，委员会指定一两名委员（或者甚至不是委员的人）作为某某区的代表，委托这些代表去建立区小组。区小组的全体成员也要由委员会批准。区小组是委员会的一个分部，只是代行委员会的职权。

现在再来谈谈宣传员小组问题。由于宣传人员缺乏，未必能够在每个区都单独建立这样的小组，而且这样做也未必理想。宣传应当由整个委员会按照统一的

精神来进行，而且应当严格地集中起来，所以，我想可以这样办：由委员会委托几个委员组成宣传员小组（这个小组可以是委员会的一个分部，也可以是委员会的一个机构）。这个宣传员小组在保密方面得到各区小组的帮助，在全市，在委员会所“管辖的”整个地区进行宣传工作。必要时，这个小组可以成立分组，随后把它的某一部分职能转托给分组，但是这一切都必须经过委员会批准，委员会无论什么时候都绝对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每个小组、分组或者与运动多少有关联的小组。

应当适应运动的需要，按照这种委托的方式，即按照设立委员会的分部或它的机构的方式，建立各种各样的小组：如大中学生小组、官员协助者小组、交通联络小组、印刷小组、身分证办理小组、安排秘密住宅小组、监视特务小组、军人小组、武器供应小组、筹建“有收益的财务机构”小组等等。建立秘密组织的全部艺术应在于利用一切力量，“让每个人都有事可做”，同时保持对整个运动的领导，当然，保持领导不是靠权力，而是靠威信，毅力，靠比较丰富的经验、比较渊博的学识以及比较卓越的才能。这一点是针对通常可能产生的下面这种反对意见而说的：如果中央偶然出现一个大权在握的无能的人，那么严格的集中制就很容易断送整个事业。这种情况当然可能发生，但是不能拿选举制和分散制作为防止出现这种情况的手段，在专制制度下进行革命工作，无论在多大的范围内搞选举制和分散制，都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并且简直是有害的。任何章程也不能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只有“同志式的影响”才能防止。开始时可由各个分组作出决议，随后由它们向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提出申诉，直到最后（在最坏的情况下）推翻完全无能的当权者。委员会应当尽可能实行分工，必须记住：各方面的革命工作需要具备各种才能的人，有时完全不适于做组织工作的人，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鼓动员；有时不善于从事需要严守秘密的工作的人，竟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员，等等。

谈到宣传员，我还想顺便说几句，就是搞这项工作的人当中能力不强者往往太多，因而降低了宣传工作的水平。有时只要是大学生，我们就不加选择地把他当成宣传员，每个青年都要求“给他一个小组”等等。这种现象应当制止，因为这样做害处甚多。真正坚持原则和有才能的宣传员很少（要成为这样的宣传员必须好好学习，逐步取得经验），应当对这种人进行专门训练，充分使用他们，极其爱护他们。应当每周给他们上几次课，善于及时把他们派到其他城市去，组织一些能干的宣传员到各城市去巡回宣传。应当把大批刚参加工作的青年更多地派到实际工作机构中去，我们往往不重视这些机构，却让大学生在各小组跑来跑去，还美其名曰“宣传”。当然，到严格的实际工作的机构去同样需要有扎实的训练，但即使是“刚参加工作的人”，在那里毕竟还是比较容易找到事干的。

现在谈一谈工厂小组。工厂小组对我们特别重要：运动的全部主要力量就在于各大工厂工人的组织性，因为大工厂里集中的那一部分工人，不但数量上在整个工人阶级中占优势，而且在影响、觉悟程度和斗争能力方面更占优势。每个工厂都应当成为我们的堡垒。为此，“工厂的”工人组织应当同任何革命组织一样，内部是秘密的，外部（就是说，在其对外交往上）是“枝脉纵横的”，应当把自己的触角伸得远远的，伸到各个方面去。我要强调指出，在这里，工人革命家小组也一定要成为核心和领导者即“主人”。我们应当完全屏弃包括“工厂”小组在内的那种纯粹工人式的和工会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传统。工厂小组和工厂委员会（为了把它同其他数量一定很多的小组区分开来）应当由极少数革命者组成，这些人直接接受委员会的委托和委员会给予的职权，在工厂内进行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工作。工厂委员会的全体成员都应把自己看成是委员会的代办员，应该服从委员会的一切指示，应该遵守“作战大军”的一切“法令和常规”，他们加入了这支军队，在战争期间不经长官允许就无权离开军队。因此，工厂委员会的组成具有很重大的意义。委员会应当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建立好这些分委员会。我想

可以这样办：委员会委托自己的一些委员（假定说，再加上工人中那些因某种原因没有进入委员会、但是从经验、对人的了解、智慧和联系来说又是有用的人）在各个地方建立工厂分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和各区的全权代表共同商量问题，确定一系列的会见，好好地考察工厂分委员会的委员候选人，对他们进行“寻根究底的”盘问，必要时可以考验他们，这样，专门委员会可努力为该工厂分委员会亲自直接物色和考察尽可能多的委员候选人，最后，把每个工厂小组的成员提交委员会批准，或者授权某个工人去组织、筹划和配备好整个分委员会。这样，委员会可以决定这些代办员中间谁同委员会保持联系，以及如何保持联系（通常是经过区的全权代表，但是这种通例也可以有所补充和修改）。鉴于这些工厂分委员会十分重要，我们应该尽可能使每个分委员会既有中央机关报的通讯地址，又在可靠的地方设置联络关系储存处（就是说，可以把在一旦遭到破坏时为立即恢复分委员会所需要的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到党中央去保存起来，那里是俄国宪兵鞭长莫及的地方）。自然，给予通讯地址这件事应当由委员会根据情况和材料确定，而不是根据“民主”分配通讯地址这种不现实的权利来确定。最后也许有必要附带说说，有时不去建立由几个委员组成的工厂分委员会，而仅仅指派委员会的一名代办员（及其候补者）是需要的，或者更为方便。工厂分委员会一成立，就应当着手建立一系列担任各种任务、具有不同的秘密程度和组织形式的工厂小组。例如，书刊投递散发小组（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应该是使之成为我们自己的真正的邮局，不仅散发的方法，而且连挨户投递的方法都要经过试验和检查，必须了解所有的住户和通往这些住户的路线）、秘密书刊阅读小组、监视特务小组［注：我们应当使工人认识到：处死特务、奸细和叛徒，有时当然是绝对必要的，但是把这种做法作为一种工作方法，那是极不适当的，而且是错误的；我们应当设法建立一个组织来揭露并追踪特务，使他们不能为非作歹。把特务统统处死是办不到的，但是建立一个组织来侦察特务的行踪并对工人群众进行教育，则是可以做到

而且应当做到的。]、专门领导职工运动和经济斗争的小组、宣传鼓动员小组，这些宣传鼓动员要善于同人们攀谈并且长时间地完全合法地进行这种谈话（谈机器，谈视察，等等），使谈话成为公开的没有危险的，借此了解人，摸清底，等等[注：还需要建立一些战斗小组，组织服过兵役的或者特别强壮和灵巧的工人在游行示威、越狱等等时协助工作。]。工厂分委员会应当力求通过各种小组（或代办员）网掌握整个工厂，吸收尽量多的工人参加工作。分委员会工作的成绩如何，要看这种小组多不多，流动宣传员是否可能深入这些小组，而主要的要看小组在散发书刊、搜集情报和通讯方面的经常性工作搞得好不好。

因此我认为，组织的总的形式应当是这样：由委员会领导整个地方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地方工作。委员会设立附属机构和分部，例如，第一，设立善于执行任务的代办员网，它要包罗全体（尽可能全体）工人群众，组织的形式可以是区小组和工厂分委员会。这个代办员网在和平时期散发书刊、传单、宣言和委员会的秘密通知；在战争时期则组织游行示威等等集体行动。第二，委员会成立一系列为整个运动服务的小组（进行宣传、交通联络和各种秘密活动，等等）。所有的小组和分委员会等，都应当是委员会的附属机构或分部。其中一些人将直接申请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经委员会批准就成为党员，（受委员会委托或经委员会同意）担负一定的工作，保证服从党机关的指示，享有党员的权利，可以成为委员会委员的直接候选人，等等。另一些人将不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他们是由党员建立的那些小组的成员，或者是与某个党小组接近的那些小组的成员，等等。

和委员会的成员一样，所有这些小组的成员在一切内部事务上当然都是彼此平等的。这里唯一的例外就是：只有这个委员会所指定的某个人（或某些人）才有权亲自同地方委员会（以及同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进行联系。在所有其他方面这个人同其余的人都是平等的，其余的人都同样有权向地方委员会、中央

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递交（只不过不是亲自递交）声明书。因此，上述的例外实质上丝毫不违反平等原则，而只是对秘密工作的绝对要求所作的必要让步。如果委员会的成员不把“自己”小组的声明书送交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或中央机关报，那他就要负公然违反党员义务的责任。其次，至于各种小组的秘密程度和组织形式则依它们的职能而定，因此，这里的组织将是极其多种多样的（从最“严格的”、狭隘的、不开放的到最“自由的”、广泛的、公开的、形式不很固定的）。例如，书刊投递员小组须要严守秘密和军事纪律；宣传员小组虽然也要保密，但是军事纪律就不必很严格；阅读合法书刊或座谈职工的需要和要求的工人小组的保密程度就更低，如此等等。书刊投递员小组成员必须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应该认识一定数量的党员和党的负责人。研究职工劳动条件和拟订职工各种要求的小组，其成员不一定必须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大学生自学小组、军官自学小组和职员自学小组都有一两个党员参加，有时甚至根本不该让人知道他们是党员，等等。但是一方面，我们应当绝对要求所有这些所属小组尽可能地规定工作的形式，即：参加各小组的每一个党员必须对这些小组进行工作的情况正式负责，同时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使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既对每个小组的成员，又对小组的整个工作机构以及全部工作内容都有充分的了解。这样做是必要的，既可以使中央了解整个运动的全貌，又可以在最广大的人员中物色担任党的各种职务的人选，可以使全国各个这样的小组（通过中央）向某一小组学习，还可以及时防止出现奸细和可疑分子，总之，这样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绝对必要的。

怎样能做到这一点呢？就是向委员会定期打报告，要尽量把这些报告的大部分内容向中央机关报汇报，安排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的委员到各个小组去视察，最后，必须把同这个小组的联络关系，即该小组几个成员的姓名和地址，交到可靠的地方（并交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的党常务局）。只有打了报告和交了联络关系，才能认为参加各该小组的党员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只有那时全党才

能向每个做实际工作的小组学习；只有那时我们才不怕遭受破坏，因为只要各种小组的联络关系在，我们中央委员会的代表总是容易立即找到接替的人，把工作恢复起来。这样，即使委员会遭到了破坏，整个机器也不致被摧毁，只不过是失去一些领导人，而且他们都已经准备了候补者。不要以为在秘密工作的条件下送交报告和转交联络关系是办不到的，只要我们有这个愿望，而我们的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或中央机关报还存在，送交（或转寄）报告和转交联络关系在现在和将来总是可以办到的。

这里，我们接触到了整个党组织和党的活动的一个极重要的原则：如果说对运动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在思想上和实践上的领导方面需要尽量集中的话，那么党中央（因而也就是全党）在对运动的了解方面，在对党负责方面，则需要尽量分散。领导运动的应该是数量尽量少、类型尽量同一、由富有经验的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小组。参加运动的应该是无产阶级各阶层（以及人民中的其他阶级）中数量尽量多、类型尽量多种多样的小组。对待每一个这样的小组，党中央不仅应该随时掌握有关小组活动的确切材料，而且应该随时掌握有关小组成员的尽量全面的材料。我们应当集中领导运动。我们也应当尽量分散对党负责（也是为了集中领导，因为不了解情况就不可能有集中），使每个党员、每个参加工作的人、每个加入党或与党接近的小组都对党负责。这种分散是实行革命集中的必要条件和必要修正。只有彻底实行了集中，同时我们又有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每个最小的小组才有可能向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打报告（不仅有可能打报告，而且在多年的实践中已使向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打报告定期化），才不会因某个地方委员会人员偶然组成不当而导致可悲的结局。现在，当我们来深入地研究党的实际的统一和建立真正的领导中心的时候，我们应当牢牢记住，如果我们在对领导中心负责和使领导中心了解党的机器的各个大小齿轮的情况等方面不实行最大限度的分散，这个领导中心就会是软弱无力的。这种分散无非是分工的另

一面，这种分工已经被公认为我国运动中一种最迫切的实际需要。地方委员会中的一大堆人，他们什么事情都管，不担当单独一项革命工作，不负责专门机构，不把既已承担下来的、经过深思熟虑和充分准备的工作干到底，而把大量时间和精力花在无谓的忙乱上面；同时有很多大学生小组和工人小组，其中一半是委员会根本不知道的，另一半是庞大的，没有专门化，缺乏职业训练，不能吸取其他小组的经验，象委员会一样忙于没完没了的“无所不包的”会议，忙于选举和制定章程等等。如果党中央仍旧被这样一些老式的地方委员会挡住道而不能做直接的实际工作，那么，无论是正式承认某一个领导组织，无论是建立正式的中央委员会，都不能使我们的运动真正统一起来，都不能建立牢固的战斗的党。要使党中央能很好地进行工作，地方委员会应该改造自己，使之成为专门的更“切合实际的”组织，能在某一项实际工作中做到真正“尽善尽美”的地步。为了使党中央不仅能够提出建议、进行说服和争论（迄今为止就是这样做的），而且能够实际指挥乐队，党中央必须确切知道：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拉什么提琴，过去和现在在什么地方学过什么乐器，学得如何；什么人在什么地方走了调，为什么走了调（音乐开始刺耳时），为了纠正不和谐的音调，需要调谁去，怎样调和调到什么地方，等等。应当坦白地说，现在我们要么除了知道委员会的宣言和一般报道之外丝毫不了解委员会的内部真实工作情况，要么只是从自己的友人和熟人那里了解一些情况。但是，如果以为一个能领导俄国工人运动和准备向专制制度发动总攻的大党可以仅仅局限于这一点，那就未免太可笑了。委员会成员的人数应当减少；尽量委托其中每一个人担任一定的专门的需要汇报的负责工作；建立专门的、精干的指挥中心；建立善于执行任务的代办员网，这些代办员使委员会同每个大工厂保持联系，定期散发书刊并使党中央确切了解书刊散发情况和整个工作机构；最后，建立很多团体和小组担负各种工作或者团结接近社会民主党、帮助社会民主党、准备参加社会民主党的人，使委员会和党中央随时了解这些小组的活动（和

成员）——这就是圣彼得堡委员会和其他一切党的委员会进行改组所应当包含的内容，也正是章程问题所以不大重要的原因。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我的建议用意何在，我是从分析章程草稿开始谈的。我希望这样可以使读者了解：其实可以不要章程，而代之以定期报告各小组的情况和每项工作任务的执行情况。章程上可以写些什么呢？委员会领导一切（这本来就很清楚）。委员会选出指挥小组（并非总是需要这样做，一旦需要，问题就不在于章程，而在于向党中央报告这个小组的成员及其候补者的情况）。委员会分配各个委员担任各方面的工作，责成每个委员把工作进程定期向委员会、向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报告（这里向党中央报告分配工作的情况比在章程中作出规定更为重要，由于我们人力不足，规定往往不能兑现）。委员会应该确定由谁当委员。委员会可以增补委员。委员会可以指定成立区小组、工厂分委员会、某某小组等（如果要一一列举，就会没完没了，而在章程里大概也没有这种必要，只要把建立的机构向党中央报告就行）。区小组和分委员会要建立些什么小组……现在拟订这样的章程没有多大用处，因为各种小组和分组的活动，我们几乎没有（很多地区则根本没有）全党性的经验，要取得这种经验，不是需要章程，而是需要建立党内（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汇报制。我们每一个地方组织至少要在章程上花几个晚上的工夫，如果这些时间用来让每个委员就他所担负的专门工作向全党作考虑周密的详细报告，那么事情就会好上一百倍。

章程所以没有用处，不仅因为革命工作并非总是要采取固定的形式。不，固定的形式是需要的，我们应当尽可能使一切工作都具有固定的形式。固定的形式的适用范围大大超过人们一般的想象，但这不是通过章程可以达到的，而只有靠（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过）向党中央确切报告，只有那样才会有同真正的责任制和（党内）报告制相联系的真正的固定的形式。我们解决严重的冲突和意见分歧，实际上根本不是“按照章程”投票，而是用斗争和“退出”相威胁，这我

们谁不知道呢？我们大多数委员会近三四年的党内生活，就充满了这样的内部斗争。很遗憾，这种斗争并没有用一定的形式规定下来，不然的话，它给党的教益就会大得多，给我们的继承人留下的经验也会多得多。但是，这种有益的必要的形式的产生，并不是靠什么章程，而仅仅是靠建立党内报告制。在专制制度下，除了定期向党中央汇报外，我们不可能有党内报告制的其他手段和武器。

只有广泛地学会运用这种报告制，我们才能真正取得让各种组织发挥作用的经验，只有以这种广泛的多年的经验作基础，才能制定出不是纸上的章程。

注释：

[1]《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写于 1902 年 9 月，是列宁对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阿·阿·施涅尔松（叶列马）来信的答复。施涅尔松在来信中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工作的组织提出了批评。

1895 年 12 月列宁和他的战友们被捕以后，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领导权逐渐落入经济派的手中。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相反，经济派反对建立严格集中和秘密的革命家组织，而主张建立广泛的实行选举制的工人组织，把直接维护工人的经济利益、建立互助储金会等等作为这种组织的首要任务。由于经济派的长期统治，斗争协会的组织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协会的工人部分（所谓工人组织）被人为地同知识分子部分分离开来；协会组织臃肿不堪，根本不适于领导工人群众进行反对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为改变这种状况，火星派同经济派在彼得堡组织中展开了斗争。1902 年夏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终于转到了《火星报》立场上来。为了用火星派的组织原则来改组彼得堡斗争协会，当时成立了一个由《火星报》组织、工人组织和彼得堡委员会的代表组成的专门委员会。但是以亚·谢·托卡列夫为首的经济派却声明不同意彼得堡委员会关于支持《火星报》立场的决议，并建立了一个所谓工人组织委员会，来反对火

星派。火星派在工人们的支持下守住了阵地，在彼得堡组织中巩固了下来。列宁的这封信就是在这场斗争进行得最激烈的时刻寄到彼得堡的。

列宁的信最初用胶版印刷，并在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中间辗转传抄。1903 年 6 月，西伯利亚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将此信秘密出版，标题是：《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的革命工作（给一位同志的信）》。1904 年 1 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出版了《给一位同志的信》的单行本，有列宁写的序言和后记（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8 卷第 101—109 页）。《给一位同志的信》曾在各社会民主党组织中广为流传。从 1902—1905 年沙皇俄国警察司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在莫斯科、里加，顿河畔罗斯托夫、纳希切万、尼古拉耶夫、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伊尔库茨克等城市都发现过列宁的这一著作。——1。

[2]工人事业派是聚集在《工人事业》杂志周围的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工人事业》杂志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机关刊物，于 1899 年 4 月—1902 年 2 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 12 期（9 册）。该杂志的编辑部设在巴黎，担任编辑的有波·尼·克里切夫斯基、帕·费·捷普洛夫、弗·巴·伊万申和亚·马尔丁诺夫。该杂志支持所谓“批评自由”这一伯恩斯坦主义口号，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和组织问题上持机会主义的立场。工人事业派宣扬无产阶级政治斗争应服从经济斗争的机会主义思想，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认党的领导作用。他们还反对列宁关于建立严格集中和秘密的组织的思想，维护所谓“广泛民主”的原则，而这一原则在专制制度条件下，用列宁的话来说，只是一句“响亮的空话”（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6 卷第 131 页）。《工人事业》杂志支持露骨的经济派报纸《工人思想报》，该杂志的编辑之一伊万申参加了这个报纸的编辑工作。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工人事业派是党内机会主义极右派的代表。——1。

[3]《火星报》（《Искра》）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 1900 年 12 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各号的出版地点是慕尼黑、伦敦（1902

年 7 月起）和日内瓦（1903 年春起）。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编辑部的秘书起初是因·格·斯米多维奇-列曼，1901 年 4 月起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担任。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他在《火星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阐述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并评论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火星报》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往俄国翻印和传播。《火星报》成了团结党的力量、聚集和培养党的干部的中心。在俄国许多城市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火星派的小组和委员会。1902 年 1 月在萨马拉举行了火星派代表大会，建立了《火星报》俄国组织常设局。

《火星报》在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列宁的倡议和亲自参加下，《火星报》编辑部制订了党纲草案，筹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宣布《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

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火星报》编辑部改由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三人组成。后来由于普列汉诺夫支持孟什维克，要求把原来的编辑都吸收进编辑部，列宁于 1903 年 10 月 19 日（11 月 1 日）退出了编辑部。从第 52 号起，《火星报》变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人们称这以后的《火星报》为新《火星报》。——1。

《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序言

（1904 年 1 月）

我现在重印的《给一位同志的信》[注：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7 卷第 1—18 页。——编者注]，是在一年多以前，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在 1902 年 9 月写的。起先，它的抄本在大家手头辗转传阅，并且作为阐述火星派的组织观点的材料流传于俄国各地。后来，西伯利亚联合会在去年 6 月印了这封信，而且大量加以散发。这样一来，这封信就完全成了公众的财产，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理由阻止它公开发表了。以前，我没有印这封信，是考虑到它文字上还很粗糙，还完全是“草稿”性质的，这个理由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因为俄国许多做实际工作的同志都已经看过这封还是草稿的信了。此外，重印这封还是草稿的信（我只作了一些最必要的修辞性修改）的更重要的理由，是现在这封信已具有“文件”的[注：当我的对手不止一次地表示要把这封信当作文件使用以后，我自己也觉得重印时再作任何修改，简直……怎样说得婉转些呢？……有些不得体了。]意义。大家知道，《火星报》的新编辑部已经在第 53 号上提出了组织问题上的分歧。可惜这些分歧究竟是在什么地方，编辑部并没有急于明确指出，而多半只是作了一些谁也不懂的暗示。

应当尽量帮助新编辑部解决这个难题。把《火星报》的旧的组织观点，详详细细地公之于众，甚至连草稿都公布出来，这样，也许新编辑部终于会向在他们的“思想领导”之下的党公开自己的新的组织观点了吧。这样，也许新编辑部终于会向我们介绍一下，他们是怎样准确表述他们准备对我们党的组织章程作的那些带有根本性质的修改的吧。因为，实际上谁会不了解正是这个组织章程体现了我们一贯的组织计划呢？

把《怎么办？》［注：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6 卷第 1—183 页。——编者注］和《火星报》上关于组织问题的文章同这封《给一位同志的信》对照一下，再把这封信同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对照一下，读者就会清楚地看到，我们，火星派多数派，即党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派，是怎样始终如一地贯彻我们的组织“路线”的。而对《火星报》新编辑部，我们将等待，并且以极大的耐心等待，等他们阐明他们的新的组织观点，等他们指出，他们究竟是在什么问题上，究竟是从什么时候起感到失望，为什么要“把自己过去崇拜的 东西付之一炬”[1]。

注释：

[1]“把自己过去崇拜的东西付之一炬”出自俄国作家伊·谢·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贵族之家》，是书中人物米哈列维奇的诗句，后来常被人们引用来譬喻背叛自己过去的信念。——102。

《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后记

（1904 年 1 月）

《火星报》编辑部在第 55 号上谈到，中央和反对派“已经达成协议，要忘掉”我在《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我为什么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注：见本卷第 91—98 页。——编者注］中提到的事实。编辑部的这一声明是真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的（用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漂亮词汇来说）“遁词”。事实上，并没有达成这样的协议，正象中央驻国外代表在《火星报》第 55 号出版后立即出版的专页上公开声明的那样。而且也不可能达成这样的协议，这是每个认真读过我的信的人都很清楚的，因为反对派拒绝了中央提出的“真正的和平”，而这种和平当然也包括忘掉应该忘掉的一切这个条件在内。当编辑部拒绝了和平，并在第 53 号上掀起了反对所谓官僚主义的战争时，难道他们就如此幼稚，竟指望对方缄口不谈关于官僚主义的这些鬼话的真正来源吗？

编辑部非常不喜欢我把这些鬼话的真正来源归之于无谓争吵（Literatengezank——著作家的无谓争吵）。这也是毫不奇怪的！但要知道，对这个确实使人不愉快的事实喋喋不休地说些抱怨的话，并不能否定事实。

我们想冒昧地向最尊敬的编辑部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有人对于拼命责难专制制度、罗伯斯比尔式的制度和搞政变等等，只是觉得可笑，而另一些人对于别人心平气和地叙述事实和谈论实际上要求将军地位的人，却感到是对自己的莫大侮辱，这是为什么呢？他们确实感到是奇耻大辱，竟说起什么“意气用事”、“有损道德”、甚至“动机卑下〈这是从何说起？？〉”这样一些全然“没有意义”的话来了。我的朋友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是不是因为将军的“地位”比专制君主的地位“更卑下”呢？

第二个问题。编辑部为何不向读者解释一下，为什么它（在很久以前，当它还属于反对派而事实上是“少数派”的时候）曾表示希望要忘掉某些事实呢？编辑部难道不懂得，希望“忘掉”原则分歧，这个想法本身就是荒谬的，任何一个头脑清楚的人都不会产生这个念头吗？

请看，我亲爱的“政治对手们”，你们有多狼狈啊！你们谴责我，说我把原则争论降低为无谓争吵，你们本来想通过这种办法把我置于死地，然而，事与愿违，你们恰恰证实了我对你们的某些“分歧”的真实原因所作的论断。

其次，由于处境狼狈，编辑部承认曾经有过无谓争吵，但他们却不肯向读者说明，在他们看来，原则分歧是从哪里结束，无谓争吵是从哪里开始的。编辑部避而不谈我在信中曾试图把这两件事十分明确地区分开来。我在信中指出，原则分歧（远未严重到真正分手的地步）是在党章第 1 条的问题上暴露出来的，并由于火星派少数派在代表大会结束时同非火星派分子接近而扩大。我还指出，关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等的言论，主要不过是代表大会闭幕以后发生的那些无谓争吵的回声。

编辑部大概不会同意这样划分“原则的”东西和“应该忘掉的”东西吧？那他们为什么不肯把自己“正确”划分这两件事的意见讲出来呢？这是不是因为，这两件事在他们的头脑里还没有划清界限（而且划不清界限）呢？

根据尊敬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火星报》同一号即第 55 号上发表的小品文，读者可以想象得出，这样……模模糊糊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我们的党中央机关报成了一个什么样子。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实际上一个字也没有接触到我们在党章第 1 条问题上的争论，只是作了一些没有出席代表大会的人根本不懂的什么“外层团体”的暗示。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大概忘了，我们对第 1 条进行了多么长久多么详细的争论！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反而编造了一种“理论”，说什么“出席代表大会的火星派多数派都有一个念头，就是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同内部敌人进

行斗争”。“由于这个使命”，对火星派多数派来说，“我们面临的正常任务就冲淡了〈尊敬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坚信这一点〉”。“进行正常工作的前景被推到了遥远的不可预测的未来”；摆在党的面前的是更加迫切的“制服内部敌人的战斗任务”，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简直不知道该用什么字眼来咒骂这个“官僚主义的[注：顺便提一下，请编辑部注意，我这本书是用“指定的标题”出版的。我是个坚定的集中主义者，我服从我们中央机关报的“原则”指示，它已在第 55 号上开辟了一个从“标题”的角度评论党的出版物的专栏（为了同形式主义作斗争）。]〈或机械的〉集中制”，这些“雅各宾式的”（！！？）计划，这些拿别人“当叛乱分子来镇压和处置”的“瓦解组织的分子”。

为了说明这个理论，确切些说，为了说明这些谴责代表大会的多数派镇压（应该说是想象中的）叛乱的瓦解倾向和轻视正常工作的态度的论调的真实价值，我只需要向健忘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提醒一个（开头只提一个）小小的事实。1903 年 10 月 6 日，经过多次向少数派分子讲明他们进行抵制活动的荒谬和瓦解性质之后，我和普列汉诺夫一起正式约请“叛乱”著作家（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也包括在内）开始进行正常工作，并正式向他们申明，拒绝这个工作，无论从个人意气用事还是从某种意见分歧（为了阐述这些分歧，我们在我们的刊物上开辟了一定的篇幅）出发，都是愚蠢的。[注：见本卷第 352—353 页。——编者注]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忘了这回事。他忘了，他当时的回答是，没有说明任何理由而表示断然拒绝。他忘了，在当时，在这早已成为过去的时期，他认为“正常工作被推到了遥远的不可预测的未来”，而这个未来，只是到了 1903 年 11 月 26 日才成了期待中的现实[1]。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不仅“忘了”这回事，而且希望把诸如此类的“意气用事”统统“忘掉”，——不是这样吗？

向少数派指出，他们长年累月地瓦解党，抛弃正常工作，把中央的许许多多力量吸引到他们挑起的无谓争吵上去，——这是“意气用事”，是有损道德，是把两种倾向的斗争降低为无谓争吵。中央机关报不能登载这样的东西。

而谴责党代表大会的多数派，说他们竟敢把时间花到训诫“叛乱分子”上去，说他们通过跟（想象中的）瓦解组织的分子进行斗争来破坏党，——这才是原则分歧，《火星报》应该“腾出”篇幅专门登载这种分歧。不是这样吗，尊敬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

假如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看一下自己的周围，即使现在也许还可以找到不少这样的例子，说明“正常工作”对少数派的实际工作者来说，也被推到了同样是期待中的，但还是不可预测的遥远未来吧？

不，你们知道吧，你们最好还是根本不要涉及多数派和少数派对正常工作的态度这个问题！最好还是不要提起例如某城一位工厂工人[2]在给我的下面一封信中谈到的事情：

“亲爱的同志：

近来，也就是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听说，中央委员会不是代表大会一致选出的，代表大会在中央机关报与中央委员会的关系问题上分成了两派，形成了所谓的多数派和少数派。这一切，就象一块很沉的石头压在我们头上一样，我们感到非常沉重，因为中央机关报与中央委员会的关系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个出乎意料的新闻：在这次代表大会以前，不仅没有一个小组和会议提到这个问题，而且据我的记忆，各种出版物也都没有谈论过这个问题。我不懂，代表大会以前，为什么避而不谈这个问题。假如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那就必须承认，竭力要把党统一起来的那些同志，对党的组织，也就是党的机构，心中无数。但后面这个情况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现在造成党的分裂的这个问题，已经清楚地表明，对党的机构是有看法的，而且大家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如果是这样，那为

什么要隐瞒呢？这是一。第二，就是这个问题本身。当我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党的机构可以保证党的正统方向呢，与此同时，我的脑子里还出现了一个想法，就是除了党的机构，党的领袖人选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如果他们是正统的，党的方向也会是正统的，如果他们是机会主义者，那么党也会是机会主义的。现在，有了这样一些设想，也知道了党的领袖人选，我就毫不犹豫地表示主张在对党进行思想领导方面中央机关报比中央委员会占支配地位。尤其是俄国的实际情况使我更加坚持这种主张。因为尽管中央委员会是正统的，但它在俄国，就不能保险不被破坏，从而不能保险不会违背自己的意志而丧失正统性，因为继承人并不总是和他们的前人相象。在委员会做过一段工作的同志，谁不知道这样的事情：一个最好的委员会由于某一偶然原因而被一个糟糕的委员会代替，或者相反。中央机关报就完全不同了：它所处的条件不同（因为中央机关报将设在国外），它可以较长时期地存在下去。因而也有可能为自己培养合格的继承人。但是，同志，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不是一经解决就一成不变，就是说，或者是中央机关报永远比中央委员会占支配地位，或者是中央委员会永远比中央机关报占支配地位。我想，不能这样。比如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中央机关报成员突然起了变化，从正统的变成了机会主义的，象德国的《前进报》那样；试问，那时，是不是还要它在思想领导方面居于支配地位呢？我们这些受过正统教育的人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呢？难道应该向他们妥协吗？不，那时，我们就应该剥夺他们的支配权，把它交给另一个机关，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不管是由于党的纪律或是其他——而没有做到这一点，那我们大家就都应该被叫作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叛徒。我是这样来看这个问题的，我无论如何不能同意问题一经解决就一成不变，象有些同志做的那样。

现在，我对目前多数派和少数派之间的斗争，简直不能理解，我们许多人都觉得，进行这个斗争是不对的。同志，请您说说！仅仅为了议论多数派和少数派

而把全部力量用来奔走于各委员会之间，这是正常的吗？我真不懂。难道这个问题就这么重要，值得把全部力量都投进去，并且为了这个而彼此怒目相对，视如仇敌吗？事实上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假定一个委员会由一派选出，那另一派就不会有人参加进去，尽管他完全适合做这个工作，甚至可以说，即使工作需要他，没有他，工作会遭到很大损失，他也不参加。当然，我这并不是说，在这个问题上根本不要进行斗争，完全不是这样，我只是认为，这个斗争应该具有另一种性质，我们不要因为进行这个斗争而忘记我们的主要任务，即在群众中进行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宣传，因为忘了这一点，我们就会削弱我们的党。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否妥当：当我看到有人肆意践踏事业的利益、把它们全然置之脑后的时候，我就把所有这样的人叫作政治阴谋家。当你看到领导事业的人在干别的勾当，你会为这个事业而感到多么痛心和恐惧啊！看到这个，你会想到：难道我们党一定要为这些琐事长期分裂下去吗？难道我们就不能同时进行内部斗争和外部斗争吗？既然代表大会的决议不被重视，每个人都借口代表大会作出的决定不正确，借口中央委员会不中用等等，而各行其是，那还举行代表大会做什么呢？这样干的正是那些在代表大会以前一直叫喊集中制，叫喊党的纪律等等的人，而他们现在好象又想表明，只有普通人需要纪律，他们这些上层人士是不需要的。他们大概忘了，他们的所作所为对缺乏经验的同志起了多么可怕的腐蚀作用。现在在工人中间，已经又可以听到对知识分子只顾自己进行无谓争吵而忘记了工人这一点表示不满的呼声，现在已经有些比较性急的同志由于自己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而心灰意冷了。对工作进行集中统一的安排，在目前还完全是一句空话。现在只有希望将来一切会好起来。”

注释：

[1]指格·瓦·普列汉诺夫把《火星报》原来的孟什维克编辑增补进了《火星报》编辑部一事。——106。

[2]写这封信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委员、工人尼·叶·维洛诺夫。列宁于 1903 年 12 月给他写了回信（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4 卷）。——107。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和团体向全党代表大会的报告的问题

列宁（1902 年 12 月—1903 年 1 月）

组织委员会[1]的一个委员请求我把我们党各委员会和团体向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报告时最好能予以答复的那些问题开列清单寄给他。下面，我把这些问题大致开列了一张清单，不过，我先得就这张清单的长短问题说几句。不言而喻，报告最好涉及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一切部门，因此，一个理想的报告所要涉及的问题几乎无所不包。当然，要提出这样全面的报告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不过我认为，组织委员会尽力使每个委员会或团体了解所有值得代表大会注意的（和对代表大会有用的）问题，是非常重要和非常必要的。同第一次代表大会相比，我们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将更具有成立大会的性质，因此应当竭尽全力使报告更全面，更充实，每个团体提出的报告提纲愈理想，我们的代表大会对整个运动就了解得愈充分，愈准确，代表大会取得的成果就愈巩固。

各委员会和团体准备报告和讨论这些报告等工作，应在代表大会以前尽早进行。同时，各委员会和团体做到以下几点是极为重要的：第一，在许多成员中间分配起草报告的工作；第二，在拟就报告的每一部分后，立即将该部分的副本（决不要等到拟好报告的全文）送到国外去，即送到可靠的地方去；第三，这项工作不仅要尽量吸收现在的成员而且要尽量吸收过去的成员参加，不仅要尽量吸收现在担任工作的成员而且要尽量吸收现在不担任工作的成员即在流放地和国外的成员参加。可以委托这些人或者就某一组问题起草报告，或者就他们在委员会或团体内工作的那段时间起草报告。这些报告，或者报告的一些部分，可以大大减轻代表们在代表大会上的任务。同样不言而喻的是，代表们应当利用那些对报告中的问题作出了许多答复的党的文献，就是说应当尽力把这种文献加以综合，取其精华，纠正错误，补充和加入因考虑到保密原因而未能刊登出来的东西等等（这

项工作要吸收暂时在国外的各委员会和团体的过去的成员参加，这也是十分重要的）。谈到保密问题，这里要补充一点，对某些问题不能作出也不应作出书面答复，因为这样会泄密。但是，对这些问题的答复，各委员会和团体必须加以考虑、准备和讨论，因为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关于这些问题的报告是一定要作的（即使不在代表大会的全会上作，也要向特别委员会作，向中央委员会作，等等）。

为了吸收尽量多的人来草拟报告，最好尽量广泛地散发这份问题清单（连同各个委员会、团体或同志所作的补充），而且只有这些问题和报告是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这一点，应当对广大的社会民主党人保密。

最后，有这样一个问题：报告应该包括哪段时间？从形式上说，报告包括第一次代表大会到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段时间，即从 1898 年到 1903 年。但是，由于第一次代表大会既不完备，时间又太短，而且是在十分不利的条件下举行的，因此报告最好追溯到 1898 年以前的那段时间。

还应当附带说明一下，极详尽地列出报告的问题，决不能解释为只有最熟悉运动历史的同志或者一般最能回答所有这些问题的同志才是代表大会最好的代表。代表大会应当在统一运动和把运动大力向前推进方面起实际的作用，最好的代表应当是那些最有毅力、最有威信和最能献身于革命工作的同志，即使新同志也行。报告可以由许多人草拟，此外，在某些情况下，派遣的代表也许可能不止一人：如果这样，特别希望能让大量工人代表参加代表大会。

现在我就把问题列出来，这些问题共分为 8 项或 8 类（把问题一一分开，甚至分成几类，常常是勉强的，这无非是为了评述的方便，因为所有问题相互之间都有极为紧密的联系）。

一 工人运动及其历史和现状

1．工业条件和状况的简短说明。当地的（工业的、商业的、手工业的等等，也许还有农业的）无产阶级的人数、成分、分布和其他特点。

2．受到社会主义鼓动的工人的范围有多广？哪些区？哪些工厂？哪些家庭工人，等等。尽可能详细地叙述这部分工人自运动开始以来的发展情况。

3．尽可能全面地列举出过去的罢工，详细地叙述每次规模较大的罢工。最好有综合材料。

4．除罢工外，工人们是否有过出色的抵制行动和其他集体行动［注：是否有过集体声明？公开集会？是否参加过公开的“揭露”？等等。］？关于这些行动的详细情况。

5．过去和现在有过哪些工人小组、储金会、自学团体、工人组织和工会？尽可能全面地叙述所有这类团体，其组织形式、主要成份、人数、存在时间、活动性质，在这方面的试验结果等等。

6．是否有过建立合法的工人团体的尝试？关于每一次这种尝试及其成就、影响、命运、现状和意义的详细材料。也谈一谈祖巴托夫协会。是否有过为了社会民主党的利益而利用合法团体的尝试？

7．当前危机的影响如何？主要根据工人的材料说明这次危机的特点。失业者，他们的情绪，对他们的鼓动等等。

二 地方社会主义者小组的历史，社会民主党人的出现，他们内部的派别斗争

8．到社会民主党人出现时，是否还有旧的社会主义者组织的痕迹？这些痕迹表现在哪里，影响如何？什么时候和什么人开始在工人阶级中进行宣传鼓动？是民意党人？他们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态度如何？

9．单个的社会民主党人或单个的社会民主党小组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况下出现的？尽可能详细地叙述每个小组（根据提出来的大纲），它的意义和对后来的小组的影响。

10．地方小组中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其他地方（如城市）的影响如何？国外书刊的影响如何？合法马克思主义的（和“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书刊的影响如何？尽可能详细地说明第一种、第二种和第三种影响。

11．社会民主党人内部的意见分歧。在 1898 年的宣言[2]发表以前，是否有过意见分歧？表现在哪里？有没有留下文件？对宣言的反应如何？它引起了什么样的和什么人的抗议或者不满？所谓“经济主义的”观点是怎样出现的？它们是怎样发展和传播的？更确切地有根有据地描述这一点，对地方运动的每一个经济主义“阶段”是非常重要的。在对党的各个机关刊物——《工人报》[3]（1897 年），国外《工作者》文集及其《小报》[4]，《工人思想报》，《工人事业》，《火星报》，《曙光》，《斗争》，《生活》[5]等等——的评价上和在各个机关刊物的拥护者之间的斗争中，意见分歧是如何表现的？

补 11。社会民主党中的工人和“知识分子”之间是否有过分裂和纷争？弄清楚这些分裂和纷争的原因和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12．在地方小组中，派别斗争是如何进行的？只在社会民主党知识分子中进行？还是也在工人中进行？也在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有联系的大学生中进行？斗争是否表现为分裂？表现为成立各自独立的小组？斗争是否由于一般的原则

问题而爆发？由于传单的内容？由于游行示威的问题？由于对待学生运动的态度问题？由于五一节提出的要求问题？

较详细地叙述派别斗争的经过、后果和这方面的现状。

三 地方委员会、地方团体和小组的组织情况

13．委员会（或团体、小组，如果数量很多，就一一说明）的主要成员是哪些人？学生？工人？成员的补充是通过选举（如何选举？）还是通过别的方法？是否有专门的知识分子委员会和工人委员会？是否有专门的技术组、宣传组、鼓动组？是否有专门的写作组、中心组、区小组、地方组、执行组？它们的相互关系按照“章程”（如果有这种章程的话）规定怎样，实际情况又怎样？是否召开全体会议？会议的职能是什么？多长时间开一次？规模如何？如何组织同其他城市和国外的联系（即派专人、专门的小组或者不属于小组的人等等）？如何组织分发书刊的工作？如何组织巡视工作？

从组织工作经验中得出什么结论？在委员会中，在知识分子中和工人中对组织原则的主要看法是什么？

详细弄清专门的知识分子委员会和工人（工厂工人、手工业者等等）委员会产生的原因和后果，是特别重要的。

14．工作是否扩展到邻近地区和其他地区？以怎样的形式扩展：是有组织地扩展，还是偶尔扩展？是否有过成立区组织或加入这种组织的尝试？

同其他地方的联系的性质。

区组织产生和工作的历史。区中心委员会的成分如何？它对地方委员会的态度如何？如何募集经费？是否有区储金会？是否有书刊储存处？区组织对工作的范围、工作的稳定性、各委员会之间的联系和其他等等的影响。

15．委员会的财政情况如何？是否有委员会成立以来全部收支（按委员会的报表，如果有的话）的综合材料？通常的和平均的预算，收入来源的性质，向工人募捐的款项，成员交纳的款项，书刊、晚会的收入，各种捐款，等等（《解放》和社会革命党在这方面的影响）。

支出的范围和性质：技术方面的开支？人员的生活费？巡视工作的开支？等等。

四 地方工作的性质、内容和范围

16．宣传。宣传员（小组）的成份、人数和活动方式如何？他们中间是否有工人？大学生是否占多数？是否有经验较多的同志进行监督和指导？是否有讲演的通用提纲，提纲是否随时修改？工人的反应和他们对某些题目的要求如何？是否有过把报告准备得很好的报告员派到各城市、各地区去的经验？朗读会的成员、人数、次数和情况如何？

17．经济鼓动。传单的印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能否计算一下所印发的各种传单有多少份（能否大致计算一下？）？这种鼓动在哪些地区、工厂和劳动部门进行？传单的编写和批准的程序如何？工人是否参加？出版和散发的技术如何？是否有工人书刊投递员？传单满足需要的程度如何？

18．政治鼓动。如何从经济鼓动过渡到政治鼓动？这种过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否引起过异议？第一批政治性传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是否有一个时期仅仅印发经济性传单？政治鼓动的问题提法和起因是什么？从传单的性质和散发的范围尽量详细地叙述政治鼓动的扩大情况。最好有文件，因为了解政治鼓动的所有情形和所有范围是很重要的。政治鼓动是否只在工人中进行，还是也在其他阶级中进行（参看下面）？传单的编写方法和程序如何？对传单的需要如何？传单满足需要的程度如何？更需要地方性传单还是更需要一般性传单？

19．书刊。散发哪些秘密出版物？把它们列举出来，指出散发的程度，委员会和工人（或者公众）对待每一种出版物（小册子等）的态度以及散发的时间，指出哪些阶层主要需要哪些书刊。

小组中散发书刊和集体阅读书刊的情况如何？哪些东西需要由知识分子来作解释？是否广泛地建立阅读讲解小组？读哪些作品？

20．地方的和全党的机关刊物。地方机关刊物的历史：多长时间出一次？印数多少？编写工作如何安排？材料的收集和保管情况如何？（有无遗失？）地方机关刊物和全党机关刊物的撰稿工作组织得如何？是否有专门的写作组、“记者”？同著作界的联系如何？用什么方法寄送通讯稿？是通过委员会，还是通过私人，范围是否广泛？是否有过利用大学生和被流放的人的尝试？

关于机关刊物的总结和要求。

21．五一游行示威。每次五一游行示威的经过和对将来的教训。

22．游行示威。每次游行示威的综合材料。是否有组织一般游行示威，尤其是组织回击的尝试？是否有组织武装的尝试？工人和一般“实际工作者”对这点的看法如何？

补充和审查党的关于游行示威的文献。

现今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五 同其他种族和其他民族的革命的（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的）团体的关系

23．是否有其他民族和其他种族的工人？在他们中间的工作进行得怎样？是有组织地进行，还是偶尔地进行？用什么语言进行？同使用其他语言共同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团体的关系如何？最好对这些关系作确切详细的说明。是否有意见分歧？是关于民族纲领的原则问题的意见分歧？还是策略上的意见分歧，组织

上的意见分歧？为了共同工作，最好有什么样的关系？是否可能有统一的党的机关刊物？联邦制是否理想，哪种类型的联邦制？

六 印刷所、交通联络和秘密工作的安排

24．印刷所。开办印刷所的经验。经费开支和所用的人力。生产能力。对本地的印刷所（以便印刷传单？）和许多城市共用的印刷所的需要如何？这项工作的技术、组织、财务和保密等情况。

25．交通联络。过去是否有这方面的联系？有活动吗？每一种活动的经过情况以及关于活动的布置、进程、结果和对未来的展望的详细材料。理想的组织形式。

26．秘密工作的安排。是否有秘密住所？标志如何？是否有暗号？如何取得身分证？这方面的经验如何？在这方面是否有联系？

如何安排约会？

如何监视特务？同特务和奸细斗争的情况如何？斗争的形式，过去的形式和应采取的形式如何？

密码。城市和城市之间、市内以及同国外如何通信？

是否有关于“如何对付审讯”问题的读物？是否需要这种或类似的小册子？

委员会的档案工作如何？过去有档案吗？是否保存？现在呢？

七 在工人阶级以外的其他居民阶层中的联系和活动

27．农民中的工作情况如何？是否有单独的联系？是否有这种联系的详细材料？如何建立联系和如何保持联系？同什么样的农民有联系？同农业工人有联系吗？到农村去的工人的作用如何？

进行过哪些宣传？小册子、传单的散发情况如何？是些什么小册子和传单？成绩如何？

现状和对未来的展望。

28．大学生。是偶然的和个人的影响，还是有组织的影响？是否有很多社会民主党人出身于大学生？是否同大学生小组、同乡会、大学生联合会有联系？如何建立这些联系？是通过阅读小组？散发书刊？大学生中的主要情绪和各种情绪转化的经过。

对学潮的态度如何？

大学生参加游行示威的情形如何？是否事先对这个问题有过商量？

是否有大学生宣传员，如何培养他们？

29．中等学校、中学、教会学校等等以及商业学校的情况如何？同中学生的联系的性质如何？对待他们中间的运动发展新阶段的态度如何？是否作过建立小组和组织学习的尝试？是否有过（或是常有）刚毕业的（或者未毕业的）中学生就参加社会民主党的情形？有小组和阅读小组吗？散发书刊的情形如何？

30．同“社会”的联系如何？过去和现在都有联系吗？同哪些阶层有联系？是否通过募集经费和散发书刊建立联系？是否为了建立公开的图书馆，为了收集消息和通讯建立联系？“社会”对待社会民主党的态度有何变化？对社会民主党书刊的需求如何？同官吏、邮电和铁路职员、工厂视察机关、警察局职员、僧侣等的联系如何？

最好介绍一下委员会的各个委员同各阶层进行个人联系的经验。

31．同军界的联系如何？社会民主党人中服过兵役的知识分子和工人的作用如何？同军官和士兵的联系如何？如何维持和利用这种联系？这种联系在鼓动、宣传、组织和其他方面的意义。

关于这个问题和前几个问题最好有特别详细的材料，因为这是些新问题，并且必须把许多分散的措施综合起来，联结起来。

八 非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和反政府派的状况，对待它们的态度

32．自由主义派别。自由主义民粹派。在社会中？在大学生中？《解放》，它的传播（在大学生中间？在工人中间？）和影响如何？是否有“解放派”小组？它们对待社会民主党人的态度。

社会民主党人对《解放》的兴趣和看法。是否利用这个杂志来进行宣传和鼓动？

是否开大会进行辩论？

33．社会革命党人。他们在当地出现的详细经过如何？何时出现？前身是民意党人？转变为社会革命党人？“经济主义”的影响如何？社会革命党人同外界的联系的性质如何，同什么样的人联系？他们的小组的性质和成分如何？老战士？大学生？工人？同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情况如何？斗争的进程和进行斗争的方式如何？

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联合团体。这些团体的详细历史，关于这些团体的工作、传单、决议及其他等等材料。

造成社会革命党人力量强大或弱小的特殊条件如何？是否热中于恐怖手段？在大学生中？在工人中？

社会革命党人在农民中的工作如何？他们在农民中的联系和活动的性质如何？他们的“土地纲领”的影响如何？

34．其余的集团和派别。“自由社”，“俄国政治解放工人党”，马哈伊斯基派[6]，工人旗帜派[7]等等。关于他们的观点和他们对待社会民主党人的态度的说明，关于他们同外界的联系和工作情况的材料。

注释：

[1]指为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而成立的组织委员会（参看注41）。——55。

[2]指 1898 年 3 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由党的中央委员会以代表大会名义发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1 分册第 4—6 页）。——59。

[3]《工人报》（《Рабочая газета》）是基辅社会民主党人小组的秘密报纸，波·李·埃杰尔曼、巴·卢·图恰普斯基、尼·阿·维格多尔契克等任编辑，在基辅出版。共出过两号：第 1 号于 1897 年 8 月出版；第 2 号于同年 12 月出版（报纸上印的日期是 11 月）。图恰普斯基曾受编辑部委派出国同劳动解放社建立联系，得到了格·瓦·普列汉诺夫等给报纸撰稿的许诺。《工人报》和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也有联系。《工人报》参与了 1898 年 3 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被这次代表大会承认为党的正式机关报。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工人报》的印刷所被警察破获和捣毁，已编好待发排的第 3 号没能出版。

1899 年崩得中央委员会试图恢复《工人报》，编辑部曾先后建议列宁参加编辑和撰稿，列宁表示同意。列宁在《给编辑部的信》中叙述了他参加工作的条件，并随信寄去了他为《工人报》写的三篇文章：《我们的纲领》、《我们的当前任务》和《迫切的问题》（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157—174 页）。由于该报复刊未成，这些文章当时也就没有发表。——59。

[4]《工作者》文集（《Работник》）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不定期刊物，由劳动解放社编辑，1896—1899 年在日内瓦出版，读者对象为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成员。列宁是出版这个文集的发起人。1895 年 5 月，他在瑞士同格·瓦·普列汉诺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以及劳动解放社的其他成员商谈了出版这个文集的问题。1895 年 9 月回国以后，他又多方设法为这个文集提供物质支援和组织稿件。到 1895 年 12 月被捕为止，他除为文集撰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见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1—12 页）外，还给文集编辑部寄去了阿·亚·瓦涅耶夫、米·亚·西尔文、索·巴·舍斯捷尔宁娜等写的通讯。这个文集一共出了 6 期（3 册）。

《<工作者>小报》（《Листок《Работника》》）是《工作者》文集的附刊，1896—1898 年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 10 期。第 1—8 期由劳动解放社编辑。第 9—10 期合刊由经济派编辑，于 1898 年 11 月出版。——59。

[5]《生活》杂志（《Жизнь》）是俄国文学、科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897—1901 年在彼得堡出版。该杂志从 1899 年起成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机关刊物，实际领导者是弗·亚·波谢，撰稿人有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彼·伯·司徒卢威等。该杂志刊登过列宁的《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和《答普·涅日丹诺夫先生》两文。在小说文学栏发表过马·高尔基、安·巴·契诃夫、亚·绥·绥拉菲莫维奇、伊·阿·布宁等的作品。该杂志于 1901 年 6 月被沙皇政府查封。

1902 年 4—12 月，该杂志由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波谢、维·米·韦利奇金娜等组织的生活社在国外复刊，先后在伦敦和日内瓦出了 6 期，另外出了《<生活>杂志小报》12 号和《<生活>杂志丛书》若干种。——59。

[6]马哈伊斯基派是 20 世纪初俄国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接近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小派别，由其领导人瓦·康·马哈伊斯基得名。该派敌视知识分子，力图挑起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对抗。它认为知识分子“垄断地占有知识”，依靠工人劳动而生活，也是寄生阶级，并攻击科学社会主义是“知识分子对工人的极大欺骗”。马哈伊斯基派在伊尔库茨克、敖德萨、华沙、彼得堡等地有一些互不联系的小组，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微不足道，1905 年革命以后就无声无息了。——66。

[7]工人旗帜派是指 1898—1902 年存在于彼得堡、比亚韦斯托克、基辅、格罗德诺、考纳斯等地的革命团体——工人旗帜社的成员，他们大多是从被经济派夺取了领导权的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中退出的革命工人。工人旗帜派反对工人运动

只搞经济斗争，号召无产阶级积极投身政治活动，但是在组织问题上否定集中制建党原则。工人旗帜派的政治观点不完全一致，其中一部分人倾向于民粹派。各地的工人旗帜社之间也缺乏经常的联系。工人旗帜派出版过 3 号《工人旗帜报》（第 1 号于 1898 年 5 月在比亚韦斯托克出版，第 2 号于 1900 年 3 月在伦敦出版，第 3 号于 1901 年 2 月 7 日在基辅出版）和一些小册子，包括纲领性小册子《俄国工人政党的任务》。彼得堡的工人旗帜社曾于 1898 年宣布自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并企图联合其他社会民主主义团体与 1898 年 3 月宣布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相对抗。该社在彼得堡建立了一些工人小组，曾多次组织罢工和传播非法书刊，后被沙皇警察破坏。1901 年，工人旗帜派一部分活动家（维·巴·诺根、谢·瓦·安德罗波夫、阿·亚·索尔茨等）加入了列宁火星派；不久，另一部分活动家（波·维·萨文柯夫、伊·普·卡利亚耶夫等）加入了社会革命党。——66。

《关于“组织委员会”成立的通告》后记[1]

列宁（1903 年 1 月 15 日〔28 日〕）

“四年前，几个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统一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制定了一个组织计划和一些总的活动原则，这在党所发表的《宣言》中已作了阐明。可惜这个第一次尝试未能成功：当时还没有具备为建立统一的、强有力的、坚持不懈地为使无产阶级摆脱各种压迫和剥削而斗争的社会民主党所必需的因素。一方面，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实际活动形式本身才刚刚在形成；不久前才踏上斗争道路的社会民主党还正在寻找能最好地贯彻自己的理论观点的途径，它的步伐还不够大胆，不够坚定。作为社会民主党活动基础的工人运动，已经发展成为大规模的罢工，它一迸发出灿烂夺目的光芒，就使得许多人眼花缭乱，看不见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如此清楚明确的任务和目的，使他们一味醉心于狭隘的工会斗争。另一方面，政府不断采取镇压手段来打击尚未巩固、尚未深深扎下根子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破坏了各种继承性，摧毁了活动的一切传统。

但是这个没有成功的尝试并不是没有影响的。我们的先驱们所遵循的建立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从那时起就成为全体觉悟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指路明灯和向往的目标。这四年来，我们曾不止一次地试图实现最早的社会民主党活动家的这个遗志。但是迄今为止，我们仍然象四年前一样，处于组织涣散状态。

与此同时，生活向我们提出的要求却愈来愈高。如果说党的最早的活动家的任务是唤醒工人群众中沉睡着的革命力量，那么我们的任务就复杂得多。我们必须把这种觉醒起来的力量引上正路，领导和指导这种力量。我们应当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就听到这样的呼声：‘把我们引向你们号召我们去的地方吧！’如果那时我们还象现在这样分散，这样毫无准备，措手不及，那就太可怕了。不要以为我们

把形势说得太严重了。谁要是能够透过五光十色的表面现象深入地探索一下，谁要是能够洞察事物内部发展着的过程，他就不会认为我们言过其实了。

但是，使形势变得更加严重的，还有其他情况。我们正处在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时期。由俄国生活的整个进程引起的工人阶级的觉醒，使得社会各个阶层都活动起来。他们程度不同地意识到必须努力组织起来，以便通过不同的方式参加反对陈旧制度的斗争。祝他们成功！对任何一个参加这场斗争的人，社会民主党当然只能表示欢迎。但是必须警惕：不要让这些同盟者把社会民主党当成他们手中的工具，不要让他们把社会民主党推出主要的活动舞台，不要让他们夺去反专制斗争中的领导地位，而主要的，是不要让他们危害前进中的革命斗争，把斗争引入歧途。凡是密切注意近几年来革命斗争的人都会明白，这种危险并不是什么臆想中的幽灵。

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党目前面临着任何地方委员会、甚至任何区的组织都不能胜任的重大任务。不论地方组织多么完善，它们也不能胜任这项任务，因为这项任务已经超出地方的范围。只有靠团结成为一支集中的、纪律严明的队伍的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集体力量，才能完成这项任务。但是，实行统一，该由谁来倡议呢？

彼得堡'斗争协会'、联合起来的南方各委员会和各组织中央委员会、《火星报》组织、崩得两个中央委员会（国内的和国外的）、'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以及其他几个组织的代表在去年举行的代表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代表会议委托某几个组织的代表成立一个组织委员会，把真正恢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任务担当起来。

为了执行这项决议，彼得堡'斗争协会'、《火星报》组织、'南方工人'社［注：当时也曾建设崩得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组织委员会，但是我们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崩得对这一邀请没有作出反应。我们希望，这些原因纯属偶然，希望崩

得将很快派出自己的代表。〕的代表们成立了组织委员会，它的首要任务就是为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准备条件。

但是召开代表大会是一件极其复杂的工作，并且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因此在党的中央机构恢复以前，组织委员会将担负某些全国性的工作（印刷全国性传单，整个的交通联络和技术工作，建立各委员会之间的联系等等）。

不言而喻，由某几个组织个别倡议成立的组织委员会，只是对那些已经授予它或者将要授予它全权的组织才具有约束力。对于所有其他的委员会和团体来说，组织委员会只是一个为它们提供服务的局部性组织。

组织委员会毅然担负的任务十分艰巨。而它之所以敢于担负起这样的任务，只是因为统一的工作太迫切，分裂现象太明显，涣散状态的继续存在对整个事业的威胁太大。组织委员会在着手工作的同时认为，它的工作能否取得成绩，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社会民主党各委员会和组织对它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本身将是检查它对目前形势的估计是否正确的准绳。

组织委员会 1902 年 12 月”

※ ※ ※

新成立的我们党的组织委员会的声明本身已经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也就不必多费唇舌去谈论这一步骤的重大意义了。统一，即恢复党的完整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最紧要的、迫切需要完成的任务。这个任务很困难，因为我们需要的，不是几群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的统一，而是所有领导工人运动以唤起居民中整整一个人数众多的阶级去争取独立生活、去进行斗争的人的统一。我们需要的，是在严格的有原则的团结基础上的统一，这种统一是所有或大部分委员会、组织、团体、知识分子和工人（他们在各种不同环境不同条件下进行活动，有时是通过各种完全不同的途径树立起自己的社会民主主义信念的）都必须自觉地和坚决地去实现的。这种统一不仅不能靠下一道命令来建立，而且也不能只靠与会的代表通过一

些决议就一下子建立起来，应当经常不断、一步一步地准备和建立这种统一，也就是说要使全党代表大会能够巩固已做的工作，纠正其中的缺点，将业已开始的工作继续下去，并为今后更广泛更深入的工作奠定和正式确立牢固的基础。因此我们特别欢迎组织委员会以明智审慎而谦逊的态度进行自己的工作。组织委员会并不要求对广大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具有任何约束力，它只为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提供服务而已。希望一切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委员会和小组、组织和团体、现在担任工作的人和暂时不担任工作的人（被流放的人等等）都能迅速响应这个号召，争取同组织委员会建立直接的和密切的联系，全力积极支持整个宏大的统一工作。我们应当努力做到使每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团体都能同组织委员会建立联系，都能同它团结友爱地一起工作。其次，组织委员会在把筹备和召开全党代表大会当作它的首要任务的同时，也担负起为运动提供服务的某些全国性的工作。我们深信，没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不认为组织委员会这样扩大职权是迫切需要的，因为这只是扩大提供服务的范围而已，这种服务将满足已经成千上万次地提出过的要求，并不需要谁放弃任何的“权利”，而只想尽快地在实践上消除隔绝状态，来共同安排一系列联合措施。最后，组织委员会断然宣称召开代表大会是一件极其复杂的工作并且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我们认为这是完全正确和恰当的。当然，这决不是说要延迟召开代表大会。绝对不是。要是讲到代表大会的迫切性，那么连花一个月时间准备代表大会我们也认为太“长了”。但是，如果考虑一下我们的工作条件，考虑一下我们必须在代表大会上认真地反映整个运动的情况，那么即使这一段时间再延长五倍十倍，也不会使任何一个多少有点经验的工作人员泄气的。

愿尽快统一和恢复党的工作取得各方面的成就。让我们不仅用言辞，而且立刻用每个人的行动来表示支持吧。俄国的和国际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万岁！

注释：

[1]这是列宁为《关于“组织委员会”成立的通告》在 1903 年 1 月 15 日《火星报》第 32 号上发表而写的后记。

组织委员会（组委会）即筹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是在 1902 年 11 月 2—3 日（15—16 日）举行的普斯科夫会议上成立的。

1902 年 3 月，经济派和崩得分子发起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和组织的比亚韦斯托克代表会议曾选出由《火星报》的费·伊·唐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各委员会和组织联合会的奥·阿·叶尔曼斯基、崩得中央委员会的 К. Я. 波尔特诺伊组成的组织委员会。但是代表会议结束不久，它的两名委员就被捕了，因此这个组织委员会事实上并未着手工作。

1902 年春天和夏天，列宁在给《火星报》俄国组织的两名成员——彼得堡的伊·伊·拉德琴柯和萨马拉的弗·威·林格尼克的信中，提出了成立新的组织委员会的任务（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4 卷）。列宁认为，火星派应在组织委员会中起主导作用，同时为保持同比亚韦斯托克代表会议的继承关系，在制止崩得代表企图影响俄国社会民主党事务的条件下，吸收崩得代表加入组织委员会也是必要的。1902 年 8 月 2 日（15 日），由列宁主持，在伦敦召开了一次火星派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弗·潘·克拉斯努哈、彼·阿·克拉西科夫和弗·亚·诺斯科夫。这次会议建立了俄国组织委员会的核心。会议决定邀请崩得和当时向《火星报》靠拢的南方工人社派代表参加组织委员会，同时给了组织委员会以增补新委员的权利。

11 月 2—3 日（15—16 日），在普斯科夫举行了社会民主党各组织的代表会议，成立了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克拉斯努哈、《火星报》俄国组织的伊·伊·拉德琴柯和南方工人社的叶·雅·列文组成的组织委员会。组织委员会还增补了《火星报》俄国组织的克拉西科夫、弗·威·林格尼克、潘·尼·勒柏辛斯基、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协会的亚·米·斯托帕尼为委员

（拉德琴柯、克拉斯努哈和勒柏辛斯基于会议后次日被捕）。会议还通过了《关于“组织委员会”成立的通告》，该《通告》于 1902 年 12 月在俄国印成单页出版。

崩得没有派代表出席这次会议，在《火星报》发表《关于“组织委员会”成立的通告》后不久，崩得在自己的报纸《最新消息》上发表声明攻击组织委员会。列宁在《论崩得的声明》（见本卷第 80 页）一文中，尖锐地批判了崩得的立场。

1903 年 2 月初，在奥廖尔举行了组织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会议决定吸收《火星报》俄国组织的罗·萨·哈尔贝施塔特和叶·米．亚历山德罗娃、南方工人社代表 B．H．罗扎诺夫、崩得代表波尔特诺伊参加组织委员会，并批准火星派分子波·伊·戈尔德曼、A．П．多利沃-多布罗沃尔斯基、罗·萨·捷姆利亚奇卡和崩得分子伊·李·艾森施塔特为组织委员会候补委员。会议制定并通过了代表大会章程草案和有权参加代表大会的组织的名单。代表大会章程草案分发给各地方委员会进行讨论。结果，在组织委员会列入有权参加代表大会组织名单的 16 个组织中，表决通过章程草案的全部条文的占三分之二以上；这样，代表大会的章程就得到了各地方组织的通过和批准。组织委员会根据这一章程进一步开展了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谈到组织委员会的工作时写道：“组委会主要是一个负责召集代表大会的委员会，是一个有意吸收各种色彩的代表（直到崩得为止）组成的委员会；而实际建立党的组织统一工作，则完全由《火星报》组织来担负。”（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8 卷第 274 页）——74。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事[1]

列宁（1903 年 9 月上半月）

这篇记事是专为我自己的朋友们写的，因此没有征得作者（列宁）的同意而阅读它，就等于偷看别人的信件。

为了便于理解下述的内容，我首先谈谈代表大会的组成，虽说这样谈是提前了一些。大会有表决权的票数是 51 票（有 33 位代表每人是 1 票，有 9 位代表每人是 2 票，也就是说，有 9 位代表是“双票”）[2]。有发言权的人数，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 10 人，这就是说，代表总数是 52 人。整个大会过程表明，这些票在政治上的派别划分如下：有表决权的——崩得 5 票，工人事业派 3 票（2 票代表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3]，1 票代表彼得堡“斗争协会”[4]），南方工人派 4 票（2 票代表“南方工人”社[5]，2 票代表同“南方工人”社完全一致的哈尔科夫委员会），不坚定分子、动摇分子（“泥潭派”[6]，所有火星派分子都这样称呼他们，这自然是取笑他们的话）6 票，最后，比较坚定、比较彻底地坚持自己的火星立场的火星派分子大约 33 票。这 33 个火星派分子原先团结一致一直左右着大会各种问题的解决，但是后来也分裂成了两个小派别，他们是在大会快要结束的时候彻底分裂的：一派大约 9 票，他们是“温和路线，确切些说是曲折路线”（或者用某些爱开玩笑的人挖苦他们的说法，是女人路线，这样说并不是没有根据的）的火星派分子，他们主张公正，主张不偏不倚等等（从下面就可以看出）；另一派大约 24 票，他们是强硬路线的火星派分子，他们无论在策略方面或是在党中央机关的人选方面都坚持彻底的火星主义。

我再说一遍，这样的派别划分，只是到后来，在大会（召开了近 40 次会议！）快要结束时才最终形成并完全显露出来的。而我提前一步，一开头就把这种派别划分勾划出来。我还要附带说一下，这种派别划分所反映的票数仅仅是个大致的

数字，因为在某些细小问题上（而有一次也在一个大问题上，即在“语言平等”问题上，这在下面将要讲到）票数往往很分散，一部分人弃权，各派互相掺杂起来，等等。

大会的组成是由组织委员会[7]预先确定的。按照大会的章程，组织委员会有权邀请它认为需要邀请的人（有发言权）参加大会。大会一开始就选出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所有与大会组成有关的问题都交给它（委员会）去解决。（这里附带提一下，有一个崩得分子也参加了这个委员会，他常常同委员会的全体委员纠缠不休，把他们拖到夜里3点钟，而最后还是在每一个问题上“保留自己的意见”。）

大会是在全体火星派分子和谐地同心协力地工作下开幕的。自然，在他们中间小小的意见分歧是经常有的，但是这些分歧并没有成为政治上的分歧。这里，我们顺便预先提一下，火星派的分裂是大会的主要政治结果之一，因此，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特别注意同这一分裂有关的哪怕是关系并不密切的全部细节。

选举主席团是大会刚开始时极重要的一幕。马尔托夫主张选出 9 人，每次开会由这 9 人推选 3 人主持，而且他还提出一名崩得分子参加这个 9 人委员会。我主张只选出 3 人在整个大会期间主持会议，并且要由这 3 人“严格掌握”。结果选出了普列汉诺夫、我和 T 同志（下面要常常提到他，他是强硬路线的火星派分子，组委会委员）。后者得到的票数其实只比一位南方工人派分子（也是组委会委员）稍微多一点。但是，我和马尔托夫在主席团问题上的分歧（从以后的种种事实看来，这是一个重要的分歧），并没有造成任何分裂或冲突：问题也象在《火星报》[8]组织中和在《火星报》编辑部内通常处理大部分问题那样，就那么和和平平地、自然而然地、“按家庭方式”解决了。

在大会即将开始的时候，《火星报》组织召开了一次会议（当然是秘密的和非正式的），讨论了《火星报》组织出席大会代表的代表委托书问题。会议同样和平地、“友好地”解决了问题。我所以提起这次会议，只是因为我认为这次会议有两

个特点：第一，火星派分子在大会开始时是亲密合作的；第二，他们决定在发生怀疑和争论时，由《火星报》组织（确切些说是出席大会的《火星报》组织成员）的权威来解决，当然，这种会议的表决并不具有约束力，因为有一条规定："取消限权委托书"，每个代表在大会上可以而且应当根据自己个人的信念自由投票，完全不用服从任何组织。这项规定可以说是全体火星派分子一致承认的，而且几乎在《火星报》的每一次会议开始时都由主席大声宣布过。

其次，大会上的第一个事件是众所周知的"组委会事件"，这个事件暴露了火星派内部并不完全一致，并成了最终的悲剧（或者说悲喜剧？）的"开场戏"。关于这一事件应当详细谈谈。当大会还忙于制定自己本身的各项规定，还在讨论大会议事规程的时候，这一事件就发生了（顺便说说，由于崩得分子的干扰，由于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有意无意地、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讨论议事规程花了许多时间）。组委会事件的症结是：组委会一方面还在大会开会以前就拒绝了要求准许参加大会的"斗争"社[9]的抗议，在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内支持这个决定，另一方面同一个组委会突然又在大会上宣布，它邀请梁赞诺夫以有发言权的代表的资格参加大会。这一事件爆发的经过如下。

还在大会开幕以前，马尔托夫就秘密地告诉我，有个《火星报》组织的成员同时也是组委会委员的人（我们暂且把他叫作 N），决定在组委会里坚持邀请一个人以有发言权的代表的资格参加大会。拟邀请的这个人，据马尔托夫自己说，只有用"反复倒戈的分子"[10]这个词才能说明他的为人。（这个人有一个时期的确向《火星报》靠拢过，但是，后来，而且是仅仅几个星期以后，又跑到《工人事业》[11]那边去，尽管它当时已经处于完全没落的阶段。）我和马尔托夫谈过这件事情。使我们感到愤慨的是：一个《火星报》组织的成员竟采取了这样的步骤，他明明知道（因为马尔托夫事先警告过 N 同志）这样做对《火星报》是一个直接的打击，但他还是认为没有必要同组织商量。N 的确向组委会提出过建议，但是

他的建议由于遭到T同志的激烈反对而被否决了。T同志当时详详细细地描绘了这个“反复倒戈的分子”整个变化无常的政治面貌。值得注意的是，N的这种做法使得马尔托夫大为震惊，以致于在当时，用他自己的话说，已经不能和N谈话，尽管过去他们私交很好。N成心同《火星报》作对还表现在：在他的支持下，组委会对《火星报》编辑部提出了警告，这一警告虽然只是为了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引起了马尔托夫极大的愤怒。此外，来自俄国国内的消息（也是马尔托夫告诉我的），还表明N一再散布国外火星派分子和国内火星派分子闹纠纷的谣言。所有这一切都使火星派分子对N采取极端不信任的态度。而在这时，又发生了这样一件事。组委会拒绝了“斗争”社的抗议，被邀请参加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组委会委员（T和N）异口同声地最坚决地反对（N也在内!!!）“斗争”社。可是，在大会的一次上午会议休息时，组委会突然在“窗边”召开会议，并且在这次会议上决定邀请梁赞诺夫以有发言权的代表的资格参加大会！N 赞成邀请。T当然坚决反对，并且声明：在大会的组成问题交给由大会选出的专门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处理以后，组委会作出这样的决定是不合法的。当然，组委会内的南方工人派分子+一个崩得分子+N压倒了T同志，于是组委会的决定成立了。

关于这一决定，T向《火星报》编辑部作了报告。编辑部（并非全体委员出席，但有马尔托夫和查苏利奇在场）当然一致决定在大会上同组委会进行斗争，因为许多火星派分子在大会上已经公开反对“斗争”社，当时在这一问题上退却是不可能的。

当组委会（在下午的会议上）向大会宣布了它的决定以后，T也在大会上提出了抗议。当时，组委会内的一个南方工人派分子谴责T，责备他破坏纪律（!），因为组委会已决定不得在大会上泄露这件事情的真相（原文如此!）。不言而喻，我们（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和我）那时也强烈谴责组委会，责备他们恢复限权

委托书，破坏大会的最高权力等等。大会站到了我们这一边，组委会被击败了，通过了一项决议，取消组委会作为一个委员会干预大会组成的权利。

“组委会事件”就是这样。第一，这一事件彻底摧毁了很多火星派分子在政治上对 N 的信任（同时加强了对 T 的信任）；第二，它不仅证明而且十分清楚地表明甚至在仿佛是清一色的火星派中央机关——组委会内，火星派还是这样地不巩固。很明显，在组委会内除了一个崩得分子以外，还有：（1）采取自己特殊政策的南方工人派分子，（2）“以当火星派分子为可耻的火星派分子”，以及（3）只有一部分不以当火星派分子为可耻的火星派分子。当南方工人派分子希望同《火星报》编辑部就这一不幸事件进行谈话（当然是私下进行）时，——N 同志丝毫没有愿意谈话的表示（指出这一点很重要），——编辑部同他们进行了谈话，我直截了当地对南方工人派分子讲，大会彻底揭示了这样一个重大的政治事实：党内有许多以当火星派分子为可耻的火星派分子，他们专门使《火星报》为难，作出象邀请梁赞诺夫这样的怪事。我对 N 在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内发言反对“斗争”社后又作出这种怪事感到非常气愤，我在大会上公开地说：“参加过国外代表大会的同志们都知道，那些在委员会内说一套，而在代表大会上又说另一套的人，总是会引起大家极大的愤怒的。”［注：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7 卷第 244 页。——编者注］这些害怕崩得分子“斥责”他们是“《火星报》的傀儡”，并且仅仅为了这个缘故而作出反对《火星报》的政治性怪事的“火星派分子”，当然不会得到人们的信任。

马尔托夫试图找 N 谈话导致了 N 声明退出《火星报》组织！！这时，火星派分子对 N 的普遍不信任大大地增加了。从这时起，N“事件”就转到《火星报》组织去处理。《火星报》组织的成员对他这种退出《火星报》组织的行为感到很气愤，《火星报》组织为这个问题召开了四次会议。这几次会议，特别是最后一次，

非常重要，因为在这几次会议上，火星派内部主要是在中央委员会的人选问题上最后形成了分裂。

但是，在谈《火星报》组织的这几次会议以前（我再说一遍，这些会议是私下的，非正式的），我要先来讲一讲大会的工作。这些工作当时还都是同心协力地进行的，这就是说无论在第 1 项议程（崩得[12]在党内的地位）上、还是在第 2 项议程（党纲）和第 3 项议程（批准党中央机关报）上，所有火星派分子的步调是一致的。火星派分子的一致行动，使大会上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团结一致的多数派（崩得分子伤心地称之为紧密的多数派！），同时“不坚定分子”（或称“泥潭派”）和南方工人派就在这时也不止一次地在某些细小问题上表现出自己十分不坚定。不完全是火星派的分子在政治上的派别划分在大会上愈来愈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现在我再回过头来谈《火星报》组织的几次会议。在第 1 次会议上决定请 N 作解释，并让 N 自己表示他愿意同《火星报》组织的哪些人谈话。我坚决反对这样处理问题，要求把政治问题（火星派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在政治上对 N 不信任）同个人问题（指定一个委员会调查 N 的奇怪行为产生的原因）分开。在第 2 次会议上，有人宣告说 N 愿意在 T 不在场的条件下谈话，虽然据说关于 T 本人，他并不想讲什么。我第二次提出反对意见，拒绝参加这种谈话，认为不能允许一个非本组织的成员排斥（即使是非常短暂地排斥）一个本组织的成员，何况他并不是要讲该成员；我认为这是 N 玩弄的可耻的把戏，是打这个组织的耳光：N 不相信这个组织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要这个组织给他提供一定的条件，他才进行谈话！在第 3 次会议上，N 作了“解释”，但是大多数参加谈话的人都不满意他的解释。第 4 次会议是在全体火星派分子出席的情况下召开的，但在这次会议召开以前，大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

首先值得提出的是“语言平等”事件。在通过党纲时，曾讨论到语言方面平等和享有同等权利这一要求如何措辞的问题（党纲的每一条都是单独讨论通过，崩得分子拼命阻挠，以致差不多大会的三分之二的时间都花在讨论党纲上面了！）。崩得分子在这个问题上达到了动摇火星派队伍的目的，使一部分火星派分子相信了他们的所谓《火星报》不同意“语言平等”的说法；事实上，《火星报》编辑部只是不同意这种在编辑部看来是文理不通的、荒谬的、多余的措辞。斗争十分激烈，大会分成了两半——两个票数相等的部分（有个别代表弃权）。《火星报》（和《火星报》编辑部）方面大约有 23 票（可能是 23—25 票，确切数目记不清了）；反对它的也有同样多的票数。问题不得不拖延下来，交给一个委员会去解决。委员会拟出了一个方案，被整个大会一致通过。语言平等事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又一次暴露了火星主义阵地的不稳固，同时也彻底暴露了不坚定分子的动摇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正是在这时候，正是马尔托夫一派的火星派分子自己把这些人叫作泥潭派！）和一致反对《火星报》的南方工人派分子的动摇性。感情冲动到极点，火星派分子，特别是马尔托夫分子，对南方工人派说了无数尖刻的话。有一位马尔托夫派“首领”在休息时差一点跟南方工人派分子动起武来，这时我赶紧宣布继续开会（因为普列汉诺夫再三催促，他生怕打起来）。必须指出，在这 23 名最坚定的火星派分子中间，马尔托夫分子（即后来跟着马尔托夫跑的火星派分子）也是占少数。

另一个事件是由于“党章”第 1 条而引起的斗争。这已经是第 5 项议程，接近大会尾声了。（第 1 项通过了反对联邦制的决议；第 2 项通过了党纲；第 3 项承认了《火星报》是党中央机关报［注：指出下面这一点很重要，即根据我的报告在组委会内通过的并得到大会批准的议程，包括下列两个单独项目：第 3 项“建立或批准党中央机关报”和第 24 项“选举党中央机关”。当时有一个工人事业派分子就第 3 项提出质问说：我们批准谁？是批准报纸的名称吗？我们连编辑部是

哪些人也不知道！于是马尔托夫起来发言解释：要批准的是《火星报》方针，不管编辑部是哪些人；这决不是预先决定编辑部的人选，因为选举中央机关将在第24 项议程中进行，并且任何限权委托书都已经取消了。

马尔托夫的这些话（关于第 3 项，在火星派分裂以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马尔托夫的解释同我们大家对议程第 3 项和第 24 项的意义的理解是完全一致的。

第 3 项议程结束以后，马尔托夫在大会的发言中甚至不止一次地使用《火星报》原来的编辑部成员这样一个字眼。]；第 4 项听取了“代表们的报告”，听取了其中的一部分，其余的交给了一个委员会，因为大会显然已经没有时间了（经费和人们的精力都已耗尽了））。

党章第 1 条确定了党员的概念。在我的草案中，党员的定义是这样的：“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支持党并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可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马尔托夫则提议用在党的一个组织的监督和领导下工作来代替上述加了着重标记的字样。普列汉诺夫赞成我的条文，其余的编辑部成员都赞成马尔托夫的条文（阿克雪里罗得代表他们在大会上讲了话）。我们证明：为了把干实事的人和说空话的人分开，为了消除组织上的混乱现象，为了防止可能出现有些组织由党员组成但又不是党的组织这种荒谬现象等等，必须缩小党员的概念。马尔托夫则主张扩大党，并讲到广泛的阶级运动要求广泛的、界限模糊的组织等等。奇怪的是，差不多所有马尔托夫的拥护者在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时，都引用了《怎么办？》[注：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6 卷第 1—183 页。——编者注]！普列汉诺夫激烈地反对马尔托夫，指出马尔托夫的饶勒斯主义的条文是给那些只渴望既在党内又置身于组织以外的机会主义者敞开大门。当时我说，所谓“在监督和领导下”实际上是不折不扣地意味着没有任何监督和任何领导 [注：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7 卷第 272 页。——编者注]。在这个问题上，马尔托夫获得了胜

利：他的条文被大会通过（大约以 28 票对 23 票的多数或大致如此的票数通过，确切票数记不清了）。这是多亏了崩得，他们自然立刻就看到了漏洞所在，把他们的所有 5 张票都投了出去，通过了“更坏的东西”（《工人事业》的一位代表[13]正是这样说明自己为什么投票赞成马尔托夫的！）。关于党章第 1 条的激烈争论和表决又一次显示了大会上的政治派别划分，并清楚地表明：崩得+《工人事业》支持火星派的少数派来反对它的多数派，就能够决定任何一项决议的命运。

党章第 1 条的争论和表决结束后，《火星报》组织召开了最后一次（第 4 次）会议。火星派内部在中央委员会人选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已经表现得很明显，并且在他们队伍中引起了分裂：有些人主张选出一个火星派的中央委员会（鉴于《火星报》组织和“劳动解放社”[14]已经解散，以及必须继续完成火星派的工作）；另一些人则主张让南方工人派也参加，并让采取“曲折路线”的火星派分子占主要地位。有些人坚决反对 N 当候选人，另一些人则表示赞成。为了争取达成协议作了最后一次努力，召开了 16 人会议（《火星报》组织的成员，并且，我再说一遍，有发言权的也包括在内）。表决结果：9 票反对 N，4 票赞成，其余的弃权。在这以后，多数派还不愿同少数派宣战，提出了一个调和的 5 人名单，其中有一个南方工人派分子（为少数派所欢迎的）和一个好战的少数派分子，其余都是彻底的火星派分子（其中——这一点很重要——有一个是在大会的斗争快结束时才参加斗争的，实际上是不偏袒任何一方的；另外两个则根本没有参加斗争，在人选问题上是绝对不偏不倚的）。赞成这个名单的有 10 人（后来又增加了 1 人，变成 11 人），反对的 1 人（只有马尔托夫一人！），其余的弃权！这样，调和的名单就被马尔托夫撕毁了。之后，双方各自提出了“对抗的”名单付表决，但是都只得到了少数票。[15]

这样，在《火星报》组织的最后一次会议上，马尔托夫分子在两个问题上都处于少数地位，但是当多数派的一个成员（一个不袒护任何一方的人即主席）在会后去找他们，试图作最后一次调解的时候，他们却宣战了。

马尔托夫派的打算是明显而准确的：崩得分子和工人事业派分子无疑会支持曲折路线的名单，因为在大会开了一个月的会议之后，每个问题都非常清楚，每个人物的面貌也都非常明显，大会的每一个代表都不难作出抉择：什么对他更好些，或者说什么对他害处少些。而对崩得+《工人事业》来说，采取曲折路线的火星派分子自然害处少些，而且永远是这样。

16 人会议以后，火星派最后分裂了，双方正式宣战。大会上分裂成的两个派别开始各自召开会议，即各自召集所有思想一致者举行私下的、非正式的会议。最初，坚持彻底路线的火星派分子有 9 人（16 人中的 9 人）开会，后来有 15 人，最后有 24 人（按有表决权的票数而不是按人数计算）。这样迅速增长的原因是：（中央委员会）候选人的各种不同的名单已经开始传阅，马尔托夫派的名单立即无可挽回地遭到绝大多数火星派分子的拒绝，因为这是一张软弱的名单——马尔托夫派提出的候选人在大会上的表现实在太差了（动摇不定，反复无常，一味蛮干等等）。这是一。第二，向火星派分子说明在《火星报》组织内部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一做法，使他们在大多数场合转到多数派这方面来，再加上马尔托夫不能坚持明确的政治路线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24 票就很顺利地、迅速地联合起来，一致坚持彻底的火星派的策略，赞同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赞同选出编辑部三人小组（而不是批准旧的、没有工作能力的、界限模糊的编辑部六人小组）。

这时，大会结束了党章的讨论。在这期间，马尔托夫及其一伙又在崩得+《工人事业》的有力协助下，再一次（甚至不止一次，而是好几次）战胜了火星派多数派，比如在增补中央机关的成员问题上（这一问题，大会是按照马尔托夫的主张解决的）。

尽管党章遭到了损害，整个党章还是由全体火星派分子和整个大会通过了。但在共同章程通过以后，接下去讨论崩得的章程时，大会以压倒的多数票否决了崩得的提议（即承认崩得为党内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看来，在这个问题上崩得几乎是单独同整个代表大会相对立。当时，崩得分子退出了大会，并且声明退出党。马尔托夫派失去了 5 个可靠的同盟者！接着，当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16]被承认为国外唯一的党组织的时候，工人事业派也退出了大会。马尔托夫派又失去了 2 个可靠的同盟者！这时，大会上有表决权的一共有 44 票（51 票－7 票），其中大多数是彻底的火星派分子（24 票）；马尔托夫派加上南方工人派和“泥潭派”总共只有 20 票。

采取曲折路线的火星派分子本来应该服从，象坚持强硬路线的火星派分子在遭到马尔托夫和崩得的联合打击并被击败时那样不声不响地服从，但是马尔托夫分子却放肆到了这样的地步，他们不仅不服从，而且无理取闹，制造分裂。

提出批准旧编辑部的问题就是无理取闹，因为只要有一个编辑提出声明，大会就必须对整个中央机关报的人选问题重新进行审查，而不仅仅是批准一下。拒绝选举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就是一种分裂行为。

先谈谈编辑部的选举。前面已经讲过，议程的第 24 项是：选举党的中央机关。而且我在对议程的说明[17]（所有火星派分子和所有参加大会的代表都知道这个说明，而且火星派分子在大会召开以前老早就已经知道这个说明）中，曾在页边上写道：选出三人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选出三人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因此，毫无疑问，选举 3 人的要求是从编辑部内部提出的，而且编辑部没有一个人反对这个要求。就连马尔托夫和另一个马尔托夫派首领，也在大会召开以前，在许多代表面前维护过这“两个三人小组”的主张。

在大会开幕前几星期，我曾亲口对斯塔罗韦尔和马尔托夫说过，我将在大会上要求选举编辑部；我同意选举两个三人小组，并认为编辑部三人小组可以增补

7 人（或更多），也可以就只是 3 人（我特别说明了后者的可能性）。斯塔罗韦尔甚至直截了当地说，这三人就是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列宁，我也赞同他的意见。有一点对每个人来说一直是很清楚的，即只有这些人可以当选为领导者。只有在大会斗争中恼羞成怒、怨天尤人和丧失了理智的人，才会在事后来攻击三人小组的合理性及其工作效能。旧的六人小组如此没有工作效能，三年来竟没有开过一次全体会议——这很难令人置信，但这是事实。45 号《火星报》没有一号不是马尔托夫或列宁编的（就编辑技术工作来说）。除了普列汉诺夫，谁也没有提出过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阿克雪里罗得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在《曙光》[18]上连一篇文章也没有写，而在所有 45 号《火星报》上总共也只写了三四篇文章），查苏利奇和斯塔罗韦尔只限于写稿和提出一些建议，从来没有做过真正的编辑工作。应当选什么人当政治领导者，应当把什么人选入中央——这在大会开了一个月之后，对于大会的每个代表来说，都已经非常清楚了。

把批准旧编辑部的问题搬到大会上来，只能是一种荒谬的制造纠纷的行为。

说它荒谬，是因为它是徒劳无益的。即使六人小组被批准，只要有一个编辑部成员（例如我）要求重新审查编辑部，检查它的内部关系，大会就又得重新处理这个问题。

说它是制造纠纷的行为，是因为不批准就会被认为是一种侮辱，——而重新选举却丝毫不含有侮辱之意。既然中央委员会是由大家选举的，那么中央机关报也应该让大家来选举。既然没有谈到批准组委会，那也就不必谈什么批准旧编辑部。

马尔托夫派要求批准的提议提出以后，自然在大会上引起了反对。反对被看作是一种侮辱、欺凌、驱逐、排斥……于是各式各样的可怕故事都编造出来了，现在一些无聊的造谣者的种种想入非非的杜撰，就是以这些故事作材料的！

当讨论关于选举还是批准的问题时，编辑们退出了会场。经过异常激烈的争辩后，大会决定：不采取批准旧编辑部的办法［注：有一个马尔托夫分子这时作了一个非常激动的发言，以致在他的话说完以后，有一位代表就向秘书高声喊叫：请在记录上用一滴眼泪来代替句点吧！最坚决的“泥潭派”分子特别热烈地拥护旧编辑部。］。

这一决定通过后，原来的编辑部成员才回到会场。这时，马尔托夫就站起来，以个人名义并代表他的一伙人拒绝选举，讲了许许多多可怕的和抱怨的话，谈到什么“党内戒严状态”（是对落选的阁员们吗？），什么“对付个别分子和独立团体的非常法”（是对那些以《火星报》名义把梁赞诺夫偷偷塞给火星派，在委员会内说一套，在大会上又说另一套的人吗？）。

我在答复他时指出，是政治概念的极端混乱使他们反对选举，反对代表大会改组党的负责人员组成的委员会［注：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7 卷第 288 页。——编者注。］。

结果选出了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和列宁。马尔托夫再次表示拒绝。柯尔佐夫（得了 3 票）也表示拒绝。于是，大会通过决议，委托中央机关报的两位编辑部成员在找到适当人选时增补第三位成员。

接着选出了三位中央委员，检票人只向大会报了其中一人的名字。同时还选出了（用秘密投票方式）党总委员会[19]的第五个委员。

马尔托夫派及其追随者整个“泥潭派”都没有投票，他们就此事向主席团提交了一份书面声明。

这显然是分裂行为，是破坏大会、不承认党的行为。但是，当一个南方工人派分子公开声明他对大会的决议的合法性表示怀疑（原文如此！）时，马尔托夫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并起来反驳这位代表，当众声明，他对决议的合法性并不怀疑。

遗憾的是，马尔托夫（以及马尔托夫派）的所作所为同他的这些漂亮的忠诚的话不一致……

接着，大会把公布记录的问题提交“记录委员会”，并通过了11项策略性的决议：

（1）关于游行示威的决议。

（2）关于工会运动的决议。

（3）关于在教派信徒中的工作的决议。

（4）关于在青年学生中的工作的决议。

（5）关于在审问时应采取的态度的决议。

（6）关于工厂的工长的决议。

（7）关于1904年阿姆斯特丹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

（8）关于自由派的决议（斯塔罗韦尔提出的）。

（9）关于自由派的决议（普列汉诺夫提出的）。

（10）关于社会革命党人[20]的决议。

（11）关于党的出版物的决议。

接着，主席作了简短的讲话，提醒大家必须遵守大会决议，最后宣布大会闭幕。

在仔细地考察了马尔托夫派在大会以后的行为——拒绝撰稿（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正式请他们撰稿［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致尤·奥·马尔托夫》（1903年10月6日）。——编者注］），拒绝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进行抵制的宣传——之后，我只能说这是一种狂妄的、不是党员所应有的破坏党的行为……为什么要这样呢？只是由于他们不满意中央机关的人选，因为在客观上，只是在

这个问题上，我们才分道扬镳，而主观的判断（如说什么侮辱、欺凌、驱逐、排斥、诋毁，等等等等）只不过是受触犯的自尊心和病态的幻想所造成的结果。

这种病态的幻想和受触犯的自尊心直接导致最可耻的造谣。他们不知道也还没有看到新的中央机关的活动，就散布谣言说中央机关“没有工作效能”，说伊万·伊万诺维奇的“刺猬皮手套”，说伊万·尼基佛罗维奇的“拳头”[21]等等。

他们用抵制中央机关的手段来证明中央机关“没有工作效能”，这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违反党员义务的行为。任何诡辩都不能掩盖这一点：抵制是分裂党的行为。

俄国社会民主党还要经历最后一个困难的过渡：从小组习气过渡到党性，从庸俗观念过渡到对革命义务的自觉认识，从造谣中伤和施加小组压力过渡到纪律性。

谁珍视党的工作，珍视维护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事业，谁就不能容许象对中央机关进行“合理的”、“正当的”抵制这种卑劣的诡辩行为，谁就不能容许因十来个人对自己和自己的朋友没有被选入中央机关感到不满而使事业遭到损害，工作陷于停顿，谁就不能容许在私下秘密地通过以不撰稿相威胁，通过抵制，通过断绝经费，通过造谣中伤和散布流言蜚语来影响党的负责人员。

注释：

[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事》是在这次代表大会后，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的分裂、破坏活动进行尖锐斗争的时期写的。在大会记录于 1904 年 1 月公布以前，这篇《记事》是阐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结果和党分裂的原因的唯一文件。《记事》中的思想在列宁后来的一些文章、信件、讲话中，特别在《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1。

[2]列宁在这里引用的是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在 1903 年 7 月 18 日（31 日）代表大会第 2 次会议上作报告以前的材料。当时到会的共有 42 名有表决权的代表，

其中有 1 票表决权的代表 33 名，有 2 票表决权的代表 8 名；剩下 1 名崩得国外委员会的代表在第二名代表来到以前暂时也有 2 票表决权。崩得国外委员会的第二名代表到会以后，从 7 月 22 日（8 月 4 日）起，在代表大会上有表决权的代表共 43 名，其中有 1 票表决权的 35 名，有 2 票表决权的 8 名。加上有发言权的代表 14 名，大会代表共有 57 名；其中 2 名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只参加了几次会议。——1。

[3]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是根据劳动解放社的倡议，在全体会员承认劳动解放社纲领的条件下，于 1894 年在日内瓦成立的。联合会为俄国国内出版书刊，它的出版物全部由劳动解放社负责编辑。1896—1899 年联合会出版了不定期刊物《工作者》文集和《〈工作者〉小报》。1898 年 3 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承认联合会是党的国外代表机关。1898 年底，机会主义分子（经济派）在联合会里占了优势。1898 年 11 月，在苏黎世召开的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声明，除《工作者》文集以及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和《新工厂法》两个小册子外，拒绝为联合会编辑出版物。联合会从 1899 年 4 月起出版《工人事业》杂志，由经济派分子担任编辑。1900 年 4 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的成员以及与其观点一致的人正式退出联合会，成立了独立的革命组织“社会民主党人”。此后联合会和《工人事业》杂志就成了经济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代表。1903 年，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联合会宣布解散。——1。

[4]这里指的是自称为彼得堡“斗争协会”的彼得堡“工人组织”的代表莉·彼·马赫诺韦茨（布鲁凯尔）。关于这个组织，见注 138。——1。

[5]南方工人社是 1900 年秋初以《南方工人报》为中心在俄国南方形成的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南方工人报》于 1900—1903 年秘密出版，共出版了 12 号。在不同时期加入南方工人社和参加《南方工人报》编辑部的有伊·克·拉拉扬茨、阿·维

连斯基、奥·阿·科甘（叶尔曼斯基）、波·索·策伊特林、叶·雅·列文、叶·谢·列文娜、B.H.罗扎诺夫等。

南方工人社与经济派相对立，认为进行政治斗争和推翻专制制度是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它反对恐怖主义，主张开展群众性革命运动。但是，南方工人社过高估计自由资产阶级的作用，轻视农民运动，并且不同意火星派关于把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联合在《火星报》周围以建立一个集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计划，而提出通过建立各区域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途径来恢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计划。1901 年 12 月，他们召开了俄国南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和组织的代表大会，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各委员会和组织联合会，而以《南方工人报》为其机关报。这个尝试和南方工人社整个组织计划一样，是不切实际的。在 1902 年春大批组织被破坏后，联合会就瓦解了。1902 年 8 月，南方工人社开始同《火星报》编辑部就恢复俄国社会民主党统一的问题进行谈判。南方工人社发表了支持《火星报》的声明（载于 1902 年 11 月 1 日《火星报》第 27 号和 1902 年 12 月《南方工人报》第 10 号），这对团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具有很大意义。1902 年 11 月，南方工人社的成员参加了筹备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但是南方工人社在这个时期仍有分离主义倾向，他们曾要求出版一种与《火星报》平行的全俄报纸。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南方工人社的代表采取了中派立场。根据这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南方工人社解散。——1。

[6]泥潭派原来是 18 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人们给国民公会里的中派集团取的绰号，又译沼泽派，也称平原派，因他们的席位处在会场中较低的地方，故有此称。泥潭派在国民公会中占多数，代表中等工商业资产者的利益。他们没有自己的纲领，在各政治派别的斗争中依违于左派和右派之间，而总是站到当时力量较强者的一边。泥潭派一词后来成了那些动摇不定、企图回避斗争的派别的通称。——1。

[7]组织委员会（组委会）即召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是在 1902 年 11 月 2—3 日（15—16 日）举行的普斯科夫会议上成立的。1902 年 3 月，经济派和崩得分子发起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和组织的比亚韦斯托克代表会议曾选出由《火星报》的费·伊·唐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各委员会和组织联合会的奥·阿·叶尔曼斯基、崩得中央委员会的 К. Я. 波尔特诺伊组成的组织委员会。但是代表会议结束不久，它的两名委员就被捕了，因此这个组织委员会事实上并未着手工作。

1902 年春天和夏天，列宁在给《火星报》国内组织的成员——彼得堡的伊·伊·拉德琴柯和萨马拉的弗·威·林格尼克的信中，提出了成立新的组织委员会的任务（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4 卷）。列宁认为，火星派应在组织委员会中起主导作用，同时为保持同比亚韦斯托克代表会议的继承关系，在制止崩得代表企图影响俄国社会民主党事务的条件下，吸收崩得代表加入组织委员会也是必要的。1902 年 8 月 2 日（15 日），由列宁主持，在伦敦召开了一次火星派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弗·潘·克拉斯努哈、彼·阿·克拉西科夫和弗·亚·诺斯科夫。这次会议建立了俄国组织委员会的核心。会议决定邀请崩得和当时向《火星报》靠拢的南方工人社派代表参加组织委员会。同时给了组织委员会以增补新的委员的权利。

11 月 2—3 日（15—16 日），在普斯科夫举行了社会民主党各组织的代表会议，成立了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克拉斯努哈、《火星报》国内组织的伊·伊·拉德琴柯和南方工人社的叶·雅·列文组成的组织委员会。组织委员会还增补了《火星报》国内组织的克拉西科夫、弗·威·林格尼克、潘·尼·勒柏辛斯基、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协会的亚·米·斯托帕尼为委员（拉德琴柯、克拉斯努哈和勒柏辛斯基于会议后次日被捕）。会议还通过了《关于“组织委员会”成立的通告》，该《通告》于 1902 年 12 月在俄国印成单页出版。

崩得没有派代表出席这次会议，在《火星报》发表《关于“组织委员会”成立的通告》后不久，崩得在自己的报纸《最新消息》上发表声明攻击组织委员会。列宁在《论崩得的声明》（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7 卷第 80—86 页）一文中，尖锐地批判了崩得的立场。

1903 年 2 月初，在奥廖尔举行了组织委员会的第 2 次会议。会议决定吸收《火星报》国内组织的罗·萨·哈尔贝施塔特和叶·米·亚历山德罗娃、南方工人社代表 B.H.罗扎诺夫、崩得代表波尔特诺伊参加组织委员会，并批准火星派分子波·伊·戈尔德曼、A.П.多利沃-多布罗沃尔斯基、罗·萨·捷姆利亚奇卡和崩得分子伊·李·艾森施塔特为组织委员会候补委员。会议制定并通过了代表大会章程草案和有权参加代表大会的组织的名单。代表大会章程草案分发给各地方委员会进行讨论。结果，在组织委员会列入有权参加代表大会组织名单的 16 个组织中，表决通过章程草案的全部条文的占三分之二以上；这样，代表大会的章程就得到了各地方组织的通过和批准。组织委员会根据这一章程进一步开展了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谈到组织委员会的工作时写道：“组委会主要是一个负责召集代表大会的委员会，是一个有意吸收各种色彩的代表（直到崩得为止）组成的委员会；而实际建立党的组织统一工作，则完全由《火星报》组织来担负。”（见本卷第 274 页）。——2。

[8]《火星报》（《Искра》）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 1900 年 12 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各号的出版地点是慕尼黑、伦敦（1902 年 7 月起）和日内瓦（1903 年春起）。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编辑部的秘书起初是因·格·斯米多维奇-列曼，1901 年 4 月起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担任。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他在《火星报》上发表

了许多文章，阐述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并评论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火星报》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往俄国翻印和传播。《火星报》成了团结党的力量、聚集和培养党的干部的中心。在俄国许多城市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火星派的小组和委员会。1902 年 1 月在萨马拉举行了火星派代表大会，建立了俄国《火星报》组织常设局。

《火星报》在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列宁的倡议和亲自参加下，《火星报》编辑部制订了党纲草案，筹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宣布《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

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火星报》编辑部改由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三人组成。但是马尔托夫坚持保留原来的六人编辑部，拒绝参加新的编辑部，因此《火星报》第 46—51 号是由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二人编辑的。后来普列汉诺夫转到了孟什维主义的立场上，要求把原来的编辑都吸收进编辑部。列宁不同意这样做，于 1903 年 10 月 19 日（11 月 1 日）退出了编辑部。《火星报》第 52 号由普列汉诺夫一人编辑。1903 年 11 月 13 日（26 日），普列汉诺夫把原来的编辑全部增补进编辑部。因此，从第 52 号起，《火星报》变成了孟什维克机关报，人们称之为新《火星报》。——5。

[9]斗争社是达·波·梁赞诺夫、尤·米·斯切克洛夫和埃·李·古列维奇于 1900 年夏在巴黎成立的一个团体，1901 年 5 月取此名称。该社试图调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之间的矛盾，建议统一社会民主党各国外组织。

1901 年秋，斗争社成为一个独立的著作家团体。它在自己的出版物（《制定党纲的材料》第 1—3 辑、1902 年《快报》第 1 号等）中歪曲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对列宁提出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原则和策略原则。由于它背弃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和策略，进行瓦解组织的活动，并且同国内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没有联系，因

此未被允许参加 1903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根据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斗争社被解散。——6。

[10]指伊·瓦·切尔内绍夫。——6。

[11]《工人事业》杂志（《РабочееДело》）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机关刊物，于 1899 年 4 月—1902 年 2 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 12 期（9 册）。该杂志的编辑部设在巴黎，担任编辑的有波·尼·克里切夫斯基、帕·费·捷普洛夫、弗·巴·伊万申和亚·马尔丁诺夫。该杂志支持所谓“批评自由”这一伯恩施坦主义口号，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和组织问题上持机会主义的立场。工人事业派宣扬无产阶级政治斗争应服从经济斗争的机会主义思想，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认党的领导作用。他们还反对列宁关于建立严格集中和秘密的组织的思想，维护所谓“广泛民主”的原则。《工人事业》杂志支持露骨的经济派报纸《工人思想报》；该杂志的编辑之一伊万申参加这个报纸的编辑工作。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工人事业派是党内机会主义极右派的代表。——6。

[12]崩得即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1897 年 9 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犹太人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 1898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 1903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 1906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崩得重新加入了党。从 1901 年起，崩得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它在党内一贯支持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 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

1918—1920 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 年 3 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9。

[13]指阿基莫夫（弗·彼·马赫诺韦茨）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第 23 次会议上的发言。——12。

[14]劳动解放社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由格·瓦·普列汉诺夫和维·伊·查苏利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格·捷依奇、瓦·尼·伊格纳托夫于 1883 年 8 月在日内瓦建立。劳动解放社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著作译成俄文，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到俄国，这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普列汉诺夫当时写的《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著作有力地批判了民粹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俄国社会的现实和俄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劳动解放社的两个纲领草案——1883 年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动解放社纲领》和 1885 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纲领草案》，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后一个纲领草案的理论部分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纲领的基本成分。劳动解放社在团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它还积极参加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活动，和德、法、英等国的社会民主党都有接触。劳动解放社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对伯恩施坦主义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在反对俄国的经济派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恩格斯曾给予劳动解放社的活动以高度评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301 页）。列宁认为劳动解放社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从理论上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向着工人运动迈出了第一步；劳动解放社的主要缺点是：它没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它的成员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缺乏具体分析，对建立不同于第二国际各党的新型政党的特殊任务缺乏认识等。劳动解放社于 1903 年 8 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宣布解散。——12。

[15]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火星报》组织的成员讨论了下列几个中央委员会人选名单：（1）多数派提出的“调和的”名单：B．H．罗扎诺夫（南方工人派分子，“为少数派所欢迎的”），列·达·托洛茨基（“好战的少数派分子”），弗·亚·诺斯科夫（“只在大会的斗争快结束时才参加斗争的”），当时在国内、没有参加代表大会的弗·威·林格尼克和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2）少数派提出的名单：罗扎诺夫、托洛茨基、维·尼·克罗赫马尔、诺斯科夫、克尔日扎诺夫斯基；（3）多数派提出的“对抗的”名单：诺斯科夫、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罗扎诺夫；（4）少数派提出的“对抗的”名单：诺斯科夫、罗扎诺夫、托洛茨基。进行选举时，罗扎诺夫拒绝列入多数派提出的“对抗的”名单，因而代之以林格尼克。当选为中央委员的是多数派的诺斯科夫、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林格尼克。出于保密的考虑，只向代表大会宣布了诺斯科夫一人的名字。——13。

[16]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是根据列宁的倡议由《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国外组织同“社会民主党人”组织于 1901 年 10 月在瑞士合并组成的。根据章程，同盟是《火星报》组织的国外部，其任务是协助《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出版和传播，在国外宣传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帮助俄国各社会民主党组织培养积极的活动家，向政治流亡者介绍俄国革命进程等。在 1903 年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同盟被承认为享有党的地方委员会权利的唯一国外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孟什维克的势力在同盟内增强。1903 年 10 月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同盟成了孟什维主义在国外的主要堡垒，直至 1905 年被撤销为止。——14。

[17]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例行）代表大会计划》（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7 卷第 370—377 页）。——15。

[18]《曙光》杂志（《Заря》）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刊物，由《火星报》编辑部编辑，1901—1902 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共出了 4 期（第 2、3 期为合刊）。

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机会主义错误思潮。杂志刊登了列宁的下列文章：《时评》、《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前 4 章、《内政评论》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16。

[19]党总委员会（1903—1905 年）是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建立的党的最高机关。它的职责是：协调和统一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活动，在这两个中央机关之一的全部成员出缺时恢复该机关，在同其他党的交往中代表党。党总委员会必须按照党章规定的期限召开党代表大会，并在拥有代表大会一半票数的党组织提出要求时提前召开党代表大会。党总委员会由 5 人组成，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各派 2 人，另一人由代表大会任命。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格·瓦·普列汉诺夫为党总委员会的第五名委员。列宁起初代表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参加党总委员会，在他退出《火星报》编辑部以后则代表中央委员会参加党总委员会。在普列汉诺夫转向机会主义和孟什维克篡夺了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以后，党总委员会就成了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的工具。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党总委员会被撤销。从第三次代表大会起，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党的唯一领导中心是中央委员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由中央委员会任命。——17。

[20]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 1901 年底—1902 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成立时的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谢·鲁萨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尼等，正式机关报是《革命俄国报》（1901—1904 年）和《俄国革命通报》杂志（1901—1905 年）。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

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秘密的事实上脱离该党中央的战斗组织。

在 1905—1907 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焚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怖”运动，并同其他政党一起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国家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不统一造成了 1906 年的分裂，该党的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人民社会党和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联盟。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经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 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内战结束后，他们在“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叛乱。1922 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18。

[21]伊万·伊万诺维奇（伊凡·伊万内奇）和伊万·尼基佛罗维奇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尼基佛罗维奇吵架的故事》中的主人公。这两个地主本是莫逆之交，后来为一枝猎枪的争端而反目，以致打了十几年的官司。——19。

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1]

列宁（1904 年 2—5 月）

序言

当持久的顽强的激烈的斗争进行的时候，通常经过一些时候就开始显出来一些中心的基本争论点，战斗的最终结局如何，就要看这些争论点是怎样解决的，而斗争中所有一切细微的枝节问题，同这些争论点比较起来，都会日益退居次要地位。

我们党内的斗争情况也是如此，这个斗争引起全体党员的深切注意已经半年了。正因为我现在向读者介绍全部斗争的概况时不得不涉及到许多毫无意思的细节，许多实质上没有什么意思的无谓争吵，所以我想一开头就请读者注意两个真正中心的基本点，这两个基本点是很有意思的，是有明显的历史意义的，并且是我们党内当前最迫切的政治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党划分为“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政治意义问题，这两个派别的划分使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以前的一切划分都退居次要地位了。

第二个问题是新《火星报》在组织问题上的立场的原则意义问题，因为这个立场真正带有原则性。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我们党内斗争的出发点，斗争的根源，斗争的原因，斗争的基本政治性质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这个斗争的最终结果，斗争的结局，把一切属于原则方面的东西综合起来和把一切属于无谓争吵方面的东西剔除出去而作出的原则性总结的问题。解决第一个问题要靠分析党代表大会上发生的斗争情况，解决第二个问题要靠分析新《火星报》的新的原则内容。这两种分析占

了我的小册子十分之九的篇幅，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多数派"是我们党的革命派，而"少数派"是我们党的机会主义派；目前使我们分为两派的意见分歧主要不是在纲领问题上，也不是在策略问题上，而只是在组织问题上；新《火星报》愈是深刻地表述自己的立场，这个立场愈是摆脱由增补问题引起的无谓争吵，在新《火星报》上也就愈清楚地显露出一系列新的观点，这一系列观点就是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现有的一些论述我们党内危机的出版物，其主要缺点就是在研究和阐明事实方面对党代表大会的记录几乎完全没有加以分析，而在阐明组织问题的基本原则方面，对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两同志在提出党章第 1 条条文以及为这个条文辩护时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同《火星报》现在在组织问题上的原则性观点的整个"体系"（如果这里说得上体系的话）之间显然存在的联系，也没有加以分析。关于党章第 1 条条文争论的意义，尽管"多数派"的出版物已经多次指出，但是现在的《火星报》编辑部似乎根本看不见这种联系。其实，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两同志现在只是在加深、发展和扩大他们最初在党章第 1 条条文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其实，机会主义者在组织问题上的整个立场，还在讨论党章第 1 条条文时就表现出来了：当时他们主张建立界限模糊的、松散的党组织；他们反对自上而下地建党，即从党代表大会以及它所建立的机关出发来建党的思想（"官僚主义"思想）；他们要求自下而上地建党，让任何一个大学教授、任何一个中学生和"每一个罢工者"都能自封为党员；他们反对要求每个党员参加党所承认的一个组织，认为这是"形式主义"；他们欣赏只愿意"抽象地承认组织关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他们屈服于机会主义的深奥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的空谈：他们欣赏自治制而反对集中制，总之，现在新《火星报》上极力鼓吹的一切，使人愈来愈明确地看出他们最初所犯的错误。

至于说到党代表大会的记录，人们所以对它采取那种实在不应该有的忽视态度，只能是因为我们的争论夹杂了一些无谓的争吵，也许还因为这些记录中有过多的过分辛辣的真情实话。党代表大会的记录使我们看到唯一非常确切、完备、全面、充分和正确地反映我们党内真情实况的情景，那些参加运动的人自己描绘的各种观点、情绪和计划的情景，我们党内存在的各种政治色彩及其对比力量、相互关系和相互斗争的情景。正是党代表大会的记录，也只有这些记录，向我们表明，究竟我们已经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清除了旧的、纯粹小圈子式的联系的一切残余，而代之以统一的伟大的党的联系。每一个党员，只要他愿意自觉地参加自己党的事业，都应该仔细研究我们党的代表大会，——我是说要研究，因为只读一遍记录所包含的一大堆素材，还不能了解代表大会的情景。只有经过仔细和独立的研究，才能够（而且一定会）使简短的发言提纲、干巴巴的讨论摘要、小问题（似乎是小问题）上的小的磨擦构成一个完整的东西，使每一个突出的发言人都在党员面前以生动的姿态出现，使出席党代表大会的每一个代表集团的整个政治面貌都很分明。本书作者如果能够对大家广泛地独立地研究党代表大会的记录起点推动作用，这项工作就算没有白做。

还有一句话要奉告那些反对社会民主党的人。他们看见我们发生争论，就幸灾乐祸，洋洋得意；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当然会竭力断章取义，抓住我这本谈论我们党内缺点和失误的小册子中的个别地方。可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已经久经战斗，决不会为这种刺激所惊扰，他们将不理会这些，而继续进行自我批评，无情地揭露自己的缺点，这些缺点是一定会、必然会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而被克服的。希望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先生们也能把反映他们“党”内真实情况的图景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哪怕只是稍微同我们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所提供的相近也好！

尼·列宁

1904 年 5 月

注释：

[1]《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一书于 1904 年 5 月在日内瓦出版。它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第一次详尽地批判了组织上的机会主义，制定了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的组织原则。为了写这本书，列宁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详细地研究了 1904 年 1 月发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和决议、每个代表的发言、大会上所形成的各政治派别、党中央委员会和总委员会的各种文件。从本卷《附录》中《〈进一步，退两步〉一书材料》可以看到，列宁写作此书的准备工作是做得非常细致、扎实的。

这本书一出版，就受到孟什维克的恶毒攻击。格·瓦·普列汉诺夫要求中央委员会同列宁的书划清界限。中央委员会里的调和派也曾试图阻止它的印刷和发行。尽管如此，列宁的这部著作仍在俄国先进工人中得到广泛传播。

列宁把这本书编入 1907 年（在扉页上印的是 1908 年）出版的《十二年来》文集第 1 卷时，删去了其中关于组织问题斗争细节和中央机关人选问题斗争的部分（即第 10—13、15、16 节），对其他各节也作了某些压缩，同时增写了一些注释。在《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中，这部著作是按 1904 年第 1 版原文刊印的，并按手稿作了校订，同时保留了作者在 1907 年版本中所加的补充。——197。

（一）代表大会的准备

常言说，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在 24 小时之内咒骂自己的审判官。我们的党代表大会，也和任何一个政党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一样，成了某些觊觎领导地位而遭到失败的人的审判官。现在，这些“少数派”分子怀着十分动人的天真心情“咒骂自己的审判官”，并且千方百计地想破坏代表大会的威信，贬低它的意义和权威性。这种倾向在《火星报》第 57 号发表的一篇署名为实际工作者的文章中，可以说表现得最突出，这位作者对于代表大会“神圣不可侵犯”这种思想深表愤慨。

这正是新《火星报》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特征，我们决不能对此保持沉默。被代表大会否决的人员占多数的编辑部，一方面继续自称为“党的”编辑部，另一方面又竭力欢迎那些说什么代表大会不是神灵的人。这岂不是太妙了吗？是的，先生们，代表大会当然不是神灵，可是对于那些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以后“痛骂”起代表大会来的人，又该怎么想呢？

那么，就让我们回想一下代表大会准备过程中的一些主要事实吧。

《火星报》从一开始就在 1900 年的出版预告［注：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311—318 页。——编者注］中说过，在统一以前，我们必须划清界限。《火星报》曾经力求把 1902 年的代表会议[2]变成非正式的会议，而不是党的代表大会［注：见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第 20 页。］。《火星报》在 1902 年夏秋期间设法恢复这次代表会议上选出的组织委员会时，行动是十分慎重的。最后，划清界限的工作结束了，——我们大家都认为是结束了。1902 年底，组织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火星报》欢迎组织委员会的成立，并在第 32 号的编辑部文章中宣布，召开党代表大会已经是迫切需要，刻不容缓［注：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7 卷第 76—78 页。——编者注］。可见，完全没有理由责备我们在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问题上过于匆忙。我们正是按七次量，一次裁这个准则办事的。我们有充分的道义上的权利期待同志们在裁了以后就不要再怨天尤人，也不要再量来量去。

组织委员会制定了非常细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章程（有些人也许会说这个章程是形式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东西，他们现在用这些字眼来掩盖自己在政治上的毫无气节），并且交给所有的委员会讨论通过，最后正式批准，其中第 18 条是这样规定的：“代表大会的一切决定和它所进行的一切选举，都是党的决定，一切党组织都必须执行。这些决定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借口加以反对，只有下一届党代表大会才能取消或加以修改。”［注：见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第 22—23 页和第 380 页。］其实，这几句话本身是无可指责的，所以当时就作为一种不言而喻

的东西，默默地通过了，可是现在听起来真令人惊奇，好象是专门给“少数派”下的判决词！规定这一条文的目的是什么呢？难道只是为了走一下形式吗？当然不是，当时，这个决定看来是必要的，而且确实是必要的，因为党是由许多分散的独立的集团组成的，它们有可能不承认代表大会。这个决定正是表达了所有革命者的善良愿望（现在有人对这种愿望未免讲得太多而且太不恰当，本来应当用“奇怪的”字眼表示的东西却娓娓动听地用“善良的”字眼来形容了）。这个决定等于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相互立下的誓言。这个决定是要保证一切为召开代表大会而承担的巨大的劳动、风险和开支都不至于白费，保证代表大会不至于变成一出滑稽剧。这个决定事先就规定任何不承认代表大会的决定和选举的行为都是破坏信任的行为。

新《火星报》说代表大会不是神灵，代表大会的决定也不是圣经，把这当作新发现的新《火星报》究竟是在嘲笑谁呢？它的发现究竟是包含了“新的组织观点”，还是只包含一些掩盖旧痕迹的新企图呢？

注释：

[2]1902 年代表会议是指 1902 年 3 月 23—28 日（4 月 5—10 日）在波兰比亚韦斯托克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和组织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是经济派筹办的。派代表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各委员会和组织联合会、崩得中央委员会及其国外委员会、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和《火星报》编辑部。经济派和支持他们的崩得分子起初打算把这次代表会议改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指望这样来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并抑制《火星报》日益增长的影响。但是，由于代表会议的代表面太窄（只有 4 个在俄国国内有活动的社会民主工党组织派代表出席，比第一次代表大会还少），而代表会议上暴露出来的原则性意见分歧又很大，尤其是《火星报》代表对此表示坚决反对，这一企图没

有得逞。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确定会议性质的决议，通过了崩得中央委员会代表提出的原则决议案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各委员会和组织联合会代表提出的修正案（《火星报》代表提出了自己的原则决议草案，因而投了反对票），批准了以《火星报》编辑部拟订的草案为基础的五一传单，选出了筹备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代表会议后不久，大多数代表和组织委员会委员遭到了逮捕，所以 1902 年 11 月在普斯科夫会议上又成立了新的组织委员会。——201。

（二）代表大会上的派别划分的意义

总之，代表大会是经过极细致的准备并根据有最充分的代表性的原则召开的。大会主席在代表大会宣告组成以后所作的声明（记录第 54 页）中也谈到，大家一致承认代表大会的组成是正确的，认为必须无条件地执行代表大会的决定。

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究竟是什么呢？就是在《火星报》所提出和制定的原则基础和组织基础上建立真正的党。《火星报》三年来的活动以及大多数委员会对《火星报》的承认，决定了代表大会应当按照这个方针进行工作。《火星报》制定的纲领和方针应该成为党的纲领和方针，《火星报》制定的组织计划应该在党的组织章程中明文规定下来。但是，不言而喻，要达到这样的结果，不经过斗争是不行的，因为代表大会的充分代表性保证了那些坚决反对《火星报》的组织（崩得和《工人事业》）以及那些口头上承认《火星报》是指导性的机关报，但是事实上却别有企图，并在原则方面表现得很不坚定的组织（“南方工人”社以及靠近该社的某些委员会的代表），都能出席代表大会。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大会不能不变成为火星派方针的胜利而斗争的舞台。代表大会也确实成了一场这样的斗争，每一个稍微细心阅读代表大会记录的人，马上就会看清这一点。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详细追溯一下在代表大会上讨论各种问题时暴露出来的最主要的派别划分，并

根据记录的精确材料重新描述一下代表大会上每一个主要集团的政治面貌。代表大会上要在《火星报》指导下融合成为统一的政党的那些集团、派别和色彩的真实面貌究竟是怎样的呢？——这是我们要通过分析争论情况和表决情况来加以阐明的。阐明这个情况，无论对于研究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的真正面貌，或者对于了解产生意见分歧的原因，都是极端重要的。正因为如此，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和在给新《火星报》编辑部的信件中，都着重于分析各种派别划分［注：见本卷第 38—48、91—98 页。——编者注］。“少数派”中一些出面反对我的人（以马尔托夫为首）根本不了解问题的实质。他们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只限于提出一些局部的修正，对谴责他们转向机会主义的问题作一些“辩解”，而根本没有试图对代表大会上的派别划分作出和我所作的哪怕是稍有不同的描绘。现在，马尔托夫在《火星报》（第 56 号）上，企图把一切想确切划分代表大会上的各个政治集团的尝试称之为不过是“小集团政客手腕”。马尔托夫同志，你说得真够厉害的！可是新《火星报》的厉害的话具有一种独特的属性：只要我们把分歧的全部演变过程（从代表大会开始）确切地重述一下，这些厉害的话就会不折不扣地首先反对现在的编辑部。请你们这帮提出小集团政客手腕问题的所谓党的编辑先生们看一看自己吧！

现在马尔托夫对我们在代表大会上的斗争的事实感到非常不愉快，以致竭力想根本抹杀这些事实。他说：“火星派分子就是那些在党代表大会上以及在代表大会以前对《火星报》表示完全支持，拥护它的纲领和组织观点，赞成它的组织政策的人。在代表大会上，这样的火星派分子共有 40 多人，——当时赞成《火星报》的纲领并赞成承认《火星报》是党中央机关报的决议的就是这么多票。”只要翻开代表大会的记录就可以看出，除了阿基莫夫一人弃权以外，全体一致通过了纲领（第 233 页）。这样，马尔托夫同志是要我们相信，无论是崩得分子、布鲁凯尔以及马尔丁诺夫，都曾经证明他们“完全支持”《火星报》并且拥护《火星报》

的组织观点！这是令人可笑的。这是把一切参加代表大会的人在代表大会以后成为权利平等的党员（而且还不是一切参加代表大会的人，因为崩得分子退出了）和在代表大会上引起斗争的派别划分混为一谈。结果不去研究代表大会以后的“多数派”和“少数派”究竟是由哪些分子组成的，反而用“承认了党纲”这么一句冠冕堂皇的话来打掩护！

试举承认《火星报》是中央机关报问题上的表决情况为例。你们可以看出，正是马尔丁诺夫，即现在被马尔托夫同志硬说是拥护过《火星报》的组织观点和组织政策的那个马尔丁诺夫，坚决要求把决议案分成两部分来表决：一部分是仅仅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另一部分则是承认《火星报》的功绩。在表决决议案的前一部分时（承认《火星报》的功绩，对它表示支持）赞成的只有 35 票，反对的有 2 票（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弃权的有 11 票（马尔丁诺夫，5 个崩得分子，以及编辑部的 5 票：我和马尔托夫各 2 票，普列汉诺夫 1 票）。由此可见，反火星派集团（5 个崩得分子和 3 个工人事业派分子）在这里，在这个对马尔托夫现在的观点最有利的并且是他自己选定的例子上，也是暴露得极其明显的。再看决议案的后一部分的表决情况，即不用说明任何理由和不用表示是否支持而只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的表决情况（记录第 147 页）：赞成的有 44 票，现在的马尔托夫把这些票数都算作火星派分子投的。总共是 51 票，除了编辑们的 5 票弃权以外，还有 46 票；有 2 票（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表示反对；可见在其余的 44 票中是包括所有 5 个崩得分子在内的。总之，崩得分子在代表大会上是“表示了完全支持《火星报》”的，——请看，正式的《火星报》就是这样撰写正式的历史！我们现在预先向读者说明一下编造这个正式的实际情况的真正动机：如果崩得分子和工人事业派分子没有退出代表大会，那么现在的《火星报》编辑部就会成为而且真正会成为党的编辑部（而不是现在这样的冒牌的党的编辑部）；

正因为如此，所以也就需要把现在的所谓党的编辑部的这些最忠实的卫士提升为“火星派分子”。不过这个问题要留待下文再详细说明。

其次，试问：如果代表大会是火星派分子和反火星派分子之间的斗争，那么是不是还有一些动摇于两者之间的中间的、不坚定的分子呢？任何一个稍微了解我们党以及任何代表大会的一般面貌的人，都会预先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马尔托夫同志现在很不愿意提起这些不坚定的分子，于是就把“南方工人”社以及倾向于该社的代表描绘成道地的火星派分子，把我们和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说成是微不足道和无关紧要的。幸亏现在我们面前有大会的全份记录，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文件材料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是事实问题。我们在上面说明了代表大会上的一般派别划分情况，当然没有奢望解决这个问题，而只是正确地提出这个问题。

如果不分析政治上的派别划分，如果不了解代表大会上某些色彩之间的斗争情景，那就丝毫不能了解我们的意见分歧。马尔托夫甚至把崩得分子算作火星派分子，以便抹杀各种色彩之间的区别，这不过是回避问题而已。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以前的历史，就可以预先指出（以备以后检验和详细研究）存在三个主要集团：火星派，反火星派，以及不坚定的、犹豫的、动摇的分子。

（三）代表大会的开始。——组织委员会事件

分析代表大会上的争论情况和表决情况，最好按照代表大会开会的顺序来进行，以便循序渐进地指出那些愈来愈明显的政治色彩。只有在绝对必要时，我们才离开时间顺序而综合地考察有密切联系的问题或者同类的派别划分。为了公正起见，我们将力求指出所有最重要的表决，同时当然要撇开许多有关枝节问题的表决，这些表决占去了我们代表大会过多的时间（部分原因是我们没有经验，不

善于使各专门委员会和全体会议分工讨论问题，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受到一些近乎捣乱的阻挠）。

第一个引起争论从而开始暴露出各种色彩的差别的问题，就是要不要把“崩得在党内的地位”一项提到第一位（作为代表大会“议程”的第 1 项）来讨论（记录第 29—33 页）。从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托洛茨基和我所拥护的《火星报》观点看来，这个问题是毫无疑问的。崩得退党一事显然证明了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既然崩得不愿意同我们一起走，不愿意承认党内大多数人和《火星报》一致主张的组织原则，那么“装个样子”好象我们在一起走，那是没有好处而且是毫无意义的，只能阻碍代表大会的工作（正如崩得分子曾经阻碍过一样）。问题早已在出版物上谈得很清楚了，每一个稍微细心思考的党员都知道，剩下的只是把问题公开地提出来，直截了当地老老实实地作一个选择：是自治（那么我们就一起走）还是联邦制（那么我们就分道扬镳）。

在自己的全部政策上一向支吾搪塞的崩得分子，在这里也想支吾搪塞，拖延问题。阿基莫夫同志表示赞同他们的意见，并且——大概是代表全体《工人事业》的拥护者——马上提出他在组织问题上同《火星报》的分歧意见（记录第 31 页）。站在崩得和《工人事业》方面的有马霍夫同志（他代表尼古拉耶夫委员会的两票，不久以前这个委员会还对《火星报》表示支持呢！）。马霍夫同志对问题完全没有弄清楚，并且认为“关于民主制的问题，或者反过来说〈请注意这几个字！〉关于集中制的问题”也是个“麻烦的问题”，就象现在我们“党的”编辑部中的多数人完全一样，而他们在代表大会上还不曾觉察到这个“麻烦的问题”！

总之，反对火星派的有崩得、《工人事业》和马霍夫同志，加在一起恰恰是当时反对我们的 10 票（第 33 页）。赞成的有 30 票，——正如我们下面所看到的，火星派方面的票数经常在 30 票左右。当时有 11 票弃权，——大概是不愿意站在互相斗争着的两“党”的任何一方。值得指出的是，当我们表决崩得的章程第 2

条时（由于这个第 2 条被否决，崩得退出了党），赞成的和弃权的也是 10 票（记录第 289 页），而弃权的正是三个工人事业派分子（布鲁凯尔、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以及马霍夫同志。可见，表决崩得问题在议程上占什么位置的问题时形成的派别划分，并不是偶然的。可见，所有这些同志不仅在讨论次序这个技术问题上，并且在实质上也同《火星报》有意见分歧。《工人事业》在实质上所持的分歧意见是每个人都清楚的，而马霍夫同志在关于崩得退党一事的发言中再好没有地说明了自己的态度（记录第 289—290 页）。这个发言是值得谈一下的。马霍夫同志说，在通过了否决联邦制的决议以后，“关于崩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地位问题，在他看来已经由一个原则问题变成对待历史上已经形成的民族组织的现实政策问题了”；这位发言人继续说：“这里我不能不考虑到我们的表决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因此我想投票赞成整个第 2 条”。马霍夫同志出色地领会了“现实政策”的精神，他在原则上已经否决了联邦制，因此他在实践上就想投票赞成章程内主张这个联邦制的那一条！于是这位“讲求实际的”同志就用下面的话来说明自己的具有深刻原则性的立场：“但是〈有名的谢德林式的“但是”!〉[3]，由于代表大会的其余一切参加者几乎一致表决了，所以我是赞成还是反对就只有原则意义〈!!〉而不会有什么实际意义，于是我宁肯弃权，以便原则地〈上帝保佑我们别沾染上这种原则性吧!〉表明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立场同投票拥护该条的崩得代表们的立场是不同的。相反，如果崩得的代表象他们自己预先主张的那样对这一条弃权，那么我就会投票赞成这一条了。”有谁能懂得这一点呢！一个有原则性的人因为大家都说“不”，就不肯大声说一个“是”字，因为这样说实际上没有用处。

在表决了崩得问题占什么位置的问题以后，接着在代表大会上又爆发了“斗争”社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也产生了非常值得注意的派别划分，并且同代表大会上的最“麻烦的”问题，也就是同中央机关的人选问题有密切联系。负责决定

代表大会人员组成的委员会，根据组织委员会两次决议（见记录第 383 页和第 375 页）以及组织委员会代表在这个委员会中的报告（第 35 页），反对邀请“斗争”社参加代表大会。

组委会委员叶戈罗夫同志说，“‘斗争’社问题〈请注意：这里说的是“斗争”社，而不是该社的某一个成员〉对于我是一个新问题”，因而请求休会。组委会两次解决过的问题对于组委会委员怎么会成了一个新问题，——这实在是令人莫名其妙。在休会时，组委会把当时偶然列席代表大会的委员（有几个组委会委员是《火星报》组织中的老成员，没有列席代表大会）［注：关于这次会议，请参看组委会委员、代表大会以前被一致选为编辑部代理人兼编辑部第 7 个成员的巴甫洛维奇所写的一封《信》（同盟记录第 44 页）。］召集起来开会（记录第 40 页）。关于“斗争”社问题展开了争论。工人事业派分子表示赞成（马尔丁诺夫、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第 36—38 页），火星派分子（巴甫洛维奇、索罗金、朗格、托洛茨基、马尔托夫等人）表示反对。代表大会又分裂成我们已经熟悉的那些派别。“斗争”社问题引起了激烈的斗争，马尔托夫同志作了一个特别详细的（第 38 页）和“富有战斗性的”发言，公正地指出国内组织和国外组织的“代表名额不均等”，认为给国外组织以“特权”未必有什么“好处”（真是金玉良言，现在从代表大会以后发生的一些事件看来，这话是特别有教益的！），认为不应当助长“党内组织上的混乱，即没有任何原则性的理由就发生分裂”（真是打中了……我们党代表大会的“少数派”的要害！）。一直到停止报名发言时，除了《工人事业》的拥护者以外，没有一个人公开地有根有据地表示支持“斗争”社（第 40 页）。应该为阿基莫夫同志以及他的朋友们说一句公道话：他们至少没有闪烁其词，没有隐瞒观点，而是公开地提出了自己的路线，公开地说出了自己的意图。

在停止报名发言以后，就问题实质来发表意见已经是不容许的了，可是叶戈罗夫同志却“坚持要求听取组委会刚才通过的决议”。怪不得代表大会的参加者

对这种手法表示愤慨，连大会主席普列汉诺夫同志也表示“莫名其妙，叶戈罗夫同志怎么能坚持自己的要求”。看来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在代表大会全体代表面前就问题的实质公开而明确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者是根本不发表意见。但是，既然已经同意停止报名发言，忽然又以作“结论”为借口向代表大会捧出组委会的新决议（正是对于已经讨论过的问题的决议），这简直是放冷箭！

下午继续开会，仍然感到莫名其妙的主席团决定放弃“形式手续”，而采用了在代表大会上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的最后措施，即进行了“同志式的解释”。组委会的代表波波夫宣读了组委会的决议，这个决议是除了巴甫洛维奇一人反对以外由组委会全体委员通过的（第 43 页），决议建议大会邀请梁赞诺夫出席代表大会。

巴甫洛维奇声明：他过去和现在都不承认组委会会议是合法的；组委会的新决议“同组委会以前的决议相抵触”。这个声明引起了一场风波。另一个组委会委员，“南方工人”社的成员叶戈罗夫同志回避切实地回答问题，而想把重心转移到纪律问题上去。他说巴甫洛维奇同志违背了党的纪律（！），因为组委会讨论过巴甫洛维奇的反对意见并决定“不把巴甫洛维奇的个别意见通知代表大会”。争论转到党的纪律问题上，普列汉诺夫在代表大会的热烈掌声下开导叶戈罗夫同志说：“我们这虽没有什么限权委托书”（第 42 页，参看第 379 页所载代表大会章程第 7 条：“代表的职权不应当受限权委托书的限制。他们在执行自己的职权时是完全自由和独立自主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因此违背党的纪律和代表大会的章程的正是以任何方式妨碍任何一个代表把所有一切党内生活问题直接提请代表大会解决的人。于是，争论问题就归结为二者必居其一：是小组习气呢，还是党性？是为了各种团体和小组臆造出的权利或章程而限制大会代表的权利呢，还是不仅口头上而且事实上在代表大会面前完全解散所有一切下级机关和旧时的小团体，直到建立真正的党的领导机关？读者由此可以看出，在目的是要

把党切实恢复起来的代表大会上，一开始（第三次会议）就爆发的这次争论具有多么重大的原则意义。这次争论可以说是旧时的小组、团体（如“南方工人”社）和复兴的党之间发生冲突的集中表现。所以各反火星派集团立刻就暴露了自己的面目：无论是崩得分子阿布拉姆松，无论是马尔丁诺夫同志，即现在的《火星报》编辑部的热心的同盟者，或者是我们熟悉的马霍夫同志，都表示支持叶戈罗夫和“南方工人”社而反对巴甫洛维奇。马尔丁诺夫同志现在同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抢着夸耀组织上的“民主制”，甚至拿……军队作比喻，说军队中只有经过下级机关才可以向上级机关申诉！！这个“紧密的”反火星派的反对派的真正意思，是任何一个出席过代表大会或者仔细注意过代表大会以前我们党内历史的人，都完全清楚的。这个反对派的任务（也许不是该派所有一切分子都经常意识到的，有时是惰性使得他们这样做），就是维护各个小团体的独立性、独特性以及狭隘利益，以免被广大的、根据《火星报》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党吞掉。

当时还没有来得及同马尔丁诺夫联合起来的马尔托夫同志，正是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的。马尔托夫同志坚决而公正地反对那些“认为党的纪律无非是指革命家必须服从他所参加的那个下级团体”的人。“在统一的党内决不容许有任何强制性的〈黑体是马尔托夫用的〉派别划分”，——马尔托夫当时向那些拥护小组习气的人这样解释，却没有料到他的这些话正是斥责了他自己在代表大会快结束时以及代表大会以后的政治行为……强制性的派别划分对于组委会是不容许的，但是对于编辑部却完全可以容许了。当马尔托夫从中央机关的角度看问题时，他谴责强制性的派别划分，可是，当马尔托夫对中央机关的组成表示不满时，他却又坚持这种派别划分了……

值得指出的一个事实是，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发言中，除了指出叶戈罗夫同志的“重大错误”以外，还特别着重指出组委会所表现的政治上的不坚定性。马尔托夫公正地愤慨地说，“以组委会名义提出的建议同向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

报告〈我们要补充一句：根据组委会委员的报告所作的报告：第 43 页，柯尔佐夫的话〉以及组委会先前的建议相抵触”（黑体是我用的）。你们可以看出，马尔托夫当时，即在他没有“转变”以前，清楚地了解，用梁赞诺夫代替“斗争”社丝毫不能消除组委会行动上的极端矛盾性和极端动摇性（党员们从同盟代表大会记录第 57 页上可以看出，马尔托夫在转变以后又是怎样看问题的）。马尔托夫当时并没有局限于分析纪律问题；他还直接向组委会提问：“有什么新情况使这种改变成为必要的呢？”（黑体是我用的）的确，组委会提出自己的建议时，甚至没有足够的勇气象阿基莫夫等人那样公开维护自己的意见。马尔托夫现在否认这一点（同盟记录第 56 页），但是看了代表大会记录的读者却可以看出是马尔托夫错了。波波夫以组委会的名义提出建议时，对于建议的理由一个字都没有谈（党代表大会记录第 41 页）。叶戈罗夫把问题转移到纪律问题上去，而对问题的实质只是说：“组委会可能有一些新的理由〈但是究竟有没有，以及是些什么理由呢？——都不得而知〉，它可能忘记提出某人等等。〈这“等等”二字就是该发言人的唯一退路，因为组委会决不会忘记自己在代表大会以前讨论过两次、向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报告过一次的‘斗争’社问题。〉组委会所以通过这个决议，并不是因为它对‘斗争’社改变了自己的态度，而是因为它想消除将来党中央机关一开始活动时就会碰到的不必要的障碍。”这不是说明理由，而正是回避说明理由。任何一个有诚意的社会民主党人（我们连想也没有想到要怀疑任何一个参加代表大会的人的诚意）都想要消除他认为是暗礁的东西，想要用他认为适当的方法来消除这种暗礁。所谓说明理由，就是要解释并且确切说明自己对于事物的看法，而不是用一些老生常谈来搪塞。但是要说明理由，就非得“改变自己对‘斗争’社的态度”不可，因为组委会从前所通过的那些截然相反的决议也是想要消除暗礁的，但是那些决议所认定的“暗礁”恰巧是在相反的方面。所以马尔托夫同志非常尖锐非常有根据地攻击这种理由，说这是一种“小气的”理由，是想“抵赖”才提出来

的理由，并且劝告组委会“不要怕别人议论”。马尔托夫同志的这些话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在代表大会上起过巨大作用的那种政治色彩的实质和意义，因为这种色彩的特点正在于没有独立性，小里小气，没有自己的路线，怕别人议论，永远在两个营垒之间动摇不定，怕公开说出自己的信条等等，——总之，就是带有“泥潭性”[注：现在我们党内有些人，一听到这个词就大惊小怪，叫喊说这是非同志式的论战。由于爱打官腔……而且又打的不是地方，以致使感觉异常得令人惊奇！恐怕没有一个经历过内部斗争的政党不曾用过这个词，因为这个词一向是用来形容在斗争双方之间摇来摆去的不坚定分子的。连那些善于把党内斗争限制在严格的范围内的德国人也并不因为听见“泥潭”这个词而生气，既不大惊小怪，也不表现出令人好笑的假正经。]。

正因为这个不坚定的集团在政治上没有气节，结果除了崩得分子尤金以外（第 53 页），谁都没有向代表大会提出邀请“斗争”社的某一个成员出席代表大会的决议案。投票赞成尤金的决议案的有 5 票，——显然都是崩得分子：动摇分子又变节了！至于中间集团的大概票数究竟有多少，从表决柯尔佐夫和尤金两人关于这个问题各自提出的决议案的结果可以看出：拥护火星派分子的有 32 票（第 47 页）；拥护崩得分子的有 16 票，就是说，除了反火星派分子的 8 票以外，有马霍夫同志的 2 票（第 46 页），“南方工人”社分子的 4 票以及另外 2 票。下面我们就要说明这样的分配决不是偶然的，但是我们首先要简略地指出马尔托夫现在对这次组委会事件的意见。马尔托夫在同盟中硬说“巴甫洛维奇等人煽起了激烈情绪”。只要把大会记录拿来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在反对“斗争”社和组委会时发言最详尽、最热烈和最尖锐的正是马尔托夫本人。他企图把“罪过”转嫁到巴甫洛维奇身上，只不过暴露了自己的不坚定性：在代表大会以前由他投票选举到编辑部的第 7 个委员正是巴甫洛维奇，在代表大会上他是完全站在巴甫洛维奇方

面（第 44 页）来反对叶戈罗夫的，后来当他从巴甫洛维奇那里遭到失败以后，就开始责难巴甫洛维奇“煽起了激烈情绪”。这只能令人发笑。

马尔托夫在《火星报》（第 56 号）上讽刺人家把邀请某某人的问题看成有重要意义的问题。这个讽刺又反过来针对马尔托夫本人了，因为正是组委会事件成了邀请某某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这样“重要”问题的争论的伏线。在衡量一个事物时，如果根据是涉及自己的“下级团体”（对党而言）还是涉及他人的“下级团体”而使用两个不同的尺度，——这是很糟糕的。这正是庸俗观念和小组习气，决不是党性的态度。只要把马尔托夫在同盟中的发言（第 57 页）和他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第 44 页）对照一下，就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马尔托夫在同盟中说：“我真不了解，为什么有人无论如何都要以火星派分子自命，同时却又以成为火星派分子为可耻。”不了解“自命”和“成为”之间的区别，不了解言和行之间的区别，——这才真令人奇怪呢。马尔托夫自己在代表大会上曾自命为反对强制性的派别划分的人，可是在代表大会以后他却又成为拥护强制性的派别划分的人了……

注释：

[3]见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随笔《在国外》。其中写道，1876 年春他在法国听到一些法国自由派人士在热烈地谈论大赦巴黎公社战士的问题。他们一致认为大赦是公正而有益的措施，但在结束这个话题时，不约而同地都把食指伸到鼻子前，说了一声“mais”（即“但是”），就再也不说了。于是谢德林恍然大悟：原来法国人所说的“但是”，意思是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209。

（四）“南方工人”社的解散

在组委会问题上形成的代表的划分也许有人认为是偶然的。但是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为了消除这种错误看法，我们暂且离开时间顺序，来分析一下在代表大

会快结束时发生的同上述问题有密切联系的事件。这个事件就是“南方工人”社的解散。在这里与《火星报》制定的组织方针对立的，即与主张团结全党力量、消除那种分散力量的混乱状态的方针对立的，是一个集团的利益，这个集团在没有真正的政党时曾做过有益的事情，可是当工作已经按集中制原则进行时，它就成为多余的了。为了小组的利益，“南方工人”社同《火星报》旧编辑部一样有权利要求保存“继承性”，保存自己的不可侵犯性。为了党的利益，该社应当服从调动，把它的力量调到“相应的党组织”中去（第 313 页，代表大会的决议末尾）。从小组利益和“庸俗观念”来看，解散一个同《火星报》旧编辑部一样不愿意解散的有益的团体，不能不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鲁索夫同志和捷依奇同志语）。从党的利益来看，解散这个团体，使它“融化”（古谢夫语）在党内，是必要的。“南方工人”社公开声明，它“不认为必须”自行宣告解散，并要求“代表大会果断地表示自己的意见”，“立刻表示是或者不是”。“南方工人”社直接引证了《火星报》旧编辑部……在解散以后所申述过的那种“继承性”！叶戈罗夫同志说：“虽然我们大家是以个人组成统一的党，但是党终究是由许多组织组成的，这些组织作为历史实体应当受到尊重……如果这样的组织对党没有什么害处，那就不必解散它。”

这样就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而所有的火星派分子，由于他们自己的小组习气还不显得突出，都坚决反对那些不坚定的分子（这时崩得分子以及两个工人事业派分子已经退出了代表大会；不然他们一定会竭力主张必须“尊重历史实体”的）。表决结果是 31 票赞成，5 票反对，5 票弃权（其中 4 票是“南方工人”社分子，还有 1 票大概是别洛夫，这可以从他早先的声明中推测出来，第 308 页）。这个拥有 10 票、激烈地反对《火星报》的彻底的组织计划、维护小组习气而反对党性的集团，在这里已经表现得十分明确了。在讨论中，火星派分子正是从原则上提出了这个问题（请看朗格的发言，第 315 页），表示反

对手工业方式和涣散状态，不考虑个别组织的“同情”，而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南方工人’社的同志们早在一两年以前就持较有原则的观点，那么党的统一事业和我们在这里所批准的纲领原则的胜利早就达到了”。奥尔洛夫、古谢夫、利亚多夫、穆拉维约夫、鲁索夫、巴甫洛维奇、格列博夫和哥林等人，都本着这个精神发表了意见。“少数派”方面的火星派分子，不但没有表示反对这些在代表大会上多次提出的肯定指明“南方工人”社、马霍夫等人缺乏原则性政策和“路线”的意见，不但没有对这一点提出什么保留，反而通过捷依奇表示坚决赞同这些意见，斥责“混乱状态”，欢迎鲁索夫同志“直接提出问题”（第 315 页），但是这个鲁索夫同志在同一次会议上居然——真不得了！——敢于把旧编辑部问题也“直接提到”纯粹党的立场上来（第 325 页）。

解散“南方工人”社的问题引起了该社的无比愤怒，这个迹象在记录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不要忘记，记录只能约略地反映出讨论情况，因为记录没有记下发言的全文，而只是最简略的要点）。叶戈罗夫同志甚至一听见有人把《工人思想报》集团”[4]的名字和“南方工人”社相提并论，就说这是“造谣”，——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代表大会上一般人对于彻底的经济主义所持的态度了。叶戈罗夫甚至在很晚的时候，即在第 37 次会议上，还十分愤慨地提起解散“南方工人”社的问题（第 356 页），并请求在记录上写明：在讨论“南方工人”社问题时，既没有向该社社员征求过关于出版经费的意见，也没有征求过关于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的监督的意见。波波夫同志在讨论“南方工人”社问题时暗示说，有一个紧密的多数派似乎已经预先决定了关于该社的问题。他说：“现在，在鲁索夫同志和奥尔洛夫同志发言以后，一切都看得很清楚了。”（第 316 页）这些话的意思无疑是说：现在，在火星派分子已经发了言，并且提出了决议案以后，一切都很清楚了，换句话说，“南方工人”社将被解散，而且是违反它本身的意愿，这一点是已经很清楚了。“南方工人”社的代表自己在这里就是把火星派分子（并且是象鲁索

夫和奥尔洛夫这样的火星派分子）和自己的同道者作为不同的组织政策“路线”的代表分开的。所以现在的《火星报》把“南方工人”社（大概也把马霍夫？）说成“道地的火星派分子”，只是清楚地表明，新编辑部忘记了代表大会上的一些最大的（从这个团体的观点来看）事件，并想把那些说明所谓“少数派”究竟是由哪些分子组成的痕迹掩盖起来。

可惜，代表大会上没有提到关于出版通俗机关报的问题。所有的火星派分子，无论在代表大会以前还是在代表大会期间（在会外），都非常热烈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一致认为在目前党内生活的情况下创办这样一个机关报或者把现有的某一个刊物改成这样的机关报，都是非常不合适的。反火星派分子在代表大会上发表了相反的意见，“南方工人”社也在自己的报告中发表过这样的意见，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或者由于不愿意提出“没有希望的”问题，才没有把一个有 10 个人署名的相应的决议案提出来。

注释：

[4]《工人思想报》集团是俄国的经济派团体，于 1897 年 10 月—1902 年 12 月先后在彼得堡、柏林、华沙和日内瓦等地出版了《工人思想报》，宣传露骨的机会主义观点。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和《怎么办？》等著作中批判了工人思想社的思想，指出它是国际机会主义的俄国变种。——218。

（五）语言平等事件

现在我们再按照代表大会开会的顺序来谈。

现在我们深信，还在代表大会没有转入讨论实质性问题以前，就不仅清楚地暴露了一个完全确定的反火星派集团（8 票），而且清楚地暴露了一个准备支持这 8 个人而给它凑到大约 16—18 票的不坚定的中间集团。

代表大会对于崩得在党内的地位问题进行了极其详细、过分详细的讨论后，只作出了一个带有原则性论点的决定，而实际的解决却一直拖延到讨论组织关系问题的时候。由于代表大会以前报刊已经用了相当多的篇幅解释过与此有关的问题，所以代表大会上的讨论所提供的新东西也就比较少了。不过要指出的一点就是，《工人事业》的拥护者（马尔丁诺夫、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虽然同意马尔托夫提出的决议案，但是有保留，认为这个决议案不够充分，并且不同意从这个决议案得出的结论（第 69、73、83、86 页）。

崩得的地位问题讨论以后，代表大会接着就讨论纲领问题。这次讨论大部分是一些意义不大的局部修正。在原则上，反火星派的反对态度只表现为马尔丁诺夫同志激烈地反对关于自发性和自觉性问题的人人皆知的提法。崩得分子和工人事业派分子当然是完全拥护马尔丁诺夫的意见的。顺便说一下，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也曾经指出马尔丁诺夫的反对意见是毫无根据的。可笑的是，现在《火星报》编辑部（大概是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已经转到马尔丁诺夫方面，说的话和它在代表大会上说过的完全相反！[5]大概这是符合有名的“继承性”原则吧……我们只好静候编辑部把问题完全弄清楚时再向我们说明一下，究竟它是在什么程度上同意马尔丁诺夫的意见的，究竟是在哪一点以及从什么时候开始同意的。在等待这个答案时，我们只想问一下，什么地方看见过有这样的党的机关报，它的编辑部在代表大会以后说的话竟然同自己在代表大会上说过的正好相反呢？

现在我们不谈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问题的争论（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了），也不谈党章问题开初的辩论（关于这些辩论，最好以后在分析党章问题的全部讨论情况时再来谈），而谈一下在讨论纲领时暴露出来的那些原则性的色彩。我们首先指出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细节，即关于比例代表制问题的讨论。“南方工人”社的叶戈罗夫同志主张把这一点写进纲领，于是波萨多夫斯基（少数派方面的火星派分子）公正地指出这里有“严重的意见分歧”。波萨多夫斯基同志说：

“毫无疑问，我们在以下这个基本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是要使我们将来的政策服从某些基本民主原则而承认这些原则有绝对价值呢，还是应当使所有的民主原则都完全服从我们党的利益？我是坚决拥护后一种意见的。”普列汉诺夫“完全赞同”波萨多夫斯基的意见，并且用更肯定、更坚决的话反对那种认为“民主原则有绝对价值”的说法，反对“抽象地”看待这些原则。他说：“我们假设可能有这样的情况：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也反对普选制。意大利各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曾经剥夺了贵族的政治权利。革命无产阶级也许会限制上层阶级的政治权利，正如上层阶级曾经限制过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一样。”对普列汉诺夫的发言有人鼓掌，也有人嘘斥，当普列汉诺夫对会场上的嘘声表示抗议——“你们不应当嘘斥”——同时请同志们不要受拘束时，叶戈罗夫同志马上站起来说：“既然这个发言有人鼓掌，那我一定要嘘斥。”叶戈罗夫同志和戈尔德布拉特同志（崩得代表）一同发言反对波萨多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的看法。可惜辩论被中断了，辩论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也就立即消失了。但是马尔托夫同志现在企图减弱甚至完全抹杀这个问题的意义却是徒劳的，他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说：“这些话〈指普列汉诺夫的话〉激怒了一部分代表，假使普列汉诺夫同志当时补充说，自然很难设想会出现这样一种不幸的局面，即无产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胜利而必须践踏象出版自由这样的政治权利，那么这种愤怒是不难避免的……（普列汉诺夫说：“谢谢”）”（同盟记录第 58 页）这种解释同波萨多夫斯基同志在代表大会上的说法是直接矛盾的，他当时完全肯定地认为在“基本问题”上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和不同的意见。关于这个基本问题，所有火星派分子都在代表大会上发言反对“右翼”反火星派分子（戈尔德布拉特）以及代表大会上的“中派”分子（叶戈罗夫）。这是事实，并且我们可以大胆地保证：假如“中派”（我想，这个字眼该比任何别的字眼都更少使“正式的”温情主义者感到难堪……），假如“中派”（以叶戈罗夫同志或马

霍夫同志为代表）有机会“不受拘束地”就诸如此类问题发表意见，那么严重的意见分歧是会立刻暴露出来的。

这种意见分歧在“语言平等”问题上暴露得还要明显（记录第171页及以下各页）。关于这一项，表决情况比讨论更能说明问题，统计一下表决的次数，就可以看到一个不可思议的数目——16次！导火线是什么呢？导火线就是：在党纲中只要指明全体公民不分性别等等以及舌头一律平等就够了呢，还是必须指出“舌头自由”或“语言平等”？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相当正确地说明了这一事件的特点，他说：“关于党纲一项条文措辞的小小的争论。竟有了原则的意义，因为在代表大会上半数代表都决心推翻纲领委员会。”正是如此。［注：马尔托夫补充说：“在这里，普列汉诺夫关于驴子的挖苦话给我们带来很大害处”（当谈到舌头自由时，仿佛有一个崩得分子列举各种机关而提到了种马场，当时普列汉诺夫就自言自语地说：“马是不讲话的，而驴子有时倒讲话”）。我当然不认为这种挖苦话特别温和、特别谦让、特别慎重和特别灵活。但我终究觉得奇怪的是，马尔托夫虽然承认争论具有原则的意义，却完全不来分析这方面的原则性究竟表现在哪里以及暴露出怎样的色彩，而只限于指出挖苦话的“害处”。这才真是官僚主义的和形式主义的观点呢！尖刻的挖苦话确实“在代表大会上带来很大害处”，其中不仅对崩得分子说了挖苦话，还对那些有时受到崩得分子支持甚至被他们从失败危险中救出来的人说了挖苦话。但是，既然已经承认这一事件有原则的意义，那就不能用指出某些挖苦话“不能容许”（同盟记录第58页）的说法来回避问题。］引起冲突的导火线确实很小，但是冲突具有真正原则的性质，因而也具有非常激烈的形式，直到有人企图“推翻”纲领委员会，直到猜疑有人存心“把代表大会引向歧途”（叶戈罗夫就是这样猜疑过马尔托夫的！），直到彼此……破口大骂，反唇相讥（第178页）。甚至波波夫同志也“表示了遗憾，说为了一点小事竟造成这

样的气氛”（黑体是我用的，第 182 页），一连三次（第 16、17、18 次）会议都充满了这种气氛。

所有这些话都非常明确、肯定地指出一件极重要的事实：充满“猜疑”和最激烈的斗争形式（“推翻”）的那种气氛（后来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有人指责火星派多数派造成了这种气氛!），其实远在我们分裂为多数派和少数派以前就形成了。我再说一遍，这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实，这是一件基本事实，许多人往往由于不了解这件事实而产生一种极轻率的看法，认为在代表大会快结束时形成的多数派是人为的。从现在硬说代表大会的参加者中十分之九都是火星派分子的马尔托夫同志的观点看来，由于一点“小事”，由于“小小的”导火线就爆发具有“原则的性质”并且几乎弄到推翻代表大会纲领委员会地步的冲突，是绝对解释不通和绝对荒诞的。对“带来害处”的挖苦话仅仅表示埋怨和遗憾，以此来回避这件事实，是令人可笑的。冲突是不会由于任何尖刻的挖苦话就产生原则的意义的，只有代表大会上政治派别划分的性质才会产生这样的意义。不是什么尖刻话或挖苦话引起了冲突，——这些话只是表明代表大会上政治派别的划分本身存在着“矛盾”，存在着引起冲突的一切前提，存在着一碰到甚至小小的导火线就会以其固有的力量爆发出来的内在分歧。

相反，从我用来观察代表大会的观点（我认为我应该坚持把这种观点作为观察事件的某种政治见解，尽管有人觉得这种见解令人难堪）看来，由于“小小的”导火线而爆发十分剧烈的原则性的冲突，是完全可以理解和不可避免的。既然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上，时刻都有火星派分子和反火星派分子的斗争，既然在他们之间有一些不坚定的分子，既然这些不坚定的分子和反火星派分子共占三分之一的票数（8 票+10 票＝51 票中的 18 票，这当然是根据我的粗略计算），那么，火星派分子方面有一些人，哪怕是很小一部分人分离出去，就有可能使反火星派的方针取得胜利，因而引起“疯狂的”斗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而且十分自然的。这

并不是由什么过分尖刻的话语或者攻击引起的，而是由政治的分化引起的。并不是什么尖刻话造成了政治冲突，而是代表大会上的派别划分本身存在的政治冲突造成了尖刻话和攻击，——这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也就是我们和马尔托夫在估计代表大会的政治意义及其结果方面的基本的原则性意见分歧。

在整个代表大会期间，使极少数火星派分子脱离大多数火星派分子的重大事件共有三次，即语言平等、党章第 1 条和选举问题，这三次事件都引起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最终导致现在的党内严重的危机。为了从政治上了解这个危机和这次斗争，不应该只限于空谈什么有人讲过不能容许的挖苦话，而应该考察一下在代表大会上彼此发生冲突的各种色彩的政治派别划分。所以，“语言平等”事件对于说明分歧的原因是有双重作用的，因为马尔托夫当时还是（还是！）一个火星派分子，并且几乎比任何一个人都更起劲地攻击反火星派分子和“中派”。

战争是由马尔托夫同志和崩得首领李伯尔同志的争论开始的（第 171—172 页）。马尔托夫证明只要提出“公民平等”的要求就够了。“舌头自由”被否决了，但是接着提出了“语言平等”，而且有叶戈罗夫同志同李伯尔一起进行战斗。马尔托夫说这是拜物教，“因为发言人坚决主张民族平等，而把不平等现象转移到语言问题方面。其实，问题正应该从另一方面来考察：民族不平等现象是存在的，其表现之一就是属于某一民族的人失去了使用本族语言的权利”（第 172 页）。马尔托夫当时说得完全对。李伯尔和叶戈罗夫毫无理由地企图为他们自己的说法辩护，并且企图证明我们不愿意或者不善于实行民族平等原则，这的确是一种拜物教。确实，他们象“拜物教徒”一样只坚持词句而不坚持原则，他们做事不是怕犯什么原则错误，而是怕别人议论。正是这种动摇心理（如果“别人”因这一点而责备我们，那怎么办呢？）——在发生组织委员会事件时我们已经指出的心理，——我们的整个“中派”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明显。另一个中派分子，即与“南方工人”社密切接近的矿区代表李沃夫“认为边疆地区提出的关于压制语言平等的

问题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在党纲中规定关于语言的条文，消除别人可能猜疑社会民主党人搞俄罗斯化的任何推测”。这种对于问题的“严重性”的论证真是太妙了。问题所以很严重，是因为必须消除边疆地区的可能的猜疑！这个发言人根本没有谈什么涉及到问题本质的话，根本没有回答关于拜物教的指责，反而完全证实了这个指责，因为他完全没有自己的论据，只是借口边疆地区会怎么说这一点来敷衍搪塞。当时有人对他说：他们可能说的话都是不对的。而他并不去分析究竟说得对不对，却回答说：“别人可能猜疑。”

这样一种自以为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和重要性的提法，倒确实具有了原则的性质，不过这完全不是李伯尔们、叶戈罗夫们、李沃夫们想在这里找到的那种原则的性质。成为原则性问题的是：我们应该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运用党纲上规定的一般的基本原理，把这些原理运用于具体条件并在具体运用上加以发挥呢，还是仅仅因为害怕别人猜疑就应该用枝节的条文、局部的指示、重复的语句和烦琐的解释来充斥党纲的篇幅。成为原则性问题的是：社会民主党人怎么能把反对烦琐的解释的斗争看成（“猜疑为”）想缩小起码的民主权利和自由。我们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会丢掉这种崇拜烦琐解释的拜物教心理呢？——这就是我们看到由于“语言”问题引起斗争时产生的想法。

由于进行过多次记名投票，所以在这个斗争中代表们的派别划分表现得特别明显。这样的表决一共有三次。始终竭力反对火星派核心的，有全部反火星派分子（8 票）以及只有很小变动的整个中派（马霍夫、李沃夫、叶戈罗夫、波波夫、梅德维捷夫、伊万诺夫、察廖夫和别洛夫，——只有后面两个人起初表现动摇，时而弃权，时而投票赞成我们，直到第三次表决时才完全确定了自己的态度）。火星派方面有一部分人，主要是高加索人（3 个人共有 6 票）脱离出去了，于是“拜物教派”终于占了优势。在进行第三次表决时，当两种不同倾向的人们都已经十分确切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时，脱离火星派多数派而转到对方去的是拥有 6 票的 3

个高加索人，而脱离火星派少数派的是拥有 2 票的波萨多夫斯基和科斯季奇；在头两次表决中转到对方或弃权的，在火星派多数派方面有连斯基、斯捷潘诺夫和哥尔斯基，在火星派少数派方面则有捷依奇。火星派方面有 8 票（从 33 票总数里）脱离出去，结果就使反火星派分子和不坚定分子的联盟占了优势。这就是代表大会派别划分的基本事实，这一事实在表决党章第 1 条以及在进行选举时也都再次出现（不过当时脱离出去的是另一些火星派分子而已）。怪不得那些在选举时遭到失败的人现在竭力想抹杀他们失败的政治原因，竭力想抹杀各种色彩之间斗争的出发点，而这个斗争却在全党面前愈来愈清楚地暴露了和愈来愈无情地揭露了那些不坚定的、政治上没有气节的分子。语言平等事件所以特别明显地向我们说明了这个斗争，是因为当时连马尔托夫同志也还没有博得阿基莫夫和马霍夫两人的夸奖和赞许。

注释：

[5]孟什维克的《火星报》编辑部在 1904 年 1 月 15 日的第 57 号《火星报》附刊上登载了亚·马尔丁诺夫的一篇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组织原则和攻击列宁的文章。《火星报》编辑部在给该文加的注释中表示赞同马尔丁诺夫的一个观点，这就是所谓“新型的组织上的空想主义（指多数派的组织原则）忽视党员的政治自我教育的任务，而这种忽视乃是对‘经济主义’及其崇尚组织中的‘民主主义’作了剧烈反应的结果”。这个注释还说，“组织上的空想主义的这个缺陷如何同关于‘自发性’和‘自觉性’之间的关系问题的不正确提法相关联，以及列宁同志对这种不正确提法负何责任，本报将会不止一次地予以论述”。随后，格·瓦·普列汉诺夫就在《火星报》第 70、71 号上发表了《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知识分子》一文，公然反对他过去曾经赞同的列宁关于自觉性和自发性问题的提法。——220。

（六）土地纲领

反火星派和“中派”的不坚持原则，在讨论土地纲领时也表现得很明显，这些讨论占了代表大会不少时间（见记录第 190—226 页），并且提出了不少很有意义的问题。果然不出所料，马尔丁诺夫同志（在李伯尔和叶戈罗夫两位同志发表了小小的责难意见以后）对纲领发动了进攻。他提出一个旧论据，说我们是通过纠正“历史上的这种不公平现象”来间接地“尊崇历史上的另一些不公平现象”等等。站在他一边的还有叶戈罗夫同志，叶戈罗夫说自己甚至“不了解这个纲领有什么意义。提出这个纲领是为了我们自己，即把我们所提出的那些要求确定下来呢，还是我们想使它成为大家都能接受的东西”（！？！？）。李伯尔同志“也想提出叶戈罗夫同志所提的意见”。马霍夫同志本着他所固有的坚决精神发言说，“大多数〈？〉发言人都根本不了解提出来的这个纲领是个什么东西，其目的何在”。据他说，这个纲领“很难认为是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这个纲领……“有一种把纠正历史上的不公平现象当儿戏的味道”，有“一种蛊惑人心和冒险主义的色彩”。这种深奥思想的理论根据，就是庸俗马克思主义所惯用的夸张其词和简单化的手法，说火星派似乎“想把农民看作是成分一样的；既然农民早已〈？〉分化为几个阶级，所以提出单一的纲领，势必使整个纲领成为蛊惑人心的东西，一旦实行起来就会成为冒险行为”（第 202 页）。马霍夫同志在这里“说穿了”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对我们的土地纲领持否定态度的真正原因，他们虽然决心“承认”《火星报》（正如马霍夫本人也承认它一样），但是根本没有考虑过它的方针、理论立场和策略立场。正因为他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现代俄国农民经济结构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现象时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所以他们始终不了解这个纲领，而决不是因为在个别细节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正是在这种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上，反火星派首领（李伯尔和马尔丁诺夫）和“中派”首领（叶戈罗夫和马霍夫）很快就趋于一致了。叶戈罗夫同志也直爽地表现了“南方工人”社以及所有

倾向于它的团体和小组的一个特点，即他们不了解农民运动的意义，不了解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一批有名的农民起义时期表现的弱点不是过高估计了这个运动的意义，而是过低估计了这个运动的意义（而且没有力量来利用这个运动）。叶戈罗夫同志说："我丝毫不象编辑部那样迷恋农民运动，在农民骚动以后有许多社会民主党人都迷恋过。"只是可惜叶戈罗夫同志没有积极向代表大会多少确切地指明编辑部的这种迷恋究竟表现在哪里，也没有积极具体地指明《火星报》所提供的文字材料。此外，他忘记了，我们的土地纲领的一切基本条文在《火星报》第 3 号［注：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379—386 页。——编者注］上，即在农民骚动很久以前就已经发挥过了的。谁如果不只是口头上"承认"《火星报》，那他就不妨稍微多注意一下《火星报》的理论原则和策略原则！

叶戈罗夫同志感叹地说："不，我们在农民中间不会有多大作为！"随后他又说明这种感叹不是表示反对某种个别的"迷恋现象"，而是否定我们的整个立场："这也就是说，我们的口号不能同冒险主义口号相竞争。"这真是把一切都归结为各政党口号"竞争"的非原则态度的最典型的说法！并且这还是在他自称已经对理论解释"表示满意"以后说出来的，在这种理论解释中指出：我们力求在鼓动工作中取得牢靠的成绩而不怕暂时的失利；要取得牢靠的成绩（不管那些"竞争者"……一时如何叫嚷），就必须使纲领有巩固的理论基础（第 196 页）。既然自称对这种解释已经"表示满意"，又立刻重复从旧经济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庸俗论点：认为"口号竞争"决定一切问题，不仅决定土地纲领问题，而且决定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全部纲领和全部策略问题，这是多么混乱的观点。叶戈罗夫同志说："你们不能强迫雇农同富农一道为已经有不小一部分落到这些富农手里的割地而斗争。"

又是那一套显然同我们的机会主义经济派有血统关系的简单化的论调，经济派硬说：不能"强迫"无产者去为现在有不小一部分已落到资产阶级手里而将来

还会有更大一部分落到资产阶级手里的东西而斗争。又是那一套庸俗化的论调，忘记了在雇农和富农之间的一般资本主义关系方面俄国所具有的特点。现在，事实上受到割地重压的也有雇农，他们为摆脱盘剥制而斗争是根本不必“强迫”的。需要“强迫”的倒是某些知识分子——强迫他们更广泛地看到他们担负的任务，强迫他们在讨论具体问题时丢掉那一套死板公式，强迫他们考虑到使我们的目的复杂化和发生变化的历史情况。只有认为农民是傻子的这种偏见，即马尔托夫同志公正指出的（第 202 页），在马霍夫同志以及其他反对土地纲领的人们的发言中流露出来的偏见，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反对者忘记了我国雇农生活的现实条件。

我们的“中派”分子把问题简单化为只存在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并且力图把自己的狭隘观点照例强加在农民身上。马霍夫同志说：“正因为我认为农民就其狭隘的阶级观点的限度来说是聪明的，所以我以为他们会拥护夺取土地和分割土地的小资产阶级理想。”这里显然是把两件事情混为一谈：一件事情是把农民的阶级观点估计为小资产者的阶级观点，另一件事情是缩小了这个观点，把它归结为“狭隘的限度”。叶戈罗夫们和马霍夫们的错误正在于作了这种归结（也如马尔丁诺夫们和阿基莫夫们的错误在于把无产者的观点归结为“狭隘的限度”一样）。其实，逻辑或历史都教导我们：正是因为小资产者的地位有两重性，所以小资产者的阶级观点可能比较狭隘，又比较进步。所以，我们决不能因为农民狭隘（“愚昧”）或者受“偏见”支配就灰心失望，恰恰相反，我们的任务是要始终不倦地开阔农民的眼界，促使他们用理智战胜偏见。

对于俄国土地问题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在《火星报》旧编辑部的忠实捍卫者马霍夫同志那篇原则性发言的结束语中集中地表现出来了。怪不得这些话博得了掌声……虽然是讽刺的掌声。普列汉诺夫说，我们丝毫不怕土地平分运动，我们不会阻碍这个进步（资产阶级的进步）的运动，马霍夫同志听了以后愤慨地说：“我真不知道什么东西叫作不幸。但是，这个革命即使可以称为革命，

也会是一个不革命的革命。正确些说，不是革命而是反动（笑声），类似骚动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将使我们倒退，并且要经过相当时间才可以使我们重新回到我们现在的状况。而我们现在却有比法国革命时期更多得多的东西（讽刺的掌声），我们有社会民主党（笑声）……”是的，如果社会民主党是按照马霍夫的观点看问题，或者拥有受到马霍夫们支持的中央机关，那它确实只能受到嘲笑……

可见，就是在讨论土地纲领所引起的一些纯粹原则性的问题时，也立即反映出我们已经熟悉的派别划分。反火星派分子（8 票）为了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而出马上阵，“中派”首领，叶戈罗夫们和马霍夫们尾随在他们的后面，而且总是陷在那个狭隘的观点里出不来。所以很自然，在表决土地纲领的某些条文时，赞成的有 30 票和 35 票（第 225 页和第 226 页），就是说，恰巧和我们在争论崩题讨论的次序、组委会事件以及解散“南方工人社”问题时所看到得问的那个数目接近。每当问题稍微超出通常的框框，稍微要求把马克思的理论独立地运用于新的（对德国人说来是新的）特殊的社会经济关系时，真正胜任的火星派分子立刻就只占五分之三的票数，整个“中派”就立刻转到李伯尔们和马尔丁诺夫们方面去了。马尔托夫同志却拼命抹杀这一明显的事实，胆怯地回避那些显然暴露出各种色彩的表决情况！

从土地纲领问题的讨论中可以明显地看到火星派分子同在代表大会上足足占有五分之二的人进行斗争的情况。高加索的代表在这里采取了完全正确的立场，——这也许多半是因为他们熟悉当地无数农奴制残余的各种表现，所以才没有赞同马霍夫们觉得满意的那套抽象而幼稚的简单对立法。当时发言反对马尔丁诺夫和李伯尔、马霍夫和叶戈罗夫的，有普列汉诺夫、古谢夫（他证实说，“对我们的农村工作所持的这种悲观看法”……即叶戈罗夫同志的那种看法……他“常常在俄国工作的同志中间听到”），有科斯特罗夫、卡尔斯基，还有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正确地指出，土地纲领的批评者的“各种忠告”“是十分庸俗的”。不过我们在

谈到研究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派别划分问题时必须指出，他在这一段发言中（第 208 页）把朗格同志同叶戈罗夫和马霍夫两人相提并论却不一定正确。谁如果仔细地读一读记录就能够看出，朗格和哥林两人所站的立场跟叶戈罗夫和马霍夫两人的立场完全不同。朗格和哥林两人不喜欢关于割地一条的提法，他们却完全领会我们土地纲领的思想，他们不过企图用另一种方式体现这个思想，积极努力寻找在他们看来更为完善的提法，提出自己的决议草案来说服土地纲领的起草人，或是站在土地纲领起草人方面反对所有的非火星派分子。例如，只要把马霍夫关于否决全部土地纲领的提议（第 212 页，9 票赞成，38 票反对）以及关于否决这个纲领的个别条文（第 216 页及其他各页）的提议，拿来和朗格对割地条文提出独立的修订方案（第 225 页）的立场对比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两种立场是截然不同的［注：见哥林的发言，第 213 页。］。

托洛茨基同志在往下谈论那些带有“庸俗气味”的理由时指出，“在即将来临的革命时期，我们应该同农民联系起来”……“在这个任务面前，马霍夫和叶戈罗夫的怀疑态度和政治‘远见’比任何一种近视更加有害。”另一个火星派少数派分子科斯季奇同志，很准确地指出了马霍夫同志“不相信自己，不相信自己的原则稳定性”，——这个估计真是打中了我们的“中派”的要害。科斯季奇同志继续说：“马霍夫同志的悲观态度是跟叶戈罗夫同志一致的，虽然他们各有不同的色彩。马霍夫同志忘记了，社会民主党人现时已在农民中间进行工作，已在可能范围内领导农民运动。而他们却用这种悲观态度来缩小我们工作的规模。”（第 210 页）

在快要谈完代表大会讨论纲领问题的情形时，还应该指出关于支持反政府派问题的简短辩论。我们的纲领说得很清楚，社会民主党支持“任何反对俄国现存社会政治制度的反政府运动和革命运动”。看来，这个限定语已经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支持的究竟是哪些反政府派别。然而我们党内早已形成的各种不同色彩在

这里也立即暴露出来了，本来很难设想在这样一个已经再三说明过的问题上还会发生“疑问和误解”！显然，并不是由于什么误解，而是由于有各种不同的色彩。马霍夫、李伯尔以及马尔丁诺夫立刻就惶恐不安了，结果又落到了“紧密的”少数派的地位，马尔托夫同志大概认为这也是由于有人搞阴谋、倾轧、耍权术和其他种种卑鄙手腕（见他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而那些不能理解形成“紧密的”少数派和多数派的政治原因的人才会求助于这些东西。

马霍夫又是从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地简单化开始。他宣称：“我国唯一革命的阶级是无产阶级”，可是他从这个正确的论点马上得出一个不正确的结论：“其余的阶级都是微不足道的，都是无关紧要的（全场大笑）……是的，它们是无关紧要的，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我反对支持它们。”（第 226 页）马霍夫同志对自己立场作的这种绝妙的表述，使许多人（他的许多同道者）都感到难为情，但是李伯尔和马尔丁诺夫两个人和他的意见实质上是一致的，他们提议删掉“反政府派”字样，或者添上“民主的反政府派”加以限定。普列汉诺夫对马尔丁诺夫的这个修正作了公正的反驳。他说：“我们应当批判自由派，揭露他们的不彻底性。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在揭露一切非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狭隘性和局限性时，必须向无产阶级说明，同专制制度比较起来，就连不保证普选制的宪法也是一种进步，所以无产阶级不应该宁要现存制度而不要这种宪法。”马尔丁诺夫、李伯尔和马霍夫三位同志不同意这个意见，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阿克雪里罗得、斯塔罗韦尔、托洛茨基，还有普列汉诺夫的第二次发言都抨击了这种立场。马霍夫同志在这里又一次自己打了自己。起初他说，其余的阶级（除了无产阶级以外）都是“微不足道的”，他“反对支持它们”。后来他又大发慈悲地承认说，“资产阶级实质上虽然是反动的，但往往又是革命的，例如，在反对封建制度及其残余的时候”。接下去，他愈说愈糟了：“可是，有些集团始终〈？〉是反动的，——手工业者就是这样的。”请看，后来慷慨激昂地拥护旧编辑部的那些“中派”首领竟在原则方面

发表了什么样的妙论！正是手工业者，甚至在行会制度十分盛行的西欧，也如同城市中其他小资产者一样，在专制制度崩溃时代起过特殊的革命作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不加思索地重复西欧同志在专制制度崩溃已有 100 年或 50 年之久的时代就现代手工业者所讲的那些话，是特别荒谬的。在俄国，硬说手工业者在政治问题上比资产阶级反动，只不过是背诵一些陈词滥调而已。

可惜，记录完全没有载明马尔丁诺夫、马霍夫和李伯尔对这个问题提出的已被否决的修正案所得到的票数。我们能指出的只是，反火星派分子的各个首领和“中派”的一个首领［注：该派即“中派”的另一个首领叶戈罗夫同志，在另一个地方讨论到阿克雪里罗得所提的关于社会革命党人的决议案时，发表了他对于支持反政府派问题的意见（第 359 页）。叶戈罗夫同志认为：既在纲领中要求支持任何反政府运动和革命运动，又要对社会革命党人以及自由派持否定态度，这是个“矛盾”。叶戈罗夫同志在这里虽然是用另一种形式，稍微从另一个角度观察问题的，但同样暴露出他也象马霍夫、李伯尔和马尔丁诺夫三位同志那样狭隘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对（他“所承认的”）《火星报》的立场采取了不坚定的、半敌视的态度。］在这里也结成了我们已经熟悉的反火星派分子的派别。在总结对于纲领问题的全部讨论经过时，不能不作出这样的结论：没有哪一次比较热烈和引起普遍兴趣的辩论不暴露出马尔托夫同志和《火星报》新编辑部现在力图掩饰的那些色彩的区别。

（七）党章。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

代表大会在讨论了纲领问题以后，接着就讨论党章问题（我们把前面提到的中央机关报问题以及代表们所作的报告撇开不谈，可惜大多数代表的报告都作得不能令人满意）。不用说，党章问题对于我们大家都有重大的意义。要知道，《火星报》从创办时起就不仅作为机关报，而且作为组织细胞在进行活动。在《火星

报》第 4 号的编辑部文章（《从何着手？》）中提出了一个完备的组织计划［注：波波夫同志在关于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的发言中还说过："我现在回想起《火星报》第 3 号或第 4 号上所发表的《从何着手？》一文。许多在俄国工作的同志都认为它是不策略的，另一些人觉得这个计划是个幻想，而大多数人〈？大概是波波夫同志周围的大多数人〉则说这不过是好大喜功而已。"（第 140 页）读者可以看出，这种把我的政治观点解释成好大喜功的说法，这种现在又被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两同志煽起的说法，我早已听惯了。]，并且三年来始终一贯地执行了这个计划。当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时，在相应的决议所提的三条理由中（第 147 页）有两条谈的正是《火星报》的这个组织计划和组织思想：《火星报》在领导党的实际工作方面的作用和它在统一工作中的领导作用。所以很自然，如果一定的组织思想得不到全党承认，没有正式规定下来，《火星报》的工作和建党即事实上恢复党的全部工作，就不能算是完成了。而党的组织章程就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

《火星报》力求奠定的作为建党基础的基本思想，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第一是集中制思想，它从原则上确定了解决所有局部的和细节性的组织问题的方法。第二是承认进行思想领导的机关报的特殊作用，它恰恰估计到了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在政治奴役的环境下、在把革命进攻的最初的根据地建立在国外这种条件下的暂时的和特殊的需要。第一个思想是唯一的原则性思想，应该贯串在整个党章中；第二个思想是由活动地点和活动方式的暂时情况产生的局部性思想，即表面上离开集中制，而成立两个中央机关——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火星报》的这两个建党的基本思想，我在《火星报》（第 4 号）编辑部文章《从何着手？》［注：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5 卷第 1—10 页。——编者注］以及《怎么办？》［注：同上，第 6 卷第 1—183 页。——编者注］中已经发挥过了，后来我在《给一位同志的信》［注：同上，第 7 卷第 1—18 页。——编者注］

中用几乎是说明党章条文的形式又详细作了解释。其实，剩下的只是在措辞上加加工就可以把党章条文规定下来，因为，如果对《火星报》的承认不是一纸空文，不只是一句应酬话，那么党章正应当把这些思想体现出来。我在《给一位同志的信》再版的序言中已经指出：只要把党章和这本小册子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这里和那里谈的组织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注：见本卷第 102 页。——编者注］

讲到《火星报》的组织思想在党章中如何措辞和表述的问题，我不得不提到马尔托夫同志所掀起的一次事件。马尔托夫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说：“……你们实际考证一下就会知道，我在这一条（即第 1 条）条文上陷入机会主义立场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乎列宁的意料之外。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一个半月至两个月，我曾经把我的草案给列宁看过，那里第 1 条叙述得同我在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条文正好一样。当时列宁表示反对我的草案，认为写得太详细了，并且对我说，他只喜欢第 1 条的思想，即关于党员的定义，他说要把这个思想用另一种形式吸收到自己的党章中去，因为他觉得我的表述不妥当。可见，列宁早就了解我的条文，知道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因此你们可以看出我是光明正大地去参加代表大会的，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我曾经预先声明，我要反对相互增补，反对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成员增补时采取一致同意的原则，等等。”

关于预先声明反对相互增补一事，我们在一定的地方就会知道事实真相究竟是怎样的。现在我们要谈一谈马尔托夫的党章中的这种“光明正大”。马尔托夫在同盟里靠记忆叙述有关他那个不妥当的草案的情节时（马尔托夫本人在代表大会上曾把这个草案当作不妥当的草案收回了，而在代表大会以后，又本着他所特有的一贯精神把它重新亮了出来），照例忘记了许多事情，因而又把问题弄模糊了。看来，已经有很多事实足以告诫大家不要引用私人谈话和凭本人记忆（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只记起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来说明问题，但是马尔托夫同志因为没

有别的材料，只好利用次品。现在甚至普列汉诺夫同志也学起他的样子来了——大概是近墨者黑吧。

马尔托夫草案第 1 条的“思想”是不可能使我“喜欢”的，因为他的草案中根本没有后来在代表大会上提出的那种思想。是他记错了。我侥幸在纸堆中找到了马尔托夫的草案，那里“第 1 条叙述得同他在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条文正好不一样”！请看这是什么“光明正大”！

马尔托夫草案第 1 条条文是：“凡承认党纲、并在党的机关〈原文如此！〉监督和领导下为实现党的任务而积极工作的人，可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

我的草案第 1 条条文是：“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支持党并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可以作为党员。”

马尔托夫在代表大会上提出并由代表大会通过的第 1 条条文是：“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支持党并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人，可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

两相对比可以明显地看出，马尔托夫的草案根本没有什么思想，而只是泛泛空谈。说党员应该在党的机关监督和领导下进行工作，这是不言而喻的，只能是这样的，只有爱说废话，爱在“章程”中堆砌大量空洞的词句和官僚主义的（就是说，对事业不需要，只有在装饰门面时才似乎需要的）公式的人，才会这样说。第 1 条的思想只有在这样提出问题时才会产生：党的机关实际上能不能对那些不加入任何一个党组织的党员进行领导。这种思想在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中连一点影子也没有。所以我也就无法知道马尔托夫同志“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因为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对于这个问题根本没有提出什么看法。可见，马尔托夫同志所作的实际考证是一笔糊涂账。

相反，对马尔托夫同志正应该说，他从我的草案中“知道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并且无论在编辑委员会里（虽然我的草案在代表大会以前两三个星期就

给大家看过了），无论在那些仅仅看过我的草案的代表面前，他都没有表示异义，没有反驳过我的这种看法。不但如此。甚至在代表大会上，当我提出自己的党章草案［注：顺便说一下。记录委员会在第 11 号附录上刊载了“由列宁提交代表大会的”党章草案（第 393 页）。记录委员会在这里也搞错了一些事情。它把我交给全体代表（并且是在代表大会开会以前给很多代表）看的初稿（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7 卷第 238—239 页。——编者注）和我后来提交代表大会的草案混为一谈，并把第一个草案当作第二个草案刊载出来了。我当然丝毫不反对别人把我的草案，哪怕是所有各个准备阶段的条文一概公布出来，但是制造混乱毕竟是不应该的。而混乱终于造成了，因为波波夫和马尔托夫（第 154 页和第 157 页）批评我实际提交代表大会讨论的草案中的那些提法，原来是记录委员会刊载出来的草案中所没有的（参看第 394 页第 7 条和第 11 条）。如果对待问题比较仔细，那只要把我刚才指出的一些页码对照一下，就很容易发现这个错误了。］并在选举章程委员会以前为这个草案辩护时，马尔托夫同志还直截了当地声明：“我赞同列宁同志的结论。只是在两个问题上我和他有意见分歧”（黑体是我用的）——即关于总委员会组成的方法和增补要一致同意的问题（第 157 页）。这里对党章第 1 条的不同意见还只字未提。

马尔托夫同志认为有必要在自己的论戒严状态的小册子里再一次地、特别详细地回顾自己的党章草案。他在这本小册子里说，他的党章草案——对于这个草案，除了某些次要的细节以外，他现在（1904 年 2 月，——不知道过两三个月以后又会怎样）还是完全同意的——“充分表明了他对于过分集中制的否定态度”（第Ⅳ页）。这个草案之所以没有提交代表大会，据马尔托夫同志现在解释是因为：第一，“在《火星报》受到的锻炼启示了他对章程持藐视态度”（当马尔托夫同志喜欢这样做时，《火星报》这个词在他看来就不是狭隘的小组习气，而是最坚定的方针了！可惜，三年来在《火星报》受到的锻炼，没有启示马尔托夫同志对

那些不坚定的知识分子在为自己违背共同通过的党章的行为辩护时惯用的那种无政府主义词句持藐视态度）。第二，要知道，他马尔托夫同志是要避免“在《火星报》这样一个基本组织核心的策略中加进任何杂音”。说得多么头头是道啊！在关于党章第1条的机会主义条文或关于过分集中制这个原则问题上，马尔托夫同志竟这么害怕杂音（只有从最狭隘的小组观点来看才是可怕的杂音），甚至在编辑部这样一个核心面前都没有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在关于中央机关人选的实际问题上，马尔托夫同志却背离《火星报》组织（这个真正的基本组织核心）大多数人的意见而去向崩得和工人事业派分子求救。马尔托夫同志暗中用小组习气替冒牌编辑部辩护，而责备最了解情况的人在估计问题时表现了“小组习气”，他的这些话里的“杂音”，马尔托夫同志却听不出。为了惩诫他，我们现在把他那个党章草案全部引证出来，并指出它究竟有什么样的观点和什么样的过分地方［注：我要指出，可惜我找不到马尔托夫草案的第一种稿本，这种稿本共有大约48条，其中包含了更加“过分的”毫无意义的形式主义。］：

*“党章草案。（一）党员。（1）凡承认党纲、并在党的机关监督和领导下为实现党的任务而积极工作的人，可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2）党员如果违反党的利益，由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开除其党籍。[说明开除理由的决定书，应保存在党的档案库里，并须根据要求，通知每个党委员会。对于中央委员会关于开除党籍的决定，在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委员会要求时，可以向代表大会提出申诉。]”我用方括号来表明马尔托夫草案中那些显然没有什么意思的议论，这些议论不仅没有什么“思想”，而且也没有什么肯定的条件或要求，——例如在“党章”中绝妙地指明决定书究竟要保存在什么地方，或者说对于中央委员会关于开除党籍的决定（而不是它的一切决定和任何决定吗？）可以向代表大会提出申诉。这正是过分玩弄辞藻或十足的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即杜撰一些多余的、显然没有益处或文牍主义的条款。“（二）地方委员会。（3）党委员会是党在地方工作中的代表”。（真是既新颖又聪明！）“（4）[凡是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存在并派有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委员会，都可以认为是党的委员会。]（5）除了第4条指出的委员会以外，新的党委员会应当由中央委员会指定[中央委员会或者承认现有的某地方组织为委员会，或者用改组该地方组织的办法组成地方委员会]。（6）委员会用增补的办法补充自己的名额。（7）中央委员会有权用不超过地方委员会名额总数三分之一数量的同志（它所了解的同志）补充地方委员会。”*好一个典型的官样文

章：为什么不超过三分之一呢？有什么意思呢？这种根本起不了限制作用的限制——因为补充是可以重复许多次的——究竟有什么意思呢？“(8）[如果地方委员会由于遭到迫害而瓦解或者被破坏，”（就是说不是全体被捕？），中央委员会应当把它恢复起来”]（已经不考虑第 7 条了吗？马尔托夫同志是不是觉得第 8 条和规定平日工作而节日休息的俄罗斯公安法相似呢？）

“(9）[党的例行代表大会可以委托中央委员会改组某个地方委员会，如果该地方委员会的活动被认为是违反党的利益的话。在这种情况下，该委员会就可认为已被解散，而该委员会所属地区的同志可以不受其管辖［注：我们请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注意这个字眼。这还了得！这就是甚至……甚至弄到更换编辑部成员的那种“雅各宾主义”的根源……。”]本条所规定的规则，同迄今俄罗斯法律中规定的所谓“禁止人人酗酒”的条文一样，是大有好处的。“(10[党的地方委员会领导该地党的全部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并尽力协助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实现它们所担负的全党的任务。”]……哎哟天哪！要这些话干什么呢？（11）[“地方组织的内部规则，委员会和它所管辖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听见了吗，听见了吗？）“各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各该集团的权限范围和自治范围”（难道权限范围和自治范围不是一回事吗？）“由委员会自行规定并报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这里有一个疏忽：没有说明这种报告应当保存在哪里。）“(12）[委员会所管辖的各集团和各个党员，都有权要求把他们对任何问题的意见和愿望报告给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13）党的地方委员会必须把自己收入的一部分按中央委员会规定的分配比例上交给中央委员会会计处。（三）建立用其他语言（除了俄语以外）进行鼓动的组织。（14）[为了用某种非俄罗斯语言进行鼓动并把有关的工人组织起来，可以在特别需要把这种鼓动工作专门化并把这种组织划分出来的地方成立单独组织。]（15）至于是不是真有这种需要，这个问题由党中央委员会解决，如果发生争论，则提交党代表大会解决。”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个章程后面的一些规定，可以看出这一条的第一部分是多余的，而关于发生争论情况的第二部分，简直是滑稽可笑的。“(16）[第 14 条所规定的地方组织在其特殊事务方面是自治的，但是它们在地方委员会监督下进行工作并受其管辖，这种监督的形式以及该委员会和该特殊组织之间的组织关系的准则，由地方委员会规定。”（谢天谢地！现在可以看出所有这一大堆话都是多余的空话。）“在党的一般事务方面，这种组织应当作为委员会组织的一个部分来进行工作。]——（17）[第 14 条所规定的地方组织，可以成立自治联盟，以便顺利地执行它的特殊任务。这种联盟可以有自己专门的机关报和领导机关，但这些机关都应当受党中央委员会的直接监督。这个联盟的章程由它自行规定，但是必须经过党中央委员会批准。]（18）[如果党的地方委员会根据地方条件多半是用当地语言进行鼓动工作时，也可以加入第 17 条所规定的自治联盟。附注：这种委员会虽然是自治联盟的一部分，但并不因此就不成其为党的委员会”。]（整个一条都是非常有益处和非常聪明的，附注更是有过之无不及。）“(19）[加入自治联盟的地方组织同该联盟中央机关之间的联系，应当受地方委员会的监督。]（20）[各自治联盟的中央机关报和领导机关对党中央委员会的关系，也和党的地方委员会对党中央委员会的关系一样。]（四）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21）[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政治的和学术的机关报——是全党的代表。]（22）中央委员会负责对党的全部实际活动实行总的领导，关心正确使用和正确配备全党的一切力量，

监督全党各部分的活动，把报刊发给各地方组织，建立党的技术机关，召开党代表大会。（23）党的机关报负责对党内生活进行思想领导，宣传党纲，通过学术的和政论的形式阐明社会民主党的世界观。（24）所有党的地方委员会和自治联盟都同党中央委员会和党机关报编辑部发生直接联系，并定期报告本地的运动和组织工作情况。（25）党的机关报的编辑部由党代表大会指定，一直工作到下一届代表大会时止。（26）[编辑部在其内部事务方面是独立自主的]，并且可以在两届代表大会期间补充和更换自己的成员，但每次都必须通知中央委员会。（27）所有由中央委员会发出的声明或者经过它批准的声明，都应当根据中央委员会的要求在党的机关报上刊载。（28）党中央委员会经党的机关报的编辑部同意后，可以成立专门从事某种文字工作的著作家小组。（29）中央委员会由党代表大会指定，一直工作到下一届代表大会时止。中央委员会可以用增补办法补充自己的名额（人数不限），但每次都必须通知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五）国外的党组织。（30）国外的党组织主管党在国外俄国侨民中的宣传工作并把其中的社会主义分子组织起来。国外的党组织由它们选出的领导机关领导。（31）加入党的各自治联盟可以在国外设立自己的支部，以便协助执行联盟的专门任务。这些支部以自治团体的资格加入总的国外组织。（六）党代表大会。（32）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33）[党代表大会制定党纲、党章以及全党活动的指导原则；监督各级党机关的工作并处理它们之间发生的冲突。]（34）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由下列组织和机关选派：（a）党的各地方委员会；（b）所有加入党的各自治联盟的中央领导机关，（c）党中央委员会和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d）国外的党组织。（35）代表委托书可以转托，但是每一个代表至多只能拥有三张有效委托书。两个代表可以拥有一张委托书。不准使用限权委托书。（36）中央委员会如果认为吸收某同志参加代表大会有益处时，可以邀请该同志参加代表大会并享有发言权。（37）在修改党纲或党章的问题上，须经占总票数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其他问题则由简单多数决定。（38）代表大会只有在出席的代表能代表半数以上的现有的党委员会时，才可以认为有效。（39）代表大会应当尽可能每两年召开一次。[凡因某种不以中央委员会的意志为转移的障碍不能如期召开代表大会时，中央委员会可以自行决定延期举行。”]

读者如果能以超乎寻常的耐性读完这个所谓党章，大概就不会要求我们对以下几个结论再作专门的分析了。第一个结论：这个章程染上了难以医治的浮肿病。第二个结论：这个章程根本没有什么对过分集中制持否定态度的特别色彩的组织观点。第三个结论：马尔托夫同志把自己章程中的 38/39 以上的东西都瞒过世人

的耳目（并且不让在代表大会上讨论）是做得很巧妙的。令人奇怪的只是，他居然把这种隐瞒行为称为光明正大。

（八）火星派内部分裂以前关于集中制问题的讨论

在谈党章第 1 条条文这个确实很有意义并且显然表明了各种色彩的观点的问题以前，我们还要稍微谈一下关于党章问题的简短的一般讨论，这次讨论占去了代表大会第 14 次会议的全部时间和第 15 次会议的部分时间。这次讨论是有一定意义的，因为它是在《火星报》组织因中央机关人选问题而完全分离以前进行的。相反，后来那些一般关于党章问题的讨论，特别是关于增补问题的讨论，都是我们已经在《火星报》组织内部发生分离以后进行的。自然，在尚未发生分离以前，我们还能比较公正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就是说，能比较不考虑我们大家所关心的中央委员会人选问题而发表自己的意见。前面我已经指出，马尔托夫同志当时赞成（第 157 页）我的组织观点，只不过在细节上有两点不同意见。相反，不论是反火星派或"中派"，都立刻对《火星报》的整个组织计划（也就是整个党章）中的两个基本思想发起了攻击，即反对集中制，也反对有"两个中央机关"。李伯尔同志把我的党章称为"有组织的不信任"，把有两个中央机关看作分权制（同波波夫和叶戈罗夫两位同志一样）。阿基莫夫同志主张扩大地方委员会的权限，尤其是要给以自行"改变自己成员的权利"。必须给以更大的活动自由……地方委员会应当由在当地积极活动的工作人员选出，正如中央委员会是由在俄国所有积极活动的组织的代表选出一样。如果这也不许可的话，就要把中央委员会指派到地方委员会的委员名额限制一下……"（第 158 页）可见，阿基莫夫同志在那里提出了反对"过分集中制"的理由，但是马尔托夫同志当时还没有因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遭到失败而跟着阿基莫夫跑，所以他对这些权威性的指示还是充耳不闻的。甚至当阿基莫夫同志把马尔托夫同志自己那个章程的"思想"（第 7 条——

限制中央委员会指派委员加入地方委员会的权利）讲给他听时，他还是置若罔闻！马尔托夫同志当时还不愿意唱出同我们意见不一致的“杂音”，所以他也就忍耐了同阿基莫夫同志以及同他本人意见不一致的杂音……当时发言攻击“可怕的集中制”的还只有那些觉得《火星报》主张的集中制对他们显然不利的人，即阿基莫夫、李伯尔和戈尔德布拉特，小心翼翼地（所以如此，是为了随时可以向后转）跟着他们走的有叶戈罗夫（见第156页和第276页）等等。当时党内绝大多数人都还看得很清规戒律楚，崩得、“南方工人”社等等正是根据狭隘的小组利益反对集中制的。顺便说一下，现在党内大多数人也看得很清楚，《火星报》旧编辑部正是根据小组利益反对集中制的……

例如拿戈尔德布拉特同志（第160—161页）的发言来说吧。他拼命攻击我所主张的“可怕的”集中制，说这种集中制是要导致下级组织的“消灭”，“完全是想使中央机关有无限权力来随意干预一切”，而各级组织“只有权驯顺地服从上级的命令”等等。“按照这个草案建立的中央机关将是孤独的，它周围不会有任何外层，只有无定形的散漫人群，它的一些唯命是听的代办员将在这个散漫人群中进行活动。”这同马尔托夫们和阿克雪里罗得们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以后用来款待我们的那套虚伪空话一模一样。人们曾讥笑崩得，因为它一方面反对我们的集中制，同时又使自己那里的中央机关拥有更明确规定的无限权力（例如，可以吸收和开除成员，甚至不许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在人们了解了问题真相以后，也会嘲笑少数派的喊叫，因为他们一处在少数地位就大声疾呼地反对集中制和党章，而一拥有多数，就立刻又要按党章办事了。

在两个中央机关的问题上也明显地表现了派别划分：反对所有火星派的有李伯尔，有阿基莫夫（他首先唱出了现在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爱唱的调子，说总委员会内中央机关报压倒了中央委员会），有波波夫，还有叶戈罗夫。根据旧《火星报》一向发挥的（而且是波波夫们和叶戈罗夫们的同志们在口头上赞成过

的！）那些组织思想，自然要产生两个中央机关的计划。旧《火星报》的政策，是同“南方工人”社主张创办一个平行的通俗机关报并把它变成事实上占主要地位的机关报的计划截然相反的。这就是当时所有反火星派和整个泥潭派主张一个中央机关，即主张似乎更厉害的集中制的那种初看起来很奇怪的矛盾现象的根源。当然也有（特别是泥潭派中间）一些代表，未必清楚地了解“南方工人”社的组织计划将会引起，并且由于客观进程一定会引起怎样的后果，但是他们那种优柔寡断和毫无自信的本性，把他们推到反火星派方面去了。

在火星派分子参加这些（在火星派尚未分裂以前）关于党章问题的争论的发言中，马尔托夫（“赞成”我的组织思想）和托洛茨基两位同志的发言特别出色。托洛茨基当时回答阿基莫夫同志和李伯尔同志时说的每一句话，都揭穿了“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以后的行为和理论的全部虚伪实质。他（阿基莫夫同志）说：“党章规定的中央委员会的权限不够确切。我不能同意他的意见。恰恰相反，党章对这一点规定得很确切：既然党是一个整体，那就必须保证它对地方委员会的监督。李伯尔同志用我所用过的字眼说，党章表明‘有组织的不信任’。这是对的。但是，我用这个字眼是指崩得代表所提出的那个章程，因为他们的章程是意味着党内一部分人对全党表示有组织的不信任。而我们的党章〈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还没有遭到失败时，这个章程还是“我们的”！〉则意味着党要对它的各个部分表示有组织的不信任，就是说，要对各地方组织、各区组织、各民族组织以及其他组织实行监督。”（第 158 页）是的，这里对我们的党章作了正确的说明，我们奉劝那些现在公然说“有组织的不信任”制度或所谓“戒严状态”是由阴险毒辣的多数派发明和实行的人多回忆一下这种说明吧。只要把上面引用的发言和在国外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到一个典型事例，它说明了政治上的毫无气节，说明马尔托夫这伙人是怎样根据问题是涉及他们自己的下级团体还是别人的下级团体而改变自己的观点的。

（九）党章第 1 条

我们已经列举了在代表大会上引起热烈的有意义的争论的不同条文。这种争论几乎占了两次会议的时间，并且是以两次记名投票结束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整个代表大会期间只举行过八次记名投票，这种记名投票花费时间太多，所以只在特别重要的情况下才采用）。当时涉及的问题无疑是原则问题。代表大会对于争论的兴趣是很大的。所有代表都参加了表决——这是我们代表大会（正如任何一个大的代表大会一样）少有的现象，这也证明，所有参加争论的人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试问，所争论的问题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我在代表大会上已经说过，后来又不止一次地重复过："我决不认为我们的意见分歧（关于党章第 1 条）是决定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分歧。我们还决不至于因为党章有一条不好的条文而灭亡！"（第 250 页）[注：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7 卷第 269 页。——编者注] 这种意见分歧，虽然暴露出原则上的不同色彩，它本身无论如何也不会引起代表大会以后所形成的那种分离（其实，如果老实不客气地说，这是分裂）。但是，任何一种小的意见分歧，如果有人坚持它，如果把它提到首位，如果硬要去寻找这种分歧的全部来龙去脉，那它就会变成大的意见分歧。任何一种小的意见分歧，如果成为转向某些错误见解的出发点，如果这些错误见解又由于新增加的分歧而同使党分裂的无政府主义行动结合起来，那么这种意见分歧就会有重大的意义了。

这一次也正是这样。党章第 1 条引起的比较不大的意见分歧，现在竟有了重大的意义，因为正是这种意见分歧成了少数派（特别是在同盟代表大会上以及后来在新《火星报》上）走向机会主义的深奥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的空谈的转折点。正是这种意见分歧奠定了火星派少数派同反火星派以及泥潭派结成联盟的基础，这个联盟到选举时已经有了确定的形式，不了解这个联盟，就不能了解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发生的主要的根本的分歧。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党章第 1 条

问题上所犯的小错误，原是我们的罐子上的一个小裂缝（正如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这个罐子本来可以用绳子打个死结（而不是用绞索，就象在同盟代表大会期间几乎陷于歇斯底里状态的马尔托夫所听错的那样）把它捆紧。也可以竭尽全力扩大裂缝，使它完全破裂。由于热心的马尔托夫分子采取了抵制等等无政府主义的手段，结果出现了后一种情况。关于党章第 1 条的意见分歧在中央机关选举问题上起了不小的作用，而马尔托夫在这个问题上遭到失败，也就使他走向用粗暴机械的、甚至是无理取闹的（在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手段进行"原则斗争"。

现在，经过这一切事件以后，党章第 1 条问题就有了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应当确切地认识到代表大会在表决这一条时形成的派别划分的性质，同时更重要的是，应当确切地认识到在讨论党章第 1 条时就已经显现或者开始显现出来的那些观点的色彩的真实性质。现在，在读者熟悉的各种事件发生以后，问题的提法已经是这样，究竟是得到阿克雪里罗得拥护的马尔托夫的条文，象我在党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第 333 页），反映了他的（或者他们的）不坚定性、动摇性和政治态度模糊，或象普列汉诺夫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所指出的那样（同盟记录第 102 页及其他各页），反映了他（或者他们）倾向于饶勒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呢，还是得到普列汉诺夫拥护的我的条文，反映了我在集中制问题上有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的、庞巴杜尔[6]式的、非社会民主主义的错误观点呢？是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呢，还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现在，当小的分歧变成大的分歧时，问题的提法已经是这样了。在从实质上讨论那些赞成和反对我的条文的理由时，我们应当注意的正是事态的发展强加给我们大家的，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有点夸张的话）是由历史进程形成的这种问题的提法。

让我们从分析代表大会的讨论来开始剖析这些理由吧。第一个发言，即叶戈罗夫同志的发言所以值得注意，只是因为他的态度（不明白，我还不明白，我还

不知道真理在哪里）很可以说明当时还难以认清这个确实是新的、相当复杂而细致的问题的许多代表的态度。第二个发言，即阿克雪里罗得的发言，立刻从原则上提出问题。这是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第一个原则性的发言，其实这就是他在代表大会上的第一次发言，而且很难说他这个谈到有名的“大学教授”的发言是特别成功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说：“我认为，我们必须分清党和组织这两个概念。而这里有人把这两个概念混淆了。这种混淆是危险的。”这就是用来反对我的条文的第一个理由。请你们仔细看一看这个理由吧。如果我说，党应当是组织［注：“组织”一词通常有两种含义，即广义的和狭义的。狭义的是指人类集体中的，至少是有最低限度确定形式的人类集体中的单个细胞。广义的是指结合成一个整体的这种细胞的总和。例如，海军、陆军和国家，既是许多组织（从该词的狭义来说）的总和，同时又是一种社会组织（从该词的广义来说）。教育主管机关是一个组织（从该词的广义来说），同时它又是由许多组织（从该词的狭义来说）组成的。同样，党也是一个组织，而且应当是一个组织（从该词的广义来说）；同时党又应当是由许多不同的组织（从该词的狭义来说）组成的。所以，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谈论划分党和组织这两个概念时，第一，他没有注意到组织一词的广义和狭义的这个区别，第二，他没有发现他自己把有组织的分子和无组织的分子混淆起来了。］的总和（并且不是什么简单的算术式的总和，而是一个整体），那么，这是不是说我把党和组织这两个概念“混淆了”呢？当然不是。我只是以此来十分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愿望，自己的要求，使作为阶级的先进部队的党成为尽量有组织的，使党只吸收至少能接受最低限度组织性的分子。反之，我的论敌却把有组织的分子和无组织的分子，接受领导的分子和不接受领导的分子，先进的分子和不可救药的落后分子——因为还可救药的落后分子是能够加入组织的——混淆在党内。这样的混淆才真正是危险的。随后，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援引“从前那些十分秘密的集中的组织”（“土地和自由”社[7]和“民意党”[8]）做例子，说这些

组织周围“聚集了许多虽然没有加入组织，却以某种方式帮助它，并被认为是党员的人。……这个原则应当在社会民主党组织内更严格地实行”。于是我们就接触到一个关键问题：“这个原则”，即许可那些不加入任何一个党组织而只是“以某种方式帮助它”的人自称为党员的原则，真的是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吗？普列汉诺夫对这个问题作了唯一可能的回答，他说：“阿克雪里罗得援引 70 年代的情况做例子是不正确的。当时有组织严密、纪律良好的中央机关，在它周围有它所成立的各种组织，而在这些组织以外是一片混乱和无政府状态。这一混乱状态中的分子虽然也自称为党员，对于事业却并没有好处，反而造成了损失。我们不应当仿效 70 年代的无政府状态，而要避免这种状态。”可见，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想要冒充为社会民主党的原则的“这个原则”，其实是无政府主义的原则。谁要想推翻这个结论，就必须证明在组织以外有可能实现监督、领导和纪律，就必须证明有必要授予“混乱状态中的分子”以党员称号。拥护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的人，对于以上两点都没有加以证明，而且也无法加以证明。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拿了“自认为是社会民主党人并声明这一点的大学教授”做例子。要把这个例子所包含的思想贯彻到底，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就应当进一步说明：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本身是否承认这位大学教授是社会民主党人？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既然没有提出这个更进一步的问题，那他就是中途抛弃了自己的论据。的确，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承认我们所谈的这位大学教授是社会民主党人，那么他们为什么又不把他编到某一个社会民主党组织里面呢？只有把他编进去，这位大学教授的“声明”才会同他的行动相符合，才不致成为空话（大学教授们的声明往往是空话）；或者是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不承认这位大学教授是社会民主党人，那么给这位大学教授以享有光荣而又责任重大的党员称号的权利，就是荒谬的，毫无意义的，而且是有害的。所以，归结起来说，问题正在于是彻底实行组织原则，还是崇尚涣散状态和无政府状态。我们究竟是以已经形成的、已经团

结起来的社会民主党人核心——譬如说，已经召开党代表大会并且将扩大和增设各种党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核心——为出发点来建设党呢，还是满足于一切帮助党的人都是党员这种聊以自慰的空话？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接着又说："我们采纳列宁的条文，就会把虽然不能直接吸收到组织中，但终究还是党员的那一部分人抛弃掉。"在这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本人十分明显地犯了他想归罪于我的那种混淆概念的错误：他竟把所有帮助党的人都是党员这一点当作既成事实，其实正是这一点引起了争论，而我的论敌还应当来证明这种解释是必要的和有益的。所谓"抛弃"这样一个初看起来似乎可怕的词，究竟有什么内容呢？如果说只有被承认为党组织的那些组织中的成员才能称为党员，那么不能"直接"加入任何一个党组织的人，也还是能在靠近党的非党组织中工作的。因此，所谓抛弃，如果是指取消工作机会，取消参加运动的机会，那是根本谈不上的。相反，我们容纳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党组织愈坚强，党内的动摇性和不坚定性愈少，党对于在它周围的、受它领导的工人群众的影响也就会愈加广泛、全面、巨大和有效。把作为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党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显然是绝对不行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说："当然我们要建立的首先是党的最积极的分子的组织，革命家的组织，但是我们既然是阶级的党，就应当想法不把那些也许并不十分积极然而却自觉靠近这个党的人抛在党外。"他这样说，正是犯了上述把党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的错误（这种错误是我们的整个机会主义经济派的特点）。第一，列为社会民主工党积极部分的，决不单是革命家组织，还有许多被承认为党组织的工人组织。第二，究竟有什么理由，按照什么逻辑，可以根据我们是阶级的党这一事实，就作出结论说不必把加入党的人和靠近党的人区分开来呢？恰恰相反：正因为人们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有差别，所以必须区别他们同党的关系的密切程度。我们是阶级的党，因此，几乎整个阶级（而在战争时期，在国内战争年代，甚至是整个阶级）都应当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行动，都应当尽量紧密地靠近我们党，但是，

如果以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论在什么时候，几乎整个阶级或者整个阶级都能把自己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提高到自己的先进部队即自己的社会民主党的水平，那就是马尼洛夫精神[106]和“尾巴主义”。还没有一个明白事理的社会民主党人怀疑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连职业的组织（比较原始的、比较容易为落后阶层的觉悟程度接受的组织）也不能包括几乎整个工人阶级或者整个工人阶级。忘记先进部队和倾向于它的所有群众之间的区别，忘记先进部队的经常责任是把愈益广大的阶层提高到这个先进的水平，那只是欺骗自己，无视我们的巨大任务，缩小这些任务。抹杀靠近党的分子和加入党的分子之间的区别，抹杀自觉、积极的分子和帮助党的分子之间的区别，正是这种无视和遗忘的表现。

拿我们是阶级的党作借口来为组织界限模糊辩护，为把有组织和无组织现象混淆起来的观点辩护，就是重复纳杰日丁的错误，因为纳杰日丁“把运动在‘深处’的‘根子’这一哲学的和社会历史的问题，同……组织技术问题混淆起来了”（《怎么办？》第 91 页）[注：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6 卷第 115 页。——编者注]。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首创的这种混淆，后来被拥护马尔托夫同志条文的那些发言人重复了几十次。“党员称号散布得愈广泛愈好”——马尔托夫这样说，但是他没有说明这种名不副实的称号散布得广泛究竟有什么好处。对不加入党组织的党员实行监督不过是一句空话，这能否定得了吗？空话如果广泛散布，那是有害而无益的。“如果每一个罢工者，每一个示威者，在对自己行动负责的情况下，都能宣布自己是党员，那我们只会对此表示高兴。”（第 239 页）真的吗？每一个罢工者都应当有权宣布自己是党员吗？马尔托夫同志的这个论点一下子就把他的错误弄到了荒谬的地步，他把社会民主主义降低为罢工主义，重蹈阿基莫夫们的覆辙。如果社会民主党能够领导每一次罢工，我们只会对此表示高兴，因为社会民主党的直接的和责无旁贷的义务就是领导无产阶级的一切表现形式的阶级斗争。而罢工就是这种斗争最深刻最强有力的表现形式之一。但是，如果我们把

这种初步的、按实质来说不过是工联主义的斗争形式同全面的自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等同起来，那么我们就会是尾巴主义者了。如果我们给每一个罢工者以"宣布自己是党员"的权利，那么我们就是以机会主义态度使一件分明不真实的事情合法化，因为这样的"宣布"在大多数场合都是不真实的。如果我们想自欺欺人，硬说那些"没有受过训练的"非熟练工人的极广大阶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必然是十分涣散、备受压迫、愚昧无知，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罢工者都可以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党员，那么我们就是沉湎于马尼洛夫的幻想了。正是根据"罢工者"的例子，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力求本着社会民主主义精神领导每一次罢工的革命意向同宣布每一个罢工者为党员的机会主义词句之间的区别。我们是阶级的党，这是就我们在事实上本着社会民主主义精神领导几乎整个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来说的，但是，只有阿基莫夫们才能由此作出结论说，我们在提法上应当把党和阶级等同起来。

马尔托夫同志在同一次发言中说，"我不怕密谋组织"，但是，他补充说，"在我看来，密谋组织，只有当它由广泛的社会民主工党围绕着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第 239 页）。为了说得确切些，应当说，只有当它由广泛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围绕着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如果马尔托夫同志的论点是以这种形式表达的，那就不仅是不容争辩，而且是不言自明的定论了。我所以要讲到这一点，只是因为以后发言的人把马尔托夫同志的这个不言自明的定论变成非常流行和非常庸俗的论据。说什么列宁想"使党员总数以密谋者人数为限"。当时作出这个只能令人好笑的结论的有波萨多夫斯基同志以及波波夫同志，而当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发言附和这个结论时，这个结论的真正性质，即机会主义词句的性质，就充分暴露出来了。目前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新《火星报》上又发挥了这个论据，想使读者们了解新编辑部的新的组织观点。还在代表大会讨论党章第 1 条问题的第 1 次会议上，我就发现我的论敌想要利用这种廉价的武器，所以我在发言中告

诚说："不要以为党的组织只应当由职业革命家组成。我们需要有不同形式、类别和色彩的极其多种多样的组织，从极狭小极秘密的组织直到非常广泛自由的组织（松散的组织）。"（第 240 页）［注：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7 卷第 269 页。——编者注］这本来是有目共睹、不言自明的真理，所以我当时认为这是不必多谈的。但是，在目前时期，有人在很多很多方面把我们拉向后退，这就使人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也"重提旧事"。因此我要从《怎么办？》和《给一位同志的信》中摘录几段话：

"……象阿列克谢耶夫和梅什金、哈尔图林和热里雅鲍夫这样一些卓越的活动家的小组，却是能够胜任最切实最实际的政治任务的。他们所以能够胜任，正是并且只是因为他们的热烈的宣传能够获得自发觉醒起来的群众的响应，因为他们的沸腾的毅力能够得到革命阶级的毅力的响应和支持。"［注：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6 卷第 101 页。——编者注］要成为社会民主党，就必须得到本阶级的支持。不是象马尔托夫同志所想象的那样，党应当去围绕密谋组织，而是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应当围绕既包括密谋组织又包括非密谋组织的党。

"……为进行经济斗争而建立的工人组织应当是职业的组织。每个工人社会民主党人都应当尽量帮助这种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但是要求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才能成为行业工会会员，那就完全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了，因为这会缩小我们影响群众的范围。让每一个了解必须联合起来同厂主和政府作斗争的工人，都来参加行业工会吧。行业工会如果不把一切只要懂得这种起码道理的人都联合起来，如果它们不是一种很广泛的组织，就不能达到行业工会的目的。这种组织愈广泛，我们对它们的影响也就会愈广泛，但这种影响的发生不仅是由于经济斗争的'自发的'发展，而且是由于参加工会的社会党人对同事给以直接的和自觉的推动。"（第 86 页）［注：同上，第 108 页。——编者注］顺便说一下，对于评价关于党章第 1 条的争论，工会的例子是特别值得注意的。说工会应当在社会民主

党组织的“监督和领导下”进行工作，这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是不会产生异议的。但是根据这一点就给工会全体会员以“宣布自己”为社会民主党党员的权利，那就是十分荒谬的了，而且势必有两个害处：一方面是缩小工会运动的规模并且削弱工人在工会运动基础上的团结，另一方面，这会把模糊不清和动摇不定的现象带进社会民主党内。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发生了有名的汉堡泥瓦工做包工活事件[9]的具体情况下曾解决过类似的问题。当时社会民主党毫不迟疑地认为工贼行为是社会民主党人所不齿的无耻行为，即认为领导罢工和支援罢工是自己的切身事业，但是同时它又十分坚决地否定了把党的利益和行业工会的利益等同起来、要党对个别工会所采取的个别步骤承担责任的要求。党应当并且将力求把自己的思想灌输到行业工会中去，使工会接受自己的影响，但是，正是为了这种影响，党应当把这些工会中完全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加入社会民主党的）人和那些不十分自觉和政治上不十分积极的人区别开来，而不是象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希望的那样，把他们混为一谈。

“……革命家组织把最秘密的职能集中起来，这决不会削弱而只会扩大其他许许多多组织的活动范围和内容，这些组织既然要把广大群众包括在内，就应当是一些形式尽量不固定、秘密性尽量少的组织，如工会、工人自学小组、秘密书刊阅读小组、以及其他一切居民阶层中的社会主义小组和民主主义小组等等。这样的小组、工会和团体必须遍布各地，履行各种不同的职能；但是，如果把这些组织同革命家的组织混为一谈，抹杀这两者之间的界限……那就是荒唐和有害的了。”（第 96 页）［注：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6 卷第 120 页。——编者注］从这种引证中可以看出，马尔托夫同志是多么不合时宜地对我提醒说，革命家组织应当由广泛的工人组织围绕起来。我在《怎么办？》中就已经指出了这一点，而在《给一位同志的信》中更具体地发挥了这个思想。我在这封信中写道，工厂小组“对我们特别重要：运动的全部主要力量就在于各大工厂工人的组织性，因为

大工厂里集中的那一部分工人，不但数量上在工人阶级中占优势，而且在影响、觉悟程度和斗争能力方面更占优势。每个工厂都应当成为我们的堡垒……工厂分委员会应当力求通过各种小组（或代办员）网掌握整个工厂，吸收尽量多的工人参加工作……所有的小组和分委员会等，都应当是委员会的附属机构或分部。其中一些人将直接申请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经委员会批准就成为党员，（受委员会委托或经委员会同意）担负一定的工作，保证服从党机关的指示，享有党员的权利，可以成为委员会委员的直接候选人，等等。另一些人将不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他们是由党员建立的那些小组的成员，或者是与某个党小组接近的那些小组的成员，等等”（第 17—18 页）［注：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7 卷第 10 页和第 12—13 页。——编者注］。从我加上着重标记的地方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我的第 1 条条文的思想在《给一位同志的信》中已经充分表明了。那里直接指出了入党的条件：（1）一定程度的组织性；（2）由党委员会批准。在下一页，我又大致指出什么样的团体和组织，根据什么理由应当（或者不应当）吸收入党：“书刊投递员小组成员必须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应该认识一定数量的党员和党的负责人。研究职工劳动条件和拟订职工各种要求的小组，其成员不一定必须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大学生自学小组、军官自学小组和职员自学小组都有一两个党员参加，有时甚至根本不该让人知道他们是党员，等等。”（第 18—19 页）［注：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7 卷第 13—14 页。——编者注］

请看这又是一种可以说明“光明正大”问题的材料！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上的条文甚至完全没有讲到党对于各组织的关系，而我几乎在代表大会一年以前就已经指出，一些组织应该包括在党内，另一些组织不应该包括在党内。在《给一位同志的信》里已经很明确地提出我在代表大会上所辩护的那个思想。这一点可以具体表述如下。一般按照组织程度，尤其是按照秘密程度来说，各组织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1）革命家组织；（2）尽量广泛和多种多样的工人组织（我只

说到工人阶级，当然，在一定条件下，这里也包括其他阶级中的某些分子）。这两种组织就构成为党。其次，（3）靠近党的工人组织；（4）不靠近党，但是事实上服从党的监督和领导的工人组织；（5）工人阶级中没有参加组织的分子，其中一部分——至少在阶级斗争的重大事件中——也是服从社会民主党的领导的。按照我的看法，情况大致就是这样。相反，按照马尔托夫同志的看法，党的界限是极不明确的，因为“每一个罢工者”都可以“宣布自己是党员”。试问，这种界限模糊有什么好处呢？可以使“称号”广泛散布。它的害处就是会产生一种把党和阶级混淆起来的瓦解组织的思想。

为了说明我们所提出的一般原理，我们还要粗略地看一看代表大会继续讨论党章第 1 条的情况。布鲁凯尔同志发言（这一点使马尔托夫同志感到满意）赞成我的条文，但是他和我的联盟是跟阿基莫夫同志和马尔托夫的联盟不同的，这只是出于误会。布鲁凯尔同志“不同意整个党章和它的整个精神”（第 239 页），而他拥护我的条文，是因为他把我的条文看成是《工人事业》的拥护者所希望的那种民主制的基础。布鲁凯尔同志当时还没有认识到在政治斗争中有时不得不选择害处较少的办法；布鲁凯尔同志没有觉察到，在我们这样的代表大会上为民主制辩护，是徒劳无益的。阿基莫夫同志就比较精明了。他完全正确地提出问题，认为“马尔托夫同志和列宁同志争论的是哪一种〈条文〉更能达到他们的共同目的”（第 252 页）。他继续说：“我和布鲁凯尔，想挑选一个比较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的条文。于是我就挑选了马尔托夫的条文。”阿基莫夫同志又坦率地解释说，他认为“他们的目的〈即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和我三个人的目的——建立一个起领导作用的革命家组织〉是实现不了的，而且是有害的”；他象马尔丁诺夫同志［注：不过，马尔丁诺夫同志想同阿基莫夫同志区别开来，他想证明，密谋似乎不等于秘密，在这两个词的差别的后面掩盖着概念上的差别。究竟是什么差别，无论马尔丁诺夫同志或者现在跟着他走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都没有加以说明。马尔丁诺

夫同志“装出一副样子”，使人感到，似乎我，例如在《怎么办？》中，没有坚决（如在《任务》（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426—449 页。——编者注）中那样）反对“把政治斗争缩小成密谋”。马尔丁诺夫同志想使听众忘记一件事实，就是我当时所反对的那些人认为不需要革命家组织，正如阿基莫夫同志现在认为不需要这种组织一样。] 一样，拥护经济派所谓不必有“革命家组织”的思想。他“完全相信，实际生活终究会闯进我们党组织中来，不管你们是用马尔托夫的条文还是用列宁的条文阻挡它的去路”。本来，这种“尾巴主义的”“实际生活”观点是不值一提的，如果我们没有在马尔托夫同志那里也看到这种观点的话。马尔托夫同志的第二次发言（第 245 页）一般讲来是很有意思的，所以值得详细分析一番。

马尔托夫同志的第一个理由是说：党组织对于不加入组织的党员的监督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委员会既然委托某人担负某种职务，就有可能考察它”（第 245 页）。这个论点非常值得注意，因为它可以说是“道破了”马尔托夫的条文究竟是谁需要的，事实上是为谁效劳的：是为知识分子个人效劳呢，还是为工人团体和工人群众效劳。原来，马尔托夫的条文有可能作两种解释：（1）凡是在党的某一个组织的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人，都有权“宣布自己”（这是马尔托夫同志本人的话）是党员；（2）每一个党组织都有权承认凡是在它的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人是党员。只有第一种解释才真正有可能使“每一个罢工者”自称为党员，所以也只有这种解释才立刻得到了李伯尔们、阿基莫夫们以及马尔丁诺夫们的衷心拥护。但是，这种解释显然是一句空话，因为这样就会把整个工人阶级都包括进去，从而抹杀党和阶级之间的区别；所谓监督和领导“每一个罢工者”，那只能是“象征性地”谈一谈。正因为如此，马尔托夫同志在第二次发言时立刻就倒向第二种解释（不过，顺便说一下，这种解释被代表大会直接否决了，因为代表大会否决了科斯季奇的决议案[10]，第 255 页），即认为委员会将委托人们担负

各种职务并考察其执行情况。这种专门职务当然从来不会委托给工人群众，不会委托给数以千计的无产者（即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和马尔丁诺夫同志所说的那些无产者〉，而恰恰是常常委托给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提起的大学教授，委托给李伯尔同志和波波夫同志所关心的中学生（第 241 页），委托给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第二次发言中所提到的革命青年（第 242 页）。总之，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要么是一纸空文和空洞的辞藻，要么就多半是而且几乎完全是有利于那些“浸透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而不愿意加入组织的“知识分子”。马尔托夫的条文在口头上是维护无产阶级广大阶层的利益的，但是事实上却是为那些害怕无产阶级的纪律和组织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利益效劳。谁也不敢否认，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殊阶层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特点，一般和整个说来，正是个人主义和不能接受纪律和组织（可以参看一下考茨基论述知识分子的一些著名论文）；这也就是这个社会阶层不如无产阶级的地方；这就是使无产阶级常常感觉到的知识分子意志消沉、动摇不定的一个原因；知识分子的这种特性是同他们通常的生活条件，同他们在很多方面接近于小资产阶级生存条件的谋生条件（单独工作或者在很小的集体里工作等等）有密切联系的。最后，拥护马尔托夫同志条文的那些人恰恰必须拿大学教授和中学生做例子，也不是偶然的！在关于党章第 1 条的争论中并不象马尔丁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两位同志所想的那样，是坚决主张广泛进行无产阶级斗争的人反对坚决主张搞激进密谋组织的人，而是拥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人同拥护无产阶级组织和纪律的人发生了冲突。

波波夫同志说：“在彼得堡，也象在尼古拉耶夫或敖德萨一样，据这些城市的代表说，到处都有数以十计的散发书刊和进行口头鼓动的工人不能成为组织中的成员。可以把他们编到组织里面，但是不能看作组织中的成员。”（第 241 页）为什么他们不能成为组织中的成员呢？这始终是波波夫同志的一个秘密。上面我引了《给一位同志的信》中的一段话，正是说明把所有这些工人（是数以百计，而

不是数以十计）编到组织里面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其中有许许多多这样的组织能够而且应当包括在党内。

马尔托夫同志的第二个理由是说："列宁认为党内除了党组织以外，再也不能有其他什么组织……"完全对啊！……"反之，我却认为这样的组织应当存在。实际生活在十分迅速地建立和繁殖这些组织，以致我们来不及把它们一一纳入我们职业革命家的战斗组织的体系……"这个说法在两方面都是不正确的：（1）"实际生活"繁殖真正干练的革命家组织，要比我们所需要的，要比工人运动所要求的少得多；（2）我们党应当是一个不仅包括革命家组织而且包括许许多多工人组织在内的体系……"列宁认为中央委员会只会批准那些在原则方面完全可靠的组织为党的组织。可是，布鲁凯尔同志清楚地了解，实际生活〈原文如此！〉一定会显示自己的力量，中央委员会为了不致把许多组织抛在党外，就会不管它们是不是完全可靠而一概批准；因此，布鲁凯尔同志也就附和了列宁的意见……"请看，这真是尾巴主义的"实际生活"观点！当然，如果中央委员会一定要由一些不是按照自己的意见而是按照别人的意见行事的人（见组委会事件）组成，那"实际生活"就真正会"显示自己的力量"，就是说，党内最落后的分子就会占上风（现在由于党内存在着由落后分子组成的"少数派"，情况正是如此）。但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一个适当的理由能迫使一个干练的中央委员会把那些"不可靠的"分子吸收到党内来。马尔托夫同志拿"实际生活""繁殖"不可靠的分子作借口，正好十分明显地暴露了他的组织计划的机会主义性质！……他继续说："而我认为，如果这样的组织〈不完全可靠的组织〉同意接受党纲，接受党的监督，我们可以把它吸收入党，但并不因此就把它变成党的组织。例如，如果某个'独立派'协会决定接受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和党纲，并加入党，那我就会认为这是我们党的一个重大胜利，然而这还不是说，我们就把这个协会编入党组织中了……"请看，马尔托夫的条文竟混乱到什么程度：加入党的非党组织！请看一看他的公式吧：

党＝（1）革命家组织，+（2）被承认是党组织的工人组织，+（3）没有被承认是党组织的工人组织（多半是“独立派”组织），+（4）执行各种任务的个人，如大学教授、中学生等等，+（5）“每一个罢工者”。可以同这个出色的计划相媲美的只有李伯尔同志的下面一段话：“我们的任务不只是要建立一个组织〈!!〉，我们能够并且应当建立一个党。”（第 241 页）是的，当然我们能够并且应当做到这一点，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的并不是什么“建立一些组织”的废话，而是向党员直接提出要求，要他们切实地从事建立组织的工作。说是“建立一个党”，而又拥护用“党”这个词来掩盖一切无组织性和一切涣散状态，那就是说空话。

马尔托夫同志说：“我们的条文是表示一种想使革命家组织和群众之间有一系列组织的意图。”恰恰不是这样。马尔托夫的条文恰恰不是表示这种真正必要的意图，因为它并不是促使大家组织起来，不是要求大家组织起来，不是把有组织的东西和无组织的东西区分开来。它只是给大家一个称号［注：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又提出一个令人好笑的论据来为自己的条文辩护。他说：“我们可以指出，列宁的条文按字面意义来了解，是把中央代办员置于党外。因为这些代办员并不组成一个组织。”（第 59 页）这个论据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曾受到嘲笑，这一点从记录上可以看出来。马尔托夫同志以为他所指出的“困难”，只有中央代办员加入“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才能够解决。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马尔托夫同志所引用的例子清楚地表明他完全不了解党章第 1 条的思想，表明那种纯粹咬文嚼字的批评方式确实值得嘲笑。从形式上说，只要成立一个“中央代办员组织”，起草一个把这个组织编到党内来的决议，那个使马尔托夫同志大伤脑筋的“困难”就会立刻消失。而我提出的党章第 1 条条文的思想是要促使大家“组织起来！”，是要保证实在的监督和领导。从实质上看，中央代办员应不应当包括在党内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可笑的。因为对他们的实在的监督，由于他们被任命为代办员，由于他们被留在代办员的职位上，已经有了完全的和绝对的保证。

所以，这里根本谈不上把有组织的东西和无组织的东西混为一谈（而这正是马尔托夫同志条文的错误的根源）。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所以要不得，就是因为它使每一个人，使每一个机会主义者，每一个夸夸其谈的人，每一个“大学教授”和每一个“中学生”都可以宣布自己是党员。这就是马尔托夫同志条文的阿基里斯之踵[11]，而马尔托夫同志却枉费心机地企图掩饰这个致命弱点，举了一些根本谈不上什么自封为党员、自行宣布为党员的例子。]。说到这里，不能不回想起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说过的一段话：“无论用什么命令都不能禁止它们〈革命青年小组等等〉以及个别人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十足的真理!〉，甚至自认为是党的一部分……”这就大错特错了！禁止人家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没有必要，因为这个词直接表示的只是一种信念体系，而不是一定的组织关系。当个别小组和个别人危害党的事业，败坏和瓦解党的组织时，禁止这些小组和个人“自认为是党的一部分”，是可以而且应该的。如果党竟不能“用命令禁止”小组“自认为是”整体的“一部分”，那么说党是个整体，是个政治单位，就太可笑了！如果这样，那又何必规定开除党籍的手续和条件呢？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显然已经把马尔托夫同志的基本错误弄到了荒谬的地步；他甚至把这个错误发挥成机会主义理论，因为他补充说：“按照列宁的条文，党章第 1 条是直接同无产阶级社会民主党的实质〈!!〉及其任务根本矛盾的。”（第 243 页）这恰恰等于说：对党提出的要求高于对阶级的要求，是同无产阶级任务的实质根本矛盾的。怪不得阿基莫夫要竭力拥护这样的理论。

必须公正地指出，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现在想把这个显然有机会主义倾向的错误条文变成新观点的种子，但是他当时在代表大会上倒是表示愿意“磋商”，他说：“但是我发觉，我原来敲的是敞开的大门”（我在新《火星报》上也发觉了这一点），“因为列宁同志及其被认为是党的一部分的外层小组表示赞同我的要求。”（不仅外层小组，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工人联合会：参看记录第 242 页斯特拉霍

夫同志的发言，以及上面从《怎么办？》和《给一位同志的信》里摘录的一些话）“剩下的还有个别人。但是在这里也是可以磋商的。”我当时回答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说，一般说来，我并不反对磋商［注：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7 卷第 269 页。——编者注］，但是我现在应当解释一下，这句话究竟是指什么而言。正是关于个别人，关于所有这些大学教授和中学生等等，我是最不同意作什么让步的。但是，如果引起怀疑的是工人组织问题，那我就会同意（虽然上面我已经证明，这种怀疑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给我的第 1 条条文加上这样一个附注：“凡是接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和党章的工人组织，应当尽量列入党组织。”当然，严格说来，党章应当以法律式的定义为限，这种愿望不适于在党章中规定，而只适于在解释性的注解中、在小册子中加以说明（我已经指出，还在党章制定之前很久，我就在自己的小册子中作过这样的解释了）；但是，这样的附注至少丝毫不会有什么可能导致瓦解组织的错误思想，丝毫不会有马尔托夫条文中显然包含的机会主义的论断［注：在企图论证马尔托夫的条文时必然涌现出来的这些论断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托洛茨基同志的一段话（第 248 页和第 346 页），他说：“机会主义是由一些比党章某一条文更复杂的原因造成的〈或者说：由更深刻的原因决定的〉，——它是由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二者的相对发展水平引起的……”但是问题不在于党章条文能造成机会主义，而在于要利用党章条文锻造出比较锐利的武器来反对机会主义。机会主义产生的原因愈深刻，这种武器也就应当愈锐利。因此，以机会主义有“深刻的原因”作理由来为向机会主义敞开大门的条文辩护，那就是十足的尾巴主义。当托洛茨基同志还在反对李伯尔同志时，他了解党章是整体对部分、先进部队对落后部队所表示的“有组织的不信任”；而当托洛茨基同志站到李伯尔同志方面时，他却忘记了这一点，甚至用“复杂的原因”、“无产阶级的发展水平”等等，为我们在组织这种不信任（对机会主义的不信任）方面所表现的软弱和动摇辩护了。托洛茨基同志的另一个论据是说：“已有某种

组织的青年知识分子，是更容易自行列入〈黑体是我用的〉党员名单的。”正是这样。所以，有知识分子模糊不清的毛病的，正是那个甚至容许无组织的分子自行宣布为党员的条文，而不是我的绝对不许人们“自行列入”名单的条文。托洛茨基同志说，中央委员会“不承认”机会主义者的组织，只是因为注意到这些人的性质，但是既然大家都知道这些人的政治面貌，那么他们就没有什么危险，因为可以用全党抵制的办法把他们驱逐出去。这一点只有在必须把某人驱逐出党的情况下才是对的（而且只是对了一半，因为有组织的党不是用抵制的办法而是用表决的办法实行驱逐的）。这一点在很多日常情况下，即在只需要实行监督而绝对不能实行驱逐时，是完全不正确的。中央委员会为了实行监督，可以有意把某一个虽然不完全可靠，但有工作能力的组织在一定条件下接纳到党内来，以便考验它，试图把它引上正确道路，用自己的领导来克服它的局部的偏向，等等。如果根本不允许“自行列入”党员名单，那么这样的接纳是没有危险的。为了能使人公开地和负责地，即在有监督的条件下表达（并讨论）其错误观点和错误策略，这样的接纳往往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说法律式的定义应当适合事实上的关系，那么列宁同志的条文就应当被否决。”——托洛茨基同志这样说，但这又是机会主义者的说法。事实上的关系并不是死的，而是有生气的和不断发展的。法律式的定义能适合这些关系的进步发展，但是也能（如果这些定义是坏定义的话）“适合”退化或停滞。后一种情况也就是马尔托夫同志的“情况”。〕和“无政府主义的观念”。

我加了引号的最后一个说法，是巴甫洛维奇同志的。他当时很公正地把承认“不负责任的和自行列名入党的分子”是党员的主张看作无政府主义。巴甫洛维奇同志向李伯尔同志解释我的条文时说，“如果翻译成普通话”，——这个条文就是说：“既然你想做一个党员，就应当也承认组织关系，而且不只是抽象地承认。”这种“翻译”虽然很简单，但是它不仅对于那些各种各样可疑的大学教授和中学

生，而且对于最真实的党员，对于上层人物，都不是多余的（正如代表大会以后的事件证明的那样）……巴甫洛维奇同志同样公正地指出，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是同马尔托夫同志引证得很不恰当的那个不容争辩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相抵触的。“我们党是不自觉过程的自觉表现者。”正是如此。并且正因为如此，要“每一个罢工者”都能自称为党员是不正确的，因为假使“每次罢工”都不只是强大的阶级本能和必然引向社会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发表现，而是这个过程的自觉表现，那么……那么，总罢工就不会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话，那么我们的党就会立刻一下子包括整个工人阶级，因而也就会一下子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消灭掉。为了真正成为自觉的表现者，党应当善于造成一种能保证有相当的觉悟水平并不断提高这个水平的组织关系。巴甫洛维奇同志说：“按照马尔托夫的道路走去，首先就要删掉关于承认党纲的条文，因为要接受党纲，就必须领会和了解这个党纲……承认党纲是要有相当高的政治觉悟水平才能做到的。”我们从来不容许用任何要求（领会、了解等等）来人为地限制人们支持社会民主党以及参加它所领导的斗争，因为单是参加斗争这一事实本身就能提高觉悟性和组织本能，但是，既然我们结成一个党，以便进行有计划的工作，那我们就应当设法保证这种计划性。

巴甫洛维奇同志关于党纲问题的警告看来不是多余的，这在同一次会议过程中就立即显示出来了。保证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得以通过［注：投票赞成这个条文的有 28 票，反对的有 22 票。八个反火星派分子中有七个人赞成马尔托夫，有一个人赞成我。假如没有机会主义者的帮忙，马尔托夫同志就不能使自己的机会主义条文通过。（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毫无成效地企图驳倒这件不成问题的事实，不知为什么只指出崩得分子的票数，而把阿基莫夫同志和他的朋友们忘记了，确切些说，只有在这一点可以作为攻击我的证据——布鲁凯尔同志同意我的条文——时，才想起这些人。）］的阿基莫夫同志和李伯尔同志立刻就暴露出自己的真正本性，他们要求（第 254—255 页）对于党纲也只要（为了取得“党

员资格”）抽象地加以承认，即只承认它的“基本原理”就行了。巴甫洛维奇同志指出:“阿基莫夫同志的提议，从马尔托夫同志的观点看来，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可惜，我们从记录中看不出究竟有多少票赞成阿基莫夫的这个提议，——大概不少于七票（五个崩得分子，再加上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正因为七个代表退出了代表大会，所以原先在讨论党章第 1 条时形成的“紧密的多数派”（反火星派分子、“中派”和马尔托夫分子）结果变成了紧密的少数派！正因为七个代表退出了代表大会，主张批准旧编辑部的提议才遭到了失败，《火星报》办报的“继承性”才受到这种似乎惊人的破坏！这奇异的七个人竟是《火星报》的“继承性”的唯一救星和保证，而这七个人就是崩得分子以及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也就是说，正是那些对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的理由投过反对票的代表，而他们的机会主义立场曾经由代表大会肯定地指出过几十次了，并且是由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两人在讨论关于缓和第一条有关党纲的提法问题时就肯定地指出过的。反火星派分子捍卫《火星报》的“继承性”！——这就是代表大会以后展开的一出悲喜剧的开端。

※　※　※

表决党章第 1 条条文时形成的派别划分，也跟语言平等事件暴露的情况完全相同：由于火星派多数派方面有四分之一（大概数目）的票数脱离出去，结果就使“中派”所追随的反火星派有可能取得胜利。当然，这里也有个别的票数破坏了画面的完整性，——在象我们代表大会这样一个大规模的会议上，必然有一部分“野”票偶然地有时跑到这方有时跑到那方，尤其是在讨论党章第 1 条这样的问题时情况是这样，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的实质还刚刚显露出来，许多人简直还来不及把问题弄清楚（因为这个问题预先没有在书刊上探讨过）。从火星派多数派方面跑出去五票（各有两票表决权的鲁索夫和卡尔斯基以及有一票表决权的连斯基）；同时，又有一个反火星派分子（布鲁凯尔）和三个中派分子

（梅德维捷夫、叶戈罗夫和察廖夫）归附到火星派多数派方面；结果多数派共有23 票（24-5+4），比后来进行选举时最终形成的派别划分少一票。反火星派分子使马尔托夫取得了多数，反火星派分子中有七个人赞成马尔托夫，有一个人赞成我（“中派”方面也有七票赞成马尔托夫，三票赞成我）。火星派少数派和反火星派以及“中派”的联盟——即在代表大会快结束时和在代表大会以后组成的紧密的少数派的那个联盟——开始形成起来。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提出党章第1 条条文时，特别是在为这个条文辩护时所犯的无疑是向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个人主义迈进了一步的政治错误，由于有代表大会这样一个自由的公开的舞台，立刻和特别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具体表现就是，最不坚定的和最不坚持原则的分子马上发动了他们的全部力量来扩大社会民主党革命派观点中出现的裂缝，或者说缺口。在组织方面公开追求不同目的（见阿基莫夫的发言）的人们共同参加代表大会的事实，立刻就推动了在原则上反对我们的组织计划和反对我们的章程的人去支持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错误。在这个问题上也仍然忠实于社会民主党革命派观点的火星派分子竟成了少数。这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实，因为谁如果没有弄清楚这件事实，谁就根本无法了解由于争论党章的细节问题而发生的斗争，也无法了解由于争论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人选问题而发生的斗争。

注释：

[6]庞巴杜尔出自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作品《庞巴杜尔先生们和庞巴杜尔女士们》。作家在这部作品中借用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庞巴杜尔这个名字塑造了俄国官僚阶层的群像。“庞巴杜尔”一词后来成了沙皇政府昏庸横暴、刚愎自用的官吏的通称。——251。

[7]土地和自由社是俄国民粹派的秘密革命组织，1876 年在彼得堡成立，起初称为北方革命民粹主义小组、民粹派协会，1878 年底改称土地和自由社（19 世纪 60 年代初出现的一个俄国革命组织也叫土地和自由社）。该社著名活动家有：

马·安·和奥·亚·纳坦松夫妇、亚·德·米哈伊洛夫、阿·费·米哈伊洛夫、阿·德·奥博列舍夫、格·瓦·普列汉诺夫、奥·瓦·阿普捷克曼、德·亚·克列缅茨、尼·亚·莫罗佐夫，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土地自由派认为俄国可以走非资本主义的特殊发展道路，其基础就是农民村社。他们的纲领提出全部土地归“农村劳动等级”并加以“平均”分配、村社完全自治、“按地方意愿”把帝国分为几个部分等等。土地自由派认为俄国的主要革命力量是农民。他们在坦波夫、沃罗涅日等省进行革命工作，企图发动农民起义来反对沙皇政府。他们还出版和传播革命书刊，参加 70 年代末彼得堡的一些罢工和游行示威。他们的组织原则是遵守纪律、同志之间互相监督、集中制和保守秘密。由于对农村中革命运动日益感到失望，以及政府迫害的加剧，在土地和自由社内部逐渐形成了主张把恐怖活动作为同沙皇政府进行斗争的主要手段的一派。另一派主张继续采取原来的策略。1879 年 8 月，土地和自由社最终分裂，前者成立了民意党，后者组织了土地平分社。——253。

[8]民意党于 1879 年 8 月建立，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米·费·弗罗连柯、尼·亚·莫罗佐夫、维·尼·菲格涅尔、亚·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该党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制，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等自由和广泛的村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但是民意党人把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混为一谈，认为在俄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经过农民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并且认为俄国主要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民意党人从积极的“英雄”和消极的“群氓”的错误理论出发，采取个人恐怖的活动方式，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他们在 1881 年 3 月 1 日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由于理论上、策略上和斗争方法上的错误，

在沙皇政府的严重摧残下，民意党在 1881 年以后就瓦解了。列宁批判了民意党人的乌托邦式的纲领，但十分敬重他们同沙皇制度英勇斗争的精神。——253。

[9]这一事件发生在 1900 年。汉堡的 122 名泥瓦工组织了“泥瓦工自由工会”，在罢工期间违反泥瓦工工会中央联合会的禁令做包工活。泥瓦工工会汉堡分会向当地社会民主党组织提出了“泥瓦工自由工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员的破坏罢工行为的问题。地方党组织把这一问题转交给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处理。中央委员会指定党的仲裁法庭审理此案。仲裁法庭斥责了“泥瓦工自由工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员的行为，但否决了把他们开除出党的建议。——259。

[10]科斯季奇（米·索·兹博罗夫斯基）决议案所提出的党章第 1 条条文是：“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人，可以作为该组织的党员。”（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59 年俄文版第 281 页）——263。

[11]阿基里斯之踵意为致命弱点，出典于希腊神话。阿基里斯是希腊英雄珀琉斯和海洋女神忒提斯所生的儿子。他的母亲为了使他和神一样永生不死，在他出生后曾捏着他的脚后跟把他放进冥河的圣水里浸过。他的脚后跟因为没有沾上圣水就成了他唯一可能受到伤害的部位。后来阿基里斯果然被暗箭射中脚后跟而死。——267。

（十）无辜被加上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的人

在谈党章问题继续讨论的情况以前，必须讲一下《火星报》组织在代表大会期间举行的几次非正式会议，以便说明我们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发生的分歧。这四次会议中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次会议正是在表决了党章第 1 条以后举行的，所以，《火星报》组织在这次会议上发生的分裂，无论在时间上或者在逻辑上都是以后斗争的先声。

《火星报》组织的非正式会议［注：为了避免陷入无法解决的争论，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对于这些非正式会议上的情况的说明，已经是尽量简单了。基本的事实已经在我的《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第 4 页）中叙述过了。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答复》中并没有对这些基本事实表示异议。］是在组委会事件（它是挑起讨论中央委员会的可能的候选人问题的导火线）以后不久召开的。不言而喻，由于限权委托书被取消，这几次会议只具有协商性质，对任何人都没有约束作用，但是这几次会议的意义毕竟是很大的。中央委员会人选问题在许多代表看来是个很大的难题，因为他们既不知道秘密名字，也不知道《火星报》组织的内部工作情况，虽然这个组织造成了党在事实上的统一，并且实现了成为正式承认《火星报》的理由之一的对于实际运动的领导。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当火星派分子团结一致的时候，他们完全有保证在代表大会上取得五分之三的大多数，全体代表都很了解这一点。所有的火星派分子正是期望《火星报》组织提出一个关于中央委员会一定人选的名单，并且《火星报》组织中没有一个人有一句话表示反对预先在这个组织中讨论中央委员会人选问题，没有一个人提到要批准组委会全体委员，即把它变成中央委员会，甚至没有提到要同组委会全体委员协商中央委员会候选人问题。这个情况也非常重要，而且十分值得重视，因为现在马尔托夫分子事后热心拥护组委会，这不过是千百次地证明自己在政治上没有气节而已。［注：请仔细想象一下这幅“风俗画”吧：《火星报》组织的一个代表在代表大会上只同《火星报》组织协商过，并且甚至连提也没有提到要同组委会协商。而当他自己在这个组织内以及在代表大会上遭到了失败之后，他却对组委会没有被批准一事表示惋惜，事后赞扬组委会，并傲慢地漠视给他代表委托书的那个组织！我敢说，这样的事情在任何一个真正的社会民主党和真正的工人政党的历史中都是找不出来的。］当中央机关人选问题引起的分裂还没有使马尔托夫和阿基莫夫团结起来的时候，代表大会上所有的人都清楚认识到一个事实——任何一个不抱偏见的

人从代表大会的记录和《火星报》的全部历史中都很容易看清这样一个事实，即组委会主要是一个负责召集代表大会的委员会，是一个有意吸收各种色彩的代表（直到崩得为止）组成的委员会；而实际建立党的组织统一工作，则完全由《火星报》组织来担负（同时必须指出，有几个火星派的组委会委员没有出席代表大会，完全是偶然的，有的是由于被捕，有的是由于其他种种“客观”情况）。参加代表大会的《火星报》组织成员已由巴甫洛维奇同志在他的小册子中列举过了（见他的《关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信》第 13 页）[12]。

《火星报》组织内部激烈辩论的最终结果，就是我在《给编辑部的信》中引证过的两次表决。第一次表决是“以 9 票对 4 票 3 票弃权否决了马尔托夫所支持的候选人之一”。《火星报》组织所有出席代表大会的 16 个成员一致同意讨论关于可能的候选人问题，并以多数票否决了马尔托夫同志所提出的候选人之一（这个候选人就是现在马尔托夫同志自己也忍不住将其泄漏出来的施泰因同志，《戒严状态》第 69 页）——这不是最简单最自然的事情吗？要知道，我们聚集起来举行党代表大会，正是为了讨论和解决究竟把“指挥棒”交给谁掌握的问题，而我们全体党员的义务就是要极认真地对待议程上的这一项，正如鲁索夫同志后来十分公正指出的那样，解决这个问题要从事业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庸人的温情”出发。当然，在代表大会上讨论候选人问题时，特别是在非正式的和小型的会议上，不能不涉及到某些个人品质，不能不表示自己是赞成还是不赞成。[注：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伤心地抱怨，说我表示不赞成时的态度过于激烈，但是他没有觉察到，从他的抱怨里得出了对他自己不利的结论。列宁当时的举动——用他的说法——狂暴（同盟记录第 63 页）。真的。他使劲把门关了一下。不错。他的行为（在《火星报》组织的第二次或第三次会议上）使当时在场的人感到愤慨。这是实情。但是由此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只是我在各个争论问题的实质方面的论据是有说服力的，而且已经为代表大会的进程所证实。其实，既

然《火星报》组织的 16 个成员中毕竟有 9 个赞成我的立场，那么，显而易见，虽然态度激烈，哪怕态度激烈，人们还是赞成我的。这就是说，如果不是“态度激烈”，当时站到我这方面的人也许比 9 个还要多呢。也就是说，当时我的论据和事实必须胜过人们的“愤慨”，而终于得到克服的这种“愤慨”愈大，这些论据和事实也就显得愈有说服力。］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就已经警告过：把不赞成候选人看作一种“侮辱”（同盟记录第 49 页），是很荒谬的；由于人家直接履行党员的义务即自觉地慎重地选择负责人员就“吵闹”和大发歇斯底里，是很荒谬的。可是当时我们的少数派却为此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他们在代表大会以后开始叫嚷什么“破坏名誉”（同盟记录第 70 页），并在报刊上向广大读者说施泰因同志是旧组委会的“主要人物”，无辜被人指责有“什么险恶的计谋”（《戒严状态》第 69 页）。你看，在是否赞成候选人的问题上叫嚷什么“破坏名誉”，这难道不是歇斯底里吗？有人在《火星报》组织的非正式会议上以及在党的正式的最高会议即代表大会上遭到了失败以后，就在街头公众面前抱怨，并把落选的候选人当作“主要人物”推荐给可尊敬的公众；有人后来竟用闹分裂和要求增补的办法来要挟党接受他们的候选人，这难道不是无谓争吵吗？我们在国外沉闷的气氛中，政治概念竟然混淆到如此程度，以致马尔托夫同志连什么是党员义务，什么是小组习气和私人关系也分辨不清！主张候选人问题只适合在代表大会上讨论和解决，据说这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虽然在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开会首先就是要讨论重要的原则问题；参加代表大会的是运动的代表，他们能够大公无私地对待人选问题，能够（而且应当）为了投票表决而要求和收集有关候选人的一切材料；在代表大会上为指挥棒问题而发生的一定的争论本来是自然的和必要的。现在我们这里，代替这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观点而形成了另外一种风气：我们可以在代表大会闭幕以后信口开河，说伊万·伊万内奇在政治上被埋葬了，伊万·尼基佛罗维奇的名誉被破坏了等等；候选人将由一些著作家在小册子里大加渲染，这些著作

家装出一副伪善面孔，拍着胸脯说这不是小组而是党……一些喜欢看热闹的读者就会如获至宝地欢迎这种耸人听闻的消息，说什么据马尔托夫本人说，某某人曾是组委会的主要人物。[注：我也在《火星报》组织里提出过一个中央委员会候选人，而且也象马尔托夫一样没有能使这个候选人当选，对于这个候选人，我本来也能说一下他在代表大会以前和在代表大会初期有过什么杰出事迹证明他的良好的声誉。但是，我从来没有这样的念头。这位同志很有自尊心，决不会让任何人在代表大会以后在报刊上提出他的候选资格，或者抱怨什么政治上被埋葬，名誉被破坏等等。] 这些读者要比粗暴机械地根据多数通过决议的代表大会这类形式主义的机关有更大的本事去讨论问题和解决问题……是的，在国外还有许多充满了无谓争吵的奥吉亚斯的牛圈[13]需要我们真正的党的工作人员去打扫！

《火星报》组织举行的另一次表决，是“以 10 票对 2 票 4 票弃权通过了五人名单（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根据我的提议，这个名单中包括了一个非火星派领袖和一个火星派少数派领袖”[注：见本卷第 93 页。——编者注]。这次表决非常重要，因为它明显而不容争辩地证明，后来在无谓争吵的气氛中产生的那些谰言，说什么我们想把非火星派驱逐出党或者除掉，说什么多数派只是通过代表大会半数从半数里选出的等等，是毫无根据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我所引证的这次表决情况表明，我们不但没有把非火星派分子从党内排除出去，甚至没有把他们从中央委员会内排除出去，而是让我们的对手占了一个相当大的少数。全部问题就在于他们想占多数，当这个小小的愿望实现不了时，他们就大吵大闹，根本拒绝参加中央机关。事实真相就是如此，同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中所说的截然相反，从下面一封信里可以看出这一点，这封信是我们火星派多数派（在七个人退出代表大会以后成了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派）在代表大会通过党章第 1 条以后不久从《火星报》组织中的少数派那里收到的（必须指出，我所说的那

次《火星报》组织的会议是最后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以后，《火星报》组织事实上已经瓦解了，因此双方都力图说服代表大会的其余代表相信自己是正确的）。

这封信的原文如下：

“我们听了索罗金和萨布林娜两位代表关于编辑部和‘劳动解放社’的多数愿意参加（某一天［注：据我计算（见本卷第496页。——编者注），这封信指的日期是星期二。会议是在星期二晚上，即在代表大会第28次会议以后举行的。这种时间上的考证很重要。它证据确凿地驳斥了马尔托夫同志的说法，即所谓我们的分离是由于中央机关的组成问题而不是由于中央机关的人选问题引起的。它证据确凿地证明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和在《给编辑部的信》里的说明是正确的。在代表大会第28次会议以后，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两同志大谈什么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却只字不提在总委员会人选或中央机关成员增补问题上的分歧（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第25、26、27次会议上曾经争论过）。］的）会议问题的解释，同时我们又在这两位代表的帮助下查明，在上一次会议上宣读过一个似乎是由我们提出的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这个名单被人用来对我们的整个政治立场作了不正确的估计；同时我们注意到，第一，人们丝毫没有试图查一查来源就认定这个名单是我们提出的；第二，这种情况和公开加在《火星报》编辑部以及‘劳动解放社’多数身上的机会主义罪名无疑是有联系的；第三，我们十分了解这个罪名是同改变《火星报》编辑部成员的一个完全确定的计划有联系的，因此，我们认为：对我们作的关于不让参加会议的原因的解释是不能使我们满意的，而不愿意让我们参加会议就是证明不愿意让我们有可能消除上述莫须有的罪名。

至于我们彼此能不能协商提出一个共同的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的问题，我们声明：我们可以当作协商基础接受的唯一名单就是波波夫、托洛茨基、格列博夫三个人，同时我们着重指出这个名单是一个妥协性的名单，因为我们把格列博夫同志列入这个名单只是为了向多数派的愿望表示让步，因为我们在代表大会上

认清格列博夫同志的作用以后，我们不认为格列博夫同志具备中央委员会候选人所应具备的条件。

同时，我们要着重指出的一点就是，我们参加中央委员会候选人问题的谈判一事，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的问题毫无关系，因为我们决不同意就这个问题（编辑部成员问题）进行任何谈判。

代表各同志署名的

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

从这一封确切反映出争论双方的情绪和争论情况的信中，可以明白看出当时发生分裂的“核心”及其真实原因。《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虽然不愿同意多数派的意见，而宁愿在代表大会上自由地进行鼓动（他们当然完全有权利这样做），但是他们还是力争多数派的“代表”允许他们参加非正式会议！当然，这种滑稽的要求在我们的会议上（这封信当然是在会议上宣读过的）只能使人发笑和感到惊异，至于他们因“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而大叫大闹，几乎是大发歇斯底里，那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嘲笑了。但是，我们首先还是逐条剖析一下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那些伤心的抱怨吧。

他们说：有人不正确地认为名单是他们提出的；有人不正确地估计了他们的政治立场。但是，马尔托夫自己也承认（同盟记录第64页），我并不怀疑他说这个名单不是他提出的一语的真实性。一般说来，名单究竟是谁提出的，这个问题在这里并没有多大关系，因为名单究竟是由火星派分子中某个人或者是由“中派”中某个人拟订的等等，那是根本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完全由现在的少数派分子构成的这个名单曾在代表大会上传阅过，尽管只是作为一种设想或假设而传阅的。最后，最重要的是，马尔托夫同志当时在代表大会上曾经拼命表示拒绝这个名单，要是放到现在，他一定会表示欢迎。请看，在两个月以内他就由高喊“可耻的谣言”一变而为要挟党把这个似乎可耻的名单中开列的候选人接纳到中央机

关去，——这种变化最明显不过地证明他对于人物和对于色彩的评价是多么不坚定啊！[注：当我们听到关于古谢夫同志和捷依奇同志的事件的消息时，上面所写的这些话已经付排了。关于这次事件，我们将在本书附录中专门加以分析。（见本卷第 416—425 页。——编者注）]

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说，这个名单，“意味着我们以及‘南方工人’社同崩得在政治上结成联盟，即达成直接的协定”（第 64 页）。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第一，崩得永远不会同意达成一个关于没有一个崩得分子在内的名单的“协定”；第二，当时不仅同崩得，而且同“南方工人”社，都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直接的协定（当时在马尔托夫看来这是可耻的）。当时的问题恰恰不是协定，而是联盟，不是马尔托夫同志缔结过什么协定，而是那些在代表大会前半期曾遭到马尔托夫同志反对，后来却抓住马尔托夫同志在党章第 1 条问题上的错误加以利用的反火星派分子和动摇分子不可避免地要支持马尔托夫同志。我上面引用的信就确凿地证明，他们“委屈”的根本原因正在于人家公开地给他们加上了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这些曾经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而现在马尔托夫同志不管我在《给编辑部的信》中如何提醒仍然竭力回避的“罪名”，可归结为以下两点：第一，在讨论党章第 1 条时，普列汉诺夫直截了当地说，党章第 1 条的问题是把“各种机会主义分子”和我们“分开”的问题，我提出的草案是防止这些人钻进党内的壁垒，“单是这一个理由就应该使所有反对机会主义的人投票拥护”这个草案（代表大会记录第 246 页）。这些强有力的话尽管由我把语气　缓和了一些（第 250 页）[注：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7 卷第 270 页。——编者注]，还是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这在鲁索夫（第 247 页）、托洛茨基（第 248 页）和阿基莫夫（第 253 页）等同志的发言中有明显的表现。在我们“议会”的“走廊”里，大家都热烈地评论普列汉诺夫的这一论点，并在党章第 1 条问题的无数争论过程

中对它作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我们那些亲爱的同志不但不从实质上来辩护，反而可笑地感到委屈，直到用书面抱怨什么“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

那种充满小组习气和非常缺乏党性而经受不起吹来一点当众公开争论的新鲜空气的心理，在这里表现得很明显。这正是俄罗斯人所熟悉的心理，这种心理用一句古老的格言来说就是：要么飨以老拳，要么握手言欢！人们已经习惯于在一小群亲密伙伴的小圈子里生活，因此一旦在自由的公开的舞台上由自己负责发表言论，就手足无措了。给别人加上机会主义的罪名，给谁？给“劳动解放社”，而且是给该社的多数人加上这种罪名，——可以想见，这是多么可怕！或者是为了这个洗不掉的侮辱而造成党内分裂，或者是用恢复小圈子的“继承性”来遮盖这种“家丑”——这就是上面那封信里已经相当明确地提出的两种办法。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和小组习气的心理同在党面前公开发表意见的要求发生了冲突。你能设想在德国党内会有抱怨，“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这样一种荒谬现象，这样一种无谓争吵吗！在那里，无产阶级的组织和纪律早已使人抛弃了这种知识分子的脆弱性。例如，对李卜克内西是任何人都十分尊敬的，但是，李卜克内西在 1895 年代表大会上在土地问题上非常糟糕地同露骨的机会主义者福尔马尔及其同伙站到一起去了，因而被人“公开加上机会主义罪名”（和倍倍尔一起）[14]，如果他因此而抱怨起来，人们该会怎样地嗤笑他啊！李卜克内西的名字同德国工人运动史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当然不是因为李卜克内西在这样一个比较小的局部问题上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尽管他犯了这样的错误，这种联系还是不会被否定的。同样，不管斗争多么激烈，比方说，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名字现在而且将来永远会受到每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尊敬，但这并不是因为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我们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拥护过机会主义的思想，也不是因为他在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过旧的无政府主义的谬论，尽管他拥护过这种思想，提出过这种谬论，他的名字还是受人尊敬的。只有迷恋最落后的小组习气及其要么飨以老拳，要么

握手言欢的逻辑的人，才会因"'劳动解放社'多数人被加上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而大发歇斯底里，掀起无谓争吵和制造党内分裂。

这种可怕的罪名的另一个根据同前一个根据有十分密切的联系（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第 63 页）力图回避和抹杀这个事件的一个方面）。这个根据就是反火星派分子和动摇分子同马尔托夫同志在讨论党章第 1 条时已经表现出来的联盟。自然，当时马尔托夫同志和反火星派分子之间没有而且也不可能缔结什么直接的协定或间接的协定，而且谁也没有怀疑他缔结过什么协定：这不过是他自己由于害怕而产生的想法罢了。但是，那些显然有机会主义倾向的人在他周围组成一个愈加坚实"紧密的"多数派（现在只是由于有七个代表"偶然地"退出代表大会才变成了少数派），这一事实正暴露了他所犯的错误的政治意义。对于这个"联盟"，我们在讨论党章第 1 条以后当然也立刻公开地在代表大会上（见上面引用的巴甫洛维奇同志的评语，代表大会记录第 255 页）以及在《火星报》组织中指出过（我记得，普列汉诺夫曾特别指出过这一点）。这正象蔡特金在 1895 年向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两人提出的意见和嘲笑一样："ES tut mir in der seele weh，daβ ich dich in der Gesellschaft seh'"（我看见你〈即倍倍尔〉落在这样一伙人中间〈即与福尔马尔及其伙伴在一起〉，感到非常痛心）[15]。说也奇怪，当时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两人并没有歇斯底里地向考茨基和蔡特金写过什么关于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的信……

关于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的问题，这封信表明，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中说他们当时还没有最后拒绝同我们协商，这话说错了，——这再一次说明，在政治斗争中不查对文件而企图靠记忆来重述谈话，是多么不妥当。其实，"少数派"当时是那样谦逊，竟然向"多数派"提出最后通牒：让"少数派"出两个人而"多数派"出一个人（作为妥协办法，并且只是为了表示让步！）。这真是怪事，但这是事实。这件事实清楚地表明，现在散布谰言，说什么"多数派"通过代表大会

半数只选出这个半数的代表，是多么荒唐。恰恰相反：马尔托夫分子只是为了表示让步才主张让我们在三个席位中占一个席位，也就是打算在我们不同意这个奇特的“让步”时完全选出他们自己的人！我们在自己的非正式会议上嘲笑过马尔托夫分子的这种谦逊态度，并给自己拟订了一个名单：格列博夫、特拉温斯基（他后来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以及波波夫。我们随后（也是在 24 人的非正式会议上）用瓦西里耶夫同志（他后来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代替波波夫同志，只是因为波波夫同志拒绝列入我们提出的名单，起初他在私人谈话中表示拒绝，后来又在代表大会上公开表示拒绝（第 338 页）。

事实真相就是如此。

谦逊的“少数派”本来有一种想占多数席位的谦逊的愿望。当这种谦逊的愿望得不到满足时，“少数派”就公然完全表示拒绝，并开始无理取闹。但是现在竟有人煞有介事地大谈什么“多数派”“不肯让步”!

“少数派”出马上阵在代表大会上进行自由鼓动的时候，曾向“多数派”提出可笑的最后通牒。当我们的英雄遭到失败的时候，就号啕大哭，叫喊起戒严状态来了。这就是全部情况。

给我们加上蓄意改变编辑部成员这一可怕的罪名，我们（在 24 人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上）也是一笑置之，因为大家从代表大会刚一开始，甚至早在代表大会以前，就很清楚地知道以选举原先预定的三人小组来改组编辑部的计划（关于这一点，我在下面讲到代表大会选举编辑部的情况时还要详细说明）。“少数派”看到它同反火星派的联盟就是明显地证明这个计划的正确性以后，被这个计划吓得目瞪口呆，这并不使我们觉得奇怪，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我们当然不能严肃看待那种要我们不经过代表大会上的斗争就自愿变成少数派的提议，我们当然不能严肃看待整个那封信，因为那封信的作者气愤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以致说起什

么“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来了。我们深信党员的义务感很快就会战胜那种想要“泄愤出气”的自然愿望。

注释：

[12]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火星报》组织成员共 16 人，其中以列宁为首的多数派 9 人，即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罗·萨·捷姆利亚奇卡、莉·米·克尼波维奇、尼·埃·鲍曼、德·伊·乌里扬诺夫、彼·阿·克拉西科夫和弗·亚·诺斯科夫；以尔·马尔托夫为首的少数派 7 人，即马尔托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亚·尼·波特列索夫、维·伊·查苏利奇、列·格·捷依奇、列·达·托洛茨基和维·尼·克罗赫马尔。——274。

[13]奥吉亚斯的牛圈出典于希腊神话。据说古希腊西部厄利斯的国王奥吉亚斯养牛 3000 头，30 年来牛圈从未打扫，粪便堆积如山。奥吉亚斯的牛圈常被用来比喻藏垢纳污的地方。——277。

[14]指在 1895 年 10 月 6—12 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布雷斯劳代表大会上威·李卜克内西和奥·倍倍尔支持有严重错误的土地纲领草案一事。根据 1894 年法兰克福代表大会的决议成立的土地委员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这个土地纲领草案，草案的主要错误在于它有使无产阶级政党变为“全民党”的倾向。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由于同机会主义者一起支持这个草案受到了党内同志的谴责。卡·考茨基、克·蔡特金等在代表大会上严厉地批判了这个土地纲领草案。最后，代表大会以 158 票对 63 票否决了这个草案。——281。

[15]这是德国诗人约·沃·歌德的诗剧《浮士德》中的诗句，是浮士德的情人玛加雷特责备浮士德和魔鬼梅非斯特为友时说的（见该剧第 16 场）。克·蔡特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发言时引用了这句诗。——282。

（十一）继续讨论党章。总委员会的组成

党章以后各条所引起的争论多半是关于细节问题的，很少涉及到组织原则。代表大会第 24 次会议完全是讨论选派代表出席党代表大会的问题，当时坚决而明确地反对全体火星派的共同计划的又只有崩得分子（戈尔德布拉特和李伯尔，第 258—259 页）以及阿基莫夫同志，后者以值得称赞的坦率精神承认他在代表大会上起的作用，他说："我每次说话都完全意识到，我所提出的论据不会影响同志，反而会危害我所拥护的那个条文。"（第 261 页）这一段中肯的意见紧接在讨论党章第 1 条以后来讲是特别恰当的；只是"反而"一词在这里用得不完全正确，因为阿基莫夫同志不仅善于危害一定的条文，还因此而善于"影响同志"……即影响某些爱好机会主义空谈的很不彻底的火星派分子。

总之，党章第 3 条——规定选派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条件——是在 7 票弃权的情况下由多数通过的（第 263 页），弃权的显然都是一些反火星派分子。

关于总委员会组成问题的争论占了代表大会第 25 次会议的大部分时间，这次争论暴露了在许多不同的草案周围形成的非常零散的派别划分。阿布拉姆松和察廖夫根本反对成立总委员会的计划。帕宁硬想使总委员会变成一个纯粹的仲裁法庭，因此他始终一贯地提议把那些规定总委员会是最高机关以及总委员会可以由它的任何两个委员召集会议的词句删掉。[注：斯塔罗韦尔同志显然也倾向于帕宁同志的观点，不同的只是后者知道他想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他始终一贯地提出把总委员会变成一个纯粹仲裁性的调解机关的决议案；斯塔罗韦尔同志虽然说总委员会按草案规定"只应该根据双方的愿望"（第 266 页）召集，但是他并不知道他想达到的目的是什么。他这种说法是完全不正确的。] 赫尔茨和鲁索夫坚持采取各种不同的方法来组成总委员会，以补充章程委员会五个委员所提出的三种方法。

争论的问题首先归结为确定总委员会的任务：是仲裁法庭呢还是党的最高机关？我已经说过，一贯赞成前一种意见的有帕宁同志。但是他只是一个人。马尔托夫同志坚决反对这个意见，他说："我提议否决那种主张把'总委员会是最高机关'一语删掉的建议，因为我们的条文〈即我们在章程委员会内一致同意的关于总委员会任务的条文〉正是想使总委员会有可能发展成为全党最高机关。我们认为，总委员会不只是一个调解机关。"但是按照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总委员会的组成完全符合"调解机关"或仲裁法庭的性质：两个中央机关各选派两个委员，第五个委员由这四个人来聘请。别说这样的总委员会组成，就是按照鲁索夫同志和赫尔茨同志提议的由代表大会通过的总委员会组成（第五个委员由代表大会任命），也只符合调解或仲裁的目的。总委员会的这种组成和它应该成为党的最高机关的使命是根本矛盾的。党的最高机关在组成方面应该固定不变，而不应该受中央机关组成的偶然（有时是由于被破坏）变动的影响。最高机关应该同党代表大会有直接的联系，从代表大会方面取得自己的全权，而不是从其他两个服从于代表大会的党机关方面取得自己的全权。最高机关应该由党代表大会所了解的人组成。最后，最高机关组成的方式不应该使它本身的存在取决于偶然情况：在两个委员会对于选举第五个委员的问题意见不一致时，党就会处于没有最高机关的境地！反驳这个意见的人说：（1）当五个委员中有一个委员弃权，而其余四个委员又形成二对二时，结果也是没有出路的（叶戈罗夫语）。这种反驳意见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无法通过决定是任何一个委员会有时都免不了的，但是这完全不是说委员会就无法组成。第二种反驳意见说："如果象总委员会这样的机关不能选出第五个委员，这就说明这个机关根本不中用。"（查苏利奇语）然而，这里的问题不在于中用不中用，而在于最高机关存在不存在：没有第五个委员就不会有什么总委员会，就不会有任何"机关"，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中用不中用。最后，如果问题在于无法建立一个在自身之上还有上级委员会的党委员会，那倒还好办，因

为这个上级委员会在非常情况下随时可以用某种方法来弥补这个缺陷。而在总委员会上面，除了代表大会以外，没有任何委员会了，因此，如果在党章内留下一种使总委员会甚至无法组成的可能性，那就显然不合乎逻辑了。

我在代表大会上对于这个问题所作的两次简短的发言，只是为了剖析（第 267 页和第 269 页）［注：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7 卷第 274 页。——编者注］马尔托夫本人以及其他同志用来替马尔托夫草案辩护的这两个不正确的反驳意见。至于总委员会中究竟是中央机关报占优势，还是中央委员会占优势的问题，我甚至没有提到过。这个问题是阿基莫夫同志还在代表大会第 14 次会议上就提到的（第 157 页），是他首先谈到中央机关报有占优势的危险。至于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以及其他人在代表大会以后制造蛊惑人心的谬论，说“多数派”想把中央委员会变成编辑部的工具等，那只不过是步阿基莫夫的后尘而已。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戒严状态》中谈到这个问题时，竟谦虚得不提真正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人！

谁只要不是断章取义地摘引个别词句，而是想了解中央机关报对中央委员会占优势的整个问题在党代表大会上是如何提出来的，他就会很容易地发现马尔托夫同志歪曲了事实真相。还在第 14 次会议上，不是别人，正是波波夫同志起来反驳阿基莫夫同志的观点，说他想“在党的最高层维护‘最严格的集中制’，以便削弱中央机关报的影响〈第 154 页，黑体是我用的〉，这样的〈阿基莫夫式的〉体系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此”。波波夫同志补充说：“对于这样的集中制，我不仅不拥护，并且要大力反对，因为它是机会主义的旗帜。”这就是中央机关报对中央委员会占优势这一轰动一时的问题的根源，怪不得马尔托夫同志现在只好对这个问题的真实起源避而不谈。甚至波波夫同志也不能不发现阿基莫夫这些所谓中央机关报占优势的论调中所包含的机会主义性质［注：无论波波夫同志或马尔托夫同志都没有害怕把阿基莫夫同志称为机会主义者，只是当人们对他们本人使用这个称

呼，当人们由于“语言平等”问题或党章第 1 条问题而公正地对他们使用这个称呼时，他们才生了气，发了火。然而阿基莫夫同志（跟着他走的是马尔托充同志）在党代表大会上的行动要比马尔托夫同志及其伙伴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的行动更庄重而有勇气些。阿基莫夫同志在党代表大会上说：“在这里，人们把我称为机会主义者；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骂人的侮辱性的字眼，并且我认为这样称呼我是完全不应该的；但是我并不抗议这一点。”（第 296 页）也许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两同志曾向阿基莫夫同志建议在他们为反对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而提出的抗议书上签名，但是被阿基莫夫同志拒绝了吧？]，而且为了把自己和阿基莫夫同志好好地区分开来，波波夫同志断然声明：“让这个中央机关〈总委员会〉由编辑部出三人和中央委员会出两人来组成吧。这是个次要的问题〈黑体是我用的〉，重要的是党的最高领导要出自一个来源。”（第 155 页）阿基莫夫同志反驳说：“按照草案，由于编辑部的组成是固定的，而中央委员会的组成是经常变化的，单是这一点就保障了中央机关报在总委员会中占优势”（第 157 页）——但这一论据所说的仅指原则领导的“固定性”（这是正常的、合乎愿望的现象），而决不是指有干涉或侵犯独立性意义上的“优势”。因此波波夫同志（他当时还不属于以所谓中央委员会没有独立性的谰言来掩盖其对中央机关的组成不满的“少数派”）很有道理地回答阿基莫夫同志说：“我提议把它〈总委员会〉当作全党的领导中心，这样，总委员会里面究竟是中央机关报的代表占多数还是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占多数，就完全不重要了。”（第 157—158 页。黑体是我用的）

在第 25 次会议重新讨论总委员会组成问题时，巴甫洛维奇同志继续原先的辩论，表示拥护中央机关报对中央委员会占优势，“因为前者具有稳定性”（第 264 页），而他所指的正是原则的稳定性，紧接着在巴甫洛维奇同志之后发言的马尔托夫同志也正是这样理解的，马尔托夫同志在发言中认为不必“规定一个机关对另一个机关的优势”，并指出可以留一个中央委员在国外：“这样就能使中央委员

会的原则的稳定性在一定程度内保持下去。”（第 264 页）这里还丝毫没有把关于原则的稳定性以及保持这种稳定性的问题和关于保持中央委员会独立自主性的问题蛊惑人心地混淆起来。这种混淆手法，在代表大会以后几乎成了马尔托夫同志的主要法宝，而在代表大会上只有阿基莫夫同志一人顽强地使用过，阿基莫夫同志当时还说到“党章的阿拉克切耶夫精神”（第 268 页），说到“如果党总委员会中有三个委员是中央机关报的，那么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只是编辑部意志的执行者〈黑体是我用的〉。三个住在国外的人就会取得无限制地〈!!〉处理全〈!!〉党工作的权利。他们在安全方面是有保证的，因此他们的权力就会是终身的。”（第 268 页）为了反驳这些十分荒谬的蛊惑人心的说法，这些把思想领导曲解为干涉全党工作的说法（这种说法在代表大会以后给了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一个廉价的口号来大谈所谓“神权政治”[16]），巴甫洛维奇同志又起来发言，着重声明他“拥护《火星报》所代表的那些原则的坚定性和纯洁性。我主张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占优势，就是为了巩固这些原则”（268 页）。

所谓中央机关报对中央委员会占优势这一轰动一时的问题的真相就是如此。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两位同志指出这一有名的“原则性的意见分歧”，无非是重复阿基莫夫同志的那些机会主义的和蛊惑人心的词句而已，这些词句的本质，连波波夫同志也看得很清楚，当然只是在他还没有在中央机关组成问题上遭到失败以前才看得很清楚！

※　※　※

关于总委员会组成问题的总结是：不管马尔托夫同志在《戒严状态》中怎样企图证明我在《给编辑部的信》中的说法有矛盾和不正确，代表大会的记录清楚地表明，这个问题和党章第 1 条比较起来确实只是细节问题；《我们的代表大会》一文（《火星报》第 53 号）说当时我们争论的“几乎只是”关于党中央机关的建立问题，这完全是歪曲。这种歪曲所以更加令人不能容忍，是因为该文作者完全

回避了党章第 1 条的争论。其次，火星派分子在总委员会组成问题上并没有什么确定的派别划分，这一点也可以拿代表大会的记录来证实：没有举行过记名投票；马尔托夫和帕宁的意见不一致；我和波波夫的意见相同；叶戈罗夫和古谢夫两人坚持自己的立场，等等。最后，我最近（在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代表大会上）认为马尔托夫分子和反火星派分子的联盟已经巩固起来，这一论断也可以由现在大家都看得清楚的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两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转到阿基莫夫同志方面去的事实来证实。

注释：

[16]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写的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组织原则的文章《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及其任务》，载于 1903 年 12 月 15 日《火星报》第 55 号。这篇文章说："同经济主义时代遗产斗争的时期为我们培养了具有神权政治性质的组织上的空想主义：世俗社会要服从一个小小的宗教团体的统治，而且这个宗教团体由于地理的和其他的原因，甚至不能待在它所管理的臣民的土地上。"这里说的"宗教团体"就是指旧《火星报》编辑部。——289。

（十二）党章讨论的结束。中央机关成员的增补。《工人事业》代表的退出

谈到党章的继续讨论（代表大会第 26 次会议），值得指出的只有关于限制中央委员会权力的问题，从这个问题可以看出马尔托夫分子现在攻击过分集中制的用意。叶戈罗夫同志和波波夫同志力图限制集中制，而且信心更足，不以他们自己的候选资格或他们所支持的候选人为转移。他们早在章程委员会里就已经提议要限制中央委员会的权利：解散地方委员会必须得到总委员会的同意并且限于特别列举出的情况（第 272 页，注释 1）。章程委员会中有三个委员（格列博夫、马尔托夫和我）反对这种限制，马尔托夫同志在代表大会上也曾拥护我们的意见（第

273 页），并反驳叶戈罗夫和波波夫，他说："即使没有这些限制，中央委员会在决定象解散组织这样的重大步骤时也会预先讨论的。"可见，当时马尔托夫同志对于一切反集中制的企图还是不加理采的，结果代表大会否决了叶戈罗夫和波波夫的提议，——可惜只是我们不能从记录上查明究竟是多少票否决的。

在党代表大会上，马尔托夫同志也曾"反对以'批准'一词来代替'组织'一词〈党章第 6 条说：中央委员会组织各委员会等等〉。必须也给以组织的权利。"马尔托夫同志当时是这样说的，那时他还没有想出后来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才发现的那个绝妙的思想，即认为"批准"不包括在"组织"这个概念以内。

除了这两点以外，其余关于党章第 5 条至第 11 条的讨论完全是细节的辩论（记录第 273…276 页），没有多大意思。第 12 条是关于所有党委员会成员的增补，特别是中央机关成员的增补的问题。章程委员会提议把增补所必要的法定多数从 2/3 提到 4/5。报告人（格列博夫）提议：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增补需要一致通过。叶戈罗夫同志认为留下一些疙瘩是不恰当的，主张在没有人提出理由充分的异议时只要简单多数通过就可以了。波波夫同志既不同意章程委员会的意见，也不同意叶戈罗夫同志的意见，而要求要么是简单多数通过（没有提出异议权），要么是一致通过。马尔托夫同志既不同意章程委员会的意见，也不同意格列博夫、叶戈罗夫以及波波夫的意见，表示反对一致通过，反对 4/5（赞诚 2/3），反对"相互增补"，即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有对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增补提出异议的权利，反之亦然（"对增补进行相互监督的权利"）。

读者可以看出，这里派别划分是很复杂的，意见分歧表现在几乎每一个代表的看法都"一致"具有自己的特点！

马尔托夫同志说："我承认，同所厌恶的人一起工作从心理上说是不行的。但是同样重要的是使我们的组织有生命力和活动能力……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在增补方面相互监督的权利是不需要的。我所以反对这一点，并不是因

为我认为它们相互对对方的工作没有权利说话。不！例如，关于是否应该把纳杰日丁先生接收到中央委员会里的问题，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是可以向中央委员会提出很好的建议的。我所以反对，是因为我不愿意造成一种互相激怒的拖延。”

我反驳他说：“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法定多数的问题，我反对从 4/5 减到 2/3 的提议。采用提出说明理由的异议这种做法是欠考虑的，我反对这样做。第二个问题，即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对增补进行相互监督的权利问题，要重要得多。两个中央机关的相互一致，是保证协调的必要条件。这里谈的是两个中央机关不协调的问题。谁不愿意分裂，他就应该关心维持协调。从党的生活中可以知道，曾经有过一些制造分裂的人。这是个原则问题，重要问题，它决定着党的整个未来的命运。”（第 276—277 页）［注：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7 卷第 275 页。——编者注］这就是在党代表大会记录中所载的我那次发言内容概要的全文，马尔托夫同志对于这次发言特别重视。可惜他虽然重视这次发言，但是他在提到这次发言时却不肯联系这次发言时的全部讨论情况和代表大会上的整个政治形势。

首先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在自己最初的草案中（第 394 页第 11 条）［注：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7 卷第 239 页。——编者注］仅以 2/3 的票数为限，而没有要求中央机关在成员增补问题上实行相互监督呢？继我以后发言的托洛茨基同志（第 277 页）也立刻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以及巴甫洛维奇同志关于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一封信，都对这个问题作了答复。党章第 1 条“把罐子打破了”，我们必须用“双结”把它捆好，——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这样说过。这就是说，第一，马尔托夫在纯理论问题上暴露出自己是个机会主义者，而李伯尔和阿基莫夫坚持了他所犯的错误。这就是说，第二，马尔托夫分子（即火星派中的区区少数）和反火星派分子的联盟使他们在通过中央机关的人选时成为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我强调协调

的必要性并预先提醒要防备“制造分裂的人”，我在这里谈的正是中央机关的人选问题。当时这种提醒确实有重要的原则意义，因为《火星报》组织（当然，它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是更有权威的组织，因为它最熟悉实际工作中的一切事务和所有候选人）已经表示了它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已经通过了我们都知道的关于它所顾虑的那些候选人的决议。无论就道义或就实质而言（即就作出决定的权限而言），《火星报》组织在这个微妙的问题上都应该起决定作用。但是从形式上来说，马尔托夫同志当然有充分的权利请求李伯尔们和阿基莫夫们帮忙反对《火星报》组织的多数派。阿基莫夫同志在关于党章第 1 条的出色的发言中非常明白而聪明地说，每当他看到火星派分子中间在达到他们共同的火星派目的的方法上发生意见分歧时，他就自觉地、有意地投票赞成比较差的方法，因为他的目的是同火星派的目的针锋相对的。所以，毫无疑问，不管马尔托夫同志本身的愿望和意图如何，正是比较差的中央机关人选将会得到李伯尔们和阿基莫夫们的支持。他们可能会投票，他们一定会投票（不是根据他们的言论，而是根据他们的行为，根据他们对于党章第 1 条的投票情况来判断）赞成包括“制造分裂的人”在内的名单，并且他们投票的目的正是为了“制造分裂”。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说这是个重要原则问题（两个中央机关的协调），它可能关系到党的整个未来命运，这样说又有什么奇怪呢？

凡是稍微了解火星派的思想和计划，了解运动的历史，稍微有诚意赞成这些思想的社会民主党人，一分钟也不会怀疑：由李伯尔们和阿基莫夫们来解决《火星报》组织内部对于中央机关人选问题的争论在形式上虽然是正确的，但是一定会造成最坏的结果。我们一定要为防止这种最坏的结果而斗争。

试问：怎样进行斗争呢？我们进行斗争既不用歇斯底里的手段，也不用无理取闹的方法，而是用完全老老实实和完全正当的办法：当我们感觉到我们处在少数地位时（正如讨论党章第 1 条时那样），我们就请求代表大会保护少数人的权

利。接受委员时采取更严格的法定多数（以 4/5 代替 2/3），增补时采取一致同意和对中央机关成员的增补实行相互监督，——所有这些，当我们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处于少数地位时我们都曾加以坚持。有些人总是忽视这一事实，他们喜欢在一两次朋友间的谈话之后就轻率地对代表大会作评论和判断，却不肯认真研究一下全部记录和当事人的所有“证词”。凡是愿意诚实地把这些记录和这些证词拿来进行研究的人，必然会看到我所指出的这一事实：在代表大会当时的形势下，争论的根源正是中央机关人选问题，而我们所以力求规定更严格的监督条件，正是因为我们处于少数地位，想用“双结捆好”马尔托夫在李伯尔们和阿基莫夫们的欣赏和欣然参加之下打破的“罐子”。

巴甫洛维奇同志讲到代表大会的当时形势时说：“如果事情不是这样，那就只好认为，我们提出增补时需要一致同意这一条，就等于替对方操心，因为对于在某个机关中占多数的派别来说，一致同意不仅不必要，而且是不利的。”（《关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信》第 14 页）可是，现在有人总是忘记事件发生的顺序，忘记现在的少数派在代表大会整个时期内都曾经是多数（由于李伯尔们和阿基莫夫们的参加），忘记关于中央机关成员增补问题的争论正是发生在那个时期，并且这次争论的内在原因就是《火星报》组织内部因中央机关人选问题而发生意见分歧。谁弄清了这个情况，谁也就会懂得我们争论为什么这样激烈，谁也就不会对这样一个似乎矛盾的现象表示惊奇：一些细枝末节的意见分歧居然引起真正重要的原则问题。

捷依奇同志在同一次会议上（第 277 页）说得很对，他说：“毫无疑问，这个建议是针对目前形势提出来的。”的确，只有了解当时形势的全部复杂性以后，才能了解争论的真正意义。同时最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当我们处于少数地位时，我们总是用任何一个欧洲社会民主党人都认为合情合理的方法来维护少数的权利，即请求代表大会对中央机关人选进行更严格的监督。叶戈罗夫同志在同一次代表

大会上——不过是在另一次会议上——说得也很对，他说：“使我非常惊奇的是，我在辩论中又听到有人拿原则作借口。〈这是在代表大会第 31 次会议上谈到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时说的，就是说，如果我没有记错，是在星期四早晨说的，而我们现在所说的第 26 次会议则是在星期一晚上举行的。〉看来，大家都明白，在最后几天内，所有的争论都不是围绕某个原则问题，而只是围绕怎样保证或者阻止某人加入中央机关的问题。我们应该承认，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原则早就丧失净尽了，我们应该如实地说出事实真相。（全场大笑。穆拉维约夫说：“请在记录中写上马尔托夫同志笑了。”）”（第 337 页）马尔托夫同志和我们大家听见叶戈罗夫同志这些确实可笑的抱怨都哈哈大笑起来，这是不奇怪的。是的，“在最后几天内”，许许多多争论都围绕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这是事实。这在代表大会上确实是大家都清楚的（只是现在少数派力图抹杀这一明显的事实）。最后，应该如实地说出事实真相，这也是对的。可是，上帝啊，这究竟跟“原则丧失净尽”有什么相干呢？？要知道我们所以聚集在一起举行代表大会，是为了（见第 10 页，代表大会议程）在最初几天谈一谈纲领、策略、章程并解决有关的问题，在最后几天（议程第 18—19 项）谈一谈中央机关的人选并解决这些问题。人们把代表大会的最后几天用来就指挥棒问题进行争论，这本来是很自然的，是完完全全正当的。（至于在代表大会以后为指挥棒而吵架，那就是无谓争吵了。）如果谁在代表大会上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遭到了失败（如叶戈罗夫同志那样），在这之后竟说什么“原则丧失净尽”，那简直令人可笑。难怪大家都嘲笑叶戈罗夫同志。同样也难怪穆拉维约夫同志请求把马尔托夫同志参与这一嘲笑写入记录，因为马尔托夫同志嘲笑叶戈罗夫同志，就是自己嘲笑自己……

为了补充穆拉维约夫同志的讽刺，举出这样一件事实也许不是多余的。大家知道，在代表大会以后，马尔托夫同志到处扬言，说正是中央机关成员增补问题在我们的意见分歧中起了主要作用；说“旧编辑部中的多数”曾经激烈反对对中

央机关成员的增补实行相互监督。在代表大会以前，马尔托夫同志在接受我提出的选举两个三人小组以及根据三分之二的多数实行相互增补的草案时，曾把他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写给我，他写道："在接受这样的相互增补形式时，应当着重指出，在代表大会以后，每个委员会成员的补充都将按照稍微不同的另一种原则来实行（我的意见是：每个委员会在增补新委员时都要把自己的意图告诉给另一个委员会：后者可以提出异议，那时争论就由总委员会来解决。为了避免拖延，这种手续应当用于那些已经预先确定的候选人（至少对中央委员会来说应当这样做），拿这些候选人来补充，会更简便一些）。为了着重指出将来的增补应当按照将由党章规定的手续进行，必须在第 22 条［注：这是指全体代表都知道的我最初提出的那个大会议程草案以及草案说明。这个草案第 22 条说的正是关于选举两个三人小组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由这六人小组根据三分之二的多数实行"相互增补"，由代表大会批准这个相互增补以及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分别进行增补的问题。］补充一句：'……已经形成的决定也要由它批准'。"（黑体是我用的）

这是用不着说明的。

在说明了就中央机关成员增补问题进行争论的当时形势的意义以后，我们应当稍微谈一下这个问题的表决情况；至于讨论情况就不必谈了，因为在我引用过两个发言（马尔托夫同志的和我的发言）以后，只有很少几个代表提出过一些简短的质问（记录第 277—280 页）。说到表决情况，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硬说我在自己的说明里作了"最大的歪曲"（同盟记录第 60 页），"把围绕党章进行的斗争〈马尔托夫同志无意中说了一句大实话：在党章第 1 条问题以后，激烈的争论正是围绕党章进行的〉描写成《火星报》对那些同崩得结成联盟的马尔托夫分子的斗争"。

让我们仔细看一看这个关于“最大的歪曲”的有趣问题吧。马尔托夫同志把关于总委员会组成问题的表决同关于增补问题的表决合在一起，举出了八次表决：（1）由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各选出两人参加总委员会——赞成的有 27 票（马），反对的有 16 票（列），弃权的有 7 票［注：括弧中“马”字和“列”字，是表示我（列）和马尔托夫（马）当时站在哪一方面。］（顺便说一下：在记录第 270 页上写的是，弃权的有 8 票，但这无关紧要）；（2）由代表大会选出总委员会的第五个委员——赞成的有 23 票（列），反对的有 18 票（马），弃权的有 7 票；（3）由总委员会自己增补新委员来代替总委员会的离职委员——反对的有 23 票（马），赞成的有 16 票（列），弃权的有 12 票；（4）增补中央委员会委员要取得一致同意——赞成的有 25 票（列），反对的有 19 票（马），弃权的有 7 票；（5）只要有一个能说明理由的异议就不能接受委员——赞成的有 21 票（列），反对的有 19 票（马），弃权的有 11 票；（6）增补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要一致同意——赞成的有 23 票（列），反对的有 21 票（马），弃权的有 7 票；（7）可否把总委员会有权取消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关于不接受新成员的决定的问题提付表决——赞成的有 25 票（马），反对的有 19 票（列），弃权的有 7 票；（8）对于这个提议本身——赞成的有 24 票（马），反对的有 23 票（列），弃权的有 4 票。马尔托夫同志的结论是：“这里，显然有一位崩得代表投票拥护这个提议，其余的崩得代表弃权。”（黑体是我用的）（同盟记录第 61 页）

试问，当时没有实行记名投票，马尔托夫同志根据什么认为显然有一位崩得分子投票拥护他马尔托夫的主张呢？

原来是他注意到了表决人数，当表决人数表明崩得参加了投票时，马尔托夫同志就深信这种参加是有利于他的。

我的“最大的歪曲”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总共是 51 票，除去崩得分子是 46 票，再除去工人事业派分子是 43 票。马尔托夫同志列举的 8 次表决中的 7 次分别有 43、41、39、44、40、44、44 个代表参加，有一次是 47 个代表（确切些说，是 47 票）参加，马尔托夫同志本人在这里也承认有一个崩得分子支持他的主张。可见马尔托夫所描绘的（而且描绘得很不全面，这一点我们马上就会看到）情景只是证实和加重我所描述的斗争情况！原来在很多场合弃权票的数字是很大的，这恰恰表明整个代表大会对于某些细节问题的兴趣是比较小的，火星派分子在这些问题上并没有发生十分明显的派别划分。马尔托夫所说的崩得分子“弃权显然是帮助了列宁”，一语（同盟记录第 62 页），恰恰是不利于马尔托夫本人的，因为这意味着只有在崩得分子缺席或者弃权时，我才有胜利的机会。但是每当崩得分子认为值得对斗争干预一下时，他们总是支持马尔托夫同志的，而他们这种干预又不只表现在上述有 47 个代表参加的那次表决中。谁愿意查一查代表大会的记录，谁就能看出马尔托夫同志所描绘的情景是出奇的不完备。马尔托夫同志干脆把崩得另外参加过的整整三次表决都漏掉了，而这三次表决结果当然都是使马尔托夫同志取得了胜利。这三次就是：（1）通过佛敏同志提出的把法定多数从 4/5 减为 2/3 的修正案。赞成的有 27 票，反对的有 21 票（第 278 页），就是说，有 48 票参加了表决。（2）通过马尔托夫同志关于取消相互增补的提议。赞成的有 26 票，反对的有 24 票（第 279 页），就是说，有 50 票参加了表决。最后，（3）否决我所提的只有取得总委员会全体委员的同意才能增补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提议（第 280 页）。反对的有 27 票，赞成的有 22 票（甚至是记名投票，可惜这些没有保存在记录中），就是说，有 49 票参加了表决。

总结：对于中央机关成员增补问题，崩得分子只参加四次表决（有三次是我刚才列举过的，分别有 48、50、49 人参加，还有一次是马尔托夫同志列举过的，有 47 人参加）。所有这四次表决的结果，都是马尔托夫同志取得了胜利。可见我

的叙述在各方面都是正确的，无论是在指出马尔托夫分子和崩得的联盟方面，无论是在说明问题的比较细节的性质（在许多场合都有很多人弃权）方面，也无论是在指出火星派分子没有明显的派别划分（没有举行记名投票；参加讨论的人数很少）方面。

马尔托夫同志想在我的叙述中找矛盾，不过是一种不高明的手法，因为马尔托夫同志只是抓住只言片语，却不肯花点气力把全部情景重述出来。

党章中最后关于国外组织问题的一条，又引起了充分表明代表大会上派别划分情况的讨论和表决。当时谈的是承认同盟是我们党的国外组织的问题。阿基莫夫同志当然马上表示反对，他提醒注意第一次代表大会所批准的国外联合会，并指出这个问题的原则意义。他说："我首先应当声明，我并不认为这个问题得到这样还是那样的解决有什么特殊的实际意义。直到现在我们党内进行的思想斗争显然还没有完结；但是它会在另一些方面和另一种力量配置下继续下去……党章第13条再次非常鲜明地表现出把我们的代表大会由党的大会变为派别大会的倾向。有人要代表大会消灭少数派的组织，迫使少数派消失，而不是迫使俄国所有社会民主党人为了党的统一而服从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把所有的党组织统一起来。"（第281页）读者可以看出，对于马尔托夫同志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遭到失败以后所十分珍爱的"继承性"，阿基莫夫同志也同样十分珍爱。但是，在代表大会上，那些对自己用一个尺度而对别人用另一个尺度的人却起来猛烈地反对阿基莫夫同志。虽然党纲已被通过，《火星报》已被承认，党章几乎全部被通过了，但是恰恰在这时出现了一个"在原则上"把同盟和联合会分开的"原则"。马尔托夫同志高声喊道，"如果阿基莫夫同志想把问题提到原则的基础上，那我们一点也不反对；特别是因为阿基莫夫同志说到在同两个派别斗争时的各种可能的组合。所以要认可一种方针的胜利〈请注意，这是在代表大会第27次会议上说的！〉并不

是要向《火星报》再一次鞠躬致敬，而是要同阿基莫夫同志提到的一切可能的组合彻底鞠躬告别。”（第 282 页，黑体是我用的）

请看这幅图画吧：在代表大会上关于纲领问题的一切争论已经完结以后，马尔托夫同志还在继续同一切可能的组合彻底鞠躬告别……直到他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遭到失败为止！马尔托夫同志在代表大会上就同他在代表大会以后第二天就顺利实现的那种可能的“组合”“彻底鞠躬告别”了。但是，阿基莫夫同志在当时就已经比马尔托夫同志有远见得多；阿基莫夫同志援引了“根据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意志被称为委员会的一个老的党组织”五年来的工作，最后并以一句非常尖刻而又确有先见之明的警句作为结束：“至于说马尔托夫同志认为我希望我们党内产生另外一种派别是白费心思，那我应当说，甚至他本人都使我抱着这种希望。”（第 283 页，黑体是我用的）

是的，应当承认，马尔托夫同志确实没有辜负阿基莫夫同志的希望！

当一个可以算是做过三年工作的老的党委员会的“继承性”遭到破坏时，马尔托夫同志深信阿基莫夫同志的话正确而跟着他走了。阿基莫夫同志取得胜利没有花多大的代价。

但是，在代表大会上拥护——而且一贯拥护——阿基莫夫同志的只有马尔丁诺夫同志、布鲁凯尔同志和崩得分子（8 票）。作为“中派”真正领袖的叶戈罗夫同志采取了中庸之道：请看，他赞成火星派分子的意见，对他们表示“同情”（第 282 页），并且为了证明这种同情而建议（第 283 页）要完全回避当时已经提出的原则问题，避而不谈同盟和联合会。他的提议以 27 票对 15 票被否决了。显然，除了反火星派分子（8 票）以外，几乎所有的“中派”分子（10 票）都同叶戈罗夫同志一起投票拥护这个提议（投票总数是 42 票，可见有许多人是弃权的，或者是缺席的，象进行既没有意思而结果又是毫无疑义的表决时常常发生的那种情况）。每当要切实地实行《火星报》的原则时，立刻就暴露出“中派”的所谓“同

情”原来只是口头上的，而拥护我们的只有 30 票或者稍微多一点。对鲁索夫的提议（承认同盟为唯一的国外组织）举行的辩论和表决，更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反火星派分子和“泥潭派”已经直接采取了原则的立场，拥护这一立场的就有李伯尔和叶戈罗夫两位同志，他们说鲁索夫同志的提议被提付表决是不能允许的，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个提议是要扼杀其余一切国外组织”（叶戈罗夫语）。发言人不愿意参加“扼杀这些组织”，所以他不仅拒绝表决，并且退出了会场。但是我们要替这位“中派”首领说一句公道话：他表现了比马尔托夫同志及其伙伴们要大十倍的坚定信念（对自己的错误原则）和政治勇气，他并不只是在事关自己那个已在公开斗争中遭到失败的小组时才维护“被扼杀的”组织。

鲁索夫同志的提议以 27 票对 15 票认为可以交付表决，然后又以 25 票对 17 票获得通过。如果把没有参加表决的叶戈罗夫同志加到这 17 票中，那就是反火星派分子和“中派”的全班人马（18 票）。

党章第 13 条关于国外组织的全文，只是以 31 票对 12 票 6 票弃权通过的。31 票这个数目表明，代表大会上大约有多少火星派分子，就是说大约有多少人一贯坚持并且切实执行《火星报》的观点，——这个数目，我们在分析代表大会的表决情况时已经碰到过不下 6 次（关于崩得问题的地位，组委会事件，“南方工人”社的解散，关于土地纲领的两次表决）。而马尔托夫同志却硬要我们相信，把这样一个“狭隘的”火星派集团划分出来是毫无根据的！

同时还要指出，在通过党章第 13 条时，就阿基莫夫和马尔丁诺夫两位同志声明“拒绝参加表决”进行了非常值得注意的讨论（第 288 页）。当时大会主席团讨论了这个声明，并且完全合理地认为，即使把联合会干脆封闭也不能使联合会的代表有任何理由拒绝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拒绝参加表决是根本反常的和绝对不能容许的，——这就是当时整个代表大会同主席团一致的看法，其中也有火星派少数派分子，他们在第 28 次会议上还激烈地抨击他们自己后来在第 31 次会议

上所干的事情！当马尔丁诺夫同志为自己的声明辩护时（第 291 页），巴甫洛维奇、托洛茨基、卡尔斯基和马尔托夫全都起来反对他。马尔托夫同志特别清楚地认识到心怀不满的少数派的义务（在他自己还没有成为少数派以前!），并且就这个问题大有教益地讲了一通。他指着阿基莫夫和马尔丁诺夫两位同志高声说："或者你们是代表大会的成员，那你们就应该参加大会的一切工作〈黑体是我用的；当时马尔托夫同志还没有觉得少数服从多数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或者你们不是代表大会的成员，那你们就不能留在会场上……联合会的代表们的声明使我不得不提出两个问题：他们是不是党员，他们是不是代表大会的成员？"（第 292 页）

马尔托夫同志教训阿基莫夫同志要懂得党员的义务！可是，阿基莫夫同志说他对马尔托夫同志抱着希望，这也没有白说……不过这种希望只能是在马尔托夫在选举中遭到失败以后才得以实现。当问题还没有涉及到他自己而只涉及到别人时，马尔托夫同志甚至对马尔丁诺夫同志首先（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使用的"非常法" 这一吓唬人的字眼，是根本充耳不闻的。马尔丁诺夫同志回答那些劝他收回本人声明的人说："我们听到的解释并没有说清楚，究竟这是个原则的决定呢，还是用来对付联合会的一种非常办法。如果是一种非常办法，我们就认为这是对联合会的一种侮辱。叶戈罗夫同志也同我们一样感到这是用来对付联合会的非常法〈黑体是我用的〉，所以甚至退出了会场。"（第 295 页）当时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两位同志同普列汉诺夫一起，都坚决反对把代表大会表决结果看作一种侮辱的荒谬思想，反对这种确实荒谬的思想；托洛茨基同志在维护代表大会根据他的提议通过的决议（决议说：阿基莫夫和马尔丁诺夫两位同志可以认为自己已经十分满意）时说，"这个决议是原则性的而不是庸俗的，至于有谁因为这个决议而感到委屈，那不关我们的事。"（第 296 页）但是，事实很快就说明，小组习气和庸俗

观念在我们党内还非常厉害，而我加上了着重标记的这些豪言壮语只不过是一些响亮的空话而已。

阿基莫夫和马尔丁诺夫两同志拒绝收回自己的声明，并退出了代表大会，对他们的这种行动，大会代表们喊道：“真是莫明其妙！”

（十三）选举。代表大会的结束

代表大会在通过党章以后，接着又通过了关于各区组织的决议以及好几个关于党内个别组织的决议，在进行了我在上面分析过的关于“南方工人”社的富有教益的讨论以后，跟着就讨论党中央机关的选举问题。

我们已经知道，当时整个代表大会都期待《火星报》组织作出权威性的推荐，但是《火星报》组织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分裂，因为《火星报》组织中的少数派想试验一下，他们在代表大会上通过公开的自由的斗争能否取得多数。同时我们还知道，早在召开代表大会很久以前以及在代表大会上，所有代表都知道有一个革新编辑部的计划，即准备选出两个三人小组作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为了阐明代表大会上的讨论情况，下面我们比较详细地谈谈这个计划。

我在代表大会议程草案说明中讲述了这个计划，原文如下［注：见我的《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第 5 页和同盟记录第 53 页。］：“代表大会选出三人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选出三人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必要时，这六个人在一起，经三分之二多数的同意，以增补的办法补充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并向代表大会作出相应的报告。代表大会批准这个报告以后，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再分别进行增补。”

这里十分肯定而明确地说明了这个计划的内容，就是要在最有威信的实际工作领导者的参加之下革新编辑部。我所指出的这个计划的两个特点，是每一个愿意稍微留心阅读上述说明的人立刻就可以看出的。可是，现在就连最粗浅的道理

也必须加以解释。这个计划就是要革新编辑部，不一定是增加，也不一定是缩减编辑部成员人数，而是加以革新，因为可能增加或可能缩减的问题还是一个悬案：增补只是预定在必要时才实行。人们对革新问题提出种种设想，有的预计可以把编辑部成员人数缩减，有的则主张增加到 7 个人（我本人从来就认为七人小组比六人小组好得多），甚至增加到 11 个人（我认为如果同所有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特别是同崩得以及波兰社会民主党实行和平联合，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主张“三人小组”的人通常忽略的一个最主要之点，就是要求中央委员会委员参加解决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将来的增补问题。“少数派”方面所有身为本组织成员并出席代表大会的同志，都知道而且拥护这个计划（有些人曾特别表示赞同，有些人则默许），但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肯费点气力说明一下这种要求的意义。第一，为什么正是把三人小组并且仅仅把三人小组作为革新编辑部的出发点呢？显然，如果提出这个计划的用意完全是或者主要是扩大编委会［注：这里所说的编委会和几人小组都是指《火星报》编辑部。——编者注］，如果大家认为这个编委会是个真正“协调的”集体，那么这个计划就根本没有什么意思了。在扩大一个“协调的”编委会时，不以这个编委会的全体成员为出发点，而只以其中一部分成员为出发点，那就未免太奇怪了。显然，并不是编委会的全体成员都被认为完全适于讨论和解决革新编委会的组成问题，即把旧的编辑小组变成党机关的问题。显然，甚至那些自己想用扩大的办法进行革新的人也承认原来的组成是不协调的，是不符合党机关的理想的，否则就没有必要为了扩大六人小组而先把它缩减为三人小组了。我再重复一遍：这本来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只是由于“个人意气”把问题一时弄模糊了，人们才忘记了这一点。

第二，从上面引用的那段说明可以看出，即使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三个成员一致同意，也还不能扩大三人小组。这一点也是常常被忽略的。为了实行增补，必须六个人中有三分之二的票数，即 4 票表示同意；就是说，只要中央委员会三

个当选的委员提出“异议”，三人小组就根本不能扩大。相反，即使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三个成员中有两个人反对实行增补，只要中央委员会三个委员都同意，增补还是可以进行。所以很明显，当时的用意是，要让代表大会所选出的那些做实际工作的领导者在把旧的小组变成党机关时有表决权。至于我们当时大致提出的是哪些同志，从以下事实便可以看出来：编辑部在代表大会以前曾一致选举巴甫洛维奇同志为编辑部中的第七个成员，使他在代表大会上必要时可以用编辑部名义表示意见；除了巴甫洛维奇同志以外，还有后来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的《火星报》组织的一个老成员兼组委会委员被提名为第七个委员。[17]

可见，选出两个三人小组的计划显然是打算：（1）革新编辑部，（2）消除编辑部中某些与党的机关不相称的旧的小组习气的特点（假如没有什么可消除的，那就根本不必想出最初的三人小组了！），最后，（3）消除著作家小组的“神权”特点（消除的办法就是吸收优秀的实际工作者参加解决扩大三人小组的问题）。这个由全体编辑看过的计划，显然是根据三年来的工作经验，并完全符合我们一贯奉行的革命组织的原则的：在《火星报》问世的那个涣散时代，各个团体经常偶然地自发地形成起来，必然带有一些有害的小组习气。要建立党就需要消除这些特点，要求消除这些特点；吸收一些优秀的实际工作者参加这项工作是必要的，因为有些编辑部成员一向负责组织方面的事务，编辑部加入党机关系统不应当只是一个著作家小组，而应当是一个政治领导者小组。至于让代表大会选举最初的三人小组，这从《火星报》的一贯政策来看，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十分慎重地筹备了代表大会，等待大家充分弄清楚纲领、策略和组织方面发生争论的原则问题；我们并不怀疑代表大会将是火星主义的代表大会，即绝大多数代表在这些基本问题上将是意见一致的（承认《火星报》为领导机关报的决议也部分地证实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应当让那些担负了传播《火星报》思想并准备把《火星报》变成政党这一切工作重担的同志自己去决定，究竟谁是最适合参加新的党机关的

候选人。正是因为"两个三人小组"计划是理所当然的计划，正是因为这个计划完全符合《火星报》的全部政策，完全符合比较了解问题的人关于《火星报》所知道的一切，所以这个计划才得到大家的赞同，而没有人提出任何别的计划同它抗衡。

所以，鲁索夫同志在代表大会上首先提议选出两个三人小组。虽然马尔托夫曾用书面通知我们，说这个计划同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有联系，但是那些拥护马尔托夫的人却连想也没有想到要把六人小组和三人小组问题的争论转到这个罪名是否正确的问题上。他们中间谁也没有提到这一点！他们中间谁也没有勇气多少谈一谈同六人小组和三人小组有关的各种色彩的原则区别。他们宁愿采用更流行更廉价的手法——求助于抱怨，说什么可能受到委屈，借口编辑部问题已经由于任命《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而得到解决。这后一个由柯尔佐夫同志为反对鲁索夫同志而提出的论据，简直是瞎说。在代表大会议程上规定了——当然不是偶然规定的——两个单独项目（见记录第 10 页）：第 4 项是"党中央机关报"，第 18 项是"选举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这是第一。第二，在任命《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时，全体代表都坚决声明说这不是批准编辑部而只是批准方针［注：见记录第 140 页。阿基莫夫发言说："……据说我们将把中央机关报选举问题留到最后去谈"；穆拉维约夫发言反驳阿基莫夫，说阿基莫夫"对于未来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问题太关心"（第 141 页）；巴甫洛维奇发言说：我们任命了机关报，也就得到了"我们能够用来实行阿基莫夫同志如此关心的那些手术的具体材料"，至于《火星报》应当"服从""党的决议"，那是毫无疑问的（第 142 页）；托洛茨基发言说："既然我们不是批准编辑部，那么我们究竟是批准《火星报》的什么东西呢？……我们不是批准名称，而是批准方针……不是批准名称，而是批准旗帜"（第 142 页）；马尔丁诺夫发言说："……我也同其他许多同志一样，认为我们现在讨论承认代表一定方针的《火星报》为我们中央机关报的问题时，不应

当涉及到选举方法或批准其编辑部的问题；这个问题留待以后议程的适当场合再谈……”（第 143 页）]，谁也没有对这个声明提出过异议。

因此，认为代表大会批准一定的机关报其实就是批准编辑部这一说法，即少数派方面（柯尔佐夫，第 321 页，波萨多夫斯基，同上页，波波夫，第 322 页，以及其他许多人）重复过许多次的说法，是根本不符合事实的。这是谁都看得清楚的手法，这种手法是要把他们背弃大家在还能真正公正地看待中央机关人选问题时所采取的立场这种行为掩盖起来。这种背弃行为决不能用原则性理由来辩护（因为在代表大会上提起“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问题对少数派是很不利的，所以他们也就没有提起这一点），也不能拿有关六人小组或三人小组的实际工作能力的事实材料作借口（因为一涉及这些材料，就会有一大堆反对少数派的证据）。所以他们只好用所谓“严密的整体”、“协调的集体”、“严密的如结晶般完整的整体”等空话来搪塞。难怪这些论据立刻就被人恰如其分地称为“抱怨的话”（第 328 页）。三人小组计划本身就清楚地证明不够“协调”，而代表们在一个多月的共同工作中得到的印象，显然又给他们提供了大批可以独立判断问题的材料。当波萨多夫斯基同志暗示到这种材料时（在他看来这是说话不慎和考虑不周的结果：见第 321 页和第 325 页，他说他是“有条件地”使用了“疙瘩”一词），穆拉维约夫同志就直截了当地说：“我认为现在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派已经十分明白，这样的［注：波萨多夫斯基同志指的究竟是什么“疙瘩”，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始终不知道。穆拉维约夫同志却在同一次会议上（第 322 页）提出抗议，说人家把他的思想转述错了，后来在批准记录时他又直截了当地声明，说他“所讲的是在代表大会讨论各种问题时暴露出来的疙瘩，这是原则性的疙瘩，遗憾的是，目前这些疙瘩的存在已经是谁也不会否认的事实了”（第 353 页）。］疙瘩无疑是存在的。”（第 321 页）当时少数派宁愿把“疙瘩”一词（第一次使用这个词的不是穆拉维约夫而是波萨多夫斯基）了解为仅仅是涉及个人的东西，不敢接受穆拉维约夫同志的

挑战，不敢根据问题实质提出任何一种论据为六人小组辩护。于是发生了一场毫无结果的、十分可笑的争论：多数派（以穆拉维约夫同志为代言人）说他们十分了解六人小组和三人小组的真正意义，而少数派根本不听这一点，硬说“我们没有可能进行分析”。多数派不仅认为可能进行分析，而且已经“进行了分析”，并且说这种分析的结果已使他们看得十分明白。少数派大概是害怕分析，所以只是用一些“抱怨的话”来掩饰自己。多数派要人们“注意到，我们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不只是个著作家小组”，多数派“希望，主持中央机关报的都是一些完全确定的并为代表大会所了解的人物，符合我所说的那些要求的人物”（那些要求不只是对著作家提出的，第 327 页，朗格同志的发言）。少数派又不敢接受挑战，一字不提他们究竟认为谁适合参加不只是个著作家小组的编辑部，究竟谁是“完全确定的并为代表大会所了解的”人物。少数派仍旧拿所谓“协调性”作护身符。不但如此，少数派甚至拿一些原则上根本错误、因而受到应得的尖锐抨击的理由作论据，说什么“代表大会既没有道义权利，也没有政治权利来改变编辑部”（托洛茨基，第 326 页）；说什么“这是一个很棘手的〈原文如此！〉问题”（也是他说的）；说什么“那些落选的编辑部成员应当怎样对待代表大会不愿意把他们留在编辑部的事实呢？”（察廖夫，第 324 页）[注：参看波萨多夫斯基同志的发言：“……如果你们从旧编辑部六个人当中选出三个人，那么你们就是认为其余三个人都是不必要的，是多余的。而你们这样做，既没有权利，也没有根据。”]

这样的理由已经把问题完全转到抱怨和委屈方面了，这就是公开承认他们在真正原则的论证上，在真正政治的论证上陷于破产。多数派立刻就用一个恰如其分的字眼来形容这种做法：庸俗观念（鲁索夫同志）。鲁索夫同志公正地指出：“这样一些同党的工作概念截然相反，同党的道德概念不能相容的奇谈怪论，居然出自某些革命家之口。反对选举三人小组的一些人所持的基本理由，可归结为以纯粹庸人的观点看待党的事业。〈黑体全是我用的〉我们如果持这种不是党性

的而是庸人的观点，那么我们在每次选举时都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选举甲而选举乙，甲会不会感到委屈呢；如果我们不选举组委会的某个委员而选举另一个人为中央委员会委员，这位组委会委员会不会感到委屈呢。同志们，这会把我们引到什么地方去呢？如果我们聚集在这里不是为了说些相互捧场的话，不是为了表示庸人的温情，而是为了建立党，那么我们就无论如何也不能赞同这样的观点。我们的问题是要选出负责人员，所以也就谈不上什么对某个落选者不信任的问题，而只是看对事业是不是有利和当选人是不是适合他当选后所担任的职务的问题。”（第 325 页）

我们建议每一个愿意独立研究党内分裂的原因并探讨在代表大会上发生分裂的根源的人，都把鲁索夫同志的发言反复读上几遍；对于鲁索夫同志提出的理由，少数派不仅没有推翻，而且也没有提出过异议。对这样一个基本的起码的道理本来是提不出异议的；鲁索夫同志自己很公正地指出，人们忘记了这个道理只是由于“神经过敏”。这样来说明少数派怎样从党性观点滚到庸俗观念和小组习气观点，使少数派感到的不愉快确实是最少的了［注：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戒严状态》中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也同他对于所涉及的其他问题的态度一样。他并没有费点气力说明一下这次争论情况的全貌。他悄悄地回避了这次争论中提出来的唯一的真正原则问题：是讲庸人的温情呢，还是选举负责人员？是坚持党性观点呢，还是怕伊万·伊万内奇受委屈？马尔托夫同志在这里也只限于从整个事件中引用一些个别的、没有联系的片段情况，并且还加上许多谩骂我的话。马尔托夫同志，这样恐怕不太够吧！马尔托夫同志特别拿来同我纠缠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代表大会没有选举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和斯塔罗韦尔三位同志。他所持的那种庸俗观念使他看不到这个问题多么不体面（为什么他不去质问他编辑部的同事普列汉诺夫同志呢？）。他认为我的话有矛盾，说我一面认为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上对待六人小组问题的行为“不恰当”，同时又要求全党公论。其实这里

没有矛盾，马尔托夫同志如果愿意费点气力把问题的全部情况作一个联贯的叙述，而不是截取一些片断情况，那么他自己也不难了解到这一点。用庸俗观念对待问题，求助于抱怨，诉说委屈，这是不恰当的；为了全党公论，必须从实质上评价六人小组比三人小组究竟有什么优越的地方，评价担当这些职务的候选人，评价各种色彩，但是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上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这一切。马尔托夫同志只要仔细研究一下记录，就会看到代表们在发言中提出一系列反对六人小组的理由。请看这些发言中的几段话吧：第一，旧的六人小组中间显然有原则性的疙瘩；第二，最好把编辑工作的技术手续简化一下；第三，事业的利益要高于庸人的温情；只有实行选举才可以保证当选人适合他们所担任的职务；第四，决不能限制代表大会的选举自由；第五，党现在所需要的中央机关报不应当只是著作家小组，中央机关报内需要的不仅仅是著作家，而且是管理人；第六，进入中央机关报的应当是完全确定的、为代表大会所了解的人物；第七，六人编委会往往没有工作能力，它的工作并不是靠它的不正常的章程进行的，而是不顾这个章程；第八，办报是党的（而不是小组的）事业，等等。如果马尔托夫同志对于六人小组没有当选的原因很感兴趣，那么就请他细心考虑一下这些理由中的每一条理由，并驳倒其中的任何一条吧。]。

可是，少数派根本无法找出一条合理的切实的理由来反对选举，所以他们除了把庸俗观念加进党的事业中去，还公然采取了一种简直是无理取闹的手段。例如，波波夫同志劝穆拉维约夫同志“不要接受棘手的委托”（第 322 页），他这种手段不是只能称为无理取闹吗？这不正如同索罗金同志公正地指出的那样是“笼络人心”吗？（第 328 页）这不正是在找不出政治理由时想利用“个人意气”吗？索罗金同志所说“我们一向反对这种手段”一语，说得是不是正确呢？“难道捷依奇同志公然企图对那些不同意他的意见的同志给以当众侮辱的行为是可以容许的吗？”[注：索罗金同志在同一次会议上就是这样理解捷依奇同志的话的（参

看第 324 页——“同奥尔洛夫的激烈对话”)。捷依奇同志解释说（第 351 页），他“根本没有讲过类似的话”，但他自己又立刻承认他讲过非常“类似的话”。捷依奇同志解释说，“我没有说过看谁敢这样做，而只是说：我很想看一看究竟是哪些人敢〈原文如此！捷依奇同志愈说愈糟了！〉拥护象选举三人小组这样罪恶的〈原文如此！〉提议”（第 351 页）。捷依奇同志不是驳倒而是证实了索罗金同志的话。捷依奇同志证实了索罗金同志的责难：“这里把所有的概念都混淆了”（在少数派拥护六人小组的理由方面）。捷依奇同志证实了索罗金同志提醒大家要记住一个起码的道理——“我们既是党员，就应当处处以政治上的考虑为依据”是完全必要的。叫嚷实行选举是罪恶行为，这不仅是堕落到庸俗观念，简直是堕落到无理取闹的地步了！]（第 328 页）

现在我们把编辑部问题的讨论情况作一个总结。少数派没有驳倒（而且也没有反驳过）多数派再三指出过的事实，即三人小组计划是代表们在大会之初以及在大会以前已经知道了的，因此这个计划所根据的一些理由和材料是同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件和争论不相干的。少数派在拥护六人小组时采取了原则上错误的和不可容许的庸人立场。少数派暴露了自己完全忘记选举负责人员问题上的党的观点，甚至根本没有评价每个候选人以及这个候选人是不是适合这个职务。少数派始终回避讨论实质问题，却一味谈论所谓协调性，“流眼泪”和“激动”（第 327 页，朗格的发言），说什么“有人想要谋害”某某人。少数派“神经过敏”，他们甚至不惜采取“笼络人心”，叫嚷选举是“罪恶”以及诸如此类不能容许的手段。（第 325 页）

庸俗观念同党性作斗争，最坏的“个人意气”同政治上的理由作斗争，抱怨的话同起码的革命责任感作斗争——这就是我们代表大会第 30 次会议上因六人小组和三人小组问题而发生的斗争的实质。

在第 31 次会议上，当代表大会已经以 19 票对 17 票 3 票弃权的多数否决了关于批准旧编辑部全体人员的提议（见第 330 页和勘误表），而当原来的编辑们也已经回到会场上时，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代表旧编辑部多数提出的声明”（第 330—331 页）中更突出地表现了他那种政治立场和政治观念的动摇性和不坚定性。让我们把这篇集体声明和我对该声明的答复（第 332—333 页）逐条详细地分析一下吧。

马尔托夫同志在旧编辑部未被批准以后说：“从今天起，旧《火星报》就停止存在了，所以把它的名称改一下，也许更彻底。无论如何，我们认为代表大会新通过的决议大大限制了在大会初期的一次会议上对《火星报》所表示的信任。”

马尔托夫同志和他的同事提出了一个确实值得注意而且在许多方面大有教益的政治彻底性问题。我已经援引过大家在批准《火星报》时说的那些话来回答了这一点（记录第 349 页，参看前面第 82 页）［注：见本卷第 308—309 页。——编者注］。毫无疑问，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政治不彻底性表现得最明显的一个例子；至于表现了这种不彻底性的究竟是代表大会的多数还是旧编辑部的多数，请读者自己去判断吧。同时，我们还要请读者自己解决马尔托夫同志和他的同事提得正是时候的另外两个问题：（1）想把代表大会关于选举负责人员参加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决定看作“限制了对《火星报》所表示的信任”，——这是庸人观点还是党的观点？（2）旧《火星报》是从什么时候起真正停止存在的呢？是从我和普列汉诺夫两人开始编辑第 46 号的时候起呢，还是从旧编辑部多数开始编辑第 53 号时候起？如果说第一个问题是很值得注意的原则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很值得注意的事实问题。

马尔托夫同志继续说：“既然现在已经决定要选举三个人组成的编辑部，我就要用本人和其他三个同志的名义声明，我们当中谁也不会参加这样一个新编辑部。至于我个人，我要补充说：如果某些同志真想把我的名字当作一个候选人列

入这个‘三人小组’，那我只能把这件事情看作是对我的无端侮辱〈原文如此!〉。我这样说，是因为考虑到那些促使人们决定改变编辑部的情况。据说这样决定是因为存在某种‘摩擦’[注：马尔托夫同志大概是指波萨多夫斯基同志用过的“疙瘩”这个字眼而言。我再说一遍，波萨多夫斯基同志始终没有向代表大会说明他是指什么而言，而同样使用这个字眼的穆拉维约夫同志却说明，他指的是在代表大会讨论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些原则性的疙瘩。读者一定记得，有四个编辑（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和我）参加过的唯一真正原则性的讨论就是关于党章第 1 条问题的讨论；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两位同志曾用书面抱怨说，人们把“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作为“改变”编辑部的理由之一。马尔托夫同志在这封信中认为“机会主义”同改变编辑部的计划有明显的联系，而他在代表大会上却只隐约地暗示“某种摩擦”。至于“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他已经忘记了!]，是因为旧编辑部没有工作能力，可是代表大会从一定意义上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并没有向编辑部询问过这种摩擦，甚至也没有指定一个专门委员会提出关于它的工作能力问题。〈奇怪得很，少数派当中谁也没有想到建议代表大会“询问编辑部”或指定一个专门委员会！是不是因为在《火星报》组织分裂以后以及在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两位同志信中提到的谈判失败以后，这就没有益处了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不把某些同志以为我会同意参加这样改组后的编辑部的推测，看作是损害我的政治名誉……”[注：马尔托夫同志还补充说：“同意扮演这样的角色的恐怕只有梁赞诺夫，而不会是马尔托夫，至于马尔托夫，我想你们从他的工作就可以知道他的为人。”由于这是对梁赞诺夫的一种个人攻击，马尔托夫同志把这个声明收回了。可是，梁赞诺夫所以在代表大会上被当作一个普通名词来使用，决不是由于他的某些个人品质（这些个人品质是不应该涉及的），而是由于“斗争”社的政治面貌，由于它的政治错误。马尔托夫同志收回他所认为的或者他确实给人硬加上的个人侮辱，这样做是很好的，但是决不能因此忘记

那些应当使党接受教训的政治错误。“斗争”社在我们代表大会上受到斥责，是因为它引起了“组织上的混乱”和“完全是由非原则性的考虑所产生的分散状态”（第 38 页，马尔托夫同志的发言）。这样的政治行为，不仅在党代表大会以前，在普遍混乱时期，当它还是在一个小组中表现出来的时候就完全应该受到谴责，而且在党代表大会以后，在混乱已被克服的时期，即使是由“《火星报》编辑部多数和‘劳动解放社’多数”表现出来的时候也完全应该受到谴责。]

我故意把这段话全部引下来，是为了让读者看看在代表大会以后十分流行的一种行为的标本和开端，对于这种行为，我们只能称之为无谓争吵。我在我的《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中已经使用过这个字眼，不管编辑部怎样感到不满，我不得不反复使用它，因为它无疑是个用得正确的字眼。有人以为无谓争吵一定是出于“卑鄙的动机”（如新《火星报》编辑部所推论的那样），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凡是稍微熟悉我们的流放生活和侨居生活的革命家，都一定看见过数十次无谓争吵的现象，当时由于“神经过敏”以及由于不正常的死气沉沉的生活条件，人们往往提出并且一再重复一些最荒谬的责难、猜疑、自责、“个人意气”等等。不管这种无谓争吵表现得多么卑鄙，但是没有一个明白事理的人一定要在这些无谓争吵中寻找卑鄙的动机。只有用“神经过敏”才可以说明马尔托夫同志发言中的上述言论，即把谬论、个人意气、幻想出来的恐怖、笼络人心的行为、虚构出来的侮辱和诋毁等等搅成一团的言论。死气沉沉的生活条件在我们这里产生数以百计的无谓争吵，而一个政党假如不敢如实地说出自己的病，不敢进行严格的诊断和找出治病的办法，那它就不配受人尊敬了。

如果说从这一团糟的言论中可以提取什么原则性的东西的话，那么势必得出一个结论：“实行选举是同损害政治名誉毫不相干的”，“否认代表大会有权实行新的选举，有权对负责人员作某种变动，有权改组由它授予全权的委员会”，那就会把问题弄得一塌糊涂，而“马尔托夫同志在是否可以从原先的编委会中选举一

部分成员问题上的观点，表现出政治概念的极大的混淆”。（这是我在代表大会上说的话，第 332 页）［注：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7 卷第 288、289 页。——编者注］

现在我不谈马尔托夫同志对于是谁提出三人小组计划这一问题所作的“个人”评论，而只谈一下他对于旧编辑部没有被批准这一事实所作的“政治”评价：“……现在发生的事件是代表大会后半期进行的那个斗争的最后一幕。〈对啊！但这后半期是从马尔托夫在党章第 1 条问题上被阿基莫夫同志紧紧控制的时候开始的。〉谁都知道，实行这种改革涉及的不是‘工作能力’问题，而是争取对于中央委员会的影响。〈第一，谁都知道，当时既涉及工作能力，又涉及中央委员会人选问题引起的意见分歧，因为提出“改革”计划时还根本谈不上这方面的意见分歧，当时我们和马尔托夫同志还一起选出巴甫洛维奇同志为编辑委员会第七个成员呢！第二，我们已经根据文件材料指明，当时的问题关系到中央委员会的人选，当时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两个不同的名单：一个名单是格列博夫、特拉温斯基、波波夫，另一个名单是格列博夫、托洛茨基、波波夫。〉编辑部的多数已经表明他们不愿意把中央委员会变成编辑部的工具。〈开始唱起阿基莫夫的调子来了。任何一个党代表大会上的任何一个多数派在任何时候都会努力争取影响，以便借助于多数把这种影响在中央机关中巩固起来，但是人们把这个问题转移到机会主义的诽谤方面去，说什么变成编辑部的“工具”，变成编辑部的“简单附属品”，象同一个马尔托夫同志在晚些时候说的那样，第 334 页。〉因此才认为有必要减少编辑部成员人数〈!!〉。因此我也就不能加入这样一个编辑部。〈请注意一下“因此”二字。编辑部怎样才能把中央委员会变成附属品或工具呢？不是只有当编辑部在总委员会内拥有三票并且滥用这个优势的时候才会如此吗？这难道不是很明显的吗？同样，当选为第三个成员的马尔托夫同志随时都能阻止任何滥用职权的现象，并且单单用自己的一票就能消灭编辑部在总委员会内的任何优势，——这难道不也

是很明显的吗？所以问题完全在于中央委员会的人选，而所谓变成工具和附属品的说法只不过是一种诽谤而已。〉我和旧编辑部的多数本来认为，代表大会将会结束党内的‘戒严状态’而奠定党内的正常秩序。但实际上戒严状态以及用来对付独立团体的非常法仍然存在，甚至变本加厉了。只有在保存旧编辑部的全体成员时，我们才能担保编辑部根据党章享有的那些权利不会使党受到危害……”

以上就是马尔托夫同志第一次抛出“戒严状态”这个著名口号的那段言论的全文。现在请看我对他的答复：

“……不过，在纠正马尔托夫所谓两个三人小组的计划是私人性质的这一声明时，我并不想因此否认同一个马尔托夫所说的我们所采取的、不批准旧编辑部这个步骤是具有‘政治意义’的说法。恰恰相反，我完全无条件同意马尔托夫同志的意见，即这个步骤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只不过不是马尔托夫所加给它的那种政治意义罢了。他说，这是为争取影响国内的中央委员会而进行斗争的一个行动。我比马尔托夫还更进一步。迄今为止，作为一个独立团体的《火星报》的全部活动，都是为争取影响而进行的斗争，但现在问题已经进了一步，已经是要在组织上巩固这种影响，而不只是为争取这种影响而斗争了。马尔托夫同志认为这样希望影响中央委员会是我的罪过，而我却认为我过去和现在力求通过组织途径巩固这种影响正是我的功劳，由此可以看出，我和马尔托夫同志在政治上的分歧已经深刻到什么程度了。原来我们是各说各的话。如果我们的全部工作、我们的一切努力的结果仍然是照旧为争取影响而斗争，而不是完全获得和巩固这种影响，那么这些工作、这些努力又有什么意思呢？是的，马尔托夫同志说得完全对：业已采取的步骤无疑是重大的政治步骤，说明我们选定了现在已经显露出来的方向之一作为我们党今后工作的方向。‘党内戒严状态’、‘对付个别分子和独立团体的非常法’这些可怕的字眼，是一点也吓唬不了我的。对那些不坚定的和动摇的分子，我们不仅可以而且必须实行‘戒严’，而我们的整个党章、我们现在

已由代表大会批准的整个集中制，正是对政治上模糊不清的许多来源实行‘戒严’。为了对付这种模糊不清，我们正需要有特别的、哪怕是非常的法律，而代表大会所采取的步骤正确地规定了政治方向，给这样的法律和这样的措施打下了牢固的基础。”［注：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7 卷第 290—291 页。——编者注］

这就是我在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发言的提要，我在这个提要中加上着重标记的一句话，是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戒严状态》（第 16 页）中故意删掉了的。他不喜欢这句话而且不愿意了解这句话的明显意义，那是毫不奇怪的。

马尔托夫同志，“吓唬人的字眼”一语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意味着嘲笑，嘲笑那些小题大做的人，嘲笑那些用装腔作势的空话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的人。

唯一能够引起而且确实已经引起马尔托夫同志“神经过敏”的，仅仅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简单事实，即马尔托夫同志在代表大会上在关于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遭到了失败。这一简单事实的政治意义在于，党代表大会的多数派在取得胜利以后就着手巩固自己的影响，方法就是在党的领导机关中也取得多数，建立起组织基础，以便根据党章同多数派认为是动摇性、不坚定性和态度模糊的东西作斗争［注：火星派少数派的不坚定性、动摇性和态度模糊在代表大会上表现在哪里呢？第一，表现在他们在党章第 1 条问题上说的一些机会主义空话；第二，表现在他们和阿基莫夫同志以及李伯尔同志结成联盟，这种联盟在代表大会后半期发展得很快；第三，表现在他们竟把选举中央机关报负责人员的问题降低到宣扬庸俗观念，说些抱怨的话以至笼络人心的地步。在代表大会以后，所有这些可爱的品质更是大大发展，已经开花结果了。］。在这种情况下怀着一种恐怖神情说什么“争取影响的斗争”，抱怨什么“戒严状态”，那只不过是装腔作势的空话，吓唬人的字眼罢了。

马尔托夫同志不同意这一点吗？那么他不妨告诉我们，世界上是否有过这样一种党代表大会，或者从根本上说是否可以设想会有这样一种党代表大会，在会上，多数派竟会不去努力（1）在中央机关中也取得多数，（2）使这个多数拥有克服动摇性、不坚定性和态度模糊的权力，以此巩固已经赢得的影响呢？

在选举之前，我们代表大会必须解决一个问题：把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内三分之一的票数给党的多数派呢，还是给党的少数派？保留六人小组和通过马尔托夫同志所提的名单，就是给我们三分之一的票数，给马尔托夫同志的支持者三分之二的票数。选举中央机关报三人小组和通过我们所提的名单，就是给我们三分之二的票数，而给马尔托夫同志的支持者三分之一的票数。马尔托夫同志拒绝同我们妥协或作出让步，并在代表大会上用书面向我们提出挑战，而当他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时，他就哭泣和抱怨起“戒严状态”来了！难道这不是无谓争吵吗？难道这不又是知识分子脆弱性的表现吗？

说到这里，不能不令人想起考茨基不久以前从社会和心理特征角度对于这种知识分子脆弱性所作的精辟的论述。现在各国社会民主党往往患同样的病症，我们向更有经验的同志们学习正确的诊断和正确的治疗方法是很有好处的。因此，我们引证考茨基对于某些知识分子所作的评述，只是从表面上看才能说是离开本题。

“……现在关于知识分子[注：我把德文 Literat，Literatentum 译为知识分子，知识界，因为德文 Literat，Literatentum 不只是包括著作家，而且包括一切受过教育的人，所有自由职业者，与体力劳动者相对的脑力劳动者（英国人称之为 brain worker）。]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问题又使我们产生了很大兴趣。我的同事们〈考茨基本人是个知识分子，是个著作家和编辑〉多半会由于我承认有这种对抗而表示愤慨。但是这种对抗确实是存在的，这里也象在其他场合一样，如果企图用否认事实的办法来回避这种对抗，那是一种最不适当的策略。这种对抗是社会对抗，

它表现在阶级上而不是表现在个别人物上。个别资本家以及个别知识分子是可能整个投身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也就改变自己的性质。我在以下的叙述中谈的主要不是这种至今还是本阶级中例外现象的知识分子。在以下的叙述中，如果不作特别附带说明，我所说的知识分子就仅仅是指一般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以资产阶级社会为立脚点的，是知识分子阶级的典型代表。这个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是存在某种对抗的。

这种对抗和劳资对抗不同。知识分子不是资本家。诚然，他的生活水平是资产阶级的，并且他在没有变成游民以前不得不维持这种水平，但是同时他又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产品，而且常常还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往往受到资本家的剥削和一定程度的鄙视。所以，知识分子同无产阶级在经济上是没有任何对抗的。但是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却是非无产阶级的，因此在情绪上和思想上也就产生某种对抗。

无产者作为孤立的个体等于零。他的全部力量，他的全部发展，他的一切希望和愿望，都来自组织，来自他和同志们的有计划的共同活动。当他成为强大有力的机体的一部分时，他就觉得自己是强大有力的。对他来说，这个机体就是一切，而单独的个体同这个机体比较起来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无产者作为无名群众的一分子以最大的自我牺牲精神进行着斗争，他毫不计较个人利益和个人荣誉，他在指定的任何岗位上都履行自己的职责，自愿地服从贯穿于他的全部情感和全部思想的纪律。

知识分子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他不是运用实力，而是利用论点来进行斗争。他的武器就是他个人的知识，个人的能力，个人的信念。他只有凭借自己的个人素质才能起一定的作用。因此，在他看来，个性的完全自由是顺利进行工作的首要条件。他作为某个整体的从属部分而服从这个整体是很勉强的，是迫于必要而

不是出于本人心意。他认为纪律只有对群众才需要，对上等人物是不必要的，至于他自己，当然是属于上等人物……

……尼采的哲学主张超人崇拜，对这种超人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保证他自己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个人对任何伟大的社会目的的任何服从都是卑鄙可耻的，这种哲学正是知识分子世界观，它使知识分子根本不能参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除了尼采以外，易卜生可以说是符合知识分子情绪的知识分子世界观的另一位杰出代表。他的斯多克芒医生（《人民公敌》一剧中的人物）并不象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个社会主义者，而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典型，这种知识分子必然会同无产阶级运动、甚至任何人民运动发生冲突，如果他试图在运动中起作用的话。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无产阶级运动也和任何民主［注：最能表明我们的马尔托夫分子把一切组织问题都弄得一塌糊涂的事实，就是他们在转到阿基莫夫方面和鼓吹不适当的民主的同时，却又拼命反对民主选举编辑部，即照大家原先计划的那样在代表大会上进行选举！先生们，也许这就是你们的原则吧？］运动一样是以尊重多数同志为基础的。斯多克芒这类典型的知识分子认为'紧密的多数派'是应当被推翻的怪物。

……李卜克内西是社会主义运动所需要的理想的知识分子的榜样，他满怀着无产阶级的感情，他虽然是一个出色的作家，却完全没有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心理特点，他心甘情愿地行进在普通士兵的行列之中，在指定给他的任何岗位上工作，使自己完全服从于我们的伟大事业，并鄙视按照易卜生和尼采精神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一处于少数地位就抱怨自己的个性受到压抑的那种颓丧的啜泣（Weichliches Gewinsel）。这里还可以举马克思为例，他从来不想突出自己，他在国际中不止一次地处于少数地位，每次他都模范地服从党的纪律。"［注：卡尔·考茨基《弗兰茨·梅林》，载于《新时代》第 22 年卷（1903）第 1 册第 4 期第 99—101 页。］

马尔托夫及其同事们只是因为一个旧小组没有被批准就拒绝担任工作，抱怨人家用戒严状态和非常法来“对付独立团体”，这也正是处于少数地位的知识分子发出的那种颓丧的啜泣，当“南方工人”社和《工人事业》被解散的时候，马尔托夫对这些独立团体并不关心，而当他的团体被解散时却关心起来了。

马尔托夫在我们党代表大会上［注：见代表大会记录第 337、338、340、352 页及其他各页。］（尤其是在代表大会以后）滔滔不绝地对“紧密的多数派”首先发出种种抱怨、非难、暗示、斥责、造谣和诽谤，这也正是处于少数地位的知识分子发出的那种颓丧的啜泣。

少数派痛心疾首地埋怨紧密的多数派举行了自己的非正式会议。确实，少数派是需要用某种方法来掩盖一件对他们不愉快的事实的，这就是那些被少数派邀请参加少数派非正式会议的代表竟拒绝出席这种会议，而那些乐意参加这种会议的代表（叶戈罗夫们、马霍夫们、布鲁凯尔们），却由于少数派同他们在代表大会上作过斗争而不能邀请。

少数派痛心疾首地埋怨人家提出了“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确实，少数派是需要用某种方法来掩盖一件不愉快的事实的，这就是正是那些时常跟着反火星派分子跑的机会主义者，而有一部分还是这些反火星派分子本身，组成了一个紧密的少数派，极力支持机关中的小组习气，言论方面的机会主义，党务方面的庸俗观念，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和脆弱性。

在下一节我们将要说明，如何解释在代表大会快结束时形成了“紧密的多数派”这一非常值得注意的政治事实，以及少数派为什么不顾一切挑战而一味小心翼翼地对多数派形成的原因和经过这个问题避而不谈。但是，让我们首先把我们对于代表大会讨论情况的分析告一段落吧。

在选举中央委员会时，马尔托夫同志提出了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决议案（第 336 页），我把这个决议案的三个基本点有时称为“三着致命棋”。这三点就是：

（1）按照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而不是按照单个候选人来进行表决；（2）在宣读名单以后，放过两次会议（大概是为了讨论）；（3）在没有绝对多数时，第二次表决就算是最后的表决。这个决议案是考虑得非常周密的策略（对于对手也要说句公道话呀！），这个策略是叶戈罗夫同志所不同意的（第 337 页），可是如果崩得分子和工人事业派分子七个人不退出代表大会，那么这个策略是肯定可以保证马尔托夫取得完全胜利的。所以采取这个策略，是因为火星派少数派方面不仅同崩得以及布鲁凯尔，而且同叶戈罗夫们以及马霍夫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直接协定”（而火星派多数派方面是有这种协定的）。

你们想必记得，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诉苦说，“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是以他和崩得订立直接协定为前提的。我再说一遍，这是马尔托夫同志因害怕而产生的想法，正是叶戈罗夫同志不同意按名单进行表决（叶戈罗夫同志“还没有失去自己的原则”，大概就是那些使他在估计民主保证的绝对价值时同戈尔德布拉特打成一片的原则），明显地表明一件很重要的事实，当时甚至同叶戈罗夫也谈不上什么“直接协定”。但是同叶戈罗夫以及同布鲁凯尔的联盟在当时是可能有而且确实有过的，这里所谓联盟，就是说每当马尔托夫分子同我们发生严重冲突时，每当阿基莫夫及其伙伴必须选择害处较少的办法时，马尔托夫分子总是保证能得到叶戈罗夫和布鲁凯尔两个人的支持。阿基莫夫和李伯尔两位同志一定会选择中央机关报六人小组，选择马尔托夫所提的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作为害处较少的办法，作为使火星派的目的最难达到的办法（见阿基莫夫关于党章第 1 条的发言以及他对马尔托夫所抱的“希望”），这从来都是毫无疑问的。按照名单进行表决，放过两次会议，以及重新进行表决，所有这些办法都是为了不用任何直接协定而又能以几乎是机械的准确性达到这种结果。

但是，我们的紧密的多数派仍然是紧密的多数派，所以马尔托夫同志的迂回办法也就不过是一种拖延手段，我们不能不拒绝这种办法。少数派曾用书面形式

（在声明书中，第 341 页）抱怨这一点，“鉴于当时进行选举的那些条件”，按照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两个人的先例拒绝参加表决和选举中央委员会。在代表大会以后，这种抱怨选举条件不合常态的话（见《戒严状态》第 31 页）在党内数以百计的搬弄是非的人面前到处宣扬。但是，这里有什么不合常态的地方呢？是采取了由代表大会的议事规程事先规定的（第 6 条，记录第 11 页）而被可笑地说成是“虚伪”或“不公平”的秘密投票吗？是形成了被怯懦的知识分子看作“怪物”的紧密的多数派吗？或者是这帮高贵的知识分子怀着一种不合常态的愿望，想要违背他们自己在代表大会面前许下的承认大会一切选举（第 380 页，代表大会章程第 18 条）的诺言吗？

波波夫同志巧妙地暗示了这种愿望，他在进行选举的那天的代表大会上直截了当地问道：“既然有半数代表拒绝投票，主席团是否确信代表大会的决定是有效的和合法的呢？”[注：见第 342 页。这是指选举总委员会的第五个委员而言。当时投了 24 张选票（总共有 44 票），其中 2 张是空白票。] 主席团当然回答说确信这一点，并提醒大家注意阿基莫夫和马尔丁诺夫两同志事件。马尔托夫同志赞成主席团的意见，并且直截了当地说波波夫同志弄错了，“代表大会的决定是合法的”（第 343 页）。请读者自己来评价这种（想必是非常合乎常态的）政治彻底性吧；关于这种彻底性，只要把在党面前作的这个声明同在代表大会以后干的事情以及在《戒严状态》中所说的“还在代表大会上就已开始的党内半数的暴动”（第 20 页）这种话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阿基莫夫同志对马尔托夫同志抱的希望胜过了马尔托夫本人的昙花一现的善良意图。

阿基莫夫同志，“你胜利了”！

※　※　※

著名的“戒严状态”一词现在已经永远具有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意义了，至于它曾经是一个何等“吓唬人的字眼”，这可以从代表大会快结束时，即进行选举

以后发生的表面上很小但是实质上很重要的几件事实来说明。马尔托夫同志现在极力宣扬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戒严状态”，煞有介事地自欺欺人，硬说他所臆造的这个稻草人的意思就是“多数派”对“少数派”进行了某种不正常的压迫、攻击和驱策。下面我们就会让大家看看代表大会以后的情况。但是，即使拿代表大会快结束时的情况来说，也可以看出，在选举以后，“紧密的多数派”不但没有压迫这些不幸的、被驱策的、被侮辱的、任人宰割的马尔托夫分子，反而自动提议（通过利亚多夫之口）把记录委员会中的三个席位分给他们两个（第 354 页）。拿策略问题和其他问题的决议案（第 355 页及以下各页）来说，也可以看出完全切实地讨论问题的情况，当时提出决议案的同志的署名往往表明，可怕的紧密的“多数派”和“被损害和被侮辱的”“少数派”是互相交替提出决议案的（记录第 355、357、363、365、367 页）。这难道象是“解除工作”以及别的什么“驱策”吗？

在讨论斯塔罗韦尔提出的关于自由派的决议案时发生了唯一值得注意的、但可惜太简短的实质性争论。这个决议案所以被代表大会通过，根据它的署名情况来看（第 357 页和第 358 页），是因为有三个“多数派”分子（布劳恩、奥尔洛夫、奥西波夫）既赞成斯塔罗韦尔的决议案，又赞成普列汉诺夫的决议案，因为他们并不认为两者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初看起来，这两个决议案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普列汉诺夫的决议案是规定总的原则，是对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表示一定的原则上和策略上的态度，而斯塔罗韦尔的决议案是企图规定容许同“自由派或自由主义民主派”订立“暂时协定”的具体条件。两个决议案的主题是不同的。但是，斯塔罗韦尔的决议案恰恰犯了政治态度模糊的毛病，因而是一个琐碎的决议案。它没有规定俄国自由主义的阶级内容，它没有指出代表这个自由主义的一定的政治派别，它没有向无产阶级说明他们对待这些一定派别的基本宣传鼓动任务，它把学生运动和《解放》这两个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因为

它患有态度模糊的毛病），它过分琐碎地烦琐地规定了容许订立“暂时协定”的三个具体条件。政治态度模糊在这种情况下也如同在其他许多情况下一样，导致了过分的烦琐。不谈总的原则而只是列举“条件”，结果就把这种条件规定得很琐碎，严格说来，是规定错了。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斯塔罗韦尔提出的三个条件吧：（1）“自由派或自由主义民主派”应当“明确而肯定地声明，他们在同专制政府斗争时将坚决站在俄国社会民主党方面”。自由派和自由主义民主派的区别在哪里呢？决议案并没有提供任何可用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材料。区别不就在于自由派代表资产阶级中政治进步性最小的阶层的立场，而自由主义民主派则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政治进步性最大的阶层的立场吗？如果是这样，难道斯塔罗韦尔同志认为资产阶级中进步性最小的（但终究是有进步性的，否则就谈不上什么自由主义）阶层“将坚决站在社会民主党方面”是可能的吗？？这是荒谬的，即使这样一个派别的代表人物“明确而肯定地声明这一点”（这种假定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无产阶级政党也不应当相信他们的声明。做一个自由主义者和坚决站在社会民主党方面，这两者是彼此不相容的。

其次，我们假定“自由派或自由主义民主派”会明确而肯定地声明，说他们在同专制制度斗争时将坚决站在社会革命党人方面。这种假定远不象斯塔罗韦尔同志的假定那样不可思议（因为社会革命党人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派别）。如果按照他那个意思模糊和内容烦琐的决议案观点，在这种情形下是不允许同这类自由派缔结暂时协定的。可是从斯塔罗韦尔同志的决议案中必然得出的这个结论，是根本不正确的。暂时的协定可以同社会革命党人缔结（见代表大会关于社会革命党人问题的决议），因而也可以同可能站到社会革命党人方面的自由派分子缔结。

第二个条件：如果这些派别“在自己的纲领中不提出同工人阶级利益和一般民主派利益相抵触或者模糊他们的意识的要求”。这里又犯了同样的错误：从来

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自由主义民主派在自己的纲领中不提出同工人阶级利益相抵触的要求和不模糊他们的（无产阶级的）意识。甚至我国自由主义民主派中最民主的派别，即社会革命党人，在自己的纲领（它也象一切自由派的纲领一样混乱）中也提出了同工人阶级利益相抵触并且模糊他们的意识的要求。从这个事实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必须"揭露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但决不是不许缔结暂时的协定。

最后，斯塔罗韦尔同志的第三个"条件"（自由主义民主派应当把普遍、平等、秘密和直接的选举权作为自己的斗争口号），就其一般提法来说，也是不正确的。如果宣布任何情况下都不容许同那些以争取有资格限制的宪法即"残缺不全的"宪法作为口号的自由主义民主派缔结暂时的局部的协定，那是不明智的。其实，"解放派"先生们这一"派别"可以说就是这样的派别，但是事先禁止同那些甚至是最怯懦的自由派缔结"暂时的协定"，因而把自己的手脚束缚住，那就是患了同马克思主义原则不相容的政治近视病了。

总之，斯塔罗韦尔同志提出的而为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签名赞成的决议案，是一个错误的决议案，第三次代表大会一定会采取明智的行动，撤销这个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在理论立场和策略立场方面犯了政治态度模糊的毛病，在它所要求的实际"条件"方面犯了过分烦琐的毛病。它混淆了下面两个问题：（1）揭露任何一个自由主义民主派所固有的"反革命和反无产阶级的"特点，必须同这些特点作斗争；（2）规定同这些派别中任何一个派别缔结暂时的局部的协定的条件。这个决议案并没有做它应当做的事情（分析自由主义的阶级内容），而做了它不应当做的事情（预先规定"条件"）。在党代表大会上规定这种暂时协定的具体"条件"，根本就是荒谬的，因为这时连具体的对方，即可能缔结这种协定的对象都不存在；即使有了这样的"对象"，也应当让党中央机关去决定缔结暂时协定的"条件"，就象代表大会对待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的"派别"问题时所做

的那样（见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决议案中由普列汉诺夫修正过的末尾一段，载于记录第 362 页和第 15 页），那要更合理百倍。

至于“少数派”对普列汉诺夫决议案提出的异议，马尔托夫同志提出的唯一理由是：普列汉诺夫的决议案“是以必须揭露一个著作家这种浅薄的结论作结尾的。这岂不是‘拿斧头去砍苍蝇’吗？”（第 358 页）这个理由是用“浅薄的结论”这种尖刻的字眼掩盖思想的贫乏，是夸夸其谈的又一个实例。第一，普列汉诺夫的决议案是说要“向无产阶级揭露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的一切表现”。所以，马尔托夫同志所谓“全部注意力都要集中在一个司徒卢威，一个自由主义者身上”的论断（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论断，记录第 88 页），纯粹是一句废话。第二，在说到同俄国自由派缔结暂时的协定的可能性时，把司徒卢威先生比作“苍蝇”，就是为了使用尖刻的字眼而忽略一件基本的和明显的政治事实。不，司徒卢威先生不是一只苍蝇，而是一个政治人物，他所以是一个政治人物，不是因为他本人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而是因为他的立场是秘密活动界中唯一代表俄国自由派，代表多少有点活动能力和组织性的自由派的。所以，谈论俄国的自由派以及我们党对待他们的态度而不明确提到司徒卢威先生，不明确提到《解放》，那就等于是说废话。也许，马尔托夫同志想要向我们指出俄国有另一个——哪怕只是一个也好——目前能多少同“解放”派相提并论的“自由派或自由主义民主派”吧？人们倒是很希望他能这样做！[注：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反对普列汉诺夫同志的决议案时还提出这样一个理由：“反对这个决议案的主要理由，这个决议案的主要缺点，就在于它完全忽略了我们的义务是要在同专制制度的斗争中不回避同自由主义民主派缔结联盟。列宁同志也许要把这种倾向叫作马尔丁诺夫倾向。在新《火星报》上，这种倾向已经表现出来了。”（第 88 页）

这几句话内容实在太丰富了，可以说是一段难得的“妙语”集锦。（1）所谓同自由派结成联盟，这完全是把概念搞混乱了。马尔托夫同志，谁也没有说过要结成联盟，而只是说要缔结暂时的或局部的协定。这是有很大区别的。（2）如果普列汉诺夫在决议案中忽略了不可思议的“联盟”而只一般说到“支持”，那么这不是该决议案的缺点，而正是它的优点。（3）马尔托夫同志是不是可以费点力气给我们解释一下“马尔丁诺夫倾向”的一般特征呢？他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讲一下这些倾向同机会主义的关系呢？他是不是可以考察一下这些倾向同党章第1条的关系呢？（4）我实在急欲从马尔托夫同志那里听到“马尔丁诺夫倾向”在“新”《火星报》上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马尔托夫同志，请你赶快说出来，免得我等得着急吧！]

科斯特罗夫同志拥护马尔托夫同志的意见，他说：“司徒卢威的名字对于工人是毫无意义的。”这完全是（请科斯特罗夫同志和马尔托夫同志不要生气）阿基莫夫式的理由。这很象是关于无产阶级一词的所有格问题的议论[18]。

“司徒卢威的名字”（以及在普列汉诺夫同志的决议案中同司徒卢威先生的名字并提的《解放》这个名称）对什么样的工人是“毫无意义的”呢？对那些很少了解或者完全不了解俄国“自由派或自由主义民主派”的工人。试问，我们的党代表大会应当怎样对待这样的工人呢？是责成党员向这些工人说明俄国唯一确定的自由派呢，还是把某些工人由于不了解政治而不了解的名字隐讳不谈？如果科斯特罗夫同志跟着阿基莫夫同志走了第一步，而不愿意再跟着他走第二步，那他一定会按照前一种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他按照前一种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他就会知道，他当时所持的理由多么站不住脚。无论如何，普列汉诺夫的决议案中提到的“司徒卢威”和《解放》字样，要比斯塔罗韦尔的决议案中所讲的“自由派和自由主义民主派”字样能给工人多好多倍的东西。

现在俄国工人只有通过《解放》才能切实了解我国自由派比较坦率表现出来的政治倾向。在这方面，合法的自由主义出版物因为它的态度模糊而毫无用处。我们应当尽可能努力（并在尽可能多的工人群众面前）运用自己的批判的武器反对解放派，使俄国无产阶级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能用真正的武器的批判来制止解放派先生们必然想削弱革命的民主性质的企图。

除了我上面指出的叶戈罗夫同志对于我们“支持”反政府运动和革命运动的问题表示“大惑不解”以外，对于决议案的讨论并没有提供什么值得注意的材料，甚至可以说没有进行什么讨论。

代表大会结束时，主席简短地提醒说，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体党员都必须执行。

注释：

[17]指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307。

[18]指经济派弗·彼·阿基莫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他批评《火星报》编辑部提出的党纲草案说：在讲党的任务的段落里“党和无产阶级这两个概念是完全孤立和对立的，前者是一个积极活动的集体的人，后者则是党施加影响的消极的人群，因此在草案的建议中，党一词到处都以主语出现，而无产阶级一词到处都以补语出现”。他还认为这是使党脱离无产阶级利益这一倾向的明显表现（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1959 年俄文版第 127 页）。——332。

（十四）代表大会上斗争的一般情况。党内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

代表大会的讨论情况和表决情况已经分析完了，现在我们应当作个总结，以便根据代表大会的全部材料来回答一个问题：在选举过程中我们看到的并且在一

段时间内成为我们党内基本划分的最后的多数派和少数派，是由哪些人、集团和色彩组成的呢？必须把代表大会的记录所提供的关于原则上、理论上和策略上的各种色彩的丰富材料拿来作个总结。如果不作总的“概括”，如果不把整个代表大会以及在表决时一切最主要的派别划分情况作一个全面的观察，这些材料就会始终是一些支离破碎的材料，这样，乍看起来，特别是在那些不愿意费点气力从各方面独立地研究代表大会记录的人（肯下这种工夫的读者能有多少呢？）看来，某些派别划分就好象是偶然产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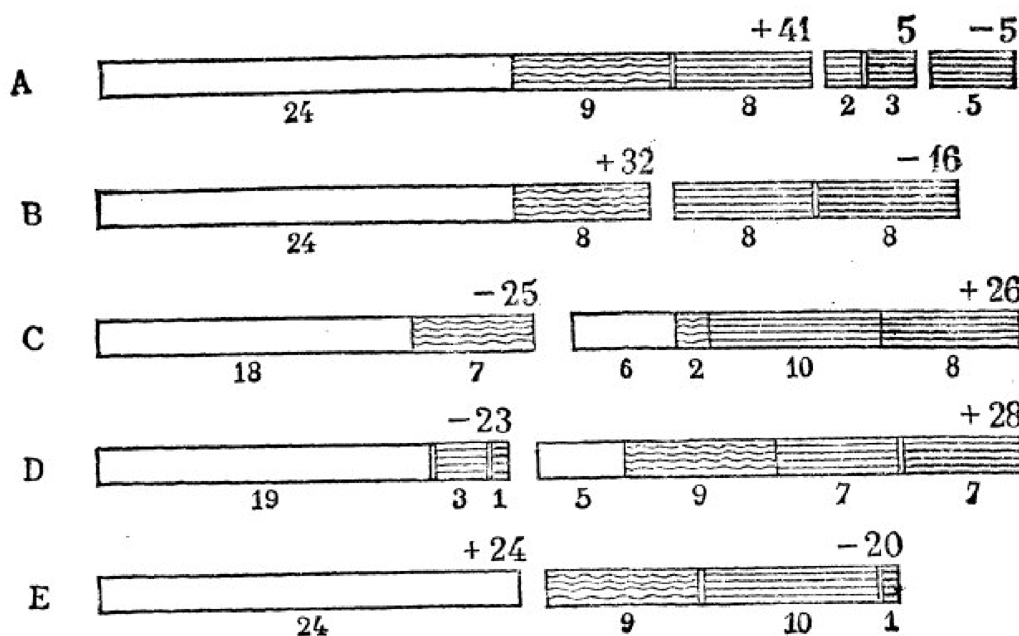
在英国议会报告中时常看到一个有特色的字眼 division（划分）。人们在谈到对于某个问题的表决情况时，就说议院“划分”成了这样那样的多数派和少数派。我们社会民主党的议院在代表大会讨论的各种问题上形成的“划分”，也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反映党内斗争、党内各种色彩和集团的独特的、十分完备而准确的图画。为了使这幅图画一目了然，为了得到一幅真实的图画，而不是一堆没有内在联系的、支离破碎的事实和细节，为了结束关于个别表决的永无休止的毫无意义的争论（谁投了谁的票，谁支持过谁？），我决定用图表形式表明我们代表大会上所有各类基本的“划分”。这样的方法大概会使许多人觉得奇怪，但是我觉得恐怕很难找到别的什么办法来进行真正的尽可能完备而准确的概括和总结。某个代表是投票赞成某个提案，还是反对某个提案，这在实行记名投票时是可以绝对准确地弄清楚的，至于某些重要的无记名投票，也可以根据记录作出一个相当可靠、十分接近真实情况的判断。所以，如果对所有记名投票和所有涉及比较重要（例如，可以就讨论的详细程度和热烈程度来看）问题的无记名投票都考虑在内，就可以把我们党内斗争情况作一个根据现有材料可能做到的最客观的描写。并且我们不准备作照相式的描写，也就是说，我们不去单独描写每一次表决，而是设法勾划出一幅反映所有各类主要表决情况的图画，而撇开那些比较次要的、只能使问题模糊不清的细枝末节。在任何情况下，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记录检查我们图表

中的每一个线条，并且用任何一次个别的表决来加以补充，总之，可以对它进行批评，——不仅可以用提出意见、表示怀疑和指出个别偶然事件的方法，也可以用根据同样的材料绘出另一幅图画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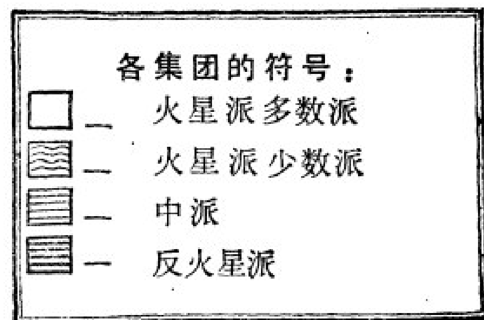
在把每一个参加投票的代表列在图表中时，我们将以特别的线条标出我们在代表大会整个讨论过程中详细考察过的四个基本集团，即：（1）火星派多数派，（2）火星派少数派，（3）“中派”，（4）反火星派。这些集团在原则色彩上的区别，我们已经从许多例子中看到了，如果有人因这些集团的名称太使爱曲折前进的人联想到《火星报》组织和《火星报》方针而不喜欢这些名称，那么我们要向他们指出，问题不在于名称。现在，我们已经根据代表大会的一切争论考察了各种色彩，也就容易用表述各个集团色彩的实质的评语来代替那些已经用惯和听惯的党内的名称（使某些人听来刺耳的名称）。如果这样做，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四个集团的名称如下：（1）彻底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2）小的机会主义者；（3）中等的机会主义者；（4）大的（按照我们俄国的尺度来讲是大的）机会主义者。但愿那些近来公然说“火星派分子”这个名称只是指一个“小组”而不是表明一种方针的人听到这些名称时不太感到刺耳吧。

现在我们就来详细说明这张图表上（见《代表大会上斗争的一般情况》图表）“拍摄了”哪几类表决情况。

代表大会上斗争的一般情况



图表上附有“＋”号和“－”号的数字，是表示对于某个问题投票赞成或反对的总票数。框框下面的数字，是表示四个集团中每个集团的票数。从Ａ 到Ｅ各类分别为包括哪些表决，将在正文中加以说明。



第一类表决（A）包括的是，“中派”同火星派一起反对反火星派或其中一部分人。属于这类表决的有关于整个党纲的表决（除了阿基莫夫同志一人弃权以外，其余的人都赞成），关于反对联邦制的原则性决议的表决（除了五个崩得分子以外，所有的人都赞成），关于崩得章程第 2 条问题的表决（反对我们的有五个崩得分子，弃权的有五票，即马尔丁诺夫、阿基莫夫、布鲁凯尔以及拥有两票的马霍夫，其余的人都赞成我们）；这次表决也就是图表 A 中所表明的。其次，关于批准《火星报》为党中央机关报问题的三次表决，也属于这一类表决；编辑部（五票）弃权，有两票（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在所有三次表决中都投反对票；此外，在表决批准《火星报》的理由时，有五个崩得分子和马尔丁诺夫同志弃权。[注：为什么特别要把关于崩得章程第2条问题的表决描绘在图表上呢？因为关于承认

《火星报》问题的表决是不很完备的，而关于党纲和联邦制的表决又涉及到不很确定的具体的政治决议。一般说来，从一批同类性质的表决中挑出这次还是那次表决作典型，一点也不改变图画的基本特点，这是每个作出相应的变更的人都很容易理解的。]

这一类表决回答了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重要问题：代表大会的“中派”是在什么时候跟火星派一道走的呢？或者是在反火星派也跟我们一道走的时候，这里只有很少的例外情况（通过党纲，不问理由如何而批准《火星报》），或者是在仅限于作一些声明而不必直接采取一定的政治立场的时候（承认《火星报》的组织工作而不必对个别集团切实地实现《火星报》的组织政策；否决联邦制而不妨碍在讨论联邦制的具体草案问题时弃权，例如马霍夫同志就有过这种例子）。我们在上面一般谈到代表大会上派别划分的意义时，已经看见这个问题在正式《火星报》的正式说明中解释得很不正确，正式的《火星报》（以马尔托夫同志为代言人）拿有时反火星派也跟我们一道走作借口来抹杀和模糊火星派和“中派”之间的区别，彻底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和机会主义者之间的区别！甚至德法两国社会民主党内最“右的”机会主义者，也不会在承认整个党纲这样的问题上投反对票。

第二类表决（B）包括的是，彻底的火星派和不彻底的火星派共同反对所有反火星派和整个“中派”。这类表决主要涉及的问题是，实现《火星报》政策的某种具体计划，即在事实上而不只是在口头上承认《火星报》。属于这一类的，有组委会事件［注：我们在图表 B 类列出的正是这次表决：当时火星派有 32 票，赞成崩得分子的决议案的有 16 票。我们要指出，在这类表决中没有一次是记名投票。能指明代表划分情况的只有以下两种大概相当接近实际情况的材料：（1）在讨论时，火星派中两个集团的发言人都表示赞成，反火星派和中派的发言人则表示反对；（2）表示“赞成”的票数始终很接近 33 票的数字。同时不要忘记，在分析代表大会上的讨论情况时，我们除了指出表决情况之外，还指出了“中派”同

反火星派一起（即同机会主义者一起）反对我们的许多场合。属于这种场合的，有民主要求的绝对价值问题，支持反政府派问题，限制集中制问题等等。]，把崩得在党内的地位问题提到议事日程首位，解散“南方工人”社，关于土地纲领的两次表决，以及第六，反对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工人事业》）的表决，即承认同盟为党在国外的唯一组织的表决。在这里同革命社会民主党坚持原则的彻底政策对抗的，是党成立以前的那种旧的小组习气，机会主义的组织或小集团的利益，以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狭隘理解。火星派少数派在许多场合，在许多极重要的（从组委会、“南方工人”社以及《工人事业》的观点看来极重要的）表决中，还是跟我们一道走的……当时问题还没有涉及到他们自己的小组习气，他们自己的不彻底性。这一类“划分”明显地表明，在关于实现我们的原则的许多问题上，中派是跟反火星派一道走的；他们接近反火星派比接近我们的程度大得多；他们在事实上倾向于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比倾向于社会民主党革命派的程度大得多。那些虽然叫作“火星派”但是以成为火星派为可耻的人暴露出自己的本性，而不可避免的斗争引起不少的愤怒，结果使那些思索力最差而感受力最强的人看不见这个斗争所暴露出来的各种原则的色彩的意义。但是现在，当斗争的热情已经稍微减退，许多激烈战斗情况的客观的摘要仍保留在记录上的时候，只有闭着眼睛的人才看不见马霍夫们和叶戈罗夫们同阿基莫夫们和李伯尔们的联合不是偶然的，而且也不可能是偶然的。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只好回避全面而确切地分析记录，或是企图事后用各种惋惜的口吻来改变自己在代表大会上的行为。似乎用惋惜的口吻就可以消除观点上的区别和政策上的区别！似乎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现在同阿基莫夫、布鲁凯尔和马尔丁诺夫结成联盟，就能迫使我们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恢复起来的党——忘记火星派在几乎整个代表大会期间同反火星派进行的斗争！

代表大会上第三类表决包括的是，图表五部分中的后三部分（即 C、D、E），其特征就是一小部分火星派分子脱离出去而转到反火星派方面，结果就使反火星派获得胜利（当他们还留在代表大会时）。为了十分确切地考察火星派少数派同反火星派结成的这一有名的联盟（在代表大会上一有人提起这个联盟就使马尔托夫歇斯底里地上书诉苦）的发展情况，我们把这类记名投票的所有三个基本类别都列举出来。C 类是关于语言平等问题的表决（这里列举的是对这个问题举行的三次记名投票中最完全的最后一次表决）。整个反火星派和整个中派都联成一气竭力反对我们，同时火星派方面又有多数派的一部分人和少数派的一部分人脱离出去。当时还看不出，哪些火星派分子同代表大会上的机会主义“右派”能结成牢固持久的联盟。其次，D 类是关于党章第 1 条的表决（这里举出的是两次表决中比较明确的，即没有一个人弃权的那次表决）。这时，这个联盟表现得更明显，结合得更牢固了［注：从各种迹象可以看出，属于这一类的还有关于党章的四次表决：在第 278 页载明，赞成佛敏的有 27 票，赞成我们的有 21 票；在第 279 页载明，赞成马尔托夫的有 26 票，赞成我们的有 24 票；在第 280 页载明，反对我的有 27 票，赞成我的有 22 票。在同一页载明，赞成马尔托夫的有 24 票，赞成我们的有 23 票。这是我在前面提到的关于中央机关成员增补问题的表决。没有载明记名投票（只举行过一次，但是记录已经遗失了）。崩得分子（全部或者一部分）显然是援救了马尔托夫。马尔托夫（在同盟中）对这类表决所作的错误的论断，已在上面纠正了。］：火星派少数派已经全体站在阿基莫夫和李伯尔方面，火星派多数派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人站在他们方面，这一小部分抵销了当时转到我们方面的三个“中派”分子和一个反火星派分子。只要看一看图表就可以知道，究竟哪些分子是偶然和暂时地时而转到这边，时而又转到那边；哪些分子又是一往直前地同阿基莫夫们结成牢固的联盟。根据最后一次表决（E 类是中央机关报、中央委员会以及党总委员会的选举），即表明最终地分为多数派和少数派的那次

表决，显然可以看出火星派少数派同整个“中派”以及反火星派残余完全打成一片了。这时八个反火星派分子当中留在代表大会上的已经只有布鲁凯尔同志一人了（当时阿基莫夫同志已经向布鲁凯尔说明了自己的错误，于是布鲁凯尔就在马尔托夫分子当中占了应有的地位）。七个极“右派”机会主义者退出大会，决定了选举的命运，使马尔托夫遭到了失败。[注：退出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七个机会主义者，包括五个崩得分子（崩得是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否决了联邦制原则以后退出党的）和两个“工人事业派分子”，即马尔丁诺夫同志和阿基莫夫同志。这两个人是在代表大会只承认火星派的同盟为党的国外组织以后，即在代表大会把工人事业派的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解散以后退出代表大会的。（这是作者为 1907 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

现在我们就根据各类表决的客观材料给代表大会作一个总结。

人们往往说我们代表大会上形成的多数派带有“偶然”性质。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中就是拿这个作为唯一的理由来安慰自己的。从图表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说多数派是偶然现象，在一个意义上，而且只是在一个意义上，即在断定七个极“右派”机会主义分子是偶然退出代表大会的意义上，才能这样说。他们退出大会有多大偶然性，我们成为多数派也就有多大偶然性（一点也不多）。只要看一看图表，就能比阅读任何长篇大论的文章更清楚地知道，这七个人会站在哪一边，一定会站在哪一边。[注：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在代表大会以后，阿基莫夫同志以及同阿基莫夫同志最亲近的沃罗涅日委员会，都是公然对“少数派”表示同情的。] 但是，试问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真正认为这七个人的退出是偶然的呢？对于这个问题，那些爱说多数派是“偶然”的人是不愿意理会的。这是一个使他们不愉快的问题，退出代表大会的是我们党的右派中的最激烈分子而不是左派中的最激烈分子，难道这是偶然的吗？退出代表大会的是机会主义者而不是彻底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难道这是偶然的吗？这种“偶然”退出，难道

不是同在整个代表大会期间进行的并且在我们图表中十分明显表现出来的反对机会主义派的斗争有某种联系吗？

只要提出这些使少数派不愉快的问题，就可以看出，硬说多数派是偶然这种话是要掩盖什么事实。这是一个毫无疑问和不容争辩的事实，即少数派是由我们党内最有机会主义倾向的党员组成的。少数派是由党内那些在理论上最不坚定、在原则上最不彻底的分子组成的。少数派正是由党内的右派组成的。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划分，是社会民主党划分为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划分为山岳派和吉伦特派[19]的直接的必然的继续，这种划分不是在昨天才出现，也不只是在俄国工人政党内出现，大概也不会在明天就消失。

这个事实，对于弄清分歧的原因及其发展的问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谁企图用否认或者模糊代表大会上发生的斗争以及这个斗争表现出来的各种原则色彩的方法来回避这个事实，谁就完全证明自己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是贫乏的。而要推翻这个事实，就必须证明：第一，我们党代表大会上各次表决和“划分”的一般情况并不象我描写的那样；第二，按照代表大会发生“划分”的一切问题的实质来说，那些在俄国博得火星派称号的最彻底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是错误的。[注：这是供马尔托夫同志参考的注。如果马尔托夫同志现在已经忘记火星派分子一语是表示一个方针的拥护者，而不是表示一个小组的成员，那么我们劝他看看代表大会的记录中托洛茨基同志就这个问题向阿基莫夫同志作的说明。代表大会上有三个小组（和党相对而言）——“劳动解放社”，《火星报》编辑部，《火星报》组织——是火星派的小组。这三个小组中有两个小组很明智，它们自行解散了；第三个小组则表现得党性不够，于是就被代表大会解散了。最广泛的一个火星派的小组，即《火星报》组织（它既包括编辑部又包括“劳动解放社”），在代表大会上共有 16 个人，其中只有 11 个人有表决权。那些只在方针上是火星派而不属于任何一个火星派“小组”的人，据我计算，在代表大会上有 27 个，一共拥有 33

票。这就是说，火星派中属于火星派小组的不到半数。] 先生们，请给我们证明这一点吧！

少数派是由党内最带机会主义性质、最不坚定和最不彻底的分子组成的，这个事实也就回答了那些不熟悉实际情况或者对问题考虑很差的人向多数派提出的那些怀疑和异议。有人对我们说，把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小错误看成分离的原因，这不是太琐碎了吗？是的，先生们，马尔托夫同志的错误本来是不大的（还在代表大会激烈进行斗争的时候，我就指出了这一点），可是这个小错误可能产生（而且已经产生了）许多恶果，因为那些犯了许多错误、在许多问题上表现了机会主义倾向、不坚持原则的代表把马尔托夫同志拉到自己方面去了。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两个同志表现得不坚定，本来是一件属于个人性质的不重要的事实，但是所有一切最不坚定的分子，所有一切根本不承认《火星报》方针并公然反对这个方针，或者口头上承认而实际上却往往跟反火星派一道走的人，组成了一个很大的少数，这就不是属于个人性质的，而是有全党意义的事实了，就不全然是一件不重要的事实了。

把《火星报》旧编辑部这样一个小组中充满顽固的小组习气和革命庸俗观念的事实看成分离的原因，这是不是可笑呢？不，这没有什么可笑的，因为起来维护这种独特的小组习气的是我们党内所有在整个代表大会期间都为维护任何小组习气而斗争的分子，所有根本不能超出革命庸俗观念的分子，所有借口庸俗观念和小组习气的祸害具有“历史”性而为之辩解和加以维护的分子。狭隘的小组利益如果只在《火星报》编辑部一个小组中比党性占上风，那也许还可以认为是偶然现象。但是竭力维护这种小组习气的是同样（也许是更加）重视有名的沃罗涅日委员会[20]的“历史继承性”以及所谓彼得堡“工人组织”[21]的“历史继承性”的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之类的同志，象哀悼旧编辑部“被谋害”那样痛心地（也许更加痛心地）哀悼《工人事业》“被谋害”的叶戈罗夫之类的同志，以及马霍夫

之类的同志等等，等等，这就不是偶然的了。常言说得好：你告诉我，你同谁相识，我就能告诉你，你是什么人。你告诉我，谁是你的政治同盟者，谁投票赞成你，我就能告诉你，你的政治面貌是怎样的。

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小错误，如果它还没有成为他们同我们党内整个机会主义派结成牢固的联盟的出发点，如果它还没有由于这个联盟而使机会主义死灰复燃，使所有那些受到《火星报》反对而现在以拿彻底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出气为最大快乐的人进行报复，那么这仍然是而且可能始终是一个小错误，但是代表大会以后发生的事件，恰恰造成了这样的情况：在新《火星报》上我们确实看到机会主义在死灰复燃，阿基莫夫们和布鲁凯尔们在进行报复（见沃罗涅日委员会的传单［注：见本卷第 408—410 页。——编者注］），马尔丁诺夫们兴高采烈，因为他们终于（终于啊！）能够把可恨的《火星报》这可恨的“敌人”踢上几脚，以报复过去受的所有一切委屈了。这特别明显地告诉我们，多么需要“恢复《火星报》旧编辑部”（摘自斯塔罗韦尔同志 1903 年 11 月 3 日的最后通牒），以保持《火星报》的“继承性”……

代表大会（以及党）划分为左派和右派，划分为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事实本身，不仅没有什么可怕，没有什么危险，而且甚至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恰恰相反，俄国（而且不仅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最近十年的历史，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导致这样的划分。至于形成这种划分的根据是右派所犯的许多很小的错误，很次要的（比较来说）意见分歧，这个情况（这个使从表面看问题的人和头脑庸俗的人感到惊奇的情况）却表明我们全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从前我们往往因为大问题而发生分离，这些大问题有时甚至可以造成分裂；现在我们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已经趋于一致了，现在我们只有色彩上的区别，为了这些色彩可以而且应当进行争论，但是，因此而发生分离，就未免荒谬和幼稚了（正如普列汉诺夫同志在《不该这么办》这篇很有意义的文章中完全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这篇文

章我们下面还要谈）。现在，当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以后的无政府主义行为几乎使党陷于分裂时，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聪明人，他们说：为了组委会事件、“南方工人”社或《工人事业》的解散、党章第 1 条、旧编辑部的解散等等这一类小事情，究竟是不是值得在代表大会上进行斗争呢？谁这样说［注：说到这里，我不能不想起我在代表大会上同“中派”某一个代表的谈话。他向我抱怨说：“我们的代表大会充满了多么沉重的气氛啊！这是残酷的斗争，这是鼓动互相反对，这是激烈的论战，这是非同志式的态度啊！……”我回答他说：“我们的代表大会太好了！公开地、自由地进行斗争。各种意见都得到发表。各种色彩都暴露出来。各种集团都显现出来。手举过了，决议通过了。一个阶段渡过了。前进吧！——这一切太好了。这才是生活。这并不是知识分子那种无休无止的讨厌的无谓口角，他们停止这种无谓口角，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解决了问题，而只是因为他们说得疲倦了……”

这位“中派”同志用大惑不解的目光看着我，耸了耸肩膀。我们没有共同的语言。］，谁就是把小组观点带到党的事业中，因为党内各种色彩之间的斗争，当它还没有导致无政府状态和造成分裂的时候，当它还是在全体同志和全体党员一致承认的范围内进行的时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而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同党的右派，同阿基莫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同马尔丁诺夫和马尔托夫进行的斗争，是绝对没有超出这个范围的。只要列举两件事就可以确凿地证明这一点：（1）当马尔丁诺夫同志和阿基莫夫同志要退出代表大会时，我们大家都决心尽力排除所谓“侮辱”的想法，我们大家通过了（以 32 票通过）托洛茨基提出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劝这两位同志对所作的解释表示满意而收回他们的声明。（2）当后来进行中央机关的选举时，我们允许代表大会的少数派（或机会主义派）在两个中央机关中占有少数席位：让马尔托夫加入中央机关报，让波波夫加入中央委员会。既然我们还在代表大会以前就决定选举两个三人小组，从党的观点来看，我们也

就不能有别的做法了。如果说代表大会上暴露出来的色彩上的区别不大，那么我们从这些色彩斗争中作出的实际结论也是不大的，因为这个结论只不过是说两个三人小组中三分之二的席位应当给党代表大会的多数派。

只是由于党代表大会上的少数派不同意成为中央机关中的少数，那些遭到失败的知识分子才始则发出“颓丧的啜泣”，随后又从事无政府主义的空谈和无政府主义的行动。

在作结束时，我们要再一次从中央机关组成问题的角度看一看图表。很自然，除了色彩问题以外，代表们在进行选举时还要考虑某某人是不是适当、工作能力强不强等问题。现在少数派总想把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这两个问题各不相同，这是不言而喻的，从一件简单的事实也可以看出这一点：选举中央机关报最初的三人小组的计划，在代表大会以前，即当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同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的联盟还是谁都料想不到的时候就已经拟定好了。对于不同的问题，应当用不同的方法来回答。对于色彩问题，应当在代表大会的记录中，在所有一切问题的公开讨论和表决情况中去找答案。关于某人是不是适当的问题，大家在代表大会上一致决定用秘密投票来解决。为什么整个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这样的决定呢？——这是一个十分浅显、无须多谈的问题。但是，少数派（当他们在选举中遭到失败以后）甚至连浅显的道理也开始忘记了。我们听到无数激昂慷慨、兴奋欲狂的拥护旧编辑部的话，但是关于代表大会上那些同拥护六人小组和拥护三人小组的斗争有关的不同色彩，我们却丝毫也没有听到什么。我们从各个角落听到所谓选入中央委员会的人没有工作能力、不适当、心怀叵测等等流言蜚语，但是关于代表大会上那些为取得中央委员会中的优势而斗争的不同色彩，我们却丝毫也没有听到什么。我觉得，在代表大会外面散布关于个人品质和行动的流言蜚语，是不体面的和卑鄙的（因为这些行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只能向党的最高机关宣布的组织秘密）。用这种流言蜚语在代表大会以外进行斗争，我认为，这就是

诽谤行为。对于这些流言蜚语，我能给予公众的唯一回答就是指出代表大会上的斗争情况。你们说，中央委员会是由不大的多数派选举出来的。这是事实。但是这个不大的多数派是由一切不是口头上而是事实上最彻底地为实现火星派计划而斗争的人组成的。因此，这个多数派道义上的威信比它形式上的威信要高得多，——对于那些把《火星报》方针的继承性看得比《火星报》某个小组的继承性更重要的人说来要高得多。谁更有资格判断某人是不是适于实行《火星报》的政策呢？是那些在代表大会上贯彻这种政策的人呢，还是那些往往反对这种政策而维护一切落后性、一切无用的东西以及一切小组习气的人？

注释：

[19]山岳派和吉伦特派是 18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两个政治派别。山岳派是法国国民公会中的左翼民主主义集团，以其席位在会场的最高处而得名。该派主张铲除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是当时的革命阶级——资产阶级的最坚决的代表，其领袖是马·罗伯斯比尔、让·保·马拉、若·雅·丹东、路·安·圣茹斯特等。吉伦特派代表共和派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主要是外省资产阶级的利益。它的许多领导人是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中的吉伦特省代表，所以后世历史学家给它起了这个名称。吉伦特派的领袖是雅·皮·布里索、皮·维·韦尼奥、罗兰夫妇、让·安·孔多塞等。吉伦特派动摇于革命和反革命之间，走同王党勾结的道路，最终变成了反革命力量。列宁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为山岳派，即无产阶级的雅各宾派，而把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称为社会民主党的吉伦特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后，列宁经常强调指出，孟什维克是工人运动中的吉伦特派。——341。

[20]沃罗涅日委员会是在以弗·彼·阿基莫夫和莉·彼·马赫诺韦茨为首的经济派影响下的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该委员会对在 1902 年 11 月普斯科夫会议上成立的组织委员会持敌对立场，不承认它有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权力。该

委员会散发诽谤性信件，辱骂组织委员会，并把在建立组织委员会中起了主要作用的《火星报》称为“社会民主党的鹰犬”，指责它实行分裂政策。由于这些原因，组织委员会认为不宜邀请该委员会参加代表大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批准了组织委员会的决定，指出：“鉴于沃罗涅日委员会不承认组织委员会以及召开代表大会的章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认为组织委员会无疑有权不邀请该委员会参加代表大会。”关于这个委员会，参看本卷第 407—410 页。——343。

[21]彼得堡“工人组织”是经济派的组织，于 1900 年夏建立，1900 年秋同被承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合并。火星派在彼得堡党组织中取得胜利后，受经济派影响的一部分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于 1902 年秋从彼得堡委员会分离出去，重新建立了独立的“工人组织”。“工人组织”委员会对列宁的《火星报》及其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计划持反对态度，鼓吹所谓发展工人运动和斗争成功的最重要条件是工人阶级的自主精神。1904 年初，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工人组织”停止活动，加入了全党的组织。——343。

（十五）代表大会以后。两种斗争方法

以上我们已经把代表大会上的讨论情况和表决情况分析完毕，这种分析对于代表大会以后发生的一切情况，已经作了溯本求源（in nuce）的说明，所以对于我们党内危机的以后各个阶段也就可以谈得简短一些了。

马尔托夫和波波夫拒绝选举，立刻就使党内各种色彩之间的党的斗争掺进一种无谓争吵的气氛。格列博夫同志不相信落选的编辑真想转到阿基莫夫和马尔丁诺夫方面去，认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激动情绪造成的，所以他在代表大会闭幕以后第二天就向我和普列汉诺夫提议和平了结，把所有四个人都“增补”进去，条件是保证编辑部有代表参加总委员会（即两个代表中一定有一个代表属于党的多数

派）。这个条件在普列汉诺夫和我看来是合理的，因为如果他们同意这个条件，就等于说他们默认自己在代表大会上犯了错误，就等于说他们愿意和平而不愿意战争，愿意同我和普列汉诺夫接近，而不去同阿基莫夫和马尔丁诺夫接近，不去同叶戈罗夫和马霍夫接近。于是，“增补”方面的让步就带有个人的性质，而为平息激动情绪和恢复和平作出个人性质的让步，是不应当拒绝的。因此我和普列汉诺夫就表示同意了。但是编辑部的多数拒绝这个条件。格列博夫离开了。于是我们就等着看事情究竟如何发展：是马尔托夫坚持他在代表大会上（在反对中派代表波波夫同志时）所采取的忠诚立场，还是他所追随的那些不坚定的、倾向分裂的分子占上风。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马尔托夫同志想把自己在代表大会上的“联盟”当作个别的政治事实（正象倍倍尔在 1895 年同福尔马尔的联盟是个别事实一样——如果可以以小比大的话），或者是他想把这个联盟巩固起来，竭力证明我和普列汉诺夫在代表大会上犯了错误，因而使他自己成为我们党内机会主义派的真正首领。换句话说就是：是无谓争吵还是进行党的政治斗争？我们三个人中间（代表大会闭幕以后第二天，中央机关的成员只有我们三个人在），格列博夫倾向于前一种，并且尽一切力量给吵架的儿童调解。倾向于后一种的是普列汉诺夫同志，他的态度称得上是十分坚决。我这一次扮演了“中派”或“泥潭派”的角色，力图采取说服方法。现在如果企图把口头上的说服重述一遍，那就等于干一件糊涂透顶的事情，所以我也就不去重蹈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两位同志的覆辙。但是我认为有必要从我给一位火星派“少数派”分子写的一份书面劝告中引证几段话：

“马尔托夫拒绝参加编辑部，他和党内的其他一些著作家拒绝撰稿，许多人拒绝为中央委员会工作，宣传抵制或消极反抗的思想，——所有这一切都必然会，甚至违反马尔托夫和他的朋友们的本意，造成党的分裂。即使马尔托夫会坚持忠

诚的立场（他在代表大会上十分坚决地采取了这一立场），其他人也不会坚持，——而我所指出的结局将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我常常问自己：究竟为什么我们要各奔东西呢？……我反复回想代表大会上的所有事件和印象，感到自己的行动常常过于激动，‘狂热’。如果说应当把当时的气氛、反应、责备和斗争等等自然引起的那些东西叫作过错，那我愿意向任何人认错。但是，现在当我冷静地观察已经达到的结果，观察通过狂热的斗争所实现的东西时，我根本看不出它们对党有任何危害的地方，对少数派有一丝一毫委屈或侮辱的地方。

当然，处于少数派的地位本身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委屈，但是我坚决反对认为我们‘诋毁’了某某人，认为我们想侮辱或者贬低某某人这种看法。绝对没有这样的事。决不容许把政治上的分歧变成给对方加上所谓居心不良、行为卑鄙、要弄阴谋以及在日益明显的分裂气氛中越来越流行的各种美妙的罪名，用这些来说明发生的事情。决不容许这样做，因为这至少，说到底，是毫无道理的。

正象我同马尔托夫发生过几十次分歧一样，我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同他发生了分歧。既然我在党章第 1 条问题上遭到失败，就不能不极力设法利用我（以及代表大会）所剩下的机会来取得补偿。一方面，我不能不设法争取有一个完全是火星派的中央委员会，另一方面，我不能不设法争取有一个三人编辑小组……我认为只有这个三人小组才能成为负责的机关而不是一个充满小圈子习气的、散漫的小团体，才能成为唯一真正的中央机关，其中每个人可以随时从党的角度提出并坚持自己的观点，丝毫不掺杂其他成分，不考虑任何个人意气，任何委屈、退出等等。

在代表大会的种种事件以后，这个三人小组无疑把在一个方面反对马尔托夫的政治和组织路线合法化了。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就要破裂吗？因此就要破坏党吗？？在游行示威问题上，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不是反对过我吗？在党纲问

题上，我和马尔托夫不是反对过普列汉诺夫吗？任何三人小组中不总是有一方反对另一方的情况吗？如果火星派多数派无论在《火星报》组织内还是在代表大会上都认为马尔托夫的路线这一特别色彩在组织方面和政治方面是错误的，那么，企图用什么‘暗算’和‘挑唆’等等来解释这一点，岂不是愚蠢吗？用‘恶棍’来辱骂这个多数派而回避这一事实，岂不是愚蠢吗？

我再说一遍：我也同代表大会上的火星派多数派一样，深信马尔托夫采取了不正确的路线，认为必须予以纠正。由于这种纠正而觉得委屈，从而作出结论说受了侮辱等等，那是没有道理的。我们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在任何问题上都没有‘诋毁’任何人，都没有解除任何人的工作。由于没有进入中央机关而搞分裂，这在我看来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愚蠢行为。”[注：这封信是早在 9 月间（公历）写的（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4 卷《致亚·尼·波特列索夫》（1903 年 9 月 13 日）。——编者注）。这里删掉了我认为与问题无关的一些话。如果收信人认为删掉的话恰恰是重要的，那他可以很容易地把删掉的地方补上去。顺便说一下。我要趁此机会讲清楚，我允许我所有的论敌公布我所有的私人信件，只要他们认为这样做对事业有好处。]

我认为现在必须把我这个书面声明重复一遍，因为这个声明确切地表明，多数派极力想一下子划清一条界限，分清什么是由于抨击的激烈和“狂热”等等可能产生的（在激烈斗争中也是必然产生的）个人委屈和个人意气用事，什么是一定的政治错误、政治路线（同右派的联盟）。

从这个声明中可以看出，少数派的消极反抗在代表大会闭幕以后就立即开始了，因此我们马上警告说：这是一个使党走向分裂的步骤；这是根本同在代表大会上表示忠诚的声明相矛盾的；这只是由于没有进入中央机关（就是说由于落选）而要搞分裂，因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想过要解除任何一个党员的工作；我们之间的政治分歧（这种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究竟是马尔托夫在代表大会上

的路线错误，还是我们在代表大会上的路线错误这个问题还没有弄清楚，还没有解决）开始愈来愈变成夹杂着谩骂、猜疑等等的无谓争吵了。

但是警告并没有起作用。少数派的行为表明，最不坚定和最不重视党的分子在他们中间占了上风。于是我和普列汉诺夫只好收回我们对于格列博夫的建议所表示的同意。既然少数派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不仅在原则方面而且在起码的党员忠诚态度方面都是政治上不坚定的，那么所谓“继承性”的话又能有什么意义呢？普列汉诺夫比谁都更巧妙地嘲笑了那种十分荒唐的要求，即要求把公开说自己有愈来愈多的分歧意见的人“增补”到党的编辑部中去，让这些人占多数！在新的分歧还没有在刊物上向全党讲清楚以前，中央机关的党的多数派竟会自动把自己变成少数，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事？让人们先把分歧谈出来吧，让党去讨论这些分歧的深度和意义吧，让党自己纠正自己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犯的错误吧，如果它确实犯了什么错误的话！为了一些尚未说明的分歧就提出这种要求，这本身就表明提出要求的人是十分不坚定的，表明他们是用无谓争吵来完全压倒政治分歧，表明他们既根本不尊重整个党，又根本不尊重本人的信念。世界上还没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这样一种有原则性信念的人，他们在自己打算使之改变信念的机关里取得（用非正式手续）多数以前，竟然拒绝进行改变信念的说服工作。

最后，10 月 4 日，普列汉诺夫同志宣称他要作最后的尝试来结束这种荒唐现象。召集了旧编辑部所有六个成员在一起开会，有一个新中央委员参加［注：除此以外，这个中央委员[22]还专门同少数派举行过几次个别谈话和集体谈话，驳斥过荒诞的谰言，并规劝他们不要忘记党员的义务。］。普列汉诺夫同志费了足足三个钟头证明，要求“增补”“少数派”四个人而“多数派”只两个人的做法是没有道理的。他提议增补两个人，以便一方面排除怕我们要“驱策”、压制、围困、处死、埋葬什么人的种种顾虑，另一方面则保障党的“多数派”的权利和阵地。增补两个人的提议也被否决了。

10 月 6 日，我和普列汉诺夫给《火星报》全体原来的编辑以及撰稿人托洛茨基同志写了一封正式的信件，内容如下：

“尊敬的同志们：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对你们拒绝参加《火星报》和《曙光》的工作不得不正式表示遗憾。虽然我们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刚闭幕就邀请你们撰稿，之后又多次敦促，可是我们始终没有收到过你们任何一篇稿件。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声明，它认为你们拒绝撰稿不是由编辑部方面引起的。任何一种个人意气用事，当然都不应该成为你们参加党中央机关报工作的障碍。如果你们拒绝参加工作是由于你们和我们之间在观点上有某种分歧，那我们认为把这种分歧详细地说清楚对党是非常有益的。此外，我们还认为最好是尽快地在我们编辑的刊物上向全党讲清楚这些分歧的性质和深度。”［注：在给马尔托夫同志的信中，还补充了一段关于一本小册子问题的话以及如下的话：“最后，为了事业的利益，我们再一次通知您，我们现在仍然准备增补您为中央机关报的成员，以便您有充分可能在党的最高机关正式申述和坚持自己的一切观点。”（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4 卷《致尤·奥·马尔托夫》（1903 年 10 月 6 日）。——编者注）］

读者可以看出，我们当时还完全不了解，“少数派”的行为主要是由于他们个人意气用事，还是由于他们希望给机关报（以及党）提供新的方针，这新方针究竟是什么样的，内容究竟如何。我想，直到现在，即使指定 70 个学识渊博的注释专家根据无论多少文件和无论多少证据来阐明这个问题，他们也是永远弄不清这笔糊涂账的。无谓争吵的结子恐怕是永远也解不开的。要么把它斩断，要么把它撇开。［注：普列汉诺夫同志大概会在这里补充说：要么就满足那些制造无谓争吵的人的一切奢望。下面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这样做不行。］

接到我们 10 月 6 日的信以后，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斯塔罗韦尔、托洛茨基以及柯尔佐夫给我们写了一个两三行字的答复，说自从《火星报》转入新

编辑部手里，他们就不参加《火星报》的任何工作了。马尔托夫同志比较爱说话，他赏赐了我们这样一封回信：

“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尊敬的同志们：为了回答你们 10 月 6 日的来信，我特声明如下：你们曾向我们建议，让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斯塔罗韦尔和我参加编辑部，条件是我们要保证把列宁同志作为自己的‘代表’选入总委员会。后来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们收回这个建议的，对于这个问题，你们在 10 月 4 日由一名中央委员参加的会议上拒绝给予答复，因此我认为，在这次会议以后，我们之间已经用不着再来讨论在一个机关报内共同工作的问题了。既然你们在这次会议上一再拒绝说明你们自己当着见证人发表的声明，那我也认为不需要在给你们的信里说明在目前情况下我拒绝参加《火星报》工作的理由。如果必要的话，我将向全党详细说出这方面的意见；党已经可以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中看出，为什么我拒绝了你们现在又提出来的要我在编辑部和总委员会里占一个席位的建议……［注：接下去是马尔托夫对他那本当时已经再版的小册子问题的回答，这里从略了。］

尔·马尔托夫”

这封信连同上述几个文件，对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戒严状态》中竭力（用感叹号和省略号）回避的关于抵制、瓦解组织、无政府状态、制造分裂的问题，即关于用正当的斗争手段和不正当的斗争手段的问题，作了不容反驳的说明。

人们向马尔托夫等同志提议，要他们说明意见分歧，请求他们直爽地说出问题的底细以及他们的意图，劝他们不要再耍脾气而要平心静气地分析他们在党章第 1 条上犯的错误（这同他们向右转的错误有密切联系），——但是马尔托夫同志及其伙伴们却拒绝交谈，并叫喊说：我被围困了，我受驱策了！人们对于这些“吓人的字眼”的嘲笑，也未能使这些可笑的叫喊的热度有所降低。

怎么能围困一个拒绝共同工作的人呢？——我们这样问马尔托夫同志。既然少数派拒绝当少数派，那怎么能委屈、“驱策”和压迫他们呢？？要知道，处于少数地位，总是会也必然会对处于少数地位的人有某些不利。这种不利就是，要么必须加入在某些问题上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委员会，要么必须站在委员会之外攻击委员会，因而也就要受到从坚固的炮台中射出来的炮火的攻击。

马尔托夫同志叫喊“戒严状态”，是不是想说人们用不公平不正当的手段对他们这些处于少数地位的人进行斗争或者说进行统治呢？只有这样的论点（在马尔托夫心目中）也许还包含一点点合理的影子，因为——我再说一遍——处于少数地位是一定和必然会有某些不利的。但可笑的是，既然马尔托夫同志还拒绝交谈，无论怎样也不可能对他进行斗争！既然少数派还拒绝当少数派，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统治！

在我和普列汉诺夫两人在编辑部工作期间，马尔托夫同志找不出任何一件事实可以证明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有越权或者滥用权力的地方。少数派的实际工作者也找不出任何一件事实可以证明中央委员会有越权或者滥用权力的地方。不管马尔托夫同志现在在他的《戒严状态》一文里如何兜圈子，一个完全不容反驳的事实是：在关于戒严状态的叫喊声中，除了“颓丧的啜泣”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

马尔托夫同志及其伙伴们反对代表大会所任命的编辑部是根本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的，他们自己所说的“我们不是农奴！”（《戒严状态》第 34 页）一语就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这里非常明显地暴露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他们把自己看成超乎群众组织和群众纪律之上的“上等人物”。用“我们不是农奴”作为说明拒绝在党内工作的理由，就等于彻底暴露了自己，就等于承认自己根本没有理由，根本说不出道理，根本没有什么应该表示不满的正当原因。我和普列汉诺夫两个人声明，我们认为他们拒绝工作完全不是由我们这方面引起的，我们请他

们说出分歧意见，可是他们回答说："我们不是农奴"（还应加上一句：我们在增补问题上还没有讲好价钱）。

对于那种在争论党章第1条时就已经暴露出机会主义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空谈倾向的知识分子个人主义来说，任何无产阶级的组织和纪律都好象是农奴制。广大读者很快就会知道，新的党代表大会，在这些"党员"和党的"负责人"看来，也是"上等人物"觉得可怕和忍受不了的农奴制机关……这个"机关"对于那些乐意利用党的招牌但是又觉得这个招牌不符合党的利益和党的意志的人看来，确实是可怕的。

我在给新《火星报》编辑部的信里列举的并由马尔托夫同志在《戒严状态》里刊印出来的那些委员会的决议，在事实上证明少数派的行为完全违反代表大会的决议，打乱正常的实际工作。由机会主义者和仇恨《火星报》的人组成的少数派竭力分裂党，损害并打乱工作，他们力图为自己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这件事进行报复，感到用诚实的和正当的手段（在刊物上或者在代表大会上说明问题）永远不能驳倒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对他们的机会主义和知识分子动摇性的指责。他们意识到自己没有力量说服党，就采用瓦解党和阻挠任何工作的手段。大家责备他们（由于他们在代表大会上的错误）把我们的罐子弄裂了一条缝，而他们对这种责备的回答是竭力设法把已经有裂缝的罐子完全打破。

概念混淆到了极点，甚至把抵制和拒绝工作都说成是斗争的"诚实的［注：矿区委员会的决议（《戒严状态》第 38 页）。］手段"。马尔托夫同志现在围绕这个棘手的问题竭力兜圈子。马尔托夫同志竟这么"有原则性"，当少数派实行抵制时……他支持抵制，当抵制威胁到偶而处于多数地位的马尔托夫本人时，他就斥责抵制！

我想，这究竟是无谓争吵还是关于社会民主工党内斗争的诚实的手段的"原则性意见分歧"的问题，可以不必分析了。

在两次（10 月 4 日和 6 日）要求那些掀起“增补”问题纠纷的同志说明理由的尝试都失败以后，中央机关只好等着看一看那些口头上答应用正当手段进行斗争的同志实际上的表现。10 月 10 日，中央委员会给同盟发了一个通告（见同盟记录第 3—5 页），宣布它正在拟定章程并邀请同盟成员来协助。同盟领导机关当时否决了（以 2 票对 1 票，见同盟记录第 20 页）召开同盟代表大会的建议。少数派对这个通告所作的答复立刻表明，所谓正当手段和承认代表大会的决议只不过是空话罢了；少数派事实上是下决心绝对不服从党的中央机关，他们对中央机关提出的一起工作的号召所作的回答，就是以十足的诡辩和无政府主义空谈来敷衍塞责。我和普列汉诺夫以及其他多数派对同盟领导机关成员捷依奇的有名的公开信（第 10 页）作出了回答，坚决表示“抗议同盟的负责人用粗暴地违反党纪的手段阻碍党机关的组织活动和号召其他同志也违反纪律和章程的行为。所谓‘我认为自己没有权利应中央委员会的邀请参加这项工作’，所谓‘同志们！我们无论如何不应当让它〈中央委员会〉给同盟制定新章程’等等一类的话，是一种鼓动手法，它只能引起每一个稍微懂得什么是党、什么是组织、什么是党纪的人的愤懑。这种手法尤其令人气愤，是因为他们用这种手法来对付刚刚成立的党机关，显然是想以此破坏党员同志对这个党机关的信任，而且采用这种手法时是打着同盟领导机关成员的旗号，背着中央委员会”（第 17 页）。

在这种情况下，同盟代表大会当然只能是一场闹剧。

马尔托夫同志从一开始就继续使用他在代表大会上使用过的“笼络人心”的策略，这一次是针对着普列汉诺夫同志，用的方法是歪曲私人谈话的内容。普列汉诺夫同志提出抗议，因而马尔托夫同志只得收回（同盟记录第 39 页和第 134 页）他那种轻率的或者说由于气愤而提出的非难。

接下去是作报告。我是代表同盟参加党代表大会的。读者只要把我的报告记要（第 43 页及以下各页）［注：见本卷第 38—48 页。——编者注］拿来参照一下，就知道我当时已经大致分析了代表大会上的历次表决情况，而本书内容就是对这种分析的进一步发挥。报告的全部重心就是要证明马尔托夫及其伙伴由于犯了错误而成为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派。虽然这个报告是当着大多数最激烈的论敌的面作的，他们也不能从这个报告中找到有任何一个地方不符合党内斗争和辩论的正当方法。

相反，马尔托夫的报告，除了对我的叙述作了微不足道的局部的“修正”以外（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这些修正是不正确的），却是……一种神经失常的产物。

所以难怪多数派拒绝在这样的气氛下进行斗争。普列汉诺夫同志对“吵闹”（第 68 页）——这确实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吵闹”！——提出抗议，并退出了代表大会，不愿意宣读他已经准备好了的对于该报告作的实质性的反驳。其余的多数派分子，也差不多都对马尔托夫同志那种“不体面行为”提出了书面抗议（同盟记录第 75 页），接着也退出了代表大会。

少数派的斗争方法大家已经都看得十分明白了。我们责备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上犯了政治错误，责备他们转向机会主义，同崩得分子、阿基莫夫们、布鲁凯尔们、叶戈罗夫们和马霍夫们结成联盟。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上遭到了失败，现在“制定了”两种斗争方法，其中包括多种多样的袭击、攻击和进攻等等。

第一种方法就是打乱全部党的工作，败坏事业，力图阻挠一切而“不说明理由”。

第二种方法就是“吵闹”等等。［注：我已经指出，把国外生活和流放生活的气氛中经常见到的无谓争吵的这些最低劣的表现形式，都归结为动机卑劣，那是愚蠢的。这是在一定的不正常的生活条件下，在一定的神经失常等情况下象传染

病一样流行的一种毛病。我所以不得不在这里把这种斗争方式的实质重提一下，是因为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戒严状态》里完全重复了这种斗争方式。]

这个“第二种斗争方法”在同盟的有名的“原则”决议中也有所表现，“多数派”当然没有参加对于这些决议的讨论。让我们仔细看一看马尔托夫同志现在在他的《戒严状态》里转载的这些决议案吧。

第一个决议案由托洛茨基、佛敏、捷依奇等同志署名，其中有两个论点，是针对党代表大会“多数派”的：(1)“同盟深表遗憾的是，由于代表大会上出现了实际上同《火星报》原先的政策背道而驰的倾向，所以在制定党章时对于建立充分的保障来维护中央委员会的独立性和威信没有予以应有的注意。”(同盟记录第83页)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原则”论点完全是阿基莫夫式的空话，连波波夫同志也在党代表大会上揭露了这些话的机会主义性质！其实，那些硬说“多数派”不想维护中央委员会的独立性和威信的断语，始终不过是诽谤罢了。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当我和普列汉诺夫在编辑部工作的时候，在总委员会内并没有造成中央机关报对于中央委员会的优势；而当马尔托夫分子加入编辑部的时候，在总委员会内才造成了中央机关报对于中央委员会的优势！当我们两个人在编辑部工作的时候，在总委员会内是国内实际工作者多于国外著作家，而当马尔托夫分子加入编辑部的时候，情况却相反了。当我们两个人在编辑部工作的时候，总委员会一次也没有企图干涉任何一个实际工作问题；自从按一致意见实行增补的时候起，就开始进行这种干涉了。这一点读者很快就会详细知道的。

该决议案的另一个论点说：“代表大会在成立党的正式中央机关时，忽略了同事实上已经形成的中央机关的继承关系……”

这个论点可以完全归结为中央机关人选问题。“少数派”宁愿回避旧中央机关在代表大会上已经证明自己不中用并且犯了许多错误的事实。但是最可笑的是

谈论组委会方面的“继承性”。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代表大会上任何人也没有提到批准组委会的全体委员。马尔托夫在代表大会上甚至气得发狂地叫嚷，说包括三名组委会委员在内的名单使他感到可耻。“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一个包括一名组委会委员在内的最后名单（波波夫、格列博夫或佛敏和托洛茨基），而“多数派”提出了一个包括两名组委会委员在内的三人名单（特拉温斯基、瓦西里耶夫和格列博夫）。试问，难道这样谈论“继承性”可以叫作“原则性的意见分歧”吗？

我们现在来谈另一个决议案，即由旧编辑部以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为首的四个成员署名的决议案。这里我们看到对“多数派”提出的、后来又在报刊上一再提起的全部主要指责。这些指责最好就按编辑小组成员的说法来加以考察。这些指责反对的是“专制的官僚主义的治党方式”，即“官僚主义的集中制”，这种集中制跟“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集中制”的区别在于它“放在首位的不是内部的统一，而是用纯粹机械手段，用一贯压制个人首创性和社会主动性的办法实现和保持的外表的、形式上的一致”；所以，这种集中制“根本不能把社会的各个组成成分有机地联合起来”。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及其伙伴在这里说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呢，只有上帝才知道。大概，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自己也不大明白，他是在写地方自治派申请实行符合愿望的行政改革的呈文呢，还是在那里发泄“少数派”的怨气。心怀不满的“编辑们”所叫喊的党内“专制”究竟是指什么呢？所谓专制，就是一个人拥有至高无上的、不受监督的、不对其他人负责的、不经过选举的权力。从“少数派”的出版物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们认为这个专制君主就是我，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当该决议案起草和通过的时候，我是同普列汉诺夫一起在中央机关报工作的。因此，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及其伙伴们就是认为普列汉诺夫和全体中央委员都不是按照他们自己对于事业有利的观点，而是按照专制君主列宁的意志来“统治党”

的。提出这种所谓专制统治的责难，必然地、不可避免地要认为其余一切参与这种统治的人，即除了专制君主一人以外，都不过是别人的工具，唯命是听的小卒，执行别人意志的差役罢了。我们要再问一下：难道这就是最值得尊敬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所谓“原则性的意见分歧”吗？

其次，我们的“党员”，这些刚刚从党代表大会回来的、曾郑重地承认代表大会决议的合法性的“党员”，在这里所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外表的、形式上的一致呢？难道他们真的认为在一个根据比较牢固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党内，除了党代表大会以外，还有什么另外可以达到一致的方法吗？如果真的认为是这样，那为什么他们没有勇气直截了当地说他们已经不承认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合法的代表大会了呢？如果他们有什么能使一个根据假想组织起来的假想的党内部达到一致的新意见和新方法，为什么他们不大胆地向我们谈一谈呢？

再其次，我们的知识分子个人主义者在这里说的是什么样的“压制个人首创性”呢？党中央机关报刚刚在此以前还规劝他们说出自己的分歧意见，但是他们非但不这样做，反而对“增补”讲起价钱来了。我和普列汉诺夫或者中央委员会从根本上来说怎么可能压制拒绝同我们进行任何共同“活动”的人的首创性和主动性呢！怎么可能在某某人拒绝参加的机关或者团体里“压制”他呢？落选的编辑既然拒绝“做被统治者”，那么他们又怎能抱怨什么“统治制度”呢？我们根本不可能在领导我们这些同志方面犯什么错误，原因很简单，这些同志根本就不曾在我们领导下工作。

看来很明显，叫喊所谓官僚主义，不过是对中央机关人选不满的一种掩饰，是掩盖他们违背自己在代表大会上郑重说过的诺言的一块遮羞布。你是官僚，因为代表大会委派你不是按照我的意志，而是违反我的意志；你是形式主义者，因为你所依据的是代表大会的形式上的决议，而不是我的同意；你做事粗暴而又机械，因为你只凭借党代表大会的“机械”多数，而不考虑到我想得到增补席位的

愿望；你是专制君主，因为你不愿意把权力交给旧时的亲热伙伴。这些伙伴对代表大会直接斥责他们的小组习气愈是感到不愉快，就愈是竭力坚持他们的小组习气的“继承性”。

除了上面说的以外，这些关于官僚主义的叫喊中没有而且也不会有什么实在的内容。[注：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普列汉诺夫同志在实行了大有好处的增补以后，就不再被少数派看作“官僚主义集中制”的拥护者了。] 这样的斗争方式不过是再一次证明少数派的知识分子不坚定性罢了。少数派想使党相信中央机关的选举不恰当。用什么方法使党相信呢？是用批评我和普列汉诺夫所编辑的《火星报》的方法吗？不，他们没有力量这么做。他们想采用一部分党员拒绝在他们所仇视的中央机关领导下工作的手段。但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党的任何一个中央机关，都无法证明自己能够对那些不愿意服从领导的人进行领导。拒绝服从中央机关的领导，就等于拒绝留在党内，就等于破坏党，——这种办法不是说服，而是破坏。而用破坏来代替说服，这正表明自己没有坚定的原则性，对自己的思想缺乏信心。

人们在大谈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一词可以在俄语中译成地位观念。官僚主义就是使事业的利益服从于向上爬的需要，就是一味追求地位而忽视工作，为增补进行争吵而不进行思想斗争。这种官僚主义确实根本不是党所希望的，并且是对党有害的，因此我可以完全泰然地请读者自己来判断，现在我们党内斗争的双方究竟是哪一方犯了这种官僚主义毛病……人们在说什么粗暴的、机械的统一方法。粗暴的机械的方法当然是有害的，但是我又要请读者自己来判断，当新方针和旧方针斗争时，在未能使党相信新观点的正确以前，在尚未向党说明这些观点以前，就要把自己的人送进党机关中去，难道还有比这更粗暴、更机械的斗争方法吗？

但是，也许少数派爱用的字眼确实还有某种原则的意义，确实反映了某些与那种显然成了这方面“转变”起点的微不足道的局部理由无关的特殊思想吧？也许，撇开“增补”引起的争吵不谈，这些字眼毕竟反映了另一种观点体系吧？

我们就从这一方面来考察一下问题。这里我们首先要指出：在同盟中最初着手作这种考察的是普列汉诺夫同志，他指出了少数派转向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而马尔托夫同志（他现在最感到委屈的是，并不是大家都愿意承认他的立场是原则的［注：新《火星报》由于列宁似乎不愿看到原则性的意见分歧或者否认这些分歧而感到委屈，是再可笑不过的了。如果你们比较有原则地对待问题，那你们就会比较快地看清楚我再三指出的你们转向机会主义去的问题。如果你们的立场比较有原则，那你们就不会这样把思想斗争降低为计较地位。既然你们自己竭力不让别人把你们当作有原则性的人看待，那就请你们埋怨自己吧。例如，马尔托夫同志在《戒严状态》里说到同盟代表大会时，隐讳了他和普列汉诺夫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争论，而只是喋喋不休地说什么列宁凌驾于中央之上，说列宁只要使个眼色就能让中央下道命令，说中央委员会横暴地欺侮了同盟等等。我毫不怀疑，马尔托夫同志通过这样选择他的论题证明了他深刻的思想性和原则性。］立场）在他的《戒严状态》里宁愿完全回避这一事件。

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一个一般性的问题是：同盟或者某一委员会为自己制定的章程不经过中央委员会批准，或者中央委员会拒绝加以批准，是不是有效呢？其实，问题是再清楚不过的：章程是组织的形式表现，而组织各委员会的权利按照我们党章第 6 条的规定应该无条件地属于中央委员会；党章规定了委员会自治的范围，而规定这些范围的决定权在党的中央机关，而不在党的地方机关。这是一个常识，而那些说什么“组织”并不总是意味着只要“批准章程”的深奥论断实在是太幼稚了（好象同盟自己不曾主动表示过想成为一个根据正式章程组成的团体）。但是马尔托夫同志甚至忘记了（也许是暂时忘记了）社会民主党的常识。按照他的意见，要求章程经过批准，只能表明“过去革命的火星派的集中制已经被官僚主义的集中制所代替”（同盟记录第 95 页），同时马尔托夫同志在同

一篇发言里又说，他认为这正是问题的“原则的方面”（第 96 页），而他在自己的《戒严状态》里却宁愿回避这个原则的方面！

普列汉诺夫同志立刻就回答马尔托夫，请他不要使用诸如官僚主义、庞巴杜尔作风等等“损害代表大会尊严”的字眼（第 96 页）。于是他同马尔托夫同志辩论起来，因为马尔托夫同志认为这些字眼是“对于一定方针的原则的表述”。当时普列汉诺夫同志也同所有的多数派分子一样，曾根据这些字眼的具体意思来加以考察，清楚地了解这些字眼没有什么原则的意义，而只有“增补的”意义（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但是他对马尔托夫和捷依奇们的坚持作了让步（第 96—97 页），同意对他们那些所谓的原则的观点进行原则的考察。他说：“如果真是这样〈就是说，如果各委员会在建立其组织方面、在制定其章程方面实行自治〉，那它们就会在对整体的关系上，对党的关系上实行自治了。这已经不是崩得派的观点，而简直是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了。确实，无政府主义者就是这样看待问题的：个人的权利不受限制；他们可以彼此冲突；每个个人都可以自行确定自身的权利范围。自治的范围不应当由一个集团自己确定，而应当由它构成其一部分的那个整体来确定。崩得可以说就是违反这个原则的明显的例证。这就是说，自治的范围要由代表大会或者代表大会所建立的最高机构来确定。中央机关的权力应当以道义上的和精神上的威信为基础。这一点我当然是同意的。组织中的每一分子，都应当关心使机关有道义上的威信。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既然需要有威信，那就不需要有权力了……把权力的威信同思想的威信对立起来，这是这里所不应当有的无政府主义言论。”（第 98 页）这些道理是再浅显不过的，都是不言自明的公理，根本用不着进行什么表决（第 102 页），至于人们不相信它们，那只是因为“目前概念都混淆了”（同上）。但是，知识分子个人主义必然使少数派企图破坏代表大会，不服从多数；而要为这种企图辩护，就只好用无政府主义的言论。非常可笑的是，少数派除了埋怨普列汉诺夫使用了机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一类

过分厉害的字眼以外，无法向普列汉诺夫提出任何其他的责难。普列汉诺夫很公正地嘲笑了这种埋怨，他问道：为什么“饶勒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这些词不可以使用，而亵渎君主和庞巴杜尔作风这些词却可以使用呢”？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答复。这种特有的误解在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及其伙伴们那里已经是屡见不鲜了：他们的新字眼带有鲜明的“火气”的迹象；当人家指出这一点时，他们感到委屈，——说什么我们是有原则性的人；但是，人家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在原则上否定局部服从整体，那么你们就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又因人家使用了厉害的字眼而感到委屈。换句话说，他们准备同普列汉诺夫厮杀一场，但是又要普列汉诺夫手下留情！

马尔托夫同志及其他一切“孟什维克”也多次用同样幼稚的手段来揭露我的“矛盾”。他们从《怎么办？》或者从《给一位同志的信》里引证一些谈到思想影响、谈到争取影响的斗争等等的话，同经过党章施加“官僚主义”影响，以及依靠权力实行“专制”的倾向等等对立起来。多么幼稚啊！他们已经忘记了，从前，我们党还不是正式的有组织的整体，而只是各个集团的总和，所以在这些集团间除了思想影响以外，别的关系是不可能有的。现在，我们已经成为有组织的政党，这也就是说造成了一种权力，思想威信变成了权力威信，党的下级机关应当服从党的上级机关。说实在的，向自己的老同事们反复讲解这样一些起码的道理，真叫人不好意思，特别是当你感觉到，问题不过是在选举问题上少数不愿意服从多数！但是，在原则上，滔滔不绝地揭露我的矛盾的这些话，完全是无政府主义的言论。新《火星报》并不拒绝利用党机关的招牌和权利，但是却不愿意服从党的多数。

如果说这些谈论官僚主义的词句中真有什么原则的话，如果说这不是用无政府主义态度否认局部必须服从整体的话，那么这个原则就是机会主义的原则，因为机会主义就是力图削弱知识分子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责任，削弱中央机关的影

响，加强党内最不坚定分子的自治，把组织关系搞成只是在口头上抽象地加以承认。这一点我们在党代表大会上已经看见了，当时阿基莫夫们和李伯尔们就曾经大谈“可怕的”集中制，和后来马尔托夫及其伙伴们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讲的一模一样，机会主义导致马尔托夫式的和阿克雪里罗得式的组织“观点”，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出自机会主义的本性，而且不仅在俄国，在全世界都是如此，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分析新《火星报》所刊载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文章时就可以看出来。

注释：

[22]指 1903 年 9 月从俄国来到日内瓦的弗·威·林格尼克。——352。

（十六）勿因小别扭而妨碍大快事

同盟否决了关于同盟章程必须经中央批准的决议案（同盟记录第 105 页），正如党代表大会的整个多数派立刻指出的，这是“根本违反党章的行为”。这种违反党章的行为，如果把它看成是一些有原则的人的行为，那就是十足的无政府主义，这种行为在代表大会以后的斗争环境中必然造成一种印象，即党的少数派在向党的多数派“进行报复”（同盟记录第 112 页），这种行为意味着党内的少数派不愿意服从党和不愿意留在党内。既然同盟拒绝根据中央关于必须修改章程的声明通过决议（第 124—125 页），这就势必导致其大会被认为是非法的，因为这个大会虽然想算作党组织的大会，却又不服从党中央机关，所以党内的多数派立刻离开了这个冒牌的党的大会，不参加这出不体面的滑稽剧。

于是，那种抽象地承认组织关系、在讨论党章第 1 条问题时暴露出思想动摇的知识分子个人主义，在实践上就走到了早在 9 月间即在一个半月以前我曾经预言过的那种合乎逻辑的结局——破坏党组织的地步。恰恰在这个时候，即在同盟代表大会闭幕的那天晚上，普列汉诺夫同志向两个党中央机关的同事声明，说他不忍“向自己人开枪”，说他“宁肯自杀，也不愿意分裂”，说为了避免更大的灾

难必须作最大限度的个人让步。当时进行这场毁灭性的斗争实际上正是为了取得这种让步（这种成分比为了维护党章第 1 条上的不正确立场所暴露的原则要大得多）。为了确切说明普列汉诺夫同志的这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全党意义的转变，我认为最好不拿私人谈话作根据，也不拿私人信件（这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可以援引）作根据，而是拿普列汉诺夫自己在全党面前对情况所作的说明，即拿他发表在《火星报》第 52 号上的《不该这么办》一文作根据，这篇文章正是在同盟代表大会以后，在我退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1903 年 11 月 1 日）以后，在增补马尔托夫分子（1903 年 11 月 26 日）以前写成的。

《不该这么办》一文的基本思想是，在政治上不应当过于生硬、过分激烈和毫不让步：有时为了避免分裂，必须对修正主义者（那些同我们接近或者表现动摇的）和无政府个人主义者实行让步。这种抽象的笼统的论点自然使《火星报》的读者感到莫名其妙。普列汉诺夫同志那些堂皇的傲慢的声明（在以后一些文章中发表的），说人们没有懂得他的意思是由于不了解他的新思想和不懂得辩证法，这话听起来真是令人好笑。其实，当《不该这么办》一文写成时，能懂得的只有十来个住在日内瓦郊区两个地方（其地名的第一个字母相同）[23]的人。普列汉诺夫同志的不幸，就在于他把只是写给这十来个参与代表大会以后同少数派斗争全过程的人看的一大堆暗示、责备、代数符号和猜测，搬到了成千上万的读者面前来。普列汉诺夫同志所以陷入这种不幸，是因为他正好违背了他自己很不恰当地提到的一个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正因为如此，用抽象的形式把在同盟代表大会以后向马尔托夫分子让步的具体思想包起来，是不妥当的。

普列汉诺夫同志当作新的口号提出来的让步，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是正当的和必要的：或者是让步者深信要求让步者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正直的政治家总是公开坦率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或者是为了避免更大的灾难而向那不合理

的、对事业有害的要求实行让步。从这篇文章完全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指的是后一种情况：他直爽地说要向修正主义者和无政府个人主义者（现在全体党员已经从同盟代表大会记录中知道这就是马尔托夫分子）实行让步，说为了避免分裂而必须让步。可见，普列汉诺夫同志的所谓新思想完全可以归结为一句并不怎么新的处世格言：勿因小别扭而妨碍大快事，小的机会主义愚蠢行为和无政府主义言论总比党的大分裂好。普列汉诺夫同志写这篇文章时，清楚地知道少数派是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并知道它是用无政府主义手段进行斗争的。普列汉诺夫同志主张，要用个人让步的办法同这个少数派作斗争，正象（又是如果可以以小比大的话）德国社会民主党同伯恩施坦作斗争时那样。倍倍尔在他自己的党的几次代表大会上曾公开声明，说他不知道有什么人比伯恩施坦同志（不象普列汉诺夫同志以前那样喜欢把他称为伯恩施坦先生，而是称为伯恩施坦同志）更容易接受环境的影响，所以我们要把他放到我们这个环境中间，我们要选派他做国会议员，我们要进行反修正主义的斗争，但不是用过分激烈的手段（象索巴开维奇—帕尔乌斯那样）来反对这位修正主义者，我们要"用温和的手段杀死"（kill with kindneess）这位修正主义者，正如麦·贝尔（M．Beer）同志（我记得似乎是他）在一次英国社会民主党人会议上称道德国人乐于让步、爱好和平、温和、灵活和审慎，而反对英国的索巴开维奇—海德门的攻击时所说的那样。同样，普列汉诺夫同志也想"用温和的手段杀死"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两位同志的小无政府主义和小机会主义思想。诚然，普列汉诺夫同志一方面十分清楚地暗示到"无政府个人主义者"，同时却有意把修正主义者说得含糊不清，好象他指的是从机会主义转向正统派方面的工人事业派分子，而不是开始从正统派转向修正主义的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但这种军事策略未免太幼稚了［注：在党代表大会以后根本就没有人谈到要对马尔丁诺夫、阿基莫夫、布鲁凯尔等同志实行让步。我没有听说过他们也要求"增补"。我甚至怀疑，斯塔罗韦尔同志或马尔托夫同志在他

们两人以“党内半数”名义递给我们公文和“照会”时，是否和布鲁凯尔同志商量过……在同盟代表大会上，马尔托夫同志以坚强的政治战士十分气愤的心情提出抗议，说他根本没有想到要“同梁赞诺夫或马尔丁诺夫联合”，说他根本没有想到可能同他们“勾结”，甚至没有想到可能同他们一起（以编辑身分）“为党工作”（同盟记录第 53 页）。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严厉地谴责“马尔丁诺夫的倾向”（第 88 页），而当正统派同志巧妙地暗示说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好象是“承认阿基莫夫、马尔丁诺夫以及其他同志同样有权随意召集会议，为自己制定章程并按照这个章程行事”（第 99 页）时，马尔托夫分子马上就来否认这一点，就象彼得否认他是耶稣的门徒一样[24]（第 100 页，“正统派同志担心”“阿基莫夫们、马尔丁诺夫们，等等”，“是没有根据的”）。]，这种构筑得很不高明的工事根本挡不住全党公论的炮火。

所以，谁只要了解当时政治形势的具体情况，谁只要洞察普列汉诺夫同志的心理，谁就会懂得我当时不能有什么别的做法。我这样说是针对那些责怪我不应该让出编辑部的多数派分子的。普列汉诺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以后转变了态度，由一个多数派变成了一个坚决的调和派，而我当时只能从最好的意义上解释他的这种转变。也许普列汉诺夫同志想在他的文章里提出一个达到善意的和真诚的和平的纲领？凡是这样的纲领都要求双方诚恳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普列汉诺夫同志指出了多数派的什么错误呢？——对修正主义者采取了索巴开维奇式的过分激烈的态度。不知普列汉诺夫同志在这里指的是什么：是他自己所说的关于驴子的那些挖苦话呢？还是当阿克雪里罗得在场时十分轻率地讲的那些关于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话；普列汉诺夫同志宁愿使用“抽象”说法，并把罪过转嫁到别人头上。当然，各有各的爱好。但是，我无论在给一个火星派分子的信中还是在同盟代表大会上，都公开承认过我本人说话过于激烈；我怎么会不承认多数派方面的这种“错误”呢？至于讲到少数派，普列汉诺夫同志很清楚地指出了他们的

错误是修正主义（参看他在党代表大会上关于机会主义和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关于饶勒斯主义的论述）和导致分裂的无政府主义。难道我能阻挠用个人让步以及种种“kindness”（亲切的、温和的手段）使人们承认这种错误并消除它的害处的尝试吗？既然普列汉诺夫同志在《不该这么办》一文中直率地劝告大家“宽恕”那些“只是由于某种程度的动摇”而成了修正主义者的“对手”，我又怎么能阻挠这样一种尝试呢？而既然我不相信这种尝试能有什么良好结果，那么我除了在中央机关报方面作出个人让步，并为维护多数派的立场而转移到中央委员会去以外，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注：关于这一点，马尔托夫同志很中肯地说我是带着武器和行囊转移的。马尔托夫同志喜欢使用军事比喻：向同盟进军、战役、治不好的枪伤，如此等等。老实说，我也有使用军事比喻的癖好，特别是现在从太平洋传来的消息很引人注意的时候。但是，马尔托夫同志，如果用军事术语来说明，那么事实就是：我们在党代表大会上占领了两座炮台。你们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攻击这两座炮台。在第一次小规模的相互射击以后，我的一位同事，一座炮台上的指挥官，敞开了大门迎接敌人。我当然就带着自己的一小队炮兵转到另外一座几乎还没有筑好工事的炮台上去，以便“低挡”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敌军。我甚至提议讲和：我为什么要同时和两个强敌作战呢？但是，新的联军对我的讲和和建议的回答是，炮轰我这座“残存的”炮台。我只好开炮还击。这时，我过去的同事、那位指挥官却带着愤怒的神情一本正经地喊道：看哪，善良的人们，这个张伯伦多么不喜欢和平啊！］当时我不能绝对否认这种尝试可能成功而独自对于可能发生的分裂负责，因为我自己在 10 月 6 日的信中也曾经想用“个人意气用事”来解释这种无谓争吵。至于维护多数派的立场，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是我自己的政治职责。在这方面指望普列汉诺夫同志是很困难和很危险的，因为所有的情况表明，普列汉诺夫同志是要把他所谓“一个无产阶级的领导人当自己的好战癖性同政治的考虑相抵触时没有权利迷恋这种癖性”这句话辩证地解释成：如果一定

要射击，那就射击多数派更合算些（按日内瓦 11 月间的天气来说）……当时所以必须维护多数派的立场，是因为普列汉诺夫同志公然违反了要求具体地全面地观察问题的辩证法，在说到革命家的善良的（？）愿望时谦虚地回避了对一个革命家的信任问题，即对一个领导了我们党内一定派别的“无产阶级领导人”的信任问题。普列汉诺夫同志讲到无政府个人主义，劝告大家“有时”应该对违反纪律的行为装作看不见，“有时”要向“同忠实于革命的思想毫无共同之处的感情所引起的”知识分子放肆行为让步，但是他显然忘记了也应该考虑到党内多数派的善良愿望，忘记了应该让实际工作者来确定对无政府个人主义者让步到什么程度。同幼稚的无政府主义谬论进行文字斗争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要在同一个组织内同无政府个人主义者进行实际工作就比较困难了。如果一个著作家竟然要自己来确定对于无政府主义在实际上可能让步到什么程度，那就只能暴露出他过分的、学究气十足的、文人的自命不凡。普列汉诺夫同志一方面堂皇地宣称（正如巴扎罗夫所说的那样，为了显示自己了不起[25]），一旦发生新的分裂，工人们就会不再理解我们，但同时他自己又着手在新《火星报》上登载许多文章，这些文章的真正的具体的含义，不仅工人必然不能了解，而且全世界的人都不能了解。怪不得有一个中央委员[26]读了《不该这么办》一文的校样，曾警告过普列汉诺夫同志，说他这篇文章恰巧破坏了他自己想把某些文件（党代表大会记录和同盟代表大会记录）公布范围稍微缩小的计划，因为这篇文章激起人们的好奇心，使一些带有刺激性而又完全暧昧不明的东西成为街谈巷议的资料［注：我们在一所门窗都关闭起来的屋子里进行非常热烈的争论。突然我们中间有一个人跳了起来，猛地打开了临街的窗子，开始大声叫喊反对什么索巴开维奇、无政府个人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等等。于是，街上自然就聚集了一群游手好闲、爱看热闹的人，而我们的敌人不禁幸灾乐祸起来。那时，其他参加争论的人也走到窗前，表示愿意把问题从头到尾说个清楚，而不要再作那些谁也不懂的暗示。这时窗子又被砰的一声关

上了，说什么不值得谈论这些无谓争吵（《火星报》第 53 号第 8 版第 2 栏倒数第 24 行）。普列汉诺夫同志，本来就不值得在《火星报》上开始谈论这些“无谓争吵”[27]，——这样说才对！]，必然使人们大惑不解，他们会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怪不得普列汉诺夫同志的这一篇议论抽象和含义暧昧的文章使社会民主党的敌人拍手称快：《革命俄国报》为此跳起了康康舞[28]，《解放》方面的彻底的修正主义者对此也备加赞扬。所有这些后来普列汉诺夫同志很可笑而又很可悲地企图摆脱的可笑而又可悲的误解[29]，其根源就在于他违背了具体问题应该根据问题的全部具体情况加以分析这一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所以，司徒卢威先生感到高兴也是完全自然的，他对普列汉诺夫同志所追求的（但是不一定能够达到的）那些“良好的”目的（用温和的手段杀死）毫不关心；司徒卢威先生欢迎而且也不能不欢迎现在人人都看见的在新《火星报》上开始的向我们党内机会主义派方面的转变。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不仅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都欢迎社会民主党内发生的每一次向机会主义的转变，哪怕是最小的和暂时的转变。聪明的敌人所作的估计很少是纯粹的误会。告诉我，谁在赞扬你，我就能告诉你，你的错误在什么地方。普列汉诺夫同志希望读者粗心大意，企图把事情说成是多数派绝对反对在增补方面作个人让步，而不是反对从党内的左派转变为右派，但这是徒劳的。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普列汉诺夫同志为了避免分裂而作了个人让步（这是很值得表扬的），而在于他虽然完全承认同那些态度不一贯的修正主义者和无政府个人主义者进行争论的必要性，却宁可同多数派进行争论，而他同多数派的分歧就在于对无政府主义实际上可能让步到什么程度。问题的实质完全不在于普列汉诺夫同志改变了编辑部的人选，而在于他背叛了他自己同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争论的立场，不再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维护这个立场。

至于说到当时作为多数派的唯一有组织的代表机关的中央委员会，那么普列汉诺夫同志当时同中央委员会的分歧，只是在于对无政府主义实际上可能让步到

什么程度。自从 11 月 1 日我退出编辑部而让“用温和的手段杀死”的政策自由实行的时候起，几乎已经一个月了。普列汉诺夫同志有充分可能通过各种交往来检验这个政策是不是行得通。普列汉诺夫同志在这个时期发表了他的《不该这么办》一文，这篇文章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马尔托夫分子进入编辑部的唯一的入场券。有两个口号——修正主义（同它应该用宽恕对手的态度来进行争论）和无政府个人主义（对它应该加以安抚，用温和的手段杀死它），特别鲜明地印在这张入场券上。先生们，请进吧，我会用温和的手段杀死你们的，——这就是普列汉诺夫同志通过这个请贴对自己的编辑部新同事们说的话。当然，中央委员会只得说出自己的最后的话（最后通牒，也就是争取和平解决的最后的话），即从中央委员会的观点看来，容许对无政府个人主义实际上让步到什么程度。或者是你们愿意和平，那我们就会给你们一定数量的席位，以表明我们态度温和，爱好和平，愿意让步等等（我们为了保障党内和平不能给你们更多的东西了，和平并不意味着没有争论，而是意味着不许无政府个人主义破坏党）。请你们接受这些席位并逐渐从阿基莫夫方面转到普列汉诺夫方面吧。或者是你们想坚持并发展你们的观点，最终地转到（哪怕只是在组织问题上）阿基莫夫方面去，使党相信你们是正确的，而普列汉诺夫是错误的，那就请你们组织自己的著作家小组，派代表参加代表大会，并开始用诚实的斗争和公开论战的手段争取多数吧。中央委员会在 1903 年 11 月 25 日的最后通牒内（见《戒严状态》和《对同盟代表大会记录的述评》[注：至于马尔托夫在《戒严状态》中引用私人谈话等等歪曲中央委员会的最后通牒的把戏，我当然是不准备加以分析的。这套把戏就是我在前一节曾经说过的“第二种斗争方法”，这套把戏只有神经病理学专家才有本事把它弄清楚。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就是马尔托夫同志在那里硬说他们同中央订立过不发表谈判内容的协定，可是这种协定不管怎样去找，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当时代表中央进行

谈判的特拉温斯基同志曾用书面通知我，说他认为我有权在《火星报》以外的刊物上发表我给编辑部的信。

不过马尔托夫同志那里有一个词是我特别喜欢的。这个词就是“最坏的波拿巴主义”。我觉得，马尔托夫同志提出的这个概念是非常恰当的。让我们冷静地看一看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吧。在我看来，这个概念意味着用形式上合法而实质上违反人民（或党）意志的手段来取得权力。马尔托夫同志，难道不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我就可以放心地让公众来判断，是谁的所作所为应该被指责为“最坏的波拿巴主义”：是本来可以根据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意志行使自己的不让马尔托夫分子进来的正式权利而没有行使这种权利的列宁和伊格列克呢，还是那些在形式上正当地占据了编辑部（“一致同意的增补”）而明知这在实质上不符合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意志并害怕第三次代表大会将来会检查这种意志的人们？]）十分清楚地向马尔托夫分子提出的这个二者择一的问题，完全符合我和普列汉诺夫两个人在 1903 年 10 月 6 日给原来的编辑们写的那封信的内容：或者是个人意气用事（那就可以在最坏的情况下实行“增补”），或者是原则性的分歧（那就要先说服党，然后才谈得上改变中央机关的人选）。中央委员会有理由让马尔托夫分子自己来解决这个二者择一的难题，尤其是因为正好在这时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宣言书”（《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里写过如下一段话。

“少数派只要求得到一种荣誉，即想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作出第一个这样的范例：可以处在‘失败者’的地位而不成立新党。少数派的这种立场是出自他们对党组织发展过程的全部看法，出自他们对他们自己同以往的党的工作之间的牢固联系的认识。少数派不相信‘纸上革命’的神秘力量，认为自己的意愿有深刻的十分重要的根据，能保证他们在党内用纯粹思想宣传手段使自己的组织原则取得胜利。”（黑体是我用的）

多么漂亮、多么自负的言词啊！而当我们根据实际经历清楚看到这仅仅是一些言词时，又是多么痛苦啊……马尔托夫同志，对不起，现在我要代表多数派要求获得你们不配获得的这种“荣誉”了。这种荣誉确实是一种很大的荣誉，值得为它一战，因为小组习气的传统给我们留下的就是过分轻率地进行分裂和过分热心地运用“要么飨以老拳，要么握手言欢”这一格言。

大快事（有一个统一的党）应当高于并且确实高于小别扭（指为增补进行的无谓争吵）。我退出了中央机关报，伊格列克同志（是我和普列汉诺夫推举他代表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参加总委员会的）退出了总委员会。马尔托夫分子用一封等于宣战的信（见我们引用过的那本书）回答了中央委员会提议和平解决的最后的话。那时，并且直到那时，我才给编辑部写信（《火星报》第 53 号）说到公论问题[注：见本卷第 86—90 页。——编者注]。我说，如果真要谈论修正主义，争论不彻底性和无政府个人主义，争论一些领导人的失败，先生们，那就让我们把一切都说出来，痛痛快快地说出全部事实真相吧，——这就是我那封谈到公论问题的信的内容。编辑部对这封信的回答是破口大骂，并冠冕堂皇地训诫说：不要挑起“小组生活中的琐事和无谓争吵”（见《火星报》第 53 号）。我暗自忖度：啊，原来是“小组生活中的琐事和无谓争吵”……es ist mir recht，这和我的想法一样，先生们，这我倒是同意的。这就是说，你们把“增补”问题上的纠纷公开叫作小组的无谓争吵了。这倒是真话。可是，同一个（似乎是同一个）编辑部在同一号（第 53 号）的社论中又谈起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等，那么这种杂音又是怎么回事呢？［注：后来事实证明，这种“杂音”只是因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中有杂音。“无谓争吵”是普列汉诺夫写的（见他在《可悲的误解》中的自白，第 57 号），而社论《我们的代表大会》是马尔托夫写的（《戒严状态》第 84 页）。真是各唱各的调。］你不要提出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的增补而斗争的问题，因为

这是无谓争吵。我们却要提出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增补的问题，这不是无谓争吵，而是关于“形式主义”问题的原则分歧。我想：不，亲爱的同志们，对不起，你们这么做可不行啊。你们要向我这座炮台开火，同时又要我把炮交给你们。真是开玩笑！于是我就写了一封《给编辑部的信》(《我为什么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注：见本卷第 91—98 页。——编者注]，并且把它发表在《火星报》以外的地方；我在这封信中简略地说明了事实真相，并且一再询问，可以不可以按照你们占有中央机关报而我们占有中央委员会这样一个分配原则讲和。任何一方面都不会觉得自己在党内是“外人”，至于向机会主义方面的转变问题，我们可以争论，首先在报刊上，以后也许还要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争论。

一听到我提起讲和，所有敌人的炮台，包括总委员会在内，都立刻开炮作为回答。真可谓弹如雨下。什么专制君主，施韦泽，官僚主义者，形式主义者，凌驾于中央之上，片面性，简单生硬，顽固不化，心胸狭隘，疑神疑鬼，生性乖僻……好极了，我的朋友们！你们发射完了吗？你们的军火库里再没有什么存货了吗？你们的炮弹实在太不顶事了……

现在该我说话了。现在我们看一看新《火星报》的新组织观点的内容，以及这些观点同我们党内划分为“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关系，关于这种划分的实质，我们在分析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讨论情况和表决情况时已经说过了。

注释：

[23]可能是指日内瓦郊区的 Carouge 和 Cluse，这两个地名的第一个字母都是 C。当时这里住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成员。——369。

[24]彼得否认他是耶稣的门徒出典于圣经《新约全书》。彼得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在耶稣被捕前曾向耶稣表示要舍生忘死地效忠于他。但当耶稣果真被捕时，他却不敢出面为耶稣申辩。甚至在有人认出他是耶稣的门徒后，三次盘问他，他都加以否认，说他根本不认识耶稣。——370。

[25]巴扎罗夫是俄国作家伊·谢·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中的主人公。作为俄国 19 世纪 60 年代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巴扎罗夫痛恨贵族的风尚和习俗。他戳穿了贵族富孀阿金佐娃夫人的虚伪做作，指出她对她的贵族姨妈——一个地位很高的贵族老处女——礼数周到，殷勤备至，只是“为了显示自己了不起”。——373。

[26]指弗·威·林格尼克。——373。

[27]在 1903 年 11 月 25 日《火星报》第 53 号上同时发表了列宁《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见本卷第 86—90 页）和普列汉诺夫写的编辑部的答复信。列宁在信中建议在该报上讨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原则分歧。普列汉诺夫在答复中拒绝了这个建议，称这种分歧是“小组生活内的无谓争吵”。——373。

[28]康康舞是法国的一种下流舞蹈，19 世纪 30 年代出现在巴黎的大众舞会上，后来流行于咖啡馆舞台。——373。

[29]指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两篇文章：《可笑的误解》（1903 年 12 月 15 日《火星报》第 55 号）和《可悲的误解》（1904 年 1 月 15 日《火星报》第 57 号）。它们是对《解放》杂志评论普列汉诺夫《不该这么办》一文的文章《意义重大的转变》和《革命俄国报》评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和会后多数派和少数派的论战的文章《大代表大会的小缺点》的答复。——374。

（十七）新《火星报》。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在剖析新《火星报》的原则立场时，无疑应当把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两篇小品文［注：这两篇小品文已收入《〈火星报〉的两年》文集第 2 册第 122 页及以下各页（1906 年圣彼得堡版）。（这是作者为 1907 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当作基本材料。关于他爱用的那一套字眼的具体意义，我们在上面已经详细地指出来了，因此现在应当竭力撇开这种具体意义，来仔细考察一下迫使“少数派”

（根据某种细小的琐碎的论据）得出正是这些而不是什么别的口号的思考过程，探讨一下这些口号的原则意义，而不管它们的来源如何，不管“增补”问题如何。目前我们正处在让步空气浓厚的时候，那就让我们对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让一下步，“认真地谈谈”他的“理论”吧。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一个基本论点（《火星报》第 57 号）是，“我们的运动一开始就包含着两种对立的倾向，这两种倾向的互相对抗，不能不随着运动本身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又不能不影响这个运动”。这就是说：“在原则上，运动的无产阶级目的〈在俄国〉同西方社会民主党的目的是一样的。”可是，我们这里影响工人群众的却是“对他们说来是异己的社会成分”，即激进知识分子。总之，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认定，我们党内存在着无产阶级倾向和激进知识分子倾向之间的对抗。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这一点上无疑是正确的。这种对抗是确实存在的（并且不仅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一个党内）。而且，大家都知道，正是这种对抗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为什么现代社会民主党已经划分成革命的（或正统的）和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内阁主义、改良主义的）两派，而这种划分也在我们俄国近十年来的运动中充分地显露了出来。同时大家又知道，社会民主党正统派所代表的正是运动中的无产阶级倾向，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所代表的则是民主知识分子倾向。

可是，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多少触及这个尽人皆知的事实时，便胆怯地向后退缩了。他没有作任何尝试来认真分析一下，上述这种划分一般在俄国社会民主运动史上，尤其是在我们党代表大会上究竟是怎样表现出来的，虽然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写的正是有关代表大会的问题！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也同新《火星报》整个编辑部一样，对这次代表大会的记录怕得要死。我们了解前面说过的一切之后不会对此表示惊奇，但是，这对一个仿佛在研究我们运动中各种倾向的“理论家”却是一件害怕真相的奇事。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由于自己的这种特性，避开了关于我们运动中各种倾向的最新最精确的材料，而求救于惬意的幻想。他说：“既然合

法马克思主义或半马克思主义给我国自由派提供了一个文坛上的领袖，为什么捉弄人的历史就不能从正统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中提供一个领袖给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呢？”[30]关于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这种惬意的幻想，我们只能说，如果历史有时是在捉弄人，那么，这并不能替一个分析这种历史的人的捉弄人的思想作辩护。当那位半马克思主义的领袖显露出是一个自由派分子时，那些愿意（和善于）探讨他的“倾向”的人所引证的并不是什么可能有的历史捉弄，而是这位领袖数十种甚至数百种心理和逻辑的表现，是他全部著作的面貌特征，这些特征显出了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31]。既然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分析“我们运动中的一般革命倾向和无产阶级倾向”时，丝毫——确实是丝毫——不能证明并指出他所痛恨的党内正统派的某些代表人物的某些倾向，那他只不过是郑重地证明自己思想贫乏罢了。既然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只能引证什么可能有的历史捉弄，那么他的事情想必已经是十分不妙了！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另一引证，即关于“雅各宾派”的引证，是更有教益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大概不会不知道，现代社会民主党分成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早已——并且不仅在俄国——使人有了运用“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历史比拟”的借口。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大概不会不知道，现代社会民主党中的吉伦特派随时随地都在用“雅各宾主义”、“布朗基主义”之类的词来形容自己的对手。我们不会象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那样害怕真相，且让我们来翻阅一下我们代表大会的记录，看看这些记录究竟有没有什么材料可供我们分析和检查现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些倾向和我们所剖析的这种比拟。

第一个例子。在党代表大会上关于党纲的争论。阿基莫夫同志（他“完全赞同”马尔丁诺夫同志的意见）声明：“关于夺取政权〈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段条文写得跟所有其他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不同，这种写法有可能被解释成领导组织的作用一定会把受它领导的阶级推到后面去，并使前者同后者隔离开，而

且普列汉诺夫就是这样解释的。因此，我们的政治任务也就表述得完全和'民意党'的一样。"（记录第 124 页）普列汉诺夫同志和其他火星派分子反驳了阿基莫夫同志，指责他这是一种机会主义观点。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难道看不出，这次争论向我们表明了（是用事实，而不是用想象的历史捉弄）社会民主党内现代雅各宾派和现代吉伦特派的对抗吗？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以谈起雅各宾派来，不正是因为他（由于他所犯的错误）已经与社会民主党内的吉伦特派为伍了吗？

第二个例子。波萨多夫斯基同志认为在"民主原则的绝对价值"这个"基本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第 169 页）。他和普列汉诺夫一起否认民主原则的绝对价值。"中派"或泥潭派首领（叶戈罗夫）和反火星派首领（戈尔德布拉特）坚决反对这种看法，认为普列汉诺夫是在"仿效资产阶级的策略"（第 170 页），——这正是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关于正统派同资产阶级倾向的联系的看法，所不同的只是阿克雪里罗得没有把这种看法具体地说出来，而戈尔德布拉特则把它同一定的辩论联系了起来，我们不妨再问一次：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难道看不出这次争论也向我们具体地（在我们党代表大会上）表明了现代社会民主党内有雅各宾派和吉伦特派相对抗吗？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以高喊反对雅各宾派，不正是因为他已经与吉伦特派为伍了吗？

第三个例子。关于党章第 1 条的争论。究竟是谁在捍卫"我们运动中的无产阶级倾向"，谁在强调说明工人不怕组织，无产者不同情无政府状态，无产者重视"组织起来！"的号召，谁在提醒人们防范那些浸透机会主义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呢？是社会民主党中的雅各宾派。究竟是谁在把激进知识分子拉到党里来，谁在念念不忘大学教授和中学生、单干人物和激进青年呢？是吉伦特派分子阿克雪里罗得伙同吉伦特派分子李伯尔。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为在我们党代表大会上公开散播的那个加给"劳动解放社"多数人的"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进行辩护，可是他辩护得多么笨拙啊！他不

过是重弹伯恩施坦派的一些关于雅各宾主义、布朗基主义等等的陈词滥调，从而证实这个罪名有根有据罢了！他高喊什么激进知识分子的危险，无非是为了掩饰他自己在党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那些念念不忘这种知识分子的言论。

使用雅各宾主义等等这些“吓人的字眼”，只是暴露出自己有机会主义思想罢了。同已经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雅各宾派分子，就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留恋大学教授和中学生，害怕无产阶级专政，迷恋民主要求的绝对价值的吉伦特派分子，就是机会主义者。现在，把政治斗争缩小为密谋活动的思想已经在出版物上被驳斥过几千次了，它早就被实际生活驳倒和排挤掉了，群众性的政治鼓动的根本重要意义已经被阐明和反复地说明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机会主义者还会认为密谋组织是危险的东西。人们害怕密谋主义即布朗基主义的实际原因，并不是实际运动显露出来的某种特征（象伯恩施坦之流早就枉费心机地力图证明的那样），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种在现代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常常暴露出来的吉伦特派的怯懦心理。最滑稽不过的就是新《火星报》拼命想说出一种新意见（其实这种意见早已有人说过几百次了），即要人们防范 40 年代和 60 年代法国革命密谋家的策略（第 62 号上的社论）[32]。在即将出版的一号《火星报》上，现代社会民主党中的吉伦特派大概会给我们举出这样一批 40 年代的法国密谋家，对这些人来说，在工人群众中进行政治鼓动的作用，工人报纸作为党用来影响阶级的基本工具的作用，早已成了背得烂熟的起码常识。

可是，新《火星报》力图在发表新意见的幌子下重提旧事和反复咀嚼起码的常识，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已经陷到我党机会主义派中去的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所处的地位的必然结果。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就得讲什么样的话。所以他们只好重复机会主义词句，只好向后退，以便从遥远的过去找到一点什么理由来替自己的立场辩护，但从代表大会上的斗争来看，从代表大会上形成的党内各种不同的色彩和派别划分来看，这个立场是无法辩护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除了谈

一些阿基莫夫式的关于雅各宾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深奥思想，还发了一些阿基莫夫式的怨言，说不仅“经济派”而且“政治派”也有“片面性”、过分“迷恋”的毛病等等。当你在妄自尊大、自以为比有上述一切片面性和迷恋毛病的人高明的新《火星报》上读到有关这个题目的高谈阔论时，你就会惶惑莫解地自问道：他们在描画什么人的肖像？他们从哪里听过这种对话？[33]谁不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分成经济派和政治派的时期早已过去了呢？你们看看党代表大会以前一两年的《火星报》就会知道，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还在 1902 年就平息下去了，完全停止了；就会知道，例如，在 1903 年 7 月（第 43 号），人们就认为“经济主义时代”“已经完全过去了”，经济主义“已经被彻底埋葬了”，认为政治派的迷恋是一种明显的返祖现象。《火星报》新编辑部究竟根据什么理由重新提起这个已经被彻底埋葬了的划分呢？难道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同阿基莫夫们进行斗争，是因为他们两年以前在《工人事业》上犯的那些错误吗？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成了十足的白痴了。可是，谁都知道我们并没有这样做，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同阿基莫夫们进行斗争，不是因为他们在《工人事业》上所犯的旧的、已经被彻底埋葬了的错误，而是因为他们在代表大会上发言和表决时犯了新的错误。我们并不是根据他们在《工人事业》上的立场，而是根据他们在代表大会上的立场来判断究竟哪些错误已经真正消除，哪些错误仍然存在，因而有争论的必要。到举行代表大会时，经济派和政治派这种旧的划分已不存在，但是各种机会主义倾向仍然存在，这些倾向曾经在讨论和表决许多问题时表现了出来，并且终于造成党的“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新划分。问题的全部实质在于，《火星报》新编辑部由于某些很明显的原因力图掩盖这种新的划分同我们党内当前机会主义的联系，因此也就不得不从新的划分退到旧的划分上去。既然不能说明新的划分的政治起源（或者说，为了表明肯于让步而想掩盖［注：见《火星报》第 53 号上普列汉诺夫关于“经济主义”的文章。在这篇文章的副题上，大概印错了几个字。“关于第二次党

代表大会的几点公开意见”显然应该是“关于同盟代表大会”，也许是“关于增补”。虽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个人的要求作些让步，然而决不容许——不是从庸人观点而是从党的观点来看——把党所关心的一些问题混淆起来，不能把已经开始由正统派方面转到机会主义方面去的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所犯的新错误问题，偷换为今天在纲领和策略的许多问题上也许愿意由机会主义方面转到正统派方面来的马尔丁诺夫们和阿基莫夫们所犯的旧错误（即现在只有新《火星报》才会想起的错误）问题。］这种起源），那就只好去反复咀嚼早已过时的旧划分。尽人皆知，新划分的根据是组织问题上的分歧，这种分歧是由组织原则（党章第1条）的争论开始，而且只有无政府主义者才干得出来的“实践”作为结束。经济派和政治派之间的旧划分的根据主要是策略问题上的分歧。

这种从党内生活的真正是当前迫切的更为复杂的问题退回到早已解决而现在又故意翻腾出来的问题上去的行为，新《火星报》正在竭力用一种只能称为尾巴主义的可笑的深奥思想加以辩护。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首创的那个贯穿在新《火星报》一切言论中的深奥“思想”，就是认为内容比形式重要，纲领和策略比组织重要，认为“组织的生命力同它所灌输给运动的那种内容的范围和意义成正比”，认为集中制不是“独立自在的东西”，不是“万应灵丹”等等等等。这是多么深奥而伟大的真理啊！纲领的确比策略重要，策略比组织重要。识字课本比词法重要，词法比句法重要，——可是，对于那些在考试句法时没有及格而现在居然因留级而骄傲和自夸的人，又能说些什么呢？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组织原则问题上的议论象一个机会主义者（党章第1条），而在组织中的行动象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而现在，他又在加深社会民主主义了——他说：葡萄是酸的！[34]其实，什么是组织呢？它不过是一种形式罢了；什么是集中制呢？它并不是万应灵丹；什么是句法呢？它并不象词法那样重要，它不过是把各个单词联结起来的一种形式罢了……《火星报》新编辑部得意地问道：“如果我们说，代表大会制

定党纲要比它通过一个无论怎样完善的党章更能促进党的工作的集中化，难道亚历山德罗夫同志会不同意我们的说法？”（第 56 号的附刊）可以设想，这个经典性的名言将要博得的广泛而持久的历史名声，不会亚于克里切夫斯基同志所说的那句名言：社会民主党也和人类一样，永远只给自己提出可以实现的任务。新《火星报》的这个深奥思想真是与此如出一辙。为什么克里切夫斯基同志的这句话遭到讥笑呢？这是因为他用了一种冒充哲学的庸俗议论来替某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在策略问题上的错误辩护，替他们不能正确地提出政治任务辩护。同样，新《火星报》也是用一种所谓党纲比党章重要、党纲问题比组织问题重要的庸俗议论，来替某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在组织问题上的错误辩护，替某些同志的那种导致无政府主义空话的知识分子的不坚定性辩护！这难道不是尾巴主义吗？这难道不是因留级而自夸吗？

通过党纲要比通过党章更能促进工作的集中化。这种冒充哲学的庸俗议论散发着多么浓厚的激进知识分子的气味，这种知识分子对资产阶级颓废思想比对社会民主主义要亲近得多！要知道，集中化这个词在这句名言里完全是从象征的意义上理解的。如果说这句话的人不善于或者不愿意思索，那么他们至少也应当回忆一下这个简单的事实：我们和崩得分子共同通过党纲，不仅没有使我们共同的工作集中化，而且也没有使我们避免分裂。在党纲问题上和在策略问题上的一致是保证党内团结，保证党的工作集中化的必要条件，但只有这个条件还是不够的（天啊！在今天一切概念都弄得混淆不清的时候，一个多么浅显的道理也要人翻来覆去地讲！）。为了保证党内团结，为了保证党的工作集中化，还需要有组织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在一个已经多少超出了家庭式小组范围的党里面，如果没有正式规定的党章，没有少数服从多数，没有部分服从整体，那是不可想象的。当我们在纲领和策略的基本问题上还没有一致时，我们曾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是处在一个涣散状态和小组习气盛行的时代，我们曾直截了当地声明，在统一之前必

须划清界限，我们当时还没有说到共同组织的形式，只是谈到在纲领和策略方面同机会主义斗争的那些新问题（这在当时确实是些新问题）。现在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斗争已经保证了表述在党纲和党关于策略的决议中的充分的一致；现在我们必须采取下一个步骤，于是我们就在我们大家的同意下采取了这个步骤：我们制定了把一切小组融为一体的统一组织的形式。现在却有人把这些形式破坏了一半，把我们拉向后退，退到无政府主义的行为，退到无政府主义的空话，退到恢复小组来代替党的编辑部，而现在又用什么识字课本比句法更能促使文理通顺来替这种倒退辩护！

三年前在策略问题上盛行一时的尾巴主义哲学，现在又在组织问题上复活了。我们不妨看看新编辑部发表的这样一段议论。亚历山德罗夫同志说："战斗的社会民主主义方针，在党内应当不单单通过思想斗争，而且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来实行。"编辑部教训我们说："把思想斗争和组织形式这样相提并论，的确不坏。思想斗争是一种过程，而组织形式不过是……形式〈在第 56 号的附刊第 4 版第 1 栏下面确实就是这样说的！〉，这些形式应当包着一种流动的、发展着的内容，即发展着的党的实际工作。"这种说法和那种说铁弹是铁弹，炸弹是炸弹[35]的笑话毫无二致。思想斗争是一种过程，而组织形式不过是包着内容的形式！问题在于我们的思想斗争是由较高级的形式，即对大家都有约束力的党组织的形式包着呢，还是由过去的涣散状态和小组习气的形式包着。人们把我们从较高级的形式拉回到较原始的形式上去，并且还为此辩护，说什么思想斗争是一种过程，而形式不过是形式。这和克里切夫斯基同志很久以前把我们从策略-计划拉回到策略-过程上去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不妨看一看新《火星报》为了反对那些似乎只顾形式却忽略了内容的人而说的这些关于"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的大话（第 58 号的社论）。难道这不是第二号阿基莫夫主义吗？头号阿基莫夫主义常拿"无产阶级斗争"的更"深刻"

内容，拿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来替社会民主党内某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策略任务的提法上的落后辩护。第二号阿基莫夫主义，现在也用组织不过是形式而整个实质在于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这种同样深奥的理由，来替社会民主党内某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组织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的落后辩护。替小兄弟操心的先生们，无产阶级是不怕组织和纪律的！无产阶级是不会去操心让那些不愿加入组织的大学教授先生和中学生先生因为在党组织的监督下工作，就被承认为党员的。无产阶级由它的全部生活养成的组织性，要比许多知识分子彻底得多。对我们的纲领和我们的策略已经有所认识的无产阶级，是不会用形式不如内容重要的口实来替组织上的落后辩护的。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我们党内某些知识分子，在组织和纪律方面缺乏自我教育，在敌视和鄙视无政府主义空话方面缺乏自我教育。正如头号阿基莫夫们从前诬蔑无产阶级，说它还没有成熟到进行政治斗争的地步一样，现在第二号阿基莫夫们也在诬蔑无产阶级，说它还没有成熟到组织起来的地步。已经成为自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并感到自己是党的一员的无产者，也一定会象他从前用十分鄙视的态度斥责策略问题上的尾巴主义那样来斥责组织问题上的尾巴主义。

最后，请看一看新《火星报》的那位“实际工作者”的深奥思想吧。他说：“建立一个能将革命家的活动〈用黑体是为了加深意思〉统一集中起来的‘战斗的’集中组织的思想，即使被人正确理解，也只有在有了这种活动的时候才会自然实现〈真是既新颖又聪明〉；组织本身作为一种形式〈注意，听着！〉，只能随着〈这里以及这段引文里其他各处的黑体，都是原作者用的〉构成其内容的革命工作的开展而成长起来。”（第 57 号）这岂不又一次使我们想起民间故事里的那个看到人家送葬时高喊“但愿你们拉也拉不完”的人物吗？[36]大概，我们党内没有哪一个实际工作者（不带引号的）不了解：我们活动的形式（即组织）老早就落在内容的后面了，并且落后得太远了；只有党内的伊万努什卡才会向落在后面的

人们喊：齐步前进！不要抢先！不妨拿我们党和崩得比较一下。毫无疑义，我们党的工作内容［注：且不必说，我们党的工作内容在代表大会上是按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精神确定的（在纲领等等中），这只是用斗争的代价换来的，是我们同那些反火星派分子以及在“少数派”内占大多数的泥潭派分子斗争的结果。关于“内容”问题，如把旧《火星报》所出版的 6 号（第 46—51 号）同新《火星报》所出版的 12 号（第 52—63 号）比较一下，那也是很有趣的。但这只好另外有机会再说了。］要比崩得的工作内容丰富、多样、广泛、深入得多。理论规模更巨大，纲领更成熟，对工人群众（不仅对有组织的手工业者）的影响更广泛更深刻，宣传鼓动工作更多样，在先进分子和普通分子那里的政治工作的脉搏更活跃，在游行示威和总罢工时开展的人民运动更壮阔，在非无产者阶层中进行的活动更有力。可是“形式”怎样呢？我们工作的“形式”同崩得工作的形式比起来竟落后到不能容忍的地步，落后得使每一个对自己党内事务不“袖手旁观”的人都感到痛心和羞愧。工作的组织比工作的内容落后，是我们的一个弱点，并且远在召开代表大会以前，远在组委会成立以前，就已经是我们的一个弱点了。由于形式不成熟、不牢固，我们无法采取继续前进的重大步骤来发展内容，因而造成了可耻的停滞，力量的浪费，言行的不一。大家都为这种言行不一而大伤脑筋，可是阿克雪里罗得们和新《火星报》的“实际工作者们”，却在这时来鼓吹他们的深奥思想：形式只应当随着内容自然地成长起来！

请看，如果有人想加深谬论并从哲学上替机会主义词句找根据，那么在组织问题（党章第 1 条）上所犯的小错误就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吧。要慢慢地走，要小心翼翼地曲折前进！[37]——从前我们就听见有人在策略问题上唱这个调子；现在我们又听见有人在组织问题上唱这个调子。组织问题上的尾巴主义是无政府个人主义者的心理的自然的和必然的产物，只要他开始把自己的（起初也许是偶然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上升为观点的体系，上升为一种特别的原则意见分歧，就会

是这种情况。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我们看见了这种无政府主义的开端；在新《火星报》上，我们又看见有人企图把它上升为观点的体系。这种企图十分明显地证实了我们在党代表大会上已经表示过的意见：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观点跟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者的观点是不同的。例如，新《火星报》的那位“实际工作者”（他的深奥思想我们已经领教过了）揭发我，说我把党想象成一个“大工厂”，厂长就是中央委员会（第 57 号的附刊）。这位“实际工作者”根本没有料到，他提出来的这个吓人的字眼一下子就暴露出既不了解无产阶级组织的实际工作又不了解无产阶级组织的理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工厂在某些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可怕的怪物，其实工厂是资本主义协作的最高形式，它把无产阶级联合了起来，使它纪律化，教它学会组织，使它成为其余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首脑。马克思主义是由资本主义训练出来的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正是马克思主义一贯教导那些不坚定的知识分子把工厂的剥削作用（建筑在饿死的威胁上面的纪律）和工厂的组织作用（建筑在由技术高度发达的生产条件联合起来的共同劳动上面的纪律）区别开来。正因为无产阶级在这种工厂“学校”里受过训练，所以它特别容易接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难以接受的纪律和组织。对这种学校怕得要死，对这种学校的组织作用一无所知，这正是那些反映小资产阶级生存条件的思想方法的特点，这种思想方法产生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叫作 Edelanarchismus 的无政府主义，即“贵族式的”无政府主义，我说也可以把它称作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这种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在俄国虚无主义者身上是特别突出的。党的组织在他们看来是可怕的“工厂”；部分服从整体和少数服从多数在他们看来是“农奴制”（见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品文），他们一听见在中央领导下实行分工，就发出可悲又可笑的号叫，反对把人们变成“小轮子和小螺丝钉”（在这方面他们认为特别可怕的，就是把编辑变成撰稿人），他们一听见别人提起党的

组织章程，就作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轻蔑地说（对“形式主义者”），完全不要章程也可以。

这是难以置信的，但这是事实。马尔托夫同志在《火星报》第 58 号上就是这样教训我的，并且为了更加使人信服，还从《给一位同志的信》里引了我本人的话。举一些涣散时代的例子，小组时代的例子，来替在党性时代保持和赞美小组习气、无政府状态辩护，这难道不是“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这难道不是尾巴主义吗？

为什么从前我们不需要章程呢？因为当时党是由一些彼此没有任何组织联系的单个小组组成的。当时由这一小组转到另一小组，只是个人“自愿”的事情，并没有任何正式规定的整体意志作为他的行动的准绳。各个小组内部的争论问题不是按照章程，“而是用斗争和退出相威胁”来解决，正如我在《给一位同志的信》［注：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7 卷第 18 页。——编者注］里根据许多小组特别是我们六人编辑小组的经验所说的那样。在小组时代，这种现象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可是谁都没有想到要赞美它，没有认为它是理想的；大家都埋怨过这种涣散状态，大家都为此感到苦恼，渴望把各个零星小组融为一个正式的党组织。现在，这种融合实现了，却有人把我们拉向后退，用冒充最高组织观点的无政府主义的空话来款待我们！在那些过惯了穿着宽大睡衣、趿拉着拖鞋的奥勃洛摩夫[38]式的家庭式小组生活的人们看来，正式章程是太狭隘、太狭窄、太累赘、太低级了，太官僚主义化、太农奴制度化了，太约束思想斗争的自由“过程”了。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不了解，正式章程所以必要，正是为了用广泛的党的联系来代替狭隘的小组联系。一个小组内部或各个小组之间的联系，在过去是不需要规定的，也是无法规定的，因为这种联系是靠朋友关系或盲目的、没有根据的“信任”来维持的。党的联系不能而且也不应当靠这两种东西来维持。党的联系一定要以正式的，即所谓“用官僚主义态度”（在自由散漫的知识分子看来）制定的章程为

基础，也只有严格遵守这个章程，才能保证我们摆脱小组的刚愎自用，摆脱小组的任意胡闹，摆脱美其名为思想斗争的自由“过程”的小组争吵。

新《火星报》编辑部打出的一张反对亚历山德罗夫的王牌，就是用教训的口吻指出：“信任是一种微妙的东西，决不能把它钉到人心和脑袋里去。”（第 56 号的附刊）编辑部不了解，正是提出信任——单纯的信任——这一范畴本身，再一次把它那种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组织上的尾巴主义暴露了出来。当我还只是一个小组——无论《火星报》六人编辑小组或《火星报》组织——的成员时，譬如我为了说明我不愿意同某某人在一起工作，我有权拿那种盲目的、没有根据的不信任当作唯一的借口。当我成了一个党员时，我就没有权利只凭感情来表示不信任了，因为我这样做，便给以前小组习气盛行时代的一切任意胡闹和刚愎自用的现象大开方便之门；我有责任用正式的理由，即根据我们的纲领、我们的策略、我们党章中某一项正式规定的原则来说明我为什么“信任”或“不信任”；我就不能只限于盲目的“信任”或“不信任”，而必须承认我自己的决定以及党内任何一部分的一切决定都要对全党负责；我必须遵照正式规定的手续来表示自己的“不信任”，来实现根据这种不信任所得出的观点和愿望。我们已经从盲目“信任”的小组观点，提高到党的观点。党的观点要求我们按照受监督的和正式规定的手续，来表示和检查信任，可是编辑部却把我们拉向后退，并把自己的尾巴主义叫作新的组织观点！

请看，我们的所谓党的编辑部是怎样议论那些可能要求派代表参加编辑部的著作家小组的。时时处处都藐视纪律的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者教训我们说：“我们不会发怒，我们不会叫起纪律来。”假如提出这种要求的是一个明白事理的集团，我们就同它“达成协议”（原文如此！）；不然我们就对它的要求置之一笑。

你看，这该是一种多么高贵的与庸俗的“工厂式的”形式主义针锋相对的态度呀！其实，这只是编辑部赠给党的一套略加修饰的、充满小组习气的辞令，编

辑部感到它不是一个党的机关，而是旧时小组的残余。这种立场的内在的虚伪性，必然会产生无政府主义的深奥思想，这种深奥思想把涣散状态推崇为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原则，同时在口头上又伪善地把这种涣散状态说成是早已过去了的事情。根本不需要什么由上下各级党机关构成的体系，因为在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看来，这种体系不过是办公室里拟制的司厅科股等等的玩意（见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品文）；根本不需要什么部分服从整体的原则，根本不需要对党的“达成协议”或划清界限的办法作出“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规定，还是让人们去空谈“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组织方法，崇尚旧时的小组争吵吧。

正是在这方面，受过“工厂”训练的无产者可以而且应当来教训无政府个人主义。觉悟的工人早已脱离了害怕同知识分子打交道的幼稚状态。觉悟的工人善于尊重他在知识分子社会民主党人那里发现的比较丰富的知识、比较广阔的政治视野。可是，随着我们真正的政党的形成，觉悟的工人应当学会辨别无产阶级军队的战士的心理和爱说无政府主义空话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应当学会不仅要求普通党员，而且要求“上层人物”履行党员的义务，应当学会象他很久以前蔑视策略问题上的尾巴主义那样，来蔑视组织问题上的尾巴主义！

新《火星报》在组织问题上的立场的最后一个特点，是同吉伦特主义[39]和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维护自治制，反对集中制。关于官僚主义和专制的号叫，关于“非火星派分子〈在代表大会上维护自治制的非火星派分子〉受到不应有的忽视”的惋惜，关于有人要求别人“唯命是从”的滑稽喊叫，关于“庞巴杜尔作风”的伤心抱怨等等，正是含有这样的原则的意思（如果有的话［注：这里我也和在本节其他地方一样，把这些号叫的“增补”的意思撇开不谈。］）。任何一个党的机会主义派总是维护任何一种落后表现，为它辩护，无论在纲领方面、策略方面或组织方面都是如此。新《火星报》维护组织方面的落后表现（尾巴主义），是同维护自治制密切联系着的。诚然，一般说来，经过旧《火

星报》三年来的宣传揭露，自治制已经名声很坏了，因此新《火星报》公开维护自治制未免还有些害羞；它还硬要我们相信它喜欢集中制，不过它用来证明这一点的，只是集中制这个词用了黑体罢了。其实，只要稍微考察一下新《火星报》的“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吗？）所谓集中制的“原则”，处处都会发现自治制的观点。难道现在不是所有的人都清楚看到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在组织问题上已经转到阿基莫夫那里去了吗？难道他们自己不是用所谓“非火星派分子受到不应有的忽视”这句名言郑重地承认了这一点吗？难道阿基莫夫和他的朋友们在我们党的代表大会上所维护的不是自治制吗？

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所维护的正是自治制（如果不是无政府主义的话），当时他们令人可笑地竭力证明：部分不应当服从整体，部分在决定自己对整体的关系时可以有自治权，确定这种关系的国外同盟章程可以在违反党内多数的意志、违反党中央机关的意志的情况下生效。现在马尔托夫同志在新《火星报》（第 60 号）上说到中央委员会指定地方委员会委员问题时公开维护的也正是自治制[40]。我不来谈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和现在在新《火星报》上用来维护自治制的那些幼稚的诡辩［注：马尔托夫同志列举党章各项条文时，恰巧遗漏了说明整体对部分的关系的一条：中央委员会“分配全党人力”（第 6 条）。如果不能把工作人员从一个委员会调到另一个委员会，那还怎么分配人力呢？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还需要加以说明，真叫人感到难为情。]，我认为这里重要的是，应当指出他有维护自治制、反对集中制的明显倾向，这种倾向是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所固有的根本特征。

在新《火星报》（第 53 号）上拿“形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原则”（黑体是原作者用的）和“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原则”相对照，要算是分析官僚主义这个概念的唯一尝试了。这种对照（可惜，这种对照也象提到非火星派分子时那样没有加以发挥，没有加以阐明），也多少有些道理。官僚主义对民主主义，这也就是集

中制对自治制，也就是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原则对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的组织原则。后者力求自下而上地来行动，因此在凡是可能的地方和凡是可能的程度内，都坚决主张实行自治制，主张实行达到（在那些狂热坚持这点的人们那里）无政府主义地步的“民主主义”。前者力求由上层出发，坚决主张扩大中央对于部分的权利和权限。在涣散状态和小组习气盛行的时代，这种上层机关（革命社会民主党力求在组织上由它出发）必然是一个由于自己的活动和自己的革命彻底性而享有极大威信的小组（在我们这里就是《火星报》组织）。在恢复党的真正统一并在这个统一的基础上解散各个过了时的小组的时代，这种上层机关必然是党的代表大会，即党的最高机关；代表大会尽可能把各个积极组织的所有代表团结起来，任命中央机关（它的成分往往使党内的先进分子而不是落后分子比较满意，让党内的革命派而不是机会主义派比较喜欢），使它们成为党的最高机关，直到召开下届代表大会为止。至少在欧洲社会民主党人那里情况是如此，而且这种为无政府主义者所深恶痛绝的惯例在亚洲社会民主党人中间也开始流行起来，虽然流行得很慢，不免要遇到困难，不免要遇到斗争，不免要遇到无谓争吵。

非常值得指出的是，我在上面所谈到的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的这些根本特征（自治制、老爷式的或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义、尾巴主义和吉伦特主义），在世界各国社会民主党内，凡是划分为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试问在什么地方没有这种划分呢？），都可以看到，只是作相应的改变（mutatis mutandis）罢了。这种情形最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暴露得特别明显，因为第 20 号萨克森选区竞选的失败（所谓格雷事件［注：格雷 1903 年 6 月 16 日曾在第 15 号萨克森选区里被选为国会议员，但他在德累斯顿代表大会[41]以后辞去了议员职务。第 20 号选区在议员罗森诺死后出现空缺，该区选民又想推举格雷为候选人。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萨克森中央鼓动委员会对此表示反对，虽然它们没有权利正式禁止推举格雷为候选人，但是它们终于使格雷放弃了候选人的资格。在这次选举中，社会民

主党人遭到了失败。]）把党的组织原则提到日程上来了。由这一事件引起了原则问题，这主要是德国机会主义者推波助澜的结果。格雷（他从前是一个牧师，又是一本不无名气的书《当工厂工人的三个月》的作者，是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上的“主角”之一）本人是一个顽固的机会主义者，于是彻底的德国机会主义者的机关刊物《社会主义月刊》[42]就立刻来为他“鸣不平”。

纲领上的机会主义，自然是同策略上的机会主义和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相联系的。当时出面陈述“新”观点的是沃尔弗冈·海涅同志。为了向读者说明这个参加社会民主党并带来机会主义思想习气的典型知识分子的面目，只要指出沃尔弗冈·海涅同志是一个比德国的阿基莫夫同志小一点而比德国的叶戈罗夫同志大一点的人物就够了。

沃尔弗冈·海涅同志在《社会主义月刊》上，也象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新《火星报》上那样大举进攻。单是文章的标题《对格雷事件的几点民主意见》（《社会主义月刊》4 月第 4 期），就已经很了不起。内容也同样非比寻常。沃·海涅同志反对“侵犯选区自治权”，捍卫“民主原则”，抗议“委任的上司”（即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干涉人民自由选举议员。沃·海涅同志教训我们说，问题并不在于一次偶然事件，而在于一种总的倾向，即“党内的官僚主义和集中制倾向”，对这种倾向，据说过去人们就有所觉察，但是现在变得特别危险了。必须“在原则上承认：党的地方机关是党的生活的体现者”（这是从马尔托夫同志所写的《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这本小册子中抄来的）。不要“习惯于让一切重要政治决定都出自一个中央机关”，党要防备“脱离实际生活的教条政策”（这是从马尔托夫同志在党代表大会上大谈“实际生活一定会显示自己的力量”那篇发言中借用来的）。沃·海涅同志加深自己的论据说：“如果细心观察事物的根源，如果把这次也和任何时候一样起过不小作用的种种个人冲突撇开不谈，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这种激烈反对修正主义者的斗争〈黑体是原作者用的，大概是暗示“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和“对

修正主义者的斗争”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吧〉，主要是党内的官方人士对‘局外人’〈沃·海涅显然还没有读过那本论反对戒严状态的小册子，因此只好借用一个英国习惯用语：Outsidertum〉不信任，传统对一切异乎寻常的现象不信任，没有个性的机关对一切有个性的东西不信任〈见阿克雪里罗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关于反对压制个人主动性的决议案〉，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说明的那种倾向，即党内的官僚主义和集中制倾向。”

“纪律”这个概念在沃·海涅同志的心里所引起的高尚愤怒，并不亚于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他写道：“有人指责修正主义者缺乏纪律，是因为他们给《社会主义月刊》写过文章，有人甚至不愿承认这个刊物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因为它不受党的监督。单是这种试图缩小‘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概念的做法，单是这种让人们在应当普遍实行绝对自由的思想生产方面遵守纪律的要求〈请回忆一下所谓思想斗争是一个过程，而组织形式不过是形式的说法〉，就足以证明官僚主义和压制个性的倾向了。”接着沃·海涅又滔滔不绝地百般攻击这种创造“一个包罗万象的、尽量集中化的巨大组织，一个策略，一个理论”的可恨倾向，攻击“绝对服从”、“盲目服从”的要求，攻击“简单化的集中制”等等，真是一字不差地“模仿阿克雪里罗得”。

沃·海涅所挑起的争论激烈起来了，因为在德国党内这个争论没有掺杂什么由增补问题引起的无谓争吵，因为德国的阿基莫夫们不仅在代表大会上而且经常在专门的机关刊物上暴露自己的面目，所以这次争论很快就变成了对正统思想和修正主义在组织问题上的原则倾向的分析。以革命派（它当然也和我们这里一样被人加上“独裁”和“宗教裁判”等等的可怕罪名）代表之一的资格出面说话的，是卡·考茨基（《新时代》1904 年第 28 期的《选区和党》——《Wahlkreis und Partei》一文）。他说，沃·海涅的论文“表明整个修正主义派的思想进程”。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法国，在意大利，机会主义者都在竭力维护自治制，力图削弱党

的纪律，力图把党的纪律化为乌有，他们的倾向到处都在导向瓦解组织，导向把“民主原则”歪曲为无政府主义。卡·考茨基教训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者说：“民主并不是没有权力，民主并不是无政府状态，民主是群众对他们委任的代表的统治，它不同于冒充人民公仆而实际上是人民统治者的其他权力形式。”卡·考茨基在详细考察了各国机会主义的自治制所起的瓦解组织的作用后指出，正是由于“大批资产阶级分子”［注：卡·考茨基把饶勒斯拿来做例子。这种人愈是倾向于机会主义，他们也就“必然觉得党的纪律对于他们的自由个性是一种不可容许的约束”。］参加社会民主党，才使机会主义、自治制和违反纪律的倾向严重起来，并且一再提醒说，“组织是无产阶级解放自己的武器”，“组织是无产阶级所特有的阶级斗争的武器”。

德国的机会主义比法意两国的弱些，所以德国的“自治制倾向，暂时还只表现为唱一些反对独裁者和大宗教裁判者，反对开除教籍［注：德语 Bannstrahl（开除教籍）这个词，可以说是俄语的“戒严状态”和“非常法”的同义语。这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的“吓人的字眼”。］和追究异端的相当动听的高调，表现为无休止的吹毛求疵和无谓争吵，而对这种吹毛求疵和无谓争吵加以分析，又只会引起无休止的口角”。

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比德国的更弱，所以俄国的自治制倾向所产生的东西，其思想成分更少，“动听的高调”和无谓争吵的成分更多，这原是不足为奇的。

难怪考茨基要作出结论说：“也许，世界各国修正主义在任何其他问题上，都不象在组织问题上表现得那样性质一致，虽然其形态各不相同，色彩互有差异。”在谈到正统思想和修正主义在这方面的基本倾向时，卡·考茨基也用了“吓人的字眼”：官僚主义对（Versus）民主主义。卡·考茨基写道：据说，给党的执行委员会一种权利，让它对各地方选区选择候选人（国会议员候选人）施加影响，就是“无耻地侵犯民主原则，因为民主原则要求全部政治活动自下而上地由群众独立自主

地进行，而不是自上而下地用官僚主义的办法进行……但是，如果说有什么真正民主的原则，那它就是多数应比少数占优势，而不是相反……”任何一个选区选举国会议员都是关系全党的一个重要问题，所以党至少应当经过党所信任的人（Vertrauensmanner）对指定候选人施加影响。“如果谁觉得这太官僚主义化或太集中化，他不妨提出由全体党员（Samtliche Parteigenossen）来直接表决候选人。既然这办不到，那就不必抱怨说，这项职能也同其他许多有关全党的职能一样由党的一个或几个机关来执行，就是缺乏民主精神。”按照德国党的“习惯法”，从前各个选区也是就提出某某人为候选人的问题同党的执行委员会进行“同志式的商议”的。“可是党现在已经太大了，这个不言而喻的习惯法已经不够了。当人们不再承认习惯法为不言而喻的东西时，当这个习惯法规定的内容以及这个习惯法本身的存在都引起争议时，那它就不成其为法了。因而绝对需要精确地规定这个法，把它明文规定下来……”作更加“精确的章程性的规定（statutarische Festlegung）[注：把卡·考茨基这些关于用正式规定的章程性法规代替不言而喻的习惯法的意见，拿来和我们党尤其是编辑部从党代表大会以来所经历的全部“变更”对照一下，是很有教益的。参看维·伊·查苏利奇的发言（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见第 66 页及以下各页），她未必能领会现在发生的这种变更的全部意义。[43]]，从而加强组织的严格性（groβere Staffheit）”。

这样你们就看到：在另一个环境中也有同样的斗争，即党内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在组织问题上的斗争，有同样的冲突，即自治制同集中制的冲突，民主主义同“官僚主义”的冲突，削弱组织和纪律严格性的倾向同加强组织和纪律严格性的倾向的冲突，不坚定的知识分子的心理同坚定的无产者的心理的冲突，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同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的冲突。试问，资产阶级民主派——不是捉弄人的历史仅仅私下里许诺有朝一日会指给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看的那个资产阶级民主派，而是实实在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它在德国也有一些聪明敏锐的代表

人物，并不亚于我国的解放派先生们，——当时是怎样对待这种冲突的呢？德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马上起来对这个新的争论作出反应，并且也和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一样，也和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一样，竭力支持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德国交易所资本家的著名的《法兰克福报》[44]发表了一篇气势汹汹的社论（1904 年 4 月 7 日《法兰克福报》第 97 号晚上版），它表明肆无忌惮地抄袭阿克雪里罗得的言论简直已经成了德国报刊的一种流行病。法兰克福交易所的威风凛凛的民主派分子大肆攻击社会民主党内的"专制"、"党内独裁"、"党内首长的专制统治"，攻击打算用来"惩罚整个修正主义"（请回忆一下"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这句话）的"开除教籍"的作法，攻击"盲目服从"、遵守"死板纪律"的要求，攻击"唯命是从"、把党员变成"政治僵尸"（这比讲小螺丝钉和小轮子厉害得多！）的要求。交易所的骑士们看到了社会民主党内的反民主的制度，不禁愤愤不平地说："请看，任何个人特性，任何个性都要加以取缔，因为它们有产生法国那样的情况，即产生饶勒斯主义和米勒兰主义的危险，辛德曼〈在萨克森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大会上〉叙述这个问题时就直截了当地这样说过。"

总之，如果说新《火星报》关于组织问题的新字眼有什么原则含义，那么毫无疑问，这就是机会主义的含义。证实这个结论的，既有对我们那次分成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党代表大会的全部分析，又有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实例，在这些社会民主党内，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也是用同样的倾向和同样的责难表现出来的，并且往往用的是同样的字眼。当然，各国党的民族特点和各国政治条件的不同都会发生相当的影响，因而使得德国机会主义完全不同于法国机会主义，法国机会主义完全不同于意大利机会主义，意大利机会主义完全不同于俄国机会主义。但是，虽然有上述种种条件的差别，所有这些党内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之间的基本划分显然是相同的，机会主义在组织问题上的思想过程和倾向显然是相同的。[注：现在谁也不会怀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过去在策略问题上分成经济派

和政治派，同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分为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是一样的，尽管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同志同冯·福尔马尔和冯·埃尔姆同志，或同饶勒斯和米勒兰有很大的区别。同样，在组织问题上的基本划分也毫无疑义是相同的，尽管没有政治权利的国家和有政治自由的国家之间的条件大不相同。极其值得注意的是，讲原则的新《火星报》编辑部稍稍涉及了一下考茨基和海涅的争论（第 64 号），便畏缩地避开了一切机会主义派和一切正统派在组织问题上的原则倾向问题。〕由于在我国马克思主义者和我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有许多激进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所以由这种知识分子心理产生的机会主义不论过去或现在都必然在各个不同的方面用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曾经在我们世界观的基本问题上，即在纲领问题上，同机会主义进行了斗争，目的方面的根本分歧不可避免地使那些把我国合法马克思主义弄得声名狼藉的自由派同社会民主党人完全分道扬镳。后来我们在策略问题上同机会主义进行了斗争，我们同克里切夫斯基和阿基莫夫两位同志在这个比较次要问题上的分歧自然只是暂时的，并没有弄到各自成立政党的地步。现在我们应当克服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这些问题同纲领问题和策略问题相比当然更少具有根本意义，但是它们在目前却出现在我们党的生活的前台。

谈到同机会主义作斗争，任何时候都不应当忘记整个现代机会主义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特征：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不可捉摸。机会主义者按其本性来说总是回避明确地肯定地提出问题，谋求不偏不倚，在两种互相排斥的观点之间象游蛇一样蜿蜒爬行，力图既“同意”这一观点，又“同意”另一观点，把自己的不同意见归结为小小的修正、怀疑、天真善良的愿望等等。纲领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者爱德·伯恩施坦同志是“同意”党的革命纲领的，虽然他本来显然想“根本改良”这个纲领，但是他认为这样做是不合时宜的，是不适当的，还不如阐明“批判”的“一般原则”（主要是用无批判的态度抄袭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原则和字眼）

来得重要。策略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者冯·福尔马尔同志也是同意革命社会民主党的老的策略的，也是多半只限于唱唱高调，提出小小的修正，讲几句风凉话，而根本不提出任何明确的“内阁主义的”策略[45]。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者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也是直到现在并没有提出什么可以“用章程确定下来的”明确的原则论点，尽管人们一再公开提醒他们这样做；他们本来也愿意，非常愿意“根本改良”我们的组织章程（《火星报》第 58 号第 2 版第 3 栏），但是他们宁愿先来讲“一般组织问题”（因为如果按新《火星报》精神把我们这个不管第 1 条如何但毕竟是集中制的章程实行一番真正根本的改良，那就必然会导致自治制，可是马尔托夫同志当然甚至在自己面前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在原则上是倾向自治制的）。因此，他们在组织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也就来得五花八门：多半是唱一些所谓专制和官僚主义、所谓盲目服从、小螺丝钉和小轮子等等幼稚的动听的高调，——这种高调是如此幼稚，以致使人很难确定其中所包含的哪些真正是原则的意思，哪些真正是增补问题的意思。可是他们愈陷愈深：他们企图对他们所仇恨的“官僚主义”加以分析并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就不可避免地要导向自治制；他们企图“加深”和论证自己的观点，就不可避免地要为落后现象辩护，走向尾巴主义，陷入吉伦特主义的空谈。最后，就出现了无政府主义原则，它是作为唯一的、真正明确的、因而在实践上表现得特别明显的（实践总是走在理论前面的）原则表现出来的。藐视纪律——自治制——无政府主义，这就是我们那个组织上的机会主义时而爬上时而爬下的梯子，它从一个梯级跳到另一个梯级，巧妙地回避明确说出自己的原则。[注：现在，回想一下党章第 1 条的争论，就会清楚地看到，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党章第 1 条问题上的错误的发展和加深，必然导向组织上的机会主义。马尔托夫同志的基本思想，即自行列名入党，正是虚伪的“民主主义”，是自下而上建立党的思想。相反，我的思想所以是“官僚主义化的”，就是因为我主张自上而下，由党代表大会到各个党组织来建

立党。无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也好，无论是无政府主义的词句也好，无论是机会主义的、尾巴主义的深奥思想也好，都是在对党章第 1 条的争论中就显露了出来。马尔托夫同志在《戒严状态》这本小册子（第 20 页）中说新《火星报》上“开始了思想工作”。这种说法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因为他和阿克雪里罗得确实是从党章第 1 条开始把思想按新方向推进的。只是不幸这个新方向是机会主义的方向。他们愈顺着这个方向“工作”下去，他们的这种工作愈脱离增补问题的无谓争吵，他们也就愈陷到泥潭里去。普列汉诺夫同志在党代表大会上已经清楚地看出了这一点，并且他在《不该这么办》一文中又再次警告他们说：我甚至情愿把你们增补进来，只是希望你们不要顺着这条只会走到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去的道路走下去。——但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两人并没有接受这个忠告，他们说：怎么？不顺着这条路走？要赞同列宁所说增补不过是一种无谓争吵的意见吗？绝对不行！我们要向他表明我们是些讲原则的人！——果然表明了。他们已经向大家具体地表明了，如果说他们有什么新的原则，那就是机会主义的原则。] 在纲领和策略上的机会主义那里，也可以看到同样的阶梯：藐视“正统思想”、虔诚信仰、狭隘死板——修正主义的“批评”和内阁主义——资产阶级民主。

在一切现代机会主义者尤其是我国少数派的一切著作中发出的那种绵延不断的委屈声调，都是同仇恨纪律的心理有密切联系的。据说，有人在迫害他们，排挤他们，驱逐他们，围困他们，驱策他们。在这些字眼里流露出来的真实心理和政治真相，大概要比编造被驱策者和驱策者[46]这种诙谐而动听的笑话的人自己所预料的多得多。的确，拿我们党代表大会的记录来看，就可以看到少数派都是一些在某个时候和因为某件事情在革命社会民主党那儿受到委屈的人。这中间有崩得分子和工人事业派分子，我们让他们“委屈”得退出了代表大会；这中间有南方工人派分子，他们因为一切组织尤其是他们自己的组织被取消而受到极大的委屈；这中间有马霍夫同志，他每次发言的时候都受到了委屈（因为他每次总要

出丑）；最后，这中间还有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他们受到的委屈，就是他们因为党章第 1 条而被加上了“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就是他们在选举中遭到了失败。所有这些令人伤心的委屈，都不象许多庸人至今想象的那样，是由于什么人说了不可容许的挖苦话，作了激烈的攻讦，进行了狂热的论战，由于什么人粗野地甩门，什么人挥舞拳头进行威胁等等偶然引起的结果，而是由于《火星报》整个三年思想工作必然产生的政治结果。既然我们在这三年中不是光耍耍嘴皮子，而是表示了一种应该转变成行动的信念，所以，我们在代表大会上也就不能不对反火星派和“泥潭派”进行斗争。在我们同站在前列勇敢地进行过斗争的马尔托夫同志一起把这样一大堆人再三地委屈过以后，我们只是稍微把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和马尔托夫同志委屈一下，他们就受不了了。量转变成了质。发生了否定的否定。所有受到委屈的人忘记了相互间的嫌隙，痛哭流涕地彼此拥抱在一起，并扯起了旗帜，举行“反对列宁主义的起义”[注：这种惊人之语是马尔托夫同志创造的（《戒严状态》第 68 页）。马尔托夫同志一直想等到他那方面凑够五个人时举行“起义”来反对我一个人。马尔托夫同志所采用的论战手法并不高明，他想用拼命恭维对手的办法来消灭对手。]。

当先进分子起义反对反动分子时，起义是一件大好事。革命派举行起义反对机会主义派，这是很好的。机会主义派举行起义反对革命派，那就是坏事了。

普列汉诺夫同志只得以可以说是战俘的身分参加到这种坏事中去。他抓住起草支持“多数派”的某些决议的人的个别不恰当的词句，竭力“泄愤出气”，并高声叹息道：“穷得可怜的列宁同志啊！他的正统派拥护者们真是太妙了！”（《火星报》第 63 号的附刊）

可是，普列汉诺夫同志，如果说我穷得可怜，那么，新《火星报》编辑部就应该是十足的叫花子了。无论我怎样穷，我总还没有落到如此绝对贫困的地步，以致只好闭起眼来不看党代表大会，而到某些地方委员会委员的决议中找材料来

锻炼自己的机智。无论我怎样穷，我总比某些人富千百倍，他们的拥护者不是偶而说出一两句不恰当的话，而是在一切问题上，不论在组织问题上也好，在策略问题或纲领问题上也好，都死死抓住同革命社会民主党原则相反的原则不放。无论我怎样穷，我总还没有穷到只好把这样一些拥护者赠给我的颂词向公众隐瞒起来的地步。可是新《火星报》编辑部却不得不这样做。

读者们，你们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沃罗涅日委员会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吗？如果你们不知道，可以读一读党代表大会的记录。你们从那里可以看出，这个委员会的方向完全由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两同志表现了出来，这两位同志在代表大会上对我们党的革命派进行过全面的斗争，并且多次被大家——从普列汉诺夫同志起到波波夫同志止——列为机会主义者。正是这个沃罗涅日委员会在它的一月份的传单（1904 年 1 月第 12 号）上声明说：

“去年在我们不断发展的党内，发生了一件对于党有重要意义的大事件：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即由党的组织的代表参加的大会。召集党代表大会本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而在君主制的条件下更是一件很冒险很困难的事情，因此难怪召集这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做得很不完善；代表大会本身虽然完全顺利地举行过了，可是并没有满足党对它提出的一切要求。受 1902 年代表会议委托负责召开代表大会的那些同志被逮捕了，召开代表大会的工作只是由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一个派别——火星派——指派的人担任的。许多不属于火星派的社会民主党人组织，都没有被吸收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代表大会制定党纲和党章的任务执行得极不完善，连参加代表大会的人自己也承认，党章里含有‘可能引起危险的误解’的重大缺陷。在代表大会上，火星派本身分裂了，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许多从前似乎完全接受《火星报》的行动纲领的重要人物，也都意识到该报许多主要由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两人所主张的观点不切合实际。虽然他们两个人在代表大会上也占过上风，可是实际生活

的力量，实际工作（一切非火星派分子也参加了的实际工作）的要求，很快就纠正了理论家的错误，并且在代表大会以后就作了重大的修正。《火星报》大大地改变了，并且答应细心听取社会民主党一切活动家的要求。这样，虽然代表大会的工作应当由下届代表大会加以审查，而且这些工作连代表大会参加者也认为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因此也就不能作为不可改变的决议要党接受，可是代表大会澄清了党内状况，对于党今后的理论工作和组织工作提供了大量的材料，因而对全党的工作来说也是一个大有教益的经验。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和制定的党章，将受到一切组织的注意，但是由于它们具有显而易见的不足之处，许多组织都反对只以它们为指南。

沃罗涅日委员会充分理解全党工作的重要性，对有关组织代表大会的一切问题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它充分意识到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情的重要性，欢迎已经成了中央机关报（主要机关报）的《火星报》所发生的转变。虽然党内和中央委员会内的状况还不能令我们满意，但是我们相信，困难的建党工作经过共同的努力是会日益改进的。鉴于有许多谣传，沃罗涅日委员会特向同志们声明，根本不存在沃罗涅日委员会退党的问题。沃罗涅日委员会十分了解，象沃罗涅日委员会这样一个工人组织退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会是一个多么危险的先例，会多么有损于党的声誉，这对那些可能仿效这种先例的工人组织是多么的不利。我们不应当制造新的分裂，而应当坚决努力使一切觉悟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统一成一个党。何况第二次代表大会是一个例行的大会，而不是一个成立大会。开除出党只能根据党的裁决来进行，任何一个组织，甚至连中央委员会也没有权利把某一个社会民主党组织开除出党。况且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章第8条已经规定，任何一个组织都在本地的事务方面享有自治权（自主权），因此沃罗涅日委员会有充分的权利把自己的组织观点贯彻到实际生活中去，贯彻到党内来。”

新《火星报》编辑部在第 61 号上引证这个传单时，转载了上面这一大段文字的后一部分，即用大号字排印的这一部分；至于前一部分，即用小号字排印的那一部分，编辑部宁愿删去不要。

大概是有些不好意思吧。

注释：

[30]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这些话出自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及其任务》一文，其中自由派的文坛领袖是指彼·伯·司徒卢威，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是暗指列宁。——380。

[31]这里说的是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彼·伯·司徒卢威。1894 年秋，列宁在彼得堡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代表参加的一次讨论会上，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的报告，批判了司徒卢威同其他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这篇报告后来成为他 1894 年底至 1895 年初撰写的《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一文（见《列宁全蒙》第 2 版第 1 卷第 297—465 页）的基础。——381。

[32]列宁指尔·马尔托夫在《火星报》第 62 号上发表的《我们能这样去准备吗？》一文。该文与拥护多数派的三个乌拉尔委员会论战，反对它们坚持的必须建立严格保守秘密的组织以准备全俄武装起义的观点，认为这是空想和搞密谋活动，是 19 世纪 40 年代和 60 年代法国革命家的策略。——383。

[33]他们在描画什么人的肖像？他们从哪里听过这种对话？出自俄国诗人米·尤·莱蒙托夫的对话体诗《编辑、读者与作家》。诗人通过读者对编辑的批评，表达了对当时一些文学作品的不满。列宁借用这句话来嘲讽新《火星报》。——384。

[34]葡萄是酸的！一语出自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狐狸和葡萄》。狐狸想吃葡萄够不着，就宽慰自己说："这葡萄看上去挺好，其实都没熟，全是酸的！"——386。

[35]铁弹是铁弹，炸弹是炸弹出自俄国说书艺人伊·费·哥尔布诺夫讲的故事《在大炮旁》。故事说，两个士兵在大炮旁边议论炮弹。士兵甲认为这门大炮要是装上铁弹就好了，士兵乙却认为要是装上炸弹就更好。两人争论起来，但谁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其实他们根本不懂得他们谈论的东西。——388。

[36]指俄国民间故事里的傻瓜伊万努什卡。他经常说不合时宜的话，并因此而挨揍。——389。

[37]这两句话引自尔·马尔托夫的一首讽刺诗《现代俄国社会党人之歌》。该诗用纳尔苏修斯·土波雷洛夫（意为骄矜的蠢猪）这一笔名发表于1904年4月《曙光》杂志第1期。诗中嘲笑了经济派的观点及其对自发性的盲目崇拜。——390。

[38]奥勃洛摩夫是俄国作家伊·亚·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的主人公，他是一个怠惰成性、害怕变动、终日耽于幻想、对生活抱消极态度的地主。——392。

[39]吉伦特主义即自治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吉伦特派在国家体制问题上主张各省自治，成立联邦。——395。

[40]指1904年2月25日《火星报》第60号上刊载的尔·马尔托夫的文章《当务之急》。他在这篇文章中鼓吹党的地方委员会在决定自己的人选的问题上对中央委员会保持"独立性"，并且攻击莫斯科委员会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通过的决议：该委员会根据党章第9条服从中央委员会一切命令。——396。

[41]德国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于1903年9月13—20日举行。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党的策略和同修正主义作斗争的问题。大会批评了爱·伯恩施坦、保·格雷、爱·大卫、沃·海涅等人的修正主义观点，并以压倒多数票（288票对11票）

通过了谴责修正主义者力图改变党的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老策略的决议。但是代表大会没有把修正主义分子开除出党，他们在大会后继续宣传自己的机会主义观点。——397。

[42]《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的主要刊物，也是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刊物之一，1897—1933 年在柏林出版。编辑和出版者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约·布洛赫。撰稿人有爱·伯恩施坦、康·施米特、弗·赫茨、爱·大卫、沃·海涅、麦·席佩尔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杂志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398。

[43]指维·伊·查苏利奇在 1903 年 10 月 28 日同盟代表大会第 3 次会议上的发言。在谈到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问题时，她认为，即使编辑部内部有分歧，由党的代表大会来改变编辑部的组成也是不必要的。——402。

[44]《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是德国交易所经纪人的报纸，1856—1943 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402。

[45]“内阁主义的”策略（内阁主义，内阁社会主义，米勒兰主义）是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反动政府的机会主义策略。这一术语是因法国社会党人亚·艾·米勒兰于 1899 年加入瓦尔德克-卢梭的资产阶级政府而产生的。——405。

[46]指尔·马尔托夫攻击多数派的诙谐性文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简明宪法（“坚定派”最高章程）》。这个《宪法》作为他的《当务之急》一文的附录发表于 1904 年 1 月 25 日《火星报》第 58 号。马尔托夫在这个《宪法》中歪曲多数派的组织原则，说什么“党分为驱策者和被驱策者”；“为了利于集中制，驱策者有不同的信任级别，而被驱策者的权利都是平等的”等等。——406。

（十八）稍微谈谈辩证法。两个变革

只要大体上看一看我们党内危机的发展经过，我们就不难看出，斗争双方的基本成分，除了小小的例外，始终没有改变。这是我们党内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之间的斗争。可是，这个斗争经过了各种不同的阶段，而每个想透彻了解在这方面堆积如山的大量文字材料的人，每个想透彻了解那许许多多片断的例证、孤立的引文、个别的责难等等的人，都必须对每个斗争阶段的特点有一确切的认识。

我们可以把彼此显然不同的一些主要阶段列举如下：（1）关于党章第 1 条问题的争论。这是关于基本组织原则问题的纯思想斗争。我和普列汉诺夫处在少数地位。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提出机会主义条文，投到机会主义者怀抱中去。（2）《火星报》组织由于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问题——是佛敏还是瓦西里耶夫参加五人小组，是托洛茨基还是特拉温斯基参加三人小组——发生了分裂。我和普列汉诺夫争得了多数（9 票对 7 票），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我们在党章第 1 条的问题上占少数。马尔托夫同机会主义者的联盟，用事实证明了组委会事件使我产生的种种担心。（3）继续就党章细节进行争论。机会主义者又来援救马尔托夫。我们又处于少数地位，并为少数在中央机关内的权利而斗争。（4）七个极端机会主义者退出代表大会。我们成了多数并在选举中战胜了联盟（火星派少数派、“泥潭派”以及反火星派的联盟）。马尔托夫和波波夫拒绝接受我们所提出的两个三人小组中的席位。（5）代表大会闭会以后因增补问题而发生无谓争吵。无政府主义行为和无政府主义词句猖獗。“少数派”中最不彻底和最不坚定的分子占上风。（6）普列汉诺夫为了避免分裂而采取了“用温和的手段杀死”的政策。“少数派”占领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总委员会，并且竭力攻击中央委员会。无谓争吵继续充斥一切。（7）对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次攻击被打退。无谓争吵似乎开始稍微平息下来，这样便有可能比较心平气和地讨论两个纯系思想性质而又使全党极为关心的问题：（一）我们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分成“多数派”和“少数派”从而

代替了一切旧的划分这个事实的政治意义和原因何在？（二）新《火星报》在组织问题上的新立场的原则意义何在？

每个阶段都有其完全独特的斗争情势和直接的攻击目标；每个阶段都可以说是一个总的战役中的一次战斗。不研究每次战斗的具体情况，就丝毫不能了解我们的斗争。研究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明显地看出，发展确实是按着辩证的道路，矛盾的道路行进的：少数变成多数，多数变成少数；各方时而转守为攻，时而转攻为守；思想斗争的出发点（党章第 1 条）“被否定”，让位给充斥一切的无谓争吵［注：如何把无谓争吵和原则分歧区分开来这个难题，现在已经自行解决：凡是涉及增补问题的都是无谓争吵；凡是涉及分析代表大会上的斗争，涉及党章第 1 条问题以及关于向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转变问题的争论的都是原则分歧。]，但以后就开始“否定的否定”，我们在各占一个中央机关的情况下勉强同上帝赐予的妻子“和睦相处”，又回到纯思想斗争的出发点上来，但是这个“正题”已由“反题”的一切成果所充实，变成了高一级的合题，这时在党章第 1 条问题上的孤立的偶然的错误已经发展成为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的所谓体系，这时这种现象同我们党的分成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这种根本划分的联系已经愈来愈清晰地呈现在大家面前。总而言之，不仅燕麦是按照黑格尔的规律生长的，而且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也是按照黑格尔的规律互相斗争的。

可是，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使之用脚立地后接受过来的伟大的黑格尔辩证法，同那种为某些从我党革命派滚向机会主义派的政治活动家的曲折路线进行辩护的庸俗手法混为一谈，不应当把它同那种将各种特定的声明，将同一过程中不同阶段发展的各种特定的因素搅成一团的庸俗态度混为一谈。真正的辩证法并不为个人错误辩护，而是研究不可避免的转变，根据对发展过程的全部具体情况的详尽研究来证明这种转变的不可避免性。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同时也不应当把这个伟大的黑格尔辩证法同

那种可以用“脑袋钻不进，就把尾巴塞进去”（mettere la coda dove non va il capo）这句意大利谚语来形容的庸俗的处世秘诀混为一谈。

我们党内斗争的辩证发展总起来说可归结为两个变革。党代表大会是一个真正的变革，如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中所正确指出的那样。少数派里爱说俏皮话的人也说得对，他们说：世界是由革命推动的，所以我们就进行了一次革命！他们在代表大会以后确实进行了一次革命；一般来讲，说世界是由革命推动的，这也是正确的。可是，每次具体革命的具体意义，还不能用这句一般的名言来断定，如果把令人难忘的马霍夫同志的令人难忘的说法换个样子，那么可以说：有的革命类似反动。为了断定一次具体的革命究竟是向前还是向后推动了“世界”（我们党），就必须知道实行变革的实际力量究竟是党内的革命派还是机会主义派，就必须知道鼓舞战士的究竟是革命原则还是机会主义原则。

我们的党代表大会在全部俄国革命运动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空前未有的。秘密的革命党第一次从黑暗的地下状态走到光天化日之下，向大家表明了我们党内斗争的整个进程和结局，表明了我们党以及它的每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在纲领、策略和组织问题上的全部面貌。我们第一次摆脱了小组自由散漫和革命庸俗观念的传统，把几十个极不相同的集团结合在一起，这些集团过去往往是彼此极端敌对，彼此只是由思想力量联系起来的，它们准备（在原则上准备）为了我们第一次实际创立起来的伟大整体——党而牺牲所有一切集团的特点和集团的独立性。可是，在政治上，牺牲并不是轻易作出的，而是经过战斗作出的。由于取消组织而引起的战斗，不可避免地成了异常残酷的战斗。公开的自由斗争的清风变成了狂风。这阵狂风扫除了——扫除得太好了！——所有一切小组的利益、情感和传统的残余，第一次创立了真正党的领导机构。

然而，称呼什么是一回事，而实际上是什么又是一回事。在原则上为了党牺牲小组习气是一回事，而放弃自己的小组又是一回事。清风对那些习惯于腐败的

庸俗观念的人，还是太新鲜了。“党没有经得住它自己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考验”，象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中正确地（偶然正确地）指出的那样。为组织被取消而感到的委屈实在太大了。狂风使我们党的巨流底下的全部渣滓重新泛起，这些渣滓为过去的失败进行报复。旧的顽固的小组习气压倒了还很年轻的党性。党内被击溃的机会主义派，由于偶然得到阿基莫夫这一猎获物而加强了自己的力量，又对革命派占了——当然是暂时的——优势。

结果就产生了新《火星报》，这个新《火星报》不得不发展和加深它的编辑们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所犯的错误。旧《火星报》曾教人学会革命斗争的真理。新《火星报》却教人去学处世秘诀：忍让与和睦相处。旧《火星报》是战斗的正统派的机关报。新《火星报》却使机会主义死灰复燃——主要是在组织问题上。旧《火星报》光荣地遭到了俄国机会主义者和西欧机会主义者的憎恶。新《火星报》“变聪明了”，它很快就会不再以极端机会主义者对它的赞扬为耻了。旧《火星报》一往直前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言行一致。新《火星报》，它的立场的内在的虚伪性，必然产生——甚至不以任何人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政治上的伪善。它大骂小组习气，是为了掩护小组习气对党性的胜利。它假惺惺地斥责分裂，似乎除了少数服从多数，可以设想用什么其他手段来防止一个多少有组织的、多少名副其实的党发生分裂。它声明必须考虑革命舆论，同时却隐瞒阿基莫夫们的赞扬，并制造一些卑鄙的谣言来诬蔑我们党内革命派的委员会［注：为了进行这项可爱的事业，甚至已经制定了一种固定不变的格式：据我们的某某通讯员报告，多数派的某某委员会虐待少数派的某某同志。］。这是多么可耻啊！他们把我们的旧《火星报》糟蹋到了何等地步啊！

进一步，退两步……在个人的生活中，在民族的历史上，在政党的发展中，都有这种现象。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原则，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党的纪律，必定获得完全的胜利，怀疑这一点，即使是片刻怀疑，也是一种行同严重犯罪的意志薄

弱的表现。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我们应当继续努力奋斗，不因遭到挫折而灰心丧气；我们应当坚持斗争，鄙弃那些庸俗的小组争吵的方法，尽一切可能来保卫用极大精力建立起来的全俄一切社会民主党人的统一的党内联系，力求通过顽强而有步骤的工作使全体党员特别是工人充分地自觉地了解党员义务，了解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斗争，了解我们的分歧的一切原因和演变，了解机会主义的严重危害性：机会主义在组织工作方面也象在我们的纲领和我们的策略方面一样无能为力地屈从于资产阶级心理，一样不加批判地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一样削弱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武器。

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世界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无政府竞争所分散，被那种为资本的强迫劳动所压抑，总是被抛到赤贫、粗野和退化的“底层”，它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一支工人阶级的大军。在这支大军面前，无论是已经衰败的俄国专制政权还是正在衰败的国际资本政权，都是支持不住的。不管有什么曲折和退步，不管现代社会民主党的吉伦特派讲些什么机会主义的空话，不管人们怎样得意地赞美落后的小组习气，不管他们怎样炫耀和喧嚷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义，这支大军一定会把自己的队伍日益紧密地团结起来。

附录　古谢夫同志和捷依奇同志的冲突事件

这个事件和第 10 节所引用的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两同志的那封信里提到的所谓“伪造的”（马尔托夫同志的说法）名单有密切联系。事件的实际情况如下。古谢夫同志曾经通知巴甫洛维奇同志，说这份包含施泰因、叶戈罗夫、波波夫、托洛茨基、佛敏五同志的名单，是捷依奇同志转交给他（古谢夫）的（巴甫洛维奇同志的《信》第 12 页）。捷依奇同志责备古谢夫同志这个通知是“蓄意诬蔑”，

同志仲裁法庭也认定古谢夫同志的“通知”“不正确”（见《火星报》第 62 号刊载的法庭判决词）。当《火星报》编辑部把法庭的判决词登出来以后，马尔托夫同志（这次已经不是编辑部）印发了一个题为《同志仲裁法庭的判决词》的传单，他在这个传单中不仅转载了法庭的判决词全文，并且转载了关于此案整个审理经过的报告全文以及他自己的后记。在这个后记里，马尔托夫同志谈到“为了进行派别斗争而假造名单这件事”是“可耻的”。为了回答这张传单，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利亚多夫同志和哥林同志印发了一张题为《仲裁法庭中的第四者》的传单，他们在这个传单中“坚决反对马尔托夫同志，因为他比法庭判决词走得更远，硬说古谢夫同志居心不良”，而法庭并没有认为这里有什么蓄意诬蔑，而只是认定古谢夫同志的通知不正确。哥林和利亚多夫两同志详细地解释说，古谢夫同志的通知可能是出于一种完全自然的误会，认为马尔托夫同志的行为是“不体面的”，因为他自己发表过（而且现在又在自己的传单中发表）许多错误声明，随心所欲地硬说古谢夫同志怀有不良的动机。他们说，这里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不良的动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以上就是关于这个问题，即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帮助加以说明的问题的全部“文献”。

首先必须使读者对产生这个名单（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的时间和条件有一个确切的了解。我在本书正文里已经指出，《火星报》组织在代表大会期间曾开会商量过中央委员会候选人的名单，以便共同向代表大会提出。这次会议由于意见分歧而告终，《火星报》组织中的多数派通过了包含特拉温斯基、格列博夫、瓦西里耶夫、波波夫、托洛茨基五人的名单，但是少数派不愿让步，而坚持包含特拉温斯基、格列博夫、佛敏、波波夫、托洛茨基五人的名单。《火星报》组织中的两派在提出和表决这两个名单的那次会议以后，就再没有在一起开过会。双方都在代表大会上进行自由鼓动，想通过整个党代表大会的表决来解决这一引起他们分歧的争论问题，并且双方都极力想把尽量多的代表吸引到自己方面。在代表大

会上进行的这种自由鼓动，立刻就暴露了我在本书里十分详细分析过的一件政治事实，即火星派少数派（以马尔托夫为首）为了战胜我们，不得不依靠“中派”（泥潭派）和反火星派的支持。他们之所以不得不这样做，是因为绝大多数一贯维护《火星报》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计划而反对反火星派和“中派”攻击的代表，都很快很坚决地站到我们方面来了。从既不属于反火星派，又不属于“中派”的33个代表（确切些说是33票）中，我们很快就争取到了24个，并和他们订立了“直接协定”，形成了“紧密的多数派”。而马尔托夫同志方面只剩下了9票；要取得胜利，他就必须得到反火星派和“中派”的全部票数，然而他和这两派虽然能够一同行进（如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虽然能够实行“联盟”，即能取得他们的赞助，但是并不能同他们订立直接协定，其所以不能，是因为他在整个代表大会期间始终都和我们一样激烈地进行过反对这两派的斗争。这也就是马尔托夫同志处境可悲而又可笑的原因！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戒严状态》中想用一个极端恶毒的问题置我于死地，说什么“我们恭敬地请求列宁同志爽快地回答一个问题：‘南方工人’社在代表大会上究竟对于谁是局外人呢？”（第23页附注）。我恭敬地爽快地回答说：对于马尔托夫同志是局外人。证据是：我很快就同火星派分子订立了直接协定，而马尔托夫同志当时却无论是同“南方工人”社，无论是同马霍夫同志，无论是同布鲁凯尔同志，都没有订立并且也无法订立直接协定。

只有把这一政治形势弄清楚以后，才有可能了解所谓“伪造”名单这一麻烦问题的“关键”。当时的具体情况是：《火星报》组织分裂了，我们双方都为维护各自提出的名单在代表大会上进行自由鼓动。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大量个别的私人交谈产生了许许多多方案，提出了以三人小组代替五人小组，更换这个或那个候选人的建议层出不穷。例如，我很清楚地记得，在多数派的私人交谈中曾经提出过鲁索夫、奥西波夫、巴甫洛维奇、杰多夫等同志为候选人，但是后来，经过讨论和争论又把他们取消了。很可能还提出过其他我所不知道的候选人。大会的

每一个代表都在交谈中表示过自己的意见，提出过修正，进行过争论等等。很难设想这种情形只是在多数派中间发生。甚至可以肯定，在少数派中间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形，因为我们从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两同志的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原定的那个五人小组（波波夫、托洛茨基、佛敏、格列博夫、特拉温斯基）后来用三人小组（格列博夫、托洛茨基、波波夫）代替了，并且格列博夫也不中他们的意，他们宁愿用佛敏来代替他（见利亚多夫和哥林两同志的传单）。不要忘记，我在本书内把大会代表分成各个集团，是根据事后所作的分析划分的。实际上，这些集团在进行竞选鼓动时才刚刚开始形成，因而各个代表之间交换意见是非常自由的；我们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壁垒”，每个人只要想同哪个代表私下交谈，就可以同他交谈。当时，在出现各种各样的方案和名单的情况下，除了《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的名单（波波夫、托洛茨基、佛敏、格列博夫、特拉温斯基）之外，还产生了一个与它没有很大区别的名单，即包含波波夫、托洛茨基、佛敏、施泰因、叶戈罗夫五人的名单，这也就毫不足怪了。产生这样一个候选人名单本来是极其自然的，因为我们的候选人——格列博夫和特拉温斯基，显然是不中《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的意的（见他们那封载于本书第 10 节的信，在这封信里他们把特拉温斯基从三人小组名单中取消了，而关于格列博夫，干脆说这是一种妥协办法）。用组委会委员施泰因和叶戈罗夫两人来代替格列博夫和特拉温斯基，原是完全自然的事；如果党的少数派代表中未曾有过一个人想要实行这样一种代替，那才是一件怪事。

现在我们就来考察以下两个问题：（1）包含叶戈罗夫、施泰因、波波夫、托洛茨基、佛敏五人的名单，究竟是谁提出来的呢？（2）为什么马尔托夫同志听到有人把这样一个名单推到他头上就大发雷霆呢？为了准确地回答第一个问题，必须向全体大会代表询问一番。这在目前是办不到的。特别是必须弄清楚究竟党的少数派（不要把党的少数派和《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混为一谈）有哪些代表在

大会上听见过引起《火星报》组织分裂的名单？他们究竟是怎样对待《火星报》组织的多数派和少数派提出的这两个名单的呢？他们没有提出过也没有听见过关于适当改变《火星报》组织少数派的名单的任何设想或意见吗？可惜，这些问题在仲裁法庭上看来也没有提出过，仲裁法庭（根据法庭判决词来看）甚至始终不知道《火星报》组织究竟是因为什么样的两个“五人小组”发生分裂的。例如，别洛夫同志（我认为他是“中派”的一分子）“曾经作证说，他和捷依奇有很好的同志关系，捷依奇同他说过自己对代表大会工作的感想，所以如果捷依奇进行过什么鼓动来支持某个名单的话，那他会把这件事告诉别洛夫”。可惜始终没有弄清楚，捷依奇同志在代表大会上是不是和别洛夫同志说过他对于《火星报》组织的那些名单的感想？如果说过，那么别洛夫同志对《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提出的五人名单抱什么态度呢？他没有提出过或没有听见过关于对这个名单作某种适当改变的意见吗？既然这个情节没有弄清楚，所以别洛夫和捷依奇两同志的证词中也就含有哥林和利亚多夫两同志所指出的那个矛盾，即捷依奇同志和他自己的说法相反，“曾经进行鼓动来支持”《火星报》组织提出的“某些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别洛夫同志还进一步作证说，“关于在代表大会上传阅的那个名单，他是在代表大会闭幕前一两天遇见叶戈罗夫同志、波波夫同志和哈尔科夫委员会的代表时私下听到的。当时，叶戈罗夫曾经表示惊奇，为什么竟把他列入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因为在他看来，把他推举为候选人是不可能得到大会代表的赞同的，——无论是多数派还是少数派的代表都不会赞同”。十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显然是指《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因为在党代表大会的其余的少数派中间，叶戈罗夫同志这位组委会委员和“中派”的杰出演说家被推举为候选人，不仅能够而且一定会得到赞同。可惜，恰恰是关于党的少数派内不属于《火星报》组织的那些分子是否赞同的问题，别洛夫同志却只字未提，而这个问题正是重要问题，因

为使捷依奇同志感到气愤的是，人们把这个名单推到《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头上，而这个名单可能出自不属于这个组织的少数派！

当然，现在很难回想起，究竟是谁第一个提出这样一个候选人名单的，我们中间每个人都是从谁的口中听见这个名单的。例如，我就不仅不记得这一点，而且也不记得多数派中间究竟是谁第一个提出我在前面谈到过的那个包括鲁索夫、杰多夫等人的候选名单的；从许多关于各种候选名单的谈话、设想和传闻中，我只记得那些直接在《火星报》组织中或在多数派的非正式会议上提过的“名单”。这些“名单”多半是用口头传达的（在我的《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第 4 页倒数第 5 行里所说的那个“名单”，就是我用口头方式在会议上提出的五个候选人），但是往往也记在字条上，这些字条一般是在代表大会的会议上在一些代表之间传递，通常在散会以后就销毁了。

既然没有确切的材料能够说明这个人人都知道的名单的来源，那我们只好假定：或者是一个为《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所不知道的党内少数派的代表提出了这样一个候选人名单，然后就经过口头和书面方式在代表大会上传开了；或者是《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的某一个人在代表大会上曾经提出这样一个名单，但是后来他把这一点忘掉了。我觉得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提施泰因同志为候选人在代表大会上显然得到了《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的赞同（见我的小册子），而提叶戈罗夫同志为候选人的想法显然是这个少数派在代表大会闭会后产生的（因为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和《戒严状态》中都对组委会没有被批准为中央委员会一事表示惋惜，而叶戈罗夫同志就是组委会的一个委员）。当时这种要把组委会委员变为中央委员的想法是比较普遍的，既然如此，设想少数派的某一个人在私人谈话中和在党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这种主张，不是很自然的吗？

可是，马尔托夫同志和捷依奇同志不愿意考虑这种理所当然的解释，却认为这里面有肮脏的打算，有人蓄意陷害，有不诚实的成分，有人散布“明明虚假的、

目的在于中伤的传闻”，有人“为了派别斗争而进行假造”等等。这种不正常的倾向只能用不健康的流亡生活条件或神经不正常来解释，如果事情没有弄到无理伤害同志信誉的地步，那我根本不会谈这个问题。请你们想一想，捷依奇同志和马尔托夫同志能有什么理由追查不正确的通知或不正确的传闻含有的肮脏的不良动机呢？他们显然是由于神经失常，才觉得多数派“中伤了”他们，不是指出少数派的政治错误（党章第 1 条以及同机会主义者联盟），而是把一个“明明虚假的”“假造的”名单推到少数派身上。少数派宁愿说问题不是由于自己的错误，而是由于多数派采取了什么肮脏的不诚实的可耻手段！要追查“不正确的通知”的不良动机是多么不理智，这一点我们在上面叙述当时情况时已经指出了；同志仲裁法庭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它并没有认定这里有什么诬蔑、恶意和可耻的东西。最后，还有一个事实也非常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即早在党代表大会上，在还没有进行选举以前，《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就向多数派谈到过这种谣传，而马尔托夫同志甚至在他那封在多数派所有 24 个代表的会议上宣读过的信里谈到过这种谣传！多数派根本就没有想在《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面前隐瞒在代表大会上流传过这样一个名单的事实：连斯基同志曾将此事告诉过捷依奇同志（见法庭判决词），普列汉诺夫同志对查苏利奇同志谈过这一点（“同她是不能谈话的，她仿佛把我看成特列波夫[47]了”——普列汉诺夫同志曾经这样告诉过我，这句后来重复过许多次的笑话再次证明少数派神经不正常）。我曾经向马尔托夫同志说，他的声明（说这个名单不是他马尔托夫提出的）在我看来已经够了（同盟记录第 64 页）。当时，马尔托夫同志（我记得他是同斯塔罗韦尔同志一起）向我们主席团递了一个内容大致如下的字条：“《火星报》编辑部的多数派请求允许他们参加多数派的非正式会议，以便驳斥那些对他们散布的可耻谣言。”当时我和普列汉诺夫两人就在这张字条上答复说：“我们并没有听见过什么可耻的谣言，如需召集编辑部会议，则应另行安排。列宁、普列汉诺夫。”我们晚上出席多数派会议时，

曾把这件事告诉过所有 24 个代表。当时为了避免产生任何误会，决定由我们 24 个人共同推选代表去向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两同志解释一下。被选出来的两个代表，即索罗金同志和萨布林娜同志，就去向他们解释了一番，说谁也没有把这个名单一定要推到马尔托夫同志或斯塔罗韦尔同志身上，特别是听过他们两个人的声明以后；说这个名单究竟是出自《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还是出自不属于这个组织的代表大会的少数派，这根本不重要。要知道，事实上根本不能在代表大会上普遍查问！根本不能向每个代表查问这个名单！可是，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两位同志又向我们写了一封正式辟谣的信件（见第 10 节）。这封信由我们的代表索罗金和萨布林娜两位同志在 24 人会议上宣读过。看来，这件事情已经可以告一段落了，——我说已经可以告一段落，并不是说已经确定了名单的来源（如果什么人对此有兴趣的话），而是说完全排除了任何以为有人故意"危害少数派"或"中伤"某一个人，或故意"为了派别斗争而进行假造"的看法。可是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大会上（记录第 63—64 页）又搬出这个由病态心理臆造出来的肮脏货色，并且作出了许多不正确的介绍（显然这是他自己神经过敏的结果）。他说，名单里有一个崩得分子。这是不对的。仲裁法庭的一切见证人——包括施泰因和别洛夫两位同志在内——都证实这个名单上有叶戈罗夫同志。马尔托夫同志说，这个名单就意味着签订了直接协定的联盟。这是不对的，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作了说明。马尔托夫同志说，由《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提出的（会使代表大会多数抛弃这个少数的）其他名单"是没有的，甚至连假造的也没有"。这是不对的，因为党代表大会多数派全体都知道，由马尔托夫同志及其伙伴提出的但没有得到多数赞同的至少有三个名单（见利亚多夫和哥林的传单）。

究竟为什么这个名单使马尔托夫同志这样气愤呢？因为这个名单说明他们转到我们党的右翼方面去了。当时马尔托夫同志大喊大叫，反对"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痛恨人家"把他的政治立场估计得不正确"，但是现在谁都看见：关

于某个名单是不是由马尔托夫同志和捷依奇同志提出来的问题并不能起任何政治作用；其实这个罪名无论同这个名单或其他什么名单都是无关的，这个罪名不是诬加的而是真实的，对政治立场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

从这个令人不快的、人为地造成的关于人人都知道的假名单的事件，应当作出的总结如下：

（1）马尔托夫同志高喊“为了派别斗争而假造名单是可耻的”，并以此损害古谢夫同志的名誉，我们不能不与哥林和利亚多夫两位同志一样认为这样做是不体面的。

（2）为了改善气氛并且使党员不必认真对待每一次病态的放肆行为，看来应当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象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章程那样确定一条规则。这个章程第 2 条说：“凡是严重违背党纲原则或犯有不名誉行为者，都不能留在党内。关于他们的党籍问题，应当由党的执行委员会召集的仲裁法庭来处理。审判员由提议开除者和被提议开除者各指定半数，主审员由党的执行委员会指定。对于仲裁法庭的判决，可向监察委员会或党代表大会上诉。”这样一条规则可以成为对付那些轻易控告他人犯有什么不名誉行为（或散布此类谣言）者的有力武器。有了这样一条规则，凡是这样的控告，如果提出控告者不敢理直气壮地以控告者的资格在党面前说话并且力求得到相应的党机关的裁决，就会被永远地确定为算作不体面的诽谤。

注释：

[47]看来是指曾任警察总监和彼得堡市长的费·费·特列波夫。1878 年 1 月 24 日，他因下令鞭打被监禁的革命者而被维·伊·查苏利奇开枪击伤。——423。

我们争取什么？[1]

（告全党书）

列宁（1904 年 7 月底）

不久以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 19 个党员（其中包括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一些委员会的委员和其他党组织的成员以及没有加入党组织的革命者）举行了一次非正式会议。拥护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多数派观点的同志们的这次会议，讨论了我们党内危机和摆脱危机的办法问题，并决定向俄国社会民主党全体党员发出下述呼吁。

同志们！党的严重危机正在无限期地延续下去。混乱现象日益加剧，使新的冲突不断产生，全面地和极严重地妨碍正常的工作，日益破坏党和党中央机关报之间的联系，而中央机关报则已完全变成了一个小组的，主要是国外小组的机关报。搜寻意见分歧，提出早就解决并已成为过去的老问题，向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献媚，在论述中表现出极大的混乱，无耻地渺视党的代表大会、大会的讨论和决定，嘲笑党的组织和纪律，嘲笑大多数建立了党并在地方从事工作的革命者，根据无法证实的材料和未经核对的匿名者的报道恶毒地和吹毛求疵地讥笑党内各革命派委员会工作中的缺点，——这就是我们在新《火星报》[2]这个制造混乱的策源地上看到的一切，这就是已被代表大会否定的那个利用个人让步制造新的增补问题上的争吵和进行破坏党的活动的编辑部所给予我们的一切。

然而，俄国当前所处的历史时刻要求我们党把它的全部力量都动员起来。工人阶级的激昂的革命情绪和居民中其他阶层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战争和危机、饥饿和失业日益严重地破坏专制制度的基础，可耻的战争[3]的可耻结局已为期不远，而这个结局必然会使这种激昂的革命情绪增长许多倍，使工人阶级同它的敌

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并要求社会民主党采取最坚决的进攻措施。建立团结一致的党组织，采取坚定不移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方针，使党内斗争在适当的应有范围内进行，从而使这种斗争不致破坏组织，不致妨碍正常工作，——俄国整个工人运动的这些迫切要求无论如何也要立即予以实现，因为目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声誉及其所取得的全部威信有完全丧失的危险。

达到这个目的的第一个步骤，我们认为就是要使我们党内各种派别集团相互间采取十分明朗的、坦率的和直爽的态度。有的时候，为了事业的利益，要避而不谈局部的分歧，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认为我们党目前正处于这样的时候，那就犯了最可悲最不可原谅的错误。对少数派所作的个人让步并没有制止住混乱现象，争论的问题已经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了，有人已经向全党提出了直接的挑战，而只有萎靡不振和愚昧无知的人才会幻想恢复一去不复返的东西，幻想可能掩盖某种东西，隐讳某种东西，粉饰和隐藏某种东西。不，袖手旁观的政策，消极克制的政策，自由放任的政策在我们的党内斗争中已经完全不适用了。如果再支吾搪塞、要手腕和默不作声，那不但是徒劳无益和令人蔑视的，而且简直是犯罪。我们先来直截了当地阐述一下我们党内斗争的全部纲领，我们也号召加入党的或打算在一定条件下加入党的各种色彩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都这样做。只有采取十分明朗的和直爽的态度，才能给一切觉悟工人和全体党员提供合理地和果断地解决党内争论问题的材料。

我们站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多数派的立场上。我们认为，产生后来的一切错误和混乱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代表大会的少数派采取了错误立场，并且不顾党的意志而竭力坚持这种立场。这种错误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火星报》的旧编辑小组不是从别人那里而只是从我们代表大会上的和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派那里寻求支持。第二，这种同露骨的机会主义者（过去和现在都以阿基莫夫同志为首）的联合，只是在选举中央机关这样的问题上才最终形成并造成了党的分裂。

第一个错误在逻辑上必然导致我们在新《火星报》的议论中看到的一切原则上的混乱和一切机会主义的动摇，因为这些议论可能被认为是有原则性的。第二个错误所产生的结果是不顾党的意志而维护旧编辑小组，替违反党性的小组习气辩护和辩解，把庸俗的无谓争吵和小组内的吵架所惯用的方法搬到我们的争论中来，这不是善于尊重自己的党和尊重自己的党员采用的斗争方法。第一个错误在逻辑上必然造成这样的情况：一切倾向于机会主义的人，一切处心积虑地拖党后退并因为革命社会民主党使它的论敌受了委屈而实行报复的人，一切表现了我们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倾向的人，一切喜欢用知识分子无政府主义态度否定组织和纪律的人，都团结在少数派的周围。第二个错误则造成国外小组对国内大多数工作人员的统治，使侨居国外的同志所特有的争吵变本加厉，少数派用这种争吵代替了说服的方法。

现在任何疑虑都消除了。对那些不只是口头上入党的党员来说，对那些实际上愿意维护我们工人运动的切身利益的人来说，已经不可能有任何犹豫了。少数派已经宣布了斗争，它宣布了斗争并且正在全面进行斗争，因而我们只好应战，宣布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并且决心把斗争进行到底。为了维护党性，我们反对一切带有小组习气的活动，特别是反对旧编辑小组。为了俄国工人运动的利益，我们反对国外的无谓争吵。为了坚持我们运动中的革命无产阶级倾向，我们反对知识分子机会主义的倾向。我们坚持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坚定不移的方针，反对动摇、曲折路线和恢复早已过时的东西。我们为建立我们工人先锋队的团结一致的党组织而斗争，反对知识分子放荡不羁、瓦解组织和无政府主义的行为。我们为使党的代表大会受到尊重而斗争，反对软弱善变、言行不一，反对嘲弄一致通过的协定和决议。我们为诉诸党内公论而斗争，反对新《火星报》和新的党总委员会[4]采取堵住多数派嘴巴并隐藏自己的记录的策略。

我们的斗争纲领本身就确定了斗争方式和斗争的最近目的。第一种方式就是进行全面的和最广泛的口头宣传和文字宣传。如果不是少数派进行充满无谓争吵的斗争，使我们党内产生那种把脑袋藏在翅膀底下并宣扬多数派同少数派停止斗争的（已经遭到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和其他许多组织正当的嘲笑的）臭名远扬的“调和态度”，那这一点也就用不着再谈了。只有懦弱、疲惫或偏执才能解释，为什么一个成年的党员会存在这些他所不应有的幼稚观点。可以而且应当谈论使党内斗争在党的范围内进行的问题，可以而且应当不只是用劝告来达到这一点，但是，如果建议不再去维护在代表大会上在全党面前所维护过的东西和被认为是为党的切身利益所必需的东西，如果敢于当众提出这样的建议，那只会遭到大家的蔑视。

斗争的第二种方式而且是有决定意义的方式，我们认为是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我们完全支持那些要求立即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委员会[5]。我们认为应该特别谈一谈新《火星报》编辑部以及它的公开的或隐蔽的走卒用来反对召开代表大会的虚伪论据，而他们是竭力想把这种（与党员的义务难以相容的）论据隐藏起来的（如国外同盟[6]和《火星报》编辑部就是这样做的，后者的宣传只有一部分被一些委员会揭穿和揭露）。第一个论据是：召开代表大会会造成分裂。单是少数派提出这种论据这一事实，也说明了它的立场的全部虚伪性。须知少数派这样说，也就是承认党是反对它的，承认国外小组是把自己强加于党，承认它得以维持下去只是由于离俄国远和真正的革命家在国外活动有困难。谁对党忠诚，谁真心愿意共同工作，谁就不害怕而是希望召开代表大会来消除混乱现象，使党和党的负责集体步调一致，并消除不应有的含糊思想。用分裂来吓唬人，只能清楚地表明心里有鬼。没有少数服从多数，就不可能有稍微称得上工人党的党。如果必须互相（而不是单方面）让步，如果有时要求党内各部分之间协商并缔结协定，

那只有在代表大会上才是可能的和允许的。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革命者，都不会愿意留在一个完全靠人为地拖延召开代表大会来维持共处局面的党内的。

第二个论据是：不召开代表大会还有可能和解。这种意见的根据是什么，还不知道。赞同这种意见的人都是在幕后进行活动的。这种幕后的阴谋活动只会大大地增加彼此间的不信任，只会加深敌对情绪并使情况模糊不清，现在难道还不是抛弃这种活动的时候吗？任何一个人都不敢当众提出和解计划，难道不正是由于在目前情况下这种只能令人发笑的计划是不能实现的吗？谁要是认为和平就是把少数派中意的人增补进中央委员会，谁就不是希望和平，而是希望多数派加强斗争，谁就不理解，党内斗争已经超出纯粹的增补问题上的争吵范围不可遏止地发展起来了。谁把和平了解为停止争论和斗争，谁就是回到旧的小组时期的心理状态，因为党内永远会有争论和斗争，只是应当使它们在党的范围内进行，而这一点只有代表大会才能办到。一句话，不管怎样玩弄这个不召开代表大会的和平口号，不管怎样玩弄这种使斗争双方和解而又不使任何一方满意的思想，你们一定会看到，这种天才的思想所反映出来的只能是束手无策，没有主意，不知道该要求什么和争取什么。既然连普列汉诺夫这样有威望的（过去有威望的）人通过最大限度的个人让步来扑灭初燃的火焰的计划都遭到惨败，那么现在难道还能认真地谈类似的计划吗？

第三个论据是：召开代表大会可能是弄虚作假。彼得堡委员会已经反驳了这一论据，指出这是一种诽谤[7]。地方委员会的这个声明打了那些人一记耳光，这些人毫无事实根据地在背地里提出责难，尽管少数派控制了党总委员会这个最高机关和党机关报，不但掌握了公开揭露它所怀疑的舞弊行为的工具，而且掌握了用行政手段来纠正事实和施加影响的工具。大家都明白，如果确有其事，少数派早就大喊大叫了；总委员会不久前通过的决议，证明过去不存在这样的事实，而且担保将来也不会有[8]。《火星报》使用这个论据，这又一次表明目前该报已经用

卑劣的谩骂代替了论战，从而迫使我们向全体党员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实际上有党吗？我们是想学社会革命党人的样子[9]，仅仅满足于门面和招牌呢？还是应当撕破一切伪装？

第四个论据是：意见分歧还没有澄清。新《火星报》已经对这个论据作了最好的回答，读了这个报纸党就会知道，现在是在搜寻意见分歧，而不是在澄清它们，混乱现象正在无止境地加剧。只有召开代表大会，让全体同志在会上公开地和毫无保留地说出自己的意见，才能澄清极其混乱的问题和混乱的情况。

第五个论据是：代表大会会占用一些人力财力，耽误正常工作。这个论据也是极其可笑的，因为不能设想代表大会所需要的人力财力会比混乱状态所造成的浪费还大。

不，所有这些反对召开代表大会的论据，不是证明态度虚伪，就是证明对情况无知和怯懦地怀疑党的力量。

我们的党又患了重病，但是它能够痊愈，并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俄国无产阶级的党。我们认为治疗办法就是进行下面三项改革，我们将采取一切正当的手段来实现这些改革。

第一，把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交给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多数派。

第二，使国外地方组织（同盟）真正受全俄中央组织（中央委员会）的领导。

第三，通过党章来保证采取党的方式进行党内斗争。

作了以上的说明之后，关于我们纲领的这三个基本要点，要说的话已经不多了。至于《火星报》旧编辑部现在已经在实际上表明自己没有用处，我们认为这是无可反驳的事实。现在，不是火星派过时了，象马尔托夫同志在选举失败后所发现的那样，而是《火星报》旧编辑部过时了。现在，一个小组已向全党提出了挑战，再不公开说出这一点，那就只能说是虚伪了。至于那个把自己变成第二个（如果不是第三个的话）中央机关而且完全不把党中央委员会放在眼里的国外组

织的不正常状况，那是没有什么可以多说的。最后，代表大会以后的斗争的全部经验迫使我们考虑少数派（不管是什么样的少数派）在我们党内的法律地位问题。我们深深地感到，这个经验教导我们必须在党章中保证一切少数派的权利，使那些经常发生的和无法消除的不满、愤怒和斗争，不再变成通常的庸俗的无理取闹和无谓争吵，而是形成一种目前还不习惯的捍卫自己信念的合法而正当的斗争。我们认为，对这一点的绝对保证，就是让少数派成立一个（或一个以上）著作家小组，它有权派代表参加代表大会并享有充分的“舌头自由”。必须提出最广泛的保证，让批评党中央机关工作的党的书刊能够出版。必须使各委员会有权得到（通过全党运送机构）它所需要的党的出版物。在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必须暂时停止中央委员会用劝告以外的方式来影响各委员会人选的权利。我们在这里就不来详细探讨我们的建议，因为我们不是拟订党章草案，而只是制定总的斗争纲领。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把中央曾向第二次代表大会少数派建议的出版不满分子的著作的措施，用党章固定下来，使不满情绪正当地表现出来，使戒严状态的模糊的幻影（搞增补活动的英雄们造成的）完全消除，使不可避免的党内斗争不致妨碍正常的工作。

我们必须教育我们的少数派只能在代表大会上为中央机关的人选作斗争，而不要在代表大会以后用无谓争吵来妨碍我们的工作，在我们党面临着死亡威胁的时候，必须争取做到这一点。最后，在总的纲领中，我们只是简略地提一下我们认为党章应该作的一些局部的修改，例如：把总委员会从仲裁机关变成代表大会所选举的机关，按第二次代表大会多数派的要求来修改党章第 1 条，把一切工人组织和一切在小组活动时期单独存在并希望加入党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团体列入党的组织，如此等等。

我们提出这个我们党内斗争的纲领，同时请一切党组织和党内的一切派别的代表也就它们的纲领问题发表意见，以便有可能逐步地、认真地、慎重地和合理地进行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我们没有党了——我们编辑部宫廷政变的参加者自己这样议论着，他们利用自己离俄国远，俄国的工作人员经常变换，而他们自己是没有人能代替的。我们的党正在诞生！——我们这样说，因为我们看到觉醒的各委员会正在积极地行动起来，先进工人的政治觉悟正在不断提高。我们的党正在诞生，我们的新生力量正在成长壮大，这批力量可以使衰老的著作家集团恢复活力，也可以代替它们，我们有革命家并且愈来愈多，他们比任何编辑小组都更珍视培养他们的旧《火星报》的方针。我们的党正在诞生，新《火星报》的任何诡计和拖延，任何摆老资格的恶毒谩骂，都无法阻止这个党作出坚定不移的最后决断。

我们就是从我们党的这些新生力量中吸取必胜的信心的。

注释：

[1]《我们争取什么？》是《告全党书》（见本卷第10—17页）的初稿。

根据列宁的提议，1904年7月30日—8月1日（8月12—14日）有瑞士日内瓦郊区召开了一次布尔什维克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列宁、亚•亚•波格丹诺夫、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市、维•米•韦利奇金娜、谢•伊•古谢夫、彼•阿•克拉西科夫、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伊•克•拉拉扬茨、米•斯•奥里明斯基、马•尼•利亚多夫、潘•尼•勒柏辛斯基、奥•波•勒柏辛斯卡娅、莉•亚•福季耶娃等19人。会议的各项决定很快又得到另外3名布尔什维克——瓦•瓦•沃罗夫斯基、罗•萨•捷姆利亚奇卡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赞同。因此，由列宁起草并经这次会议通过的《告全党书》是以22名布尔什维克的名义发表的。这次会议也被人们称为22名布尔什维克会议。

《告全党书》是布尔什维克为争取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而斗争的纲领。——1。

[2]新《火星报》是指被孟什维克篡夺了的《火星报》。1903 年 10 月 19 日（11 月 1 日）列宁退出《火星报》编辑部以后，该报第 52 号由格•瓦•普列汉诺夫一人编辑。1903 年 11 月 13 日（26 日）普列汉诺夫把原来的编辑全部增补进编辑部以后，《火星报》由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维•伊•查苏利奇和亚•尼•波特列索夫编辑。1905 年 5 月《火星报》第 100 号以后，普列汉诺夫退出了编辑部。1905 年 10 月，《火星报》停刊，最后一号是第 112 号。——1。

[3]指 1904—1905 年日俄战争。——2。

[4]党总委员会（1903—1905 年）是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建立的党的最高机关。它的职责是：协调和统一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活动，在这两个中央机关之一的全部成员出缺时恢复该机关，在同其他党的交往中代表党。党总委员会必须按照党章规定的期限召开党代表大会，并在拥有代表大会一半票数的党组织提出要求时提前召开党代表大会。党总委员会由 5 人组成，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各派 2 人，另一人由代表大会任命。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格•瓦•普列汉诺夫为党总委员会的第 5 名委员。列宁起初代表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参加党总委员会，在他退出《火星报》编辑部以后则代表中央委员会参加党总委员会。在普列汉诺夫转向机会主义和孟什维克篡夺了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以后，党总委员会就成了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的工具。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党总委员会被撤销。从第三次代表大会起，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党的唯一领导中心是中央委员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由中央委员会任命。

正文中所说的党总委员会隐藏自己的记录的策略，是指 1904 年 6 月 5 日（18 日）党总委员会以 4 票多数通过决定，反对公布总委员会会议记录。——4。

[5]根据列宁 1904 年 8 月 2 目（15 日）给米•康•弗拉基米罗夫的信，当时已有彼得堡、特维尔、莫斯科、图拉、西伯利亚、高加索、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尼古拉耶夫、敖德萨、里加和阿斯特拉罕等 11 个委员会要求立即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4 卷）。它们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大部分刊登在 1904 年出版的尼•沙霍夫的《为召开代表大会而斗争》这本小册子中，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和材料汇编》1955 年俄文版第 41—244 页。——5。

[6]指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

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是根据列宁的倡议由《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国外组织同“社会民主党人”组织于 1901 年 10 月在瑞士合并组成的。根据章程，同盟是《火星报》组织的国外部，其任务是协助《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出版和传播，在国外宣传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帮助俄国各社会民主党组织培养积极的活动家，向政治流亡者介绍俄国革命进程等。在 1903 年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同盟被承认为享有党的地方委员会权利的唯一国外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孟什维克的势力在同盟内增强，他们于 1903 年 10 月召开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反对布尔什维克。列宁及其拥护者曾退出代表大会。孟什维克把持的同盟通过了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章相抵触的新章程。从此同盟就成为孟什维主义在国外的主要堡垒，直至 1905 年同盟撤销为止。——5。

[7]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 1904 年 6 月 23 日（7 月 6 日）通过的关于党内状况的决议。这个决议揭露了党内的混乱状况和孟什维克《火星报》编辑部瓦解组织的活动，要求立即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指出唯有它才能挽救党免于分裂，唯有它才是党的观点的真正忠实的表达者。决议说，在彼得堡委员会看来，所谓代表大会将是中央委员会安抽的一伙私人这种说法是荒谬透顶的

（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和材料汇编》1955 年俄文版第 85—86 页）。该决议曾登载于尼•沙霍夫的小册子《为召开代表大会而斗争》。——6。

[8]指党总委红会 1904 年 6 月 5 日（18 日）通过的关于限制中央委员会给党的地方委员会增补委员的权力的决议。这个决议说，“党的委员会没有义务接纳中央委员会推荐的候选人为自己的成员”。——6。

[9]参看列宁在《社会革命党人所复活的庸俗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的论述：“社会革命党人‘各抒己见’，对自己的‘纲领’作了解释，玩弄‘实际’统一的假象。”（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7 卷第 35 页）

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 1901 年底—1902 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成立时的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谢•鲁萨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尼等，正式机关报是《革命俄国报》（1901—1904 年）和《俄国革命通报》杂志（1901—1905 年）。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秘密的事实上脱离该党中央的战斗组织。

在 1905—1907 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焚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怖”运动，并同其他政党一起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国家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

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不统一造成了 1906 年的分裂，该党的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人民社会党和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经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 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内战结束后，他们在“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叛乱。1922 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6。

进一步，退两步

尼·列宁给罗莎·卢森堡的答复[1]

（1904 年 9 月）

罗莎·卢森堡同志在《新时代》[2]第 42 期和第 43 期上发表的文章，是对我用俄文写的论述我们党内危机一书［注：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8 卷第 197—425 页。——编者注］的评论。德国同志这样关心我们党的著作，并且试图向德国社会民主党加以介绍，对此我不能不表示感谢，但我必须指出，罗莎·卢森堡在《新时代》上发表的文章，向读者介绍的不是我这本书，而是别的什么东西。这从下面一些例子可以看出。例如卢森堡同志说，我这本书透彻而又详尽地表达了一种“不顾一切的集中制”观点。因此，卢森堡同志认为，我是在维护一种组织制度，而反对另外一种组织制度。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在这一整本书中，从第一页起到最后一页止，都在捍卫任何一种可能存在的党的组织的任何一种制度的基本原则。我这本书所探讨的不是各种组织制度之间的区别问题，而是如何在不违反党的原则的情况下坚持、批判和改正任何一种制度的问题。罗莎·卢森堡接着又说，“根据他〈列宁〉的意见，中央委员会有权组织党的各个地方委员会”。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可以由我提出的党组织的章程草案来确凿地证明。这个草案根本没有提到组织地方委员会的权利。是党代表大会选出的党章起草委员会把这个权利列入草案的，而党代表大会批准了委员会的草案。除了我和另一个多数派外，还选出三个党代表大会少数派的代表参加这个委员会，这就是说，在这个授权中央委员会组织地方委员会的委员会中，正是我的对手占了上风。罗莎·卢森堡同志把两个不同的事实混为一谈了。第一，她把我的组织草案一方面同委员会的修正草案混为一谈，另一方面又同党代表大会通过的组织章程混为一谈；

第二，她把坚持党章的某一条文的某项要求（说我不顾一切地坚持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因为我在全体会议上并没有反对起草委员会提出的修正），同坚持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章在下届代表大会对它进行修改之前应该一直有效这一论点（这不是道地的“极端集中制”的论点吗？）混为一谈。这个论点（纯粹布朗基主义[3]的论点，这是读者很容易看出来的），我在这本书中确实是“不顾一切地”坚持的。卢森堡同志说，在我看来，“中央委员会是党的唯一积极的核心”。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从来没有坚持过这种意见。相反，我的论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少数派）在自己的大作中还责备我，说我维护中央委员会的独立性、自主性还很不够，让中央委员会过多地服从于设在国外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党总委员会。我在这本书中回答了这个指责，指出党内多数派在党总委员会占优势的时候，从来没有试图限制中央委员会的独立性；但当党总委员会成了少数派手中的斗争工具以后，立刻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罗莎·卢森堡同志说，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对建立统一的党的必要性并不存在任何怀疑，整个争论的中心是集中程度大小的问题。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如果卢森堡同志肯花点力气读读组成多数派的许多党的地方委员会的决议，她就会很容易地了解到（从我这本书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争论主要还是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应不应该坚持党代表大会多数派的方针的问题上。关于这种“极端集中制的”“纯粹布朗基主义的”要求，这位敬爱的同志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她却更喜欢在那里慷慨激昂地反对什么部分机械地服从整体，什么奴隶般的顺从，什么盲目服从等等可怕的东西。我非常感谢卢森堡同志向我们说明了奴隶般的顺从对党的严重危害性这样一个深奥的思想，不过我倒想知道一下，这位同志是否认为党代表大会的少数派在自称为党的机关的中央机关里占了上风是正常的，她是否能容许这种现象，她在其他任何政党中，是否看到过这样的现象？罗·卢森堡同志硬说我认为，俄国已经具备组织一个庞大的极端集中的工人政党的一切先决条件。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我在这本书里，

根本没有提出这种看法，更谈不上坚持这种看法了。我提出的论点所表述的一直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我强调的是，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得到公认的一切先决条件已经具备，可以用个别小组来代替党的委员会的时期早已过去。我举出了一些证据，说明我们党内有些学者表现了自己的不彻底性和不坚定性，他们没有任何权利把自己的无纪律行为加之于俄国的无产者。俄国工人已经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不止一次地表示要遵守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卢森堡同志说这种意见是“乐观主义的”（倒不如说是“悲观主义的”），并且对我的论点的实际根据只字不提，简直可笑。卢森堡同志说我赞扬工厂的教育作用。这不是事实。不是我，而是我的对手硬说我把党看成了工厂。我狠狠地嘲笑了他，用他自己的话证明他把工厂纪律的两个不同方面混为一谈，可惜罗·卢森堡同志竟也这样做了。［注：见俄文小册子《我们之间的争论》，《罗莎·卢森堡反对卡尔·马克思》一文。］

卢森堡同志说，我把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说成是同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的组织有联系的雅各宾派分子，这样，我就比我的任何一个对手都更巧妙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这也不是事实。最先谈到雅各宾派的不是我，而是帕·阿克雪里罗得。阿克雪里罗得最先把我们党内各派比作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各派。我只是指出，对这种比较只能理解成这样：目前的社会民主党划分为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山岳派和吉伦特派[4]的划分。党代表大会所承认的旧《火星报》[5]过去经常作这种比较。旧《火星报》正是由于承认这种划分，才同我们党的机会主义派即《工人事业》派进行了斗争。罗莎·卢森堡在这里把18世纪和20世纪的两个革命派别之间的**可比性**和这两个派别之间的同一性混为一谈了。比如，我说，小沙伊德格山跟少女峰[6]相比同二层楼跟四层楼相比是一样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我把四层楼和少女峰看成同一个东西。卢森堡同志完全忽视了对我们党内各派的实际分析。而我这本书的大部分篇幅恰恰是根据我们党代表大会的记录进行这种分析的，我在序言中也特别指出了这一点。罗莎·卢森堡想要谈论我们党的现状，

但同时却完全无视奠定我们党的真正基础的党代表大会。应当说，这是冒险的做法！尤其冒险的是，正象我在这本书中曾数百次指出的，我的对手们无视我们的党代表大会，因此，他们的一切论断都没有任何事实根据。

而罗莎·卢森堡同志正是犯了这个根本性的错误。她只是重复一些空洞的词句，而不去努力弄清这些词句的具体含义。她用各种各样的骇人之谈来进行恫吓，而不去研究争论的真正根源。她硬说，我写的是一些泛泛的言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则和论点，一些绝对真理，而对那些完全有肯定的事实根据的和只有我才运用的相对真理，却竭力避而不谈。她还指责我们死抠公式，并且为此把马克思的辩证法搬出来。然而，恰恰是这位尊敬的同志的文章，满篇都是臆造的死板公式，恰恰是她的文章与辩证法的基本原理相违背。这个基本原理就是：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罗莎·卢森堡同志傲然地无视我们党内斗争的具体事实，大谈特谈那些无法认真讨论的问题。我再从卢森堡同志的第二篇文章中举出最后一个例子。她引了我的话：组织章程条文的这种或那种写法，可能成为反对机会主义的或多或少锐利的手段［注：参看《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8 卷第 268 页。——编者注］。可是，我在这本书中以及我们大家在党代表大会上谈的是哪些起草方案，罗莎·卢森堡却只字未提。党代表大会上进行了什么样的论战，我提出的论点是反对谁的，关于这些，这位同志全都没有提到，而是给我作了一个关于议会制国家的机会主义……的演讲!!但是，机会主义的各种各样的独特的表现形式，我这本书谈到的我们俄国的各种色彩的机会主义，她的文章却一个字也没有谈到。从这一切聪明透顶的论述中得出的结论就是："党章本身绝不应当〈？？谁能懂〉成为什么反击机会主义的武器，而只应当成为实现实际上存在的党内革命无产阶级多数派的领导作用的强有力的外在手段。"完全正确。但我们党内实际上存在的多数派是怎样形成的，罗·卢森堡却避而不谈，而我这本书谈的却正是这一点。我和普列汉诺夫利用这种强有力的外在手段维护过什么样的作用，她也避而不谈。

我只能补充一句，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说过这种荒唐的话，什么党章“本身”是一种武器。

对这种解释我的观点的手法所作的最正确的回答，就是叙述我们党内斗争的具体事实。这样，每个人就会清楚地看到，具体事实与卢森堡同志的泛泛之谈和公式化的抽象概念之间有多么大的矛盾。

我们党是 1898 年春在俄国召开的几个俄国组织的代表大会[7]上成立的。党的名称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工人报》[8]成了中央机关报；“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9]成了党的国外代表机关。代表大会闭幕不久，党中央委员会成员即被逮捕。《工人报》出版了两号就停刊了。整个党成了各地方党组织（即所谓委员会）的无定形的堆积体。这些地方委员会之间的唯一联系，是思想上的联系，纯精神上的联系。一个分歧、动摇、分裂的时期不可避免地到来了。同西欧各党相比，知识分子在我们党内占的比重要大得多，他们迷恋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时髦。但是，这种迷恋很快就消失了，接着，又一面盲目崇拜资产阶级对马克思的批评，一面盲目崇拜纯粹的职工运动（罢工主义——“经济主义”）。知识分子机会主义派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分歧，引起了国外“联合会”的分裂。《工人思想报》和国外的《工人事业》[10]杂志成了“经济主义”的代言人（后者程度差些），它们贬低政治斗争的意义，否认俄国有资产阶级民主派存在。“合法的”马克思的批评家司徒卢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布尔加柯夫、别尔嘉耶夫等先生们已经彻底向右转。欧洲没有一个地方象我们俄国这样，伯恩施坦主义竟如此迅速地达到了自己的逻辑终点，组成了自由派。我们的司徒卢威先生开头为维护伯恩施坦主义[11]而进行“批评”，最后创办了一个自由主义（指欧洲的自由主义）杂志《解放》[12]。普列汉诺夫及其朋友退出国外“联合会”以后，得到了《火星报》和《曙光》[13]杂志的创办人的支持。这两种刊物（罗莎·卢森堡同志也听到了一些这方面的情况）为反对党内机会主义派进行了“三年辉煌战役”，这是社会民

主党的“山岳派”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吉伦特派”的战役（这是旧《火星报》的说法），是反对《工人事业》派（即克里切夫斯基、阿基莫夫、马尔丁诺夫等同志），反对犹太崩得[14]，反对受到该派鼓舞的俄国组织（首先反对彼得堡的所谓“工人组织”[15]和沃罗涅日委员会[16]）的战役。

事情愈来愈明显，各委员会之间只有纯思想上的联系是不够的。形势愈来愈迫切地要求成立一个真正统一的党，即要求完成1898年只是初步规划了的任务。最后，在1902年底，成立了以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7]为己任的组织委员会。一个犹太崩得代表也加入了这个主要由俄国《火星报》组织组成的组织委员会。1903年秋，终于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这次大会，一方面，党在形式上统一了，另一方面，党又分裂为“多数派”和“少数派”。这种划分在党代表大会以前是没有的。只有详细地分析一下党代表大会上展开的斗争，才能说明这种划分。遗憾的是，少数派的拥护者（包括卢森堡同志在内）却小心翼翼地避开这种分析。

我在这本由卢森堡同志以独特的方式介绍给德国读者的书中，用了100多页的篇幅，详细研究了代表大会的记录（编成一卷，约400页）。为了进行这种分析，我把代表，或者不如说是把选票（我们的代表有的有一票，有的有两票表决权）分成四大类：（1）火星派多数派（拥护旧《火星报》方针的）——24票，（2）火星派少数派——9票，（3）中派（也谑称为“泥潭派”）——10票，以及（4）反火星派——8票，共51票。我分析了这四类人参加党代表大会所举行的**一切**表决的情形，并且证明在一切问题（纲领、策略和组织）上，党代表大会都是火星派同反火星派斗争的舞台，而“泥潭派”在这里表现了各种各样的动摇。凡是对我们党的历史有点了解的人都会清楚地知道，情况只能是这样。可是，一切少数派的拥护者（包括罗·卢森堡在内）却谨慎地闭眼不看这个斗争。为什么呢？因为正是这个斗争使少数派的当前政治立场的全部虚伪性暴露出来了。在党代表大会进行这一斗争的整个过程中，火星派在数十个问题上，在数十次表决中，都是反

对反火星派和“泥潭派”的；而讨论的问题愈是具体，对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基本内容愈是肯定，要求实现旧《火星报》的不可动摇的计划愈是迫切，“泥潭派”就愈是坚决地站到反火星派方面去。反火星派（特别是阿基莫夫同志和一直附和他的彼得堡“工人组织”代表布鲁凯尔同志，还有几乎一直都附和他的马尔丁诺夫同志和五个犹太崩得代表）反对承认旧《火星报》的方针。他们维护旧的个别组织，投票反对这些组织服从党，反对它们同党合并（如组委会事件[18]，解散“南方工人”社这个“泥潭派”的最重要的集团等等）。他们反对按集中制原则制定的组织章程（代表大会第 14 次会议），并指责**一切**火星派分子，说他们想要造成“有组织的不信任”，制定“非常法”等等可怕的东西。当时，**一切**火星派分子全都嘲笑这种指责。值得注意的是，罗莎·卢森堡同志现在却把所有这些凭空捏造的东西都当成了真事。在绝大多数问题上，都是火星派取得了胜利；他们在代表大会上占优势，这从上面提到的数字可以明显看出来。可是，在代表大会的后半期的会议上，在解决一些不太重要的问题时，反火星派却取得了胜利，因为某些火星派分子投票支持他们。例如，在讨论我们党纲中的平等使用一切语言的问题时，情况就是这样。在这个问题上，反火星派几乎推倒纲领委员会并通过自己的条文。在党章第 1 条的问题上，情况也是这样：反火星派同“泥潭派”一起通过了马尔托夫的条文。按这个条文，算作党员的不仅有党组织的成员（我和普列汉诺夫都拥护这样的提法），而且还有一切在党组织的监督下工作的人。［注：考茨基同志赞同马尔托夫的条文，他是从当时是否适宜的观点出发的。第一，我们党代表大会对这个条文的讨论不是从当时是否适宜的观点出发，而是从原则的观点出发的。阿克雪里罗得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第二，如果考茨基同志认为，在俄国警察制度下，加入党组织同只在党组织的监督下进行工作这两者之间有这么大的区别，他就错了。第三，如果把目前俄国的状况和实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19]的德国的情况相比，就大错特错了。］

在选举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问题上，情况也是这样。24 个火星派分子组成了团结一致的多数派，他们实现了考虑已久的改组编辑部的计划：6 个旧编辑中有 3 个当选；组成少数派的有 9 个火星派分子、10 个中派分子和 1 个反火星派分子（其余 7 个反火星派分子即犹太崩得和“工人事业”的代表在此以前已经退出了代表大会）。这个少数派对这次选举极为不满，决定不再参加其余的选举。考茨基同志认为，改组编辑部是引起后来的斗争的主要原因，这种看法是十分正确的。但是，他认为是我（原文如此！）把 3 个同志“开除”出编辑部，这只能说明他根本不了解我们代表大会的情况。因为第一，落选和开除完全不是一回事，况且我当然没有权力在代表大会上开除谁；第二，看来考茨基同志并没有料到，反火星派、中派和一小部分《火星报》的信徒的联合这一事实也有政治意义，对选举结果不会不发生影响。谁要是不愿意闭眼不看我们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情，谁就一定会了解，我们目前分成少数派和多数派，不过是我们党以前分成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知识分子机会主义派的翻版。这是事实，任何解释、任何嘲笑都无法回避这一事实。

遗憾的是，代表大会闭幕以后，这种分裂的原则意义被增补问题上的无谓争吵给弄模糊了。就是说，要是 3 个旧编辑不被重新增补进去，少数派就不想在中央机关的监督下工作。这个斗争继续了两个月。斗争的手段是进行抵制和瓦解党。有 12 个委员会（对这个问题表态的委员会是 14 个）严厉地斥责了这种斗争手段。少数派甚至拒绝接受我们（我和普列汉诺夫）的建议，不肯在《火星报》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在国外同盟代表大会上，情况竟发展到对中央机关的成员进行人身攻击和谩骂（什么专制君主、官僚、宪兵、扯谎者等等）。指责他们压制个人的主动精神，想要人们绝对服从、盲目服从，等等。普列汉诺夫企图把少数派的这种斗争手段评定为无政府主义手段，但这种企图未能达到目的。这次代表大会以后，普列汉诺夫发表了一篇划时代的专门攻击我的文章《不该这么办》（《火星报》第

52 号）。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不一定是反对修正主义者的斗争；谁都可以看出，他这里指的是我们的少数派。接着他写道，有时没有必要反对俄国革命者身上根深蒂固的无政府个人主义；有时作出某些让步也是制服这种个人主义和防止分裂的最有效的办法。我不能同意这种看法，因而退出了编辑部。这样，少数派编辑就被增补进去了。接着，又在增补中央委员的问题上进行了斗争。我曾建议和解，条件是把中央机关报留给少数派，而把中央委员会交给多数派，但我的建议被否决了。斗争继续进行，继续“在原则上”反对官僚主义、极端集中制、形式主义、雅各宾主义、施韦泽主义（把我称为俄国的施韦泽）等等可怕的东西。我在这本书中嘲笑了所有这些指责，并指出，这或者只是为增补问题而进行的争吵，或者（假定可以认为这是“原则”的话）不外是机会主义的、吉伦特派的辞藻。目前的少数派只不过是在那里重复阿基莫夫同志和其他公认的机会主义者在我们代表大会上反对旧《火星报》的一切拥护者所维护的集中制时曾经说过的话。

俄国各委员会对中央机关报变成个别小组的刊物，变成为增补问题进行争吵和在党内进行造谣的刊物，极为不满。通过了许多决议，进行极严厉的谴责。只有我们上面已经提到的所谓彼得堡“工人组织”和沃罗涅日委员会（两者都是阿基莫夫同志的方针的拥护者）**从原则上**对新《火星报》的方针表示满意。要求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愈来愈多了。

读者只要认真研究一下我们党内斗争的第一手材料，就会很容易认识到，罗莎·卢森堡同志所说的什么“极端集中制”，必须逐步实行集中制等等，具体地说，从实际上说，是对我们代表大会的嘲笑，抽象地说，从理论上说（如果这里可以谈到理论的话），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是对马克思的真正辩证法的歪曲，等等。

我们党内斗争的最后阶段的标志，是一部分多数派中央委员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一部分已经不起作用，有名无实（这是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变动[20]等等造成的）。党总委员会（在增补旧编辑后，该委员会也落到了少数派手里）和目前的中央委员会指责一切为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而进行的鼓动，并开始同某些少数派党员订立私人协定和进行谈判。有些组织，例如中央代办员（全权）小组，就因鼓动召开代表大会这一罪行而被解散[21]。党总委员会和新的中央委员会反对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斗争已经全面展开。多数派为了回击这种行动，提出了一个口号："打倒波拿巴主义！"（代表多数派讲话的加廖尔卡同志写的小册子用的就是这个标题）。愈来愈多的决议把反对召开代表大会的党的机关称为反党的波拿巴主义的机关。我和另一位同志新创办的多数派出版社（这里出版了加廖尔卡同志的上述小册子和其他一些刊物），被宣布为非党出版社，这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少数派的一切反对极端集中制和主张自治的言论，是何等的虚伪。多数派只能通过新出版社来宣传自己的观点，因为《火星报》几乎完全拒绝刊登他们的文章。尽管这样，或更确切地说，正因为这样，党总委员会才以我们的出版社不代表任何一个党组织这个纯粹形式上的理由，作出了上述决定。

不用说，目前，正常工作已经无人过问，社会民主党的威信一落千丈，全党的士气极端涣散，这是因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一切决议和一切选举已经作废，同时也还由于对党负责的党的机关正在为反对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而进行斗争。

注释：

[1]《进一步，退两步（尼·列宁给罗莎·卢森堡的答复）》是针对卢森堡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而写的。卢森堡应《火星报》之约而写的这篇文章，于 1904 年 7 月 13 日先刊登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上，同年 7 月 23 日发表于《火星报》第 69 号。

列宁把答复寄给卡·考茨基，请他在《新时代》上发表，但是考茨基拒绝刊登，把原稿退给了列宁。在 1905 年 2 月 8 日列宁给奥·倍倍尔的信的底稿中，有一段已被删去的话提到了这件事："考茨基企图在《火星报》上贬低形式组织的价值。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周刊在'组织——这只是过程，仅仅是一种倾向'这个机智而'辩证'的借口下，颂扬了瓦解组织与背信弃义的行为（罗莎·卢森堡在《新时代》上）。这在我们队伍中引起了极大愤慨。列兵同志，多数派的一个很有影响的成员，坚持认为考茨基会刊登我的答复。我同他打赌说，情况将恰恰相反。我的'辩护词'写得简短扼要，而且仅限于纠正一些重要的失实之处，并用事实的陈述同对我们党的嘲笑相对照。考茨基拒登我的文章，用了一个出色的借口，说什么《新时代》刊登对我们的攻击并非因为它们是针对我们的。但尽管确系针对我们的，它还是刊登了！这简直是一种嘲笑！总之，《新时代》（而且不只是它）只愿把少数派的观点介绍给德国社会民主党。这在我们队伍中引起的愤慨大极了。"（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 5 卷第 172—175 页）

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手稿原件没有保存下来。保存下来的是一份德文抄写稿，抄写人不详。列宁在这份德文稿上作了一些小的修改。《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第 9 卷以德俄文对照的形式收载了这个得到作者赞同的德文稿和它的俄译文。——35。

[2]《新时代》杂志（《DieNeue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 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 年 10 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 年 10 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 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还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

本理论、宣传俄国 1905—1907 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 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35。

[3]布朗基主义是 19 世纪法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冒险主义的思潮，以路·奥·布朗基为代表。布朗基主义者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忽视同群众的联系，主张用密谋手段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少数人的专政。——36。

[4]山岳派和吉伦特派是 18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两个政治派别。山岳派也称雅各宾派，是法国国民公会中的左翼民主主义集团，以其席位在会场的最高处而得名。该派主张铲除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是当时的革命阶级——资产阶级的最坚决的代表。其领袖是马·罗伯斯比尔、让·保·马拉、若·雅·丹东、路·安·圣茹斯特等。吉伦特派代表共和派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主要是外省资产阶级的利益。它的许多领导人是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中的吉伦特省代表，所以后世历史学家给它起了这个名称。吉伦特派的领袖是雅·皮·布里索、皮·维·韦尼奥、罗兰夫妇、让·安·孔多塞等。吉伦特派动摇于革命和反革命之间，走同王党勾结的道路，最终变成了反革命力量。列宁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为山岳派，即无产阶级的雅各宾派，而把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称为社会民主党的吉伦特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后，列宁经常强调指出，孟什维克就是工人运动中的吉伦特派。——38。

[5]《火星报》（《Искра》）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 1900 年 12 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各号的出版地点是慕尼黑、伦敦（1902 年 7 月起）和日内瓦（1903 年春起）。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编辑部的秘书起初是因·格·斯米多维奇－列曼，1901 年 4 月起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担任。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他在《火星报》上发

表了许多文章，阐述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并评论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火星报》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往俄国翻印和传播。《火星报》成了团结党的力量、聚集和培养党的干部的中心。在俄国许多城市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火星派的小组和委员会。1902 年 1 月在萨马拉举行了火星派代表大会，建立了《火星报》俄国组织常设局。

《火星报》在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列宁的倡议和亲自参加下，《火星报》编辑部制定了党纲草案、筹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宣布《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

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火星报》编辑部改由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三人组成。但是马尔托夫坚持保留原来的六人编辑部，拒绝参加新的编辑部，因此《火星报》第 46—51 号是由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二人编辑的。后来普列汉诺夫转到了孟什维主义的立场上，要求把原来的编辑都吸收进编辑部。列宁不同意这样做，于 1903 年 10 月 19 日（11 月 1 日）退出了编辑部。因此，从第 52 号起，《火星报》变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人们称它为新《火星报》。——38。

[6]小沙伊德格山和少女峰是瑞士境内的两座山，分别高 2061 米和 4158 米。——38。

[7]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 1898 年 3 月 1—3 日（13—15 日）在明斯克秘密举行。倡议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是列宁领导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早在 1895 年 12 月列宁就在狱中草拟了党纲草案，并提出了召开代表大会的主张。由于彼得堡等地的组织遭到警察破坏，这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主要由基辅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担任。出席代表大会的有 6 个组织的 9 名代表：彼得堡、

莫斯科、基辅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代表各 1 名，基辅《工人报》小组的代表 2 名，崩得的代表 3 名。大会通过了把各地斗争协会和崩得合并为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决议。在民族问题上，大会承认每个民族有自决权。大会选出了由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代表斯·伊·拉德琴柯、基辅《工人报》代表波·李·埃杰尔曼和崩得代表亚·约·克列梅尔三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工人报》被承认为党的正式机关报。中央委员会在会后以大会名义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把争取政治自由列为首要任务，并把它和将来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被宣布为党的国外代表机关。这次大会没有制定出党纲和党章，也没有形成中央的统一领导，而且大会闭幕后不久大多数代表和中央委员遭逮捕，所以统一的党实际上没有建立起来。——40。

[8]《工人报》（《РабочаяГазета》）是基辅社会民主党人小组的秘密报纸，波·李·埃杰尔曼、巴·卢·图恰普斯基、尼·阿·维格多尔契克等任编辑，在基辅出版。共出过两号：第 1 号于 1897 年 8 月出版；第 2 号于同年 12 月出版（报纸上印的日期是 11 月）。图恰普斯基曾受编辑部委派出国同劳动解放社建立联系，得到了格·瓦·普列汉诺夫等给报纸撰稿的许诺。《工人报》和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也有联系。《工人报》参与了 1898 年 3 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被这次代表大会承认为党的正式机关报。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工人报》的印刷所被警察破获和捣毁，已编好待发排的第 3 号没能出版。1899 年该报试图复刊，没有成功。——40。

[9]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是根据劳动解放社的倡议，在全体会员承认劳动解放社纲领的条件下，于 1894 年在日内瓦成立的。联合会为俄国国内出版书刊，它的出版物全部由劳动解放社负责编辑。1896—1899 年联合会出版了不定期刊物《工作者》文集和《〈工作者〉小报》。1898 年 3 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

一次代表大会承认联合会是党的国外代表机关。1898 年底，机会主义分子（经济派）在联合会里占了优势。1898 年 11 月，在苏黎世召开的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声明，除《工作者》文集以及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和《新工厂法》两个小册子外，拒绝为联合会编辑出版物。联合会从 1899 年 4 月起出版《工人事业》杂志，由经济派分子担任编辑。1900 年 4 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的成员以及与其观点一致的人正式退出联合会，成立了独立的革命组织"社会民主党人"。此后联合会和《工人事业》杂志就成了经济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代表。1903 年，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联合会宣布解散。——40。

[10]《工人思想报》(《РабочаяМысль》）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的机关报，1897 年 10 月—1902 年 12 月先后在彼得堡、柏林、华沙和日内瓦出版，共出了 16 号。参加该报编辑部的有尼·尼·洛霍夫－奥尔欣、康·米·塔赫塔廖夫、弗·巴·伊万申、阿·亚·雅库波娃等人。该报号召工人阶级为争取狭隘经济利益而斗争。它把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对立起来，认为政治斗争不在无产阶级任务之内，反对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主张成立工联主义的合法组织。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209—238 页）和《怎么办？》（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6 卷第 1—183 页）等著作中批判了《工人思想报》的观点。

《工人事业》杂志（《рабочееДело》）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的不定期杂志，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机关刊物，于 1899 年 4 月—1902 年 2 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 12 期（9 册）。它的编辑部设在巴黎，担任编辑的有波·尼·克里切夫斯基、帕·费·捷普洛夫、弗·巴·伊万申和亚·马尔丁诺夫。该杂志支持所谓"批评自由"这一伯恩施坦主义口号，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

和组织问题上持机会主义立场。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批判了《工人事业》杂志的观点。——40。

[11]伯恩施坦主义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产生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 年）一书是对伯恩施坦主义的全面阐述。伯恩施坦主义在哲学上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上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竭力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传播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伯恩施坦主义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和第二国际其他一些政党的支持。在俄国，追随伯恩施坦主义的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等。——40。

[12]《解放》杂志（《Освобождение》）是俄国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机关刊物（双周刊），1902 年 6 月 18 日（7 月 1 日）—1905 年 10 月 5 日（18 日）先后在斯图加特和巴黎出版，共出了 79 期。编辑是彼·伯·司徒卢威。该杂志执行反对革命、反对无产阶级的方针，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人士中影响很大。1903 年到 1904 年 1 月，该杂志筹备成立了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的秘密组织解放社。解放派和立宪派地方自治人士一起构成了 1905 年 10 月成立的立宪民主党的核心。——40。

[13]《曙光》杂志（《Заря》）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刊物，由《火星报》编辑部编辑，1901—1902 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共出了 4 期（第 2、3 期为合刊）。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机会主义错误思潮。杂志刊登了列宁的下列文章：《时评》、《地方自治机关的

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土地问题和“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前 4 章、《内政评论》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41。

[14]崩得即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1897 年 9 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人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 1898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 1903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 1906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崩得重新加入了党。从 1901 年起，崩得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它在党内一贯支持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 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 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 年 3 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41。

[15]彼得堡“工人组织”是经济派的组织，于 1900 年夏建立，1900 年秋同被承认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合并。火星派在彼得堡党组织中取得胜利后，受经济派影响的一部分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于 1902 年秋从彼得堡委员会分离出去，重新建立了独立的“工人组织”。“工人组织”委员会对列宁的《火星报》及其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计划持反对态度，鼓吹工人阶级的主动性是开展工人运动和取得斗争成功的最重要条件。1904 年初，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彼得堡“工人组织”加入全党的组织，不复独立存在。——41。

[16]沃罗涅日委员会是一个受以弗·彼·阿基莫夫和莉·彼·马赫诺韦茨为首的经济派的影响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该委员会对 1902 年 11 月在普斯科夫会议上成立的组织委员会持敌对立场，不承认它有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权力。该委员会散发诽谤性信件，辱骂组织委员会，并把在建立组织委员会中起了主要作用的《火星报》称为“社会民主党的鹰犬”，指责它实行分裂政策。由于这些原因，组织委员会认为不宜邀请该委员会参加代表大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批准了组织委员会的决定，指出：“鉴于沃罗涅日委员会不承认组织委员会以及召开代表大会的章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认为组织委员会无疑有权不邀请该委员会参加代表大会。”——41。

[17]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 1903 年 7 月 17 日（30 日）—8 月 10 日（23 日）召开。7 月 24 日（8 月 6 日）前，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开了 13 次会议。后因比利时警察将一些代表驱逐出境，代表大会移至伦敦，继续开了 24 次会议。

代表大会是《火星报》筹备的。列宁为代表大会起草了一系列文件，并详细拟订了代表大会的议程和议事规程。出席代表大会的有 43 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他们代表着 26 个组织（劳动解放社、《火星报》组织、崩得国外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党的 20 个地方委员会和联合会），共有 51 票表决权（有些代表有两票表决权）。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发言权的代表共 14 名。代表大会的成分不一，其中有《火星报》的拥护者，也有《火星报》的反对者以及不坚定的动摇分子。

列宁被选入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了多次会议，几乎就所有问题发了言。他还是纲领委员会、章程委员会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委员。

代表大会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批准党纲、党章以及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列宁和他的拥护者在大会上同机会主义者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代表大会否

决了机会主义分子要按照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的精神来修改《火星报》编辑部制定的纲领草案的一切企图。大会先逐条讨论和通过党纲草案，然后由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整个纲领（有 1 票弃权）。在讨论党章时，会上就建党的组织原则问题展开了尖锐的斗争。由于得到反火星派和“泥潭派”（中派）的支持，尔·马尔托夫提出的为不坚定分子入党大开方便之门的党章第 1 条条文，以微弱的多数票为大会所通过。但是代表大会还是基本上批准了列宁制定的党章。

大会票数的划分起初是：火星派 33 票，“泥潭派”（中派）10 票，反火星派 8 票（3 名工人事业派分子和 5 名崩得分子）。在彻底的火星派（列宁派）和“温和的”火星派（马尔托夫派）之间发生分裂后，彻底的火星派暂时处于少数地位。但是，8 月 5 日（18 日），7 名反火星派分子（2 名工人事业派分子和 5 名崩得分子）因不同意代表大会的决议而退出了大会。在选举中央机关时，得到反火星派分子和“泥潭派”的支持的马尔托夫派（共 7 人）成为少数派，共有 20 票（马尔托夫派 9 票，“泥潭派”10 票，反火星派 1 票），而团结在列宁周围的 20 名彻底的火星派分子成为多数派，共有 24 票。列宁及其拥护者在选举中得到了胜利。代表大会选举列宁、马尔托夫和格·瓦·普列汉诺夫为中央机关报《火星报》编辑部成员，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弗·威·林格尼克和弗·亚·诺斯科夫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普列汉诺夫为党总委员会委员。从此，列宁及其拥护者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俄语多数派一词音译），而机会主义分子则被称为孟什维克（俄语少数派一词音译）。——41。

[18]组委会事件和解散南方工人社的问题，是在 1903 年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十次会议上先后发生的。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一书的第 3 节《代表大会的开始。——组织委员会事件》和第 4 节《南方工人社的解散》（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8 卷第 207—216 页）中对这两件事作了详尽的论述。——42。

[19]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即《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是德国俾斯麦政府从 1878 年 10 月起实行的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法令。这个法令规定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进步工人组织，封闭工人刊物，没收社会主义书报，并可不经法律手续把革命者逮捕和驱逐出境。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期间，有 1000 多种书刊被查禁，300 多个工人组织被解散，2000 多人被监禁和驱逐。为适应非法存在的条件，德国社会民主党改造了自己的工作：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国外出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定期在国外举行，在国内则巩固和发展地下党组织，并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加强同群众的联系。结果，党的影响进一步增长。在工人运动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 1890 年 10 月被废除。——43。

[20]1903 年 8 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选进中央委员会的是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弗·威·林格尼克和弗·亚·诺斯科夫。1903 年 10 月，罗·萨·捷姆利亚奇卡、列·波·克拉辛、玛·莫·埃森和费·瓦·古萨罗夫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同年 11 月，列宁和列·叶·加尔佩林被增补为中央委员。1904 年 7—9 月间，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发生了新的变化：拥护列宁的林格尼克和埃森被捕。调和派分子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古萨罗夫辞职。中央委员会中剩下的调和派分子克拉辛、诺斯科夫和加尔佩林不顾列宁的抗议，把多数派的拥护者捷姆利亚奇卡非法地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而把三个新的调和派分子——阿·伊·柳比莫夫、列·雅·卡尔波夫和约·费·杜勃洛文斯基——增补为中央委员。由于这些变化，调和派在中央委员会占了多数。——45。

[21]列宁指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南方局因鼓动召开第三次党代表大会而于 1904 年 8 月被中央委员会解散一事。——45。

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

列宁（1905 年 11 月 13 日〔26 日〕）

十月革命以后在俄国造成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新条件，使党的出版物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非法报刊和合法报刊的区别，这个农奴制专制俄国时代的可悲的遗迹，正在开始消失。它还没有灭绝。还远远没有灭绝。我们首席大臣的伪善的政府还在胡作非为，以致《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还在“非法地”出版，但是，政府愚蠢地企图“禁止”它所无法阻止的事情，除了给政府带来耻辱、带来道义上新的打击以外，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当存在着非法报刊和合法报刊的区别的时候，党的报刊和非党报刊的问题解决得非常简单而又非常虚假，很不正常。一切非法的报刊都是党的报刊，它们由各个组织出版，由那些同党的实际工作者团体有某种联系的团体主办。一切合法的报刊都是非党的报刊（因为党派属性是不准许有的），但又都“倾向”于这个或那个政党。畸形的联合、不正常的“同居”和虚假的掩饰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没有成熟到具有党的观点，实际上还不是党的人，他们认识肤浅或者思想畏缩，另一些人想表达党的观点，出于无奈而吞吞吐吐，这两种情况混杂在一起了。

伊索式的笔调，写作上的屈从，奴隶的语言，思想上的农奴制——这个该诅咒的时代！无产阶级结束了这种使俄国一切有生气的和新鲜的事物都感到窒息的丑恶现象。但是无产阶级暂时为俄国只争得了一半的自由。

革命还没有完成。沙皇制度已经没有力量战胜革命，而革命也还没有力量战胜沙皇制度。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候，到处都看得到公开的、诚实的、直率的、彻底的党性和秘密的、隐蔽的、“外交式的”、支吾搪塞的“合法性”之间的这种反常的结合。这种反常的结合也反映在我们的报纸上：不管古契柯夫先生如何嘲讽社会民主党的专横，说它禁止刊印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温和报纸，但事实终究是

事实，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仍然被摈斥在警察横行的专制俄国的大门之外。

不管怎样，已经完成了一半的革命，迫使我们大家立即着手新的工作安排。出版物现在有十分之九可以成为，甚至可以“合法地”成为党的出版物。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与资产阶级的习气相反，与资产阶级企业主的即商人的报刊相反，与资产阶级写作上的名位主义和个人主义、“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唯利是图相反，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出版物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

党的出版物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德国俗语说：“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我把写作事业比作螺丝钉，把生气勃勃的运动比作机器也是有缺陷的。也许，甚至会有一些歇斯底里的知识分子对这种比喻大叫大嚷，说这样就把自由的思想斗争、批评的自由、创作的自由等等贬低了、僵化了、“官僚主义化了”。实质上，这种叫嚷只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表现。无可争论，写作事业最不能作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论的，可是这一切只证明，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中写作事业这一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这一切决没有推翻那个在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看来是格格不入的和奇怪的原理，即写作事业无论如何必须成为同其他部

分紧密联系着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一部分。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写作者一定要参加到各个党组织中去。出版社和发行所、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营业所，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向党报告工作情况。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注视这一切工作，监督这一切工作，把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事业的生气勃勃的精神，带到这一切工作中去，无一例外，从而使“作家管写，读者管读”这个俄国古老的、半奥勃洛摩夫式的、半商业性的原则完全没有立足之地。

自然，我们不是说，被亚洲式的书报检查制度和欧洲的资产阶级所玷污了的写作事业的这种改造，一下子就能完成。我们决不是宣传某种划一的体制或者宣传用几个决定来解决任务。不，在这个领域里是最来不得公式主义的。问题在于使我们全党，使俄国整个觉悟的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都认识到这个新任务，明确地提出这个新任务，到处着手解决这个新任务。摆脱了农奴制的书报检查制度的束缚以后，我们不愿意而且也不会去当写作上的资产阶级买卖关系的俘虏。我们要创办自由的报刊而且我们一定会创办起来，所谓自由的报刊是指它不仅摆脱了警察的压迫，而且摆脱了资本，摆脱了名位主义，甚至也摆脱了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

最后这一句话似乎是奇谈怪论或是对读者的嘲弄。怎么！也许某个热烈拥护自由的知识分子会叫喊起来。怎么！你们想使创作这样精致的个人事业服从于集体！你们想使工人们用多数票来解决科学、哲学、美学的问题！你们否认绝对个人的思想创作的绝对自由！

安静些，先生们！第一，这里说的是党的出版物和它应受党的监督。每个人都有自由写他所愿意写的一切，说他所愿意说的一切，不受任何限制。但是每个自由的团体（包括党在内），同样也有自由赶走利用党的招牌来鼓吹反党观点的人。言论和出版应当有充分的自由。但是结社也应当有充分的自由。为了言论自

由，我应该给你完全的权利让你随心所欲地叫喊、扯谎和写作。但是，为了结社的自由，你必须给我权利同那些说这说那的人结成联盟或者分手。党是自愿的联盟，假如它不清洗那些宣传反党观点的党员，它就不可避免地会瓦解，首先在思想上瓦解，然后在物质上瓦解。确定党的观点和反党观点的界限的，是党纲，是党的策略决议和党章，最后是国际社会民主党，各国的无产阶级自愿联盟的全部经验，无产阶级经常把某些不十分彻底的、不完全是纯粹马克思主义的、不十分正确的分子或流派吸收到自己党内来，但也经常地定期“清洗”自己的党。拥护资产阶级“批评自由”的先生们，在我们党内，也要这样做，因为现在我们的党立即会成为群众性的党，现在我们处在急剧向公开组织转变的时刻，现在必然有许多不彻底的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也许甚至有某些基督教徒，也许甚至有某些神秘主义者会参加我们的党。我们有结实的胃，我们是坚如磐石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将消化这些不彻底的人。党内的思想自由和批评自由永远不会使我们忘记人们有结合成叫作党的自由团体的自由。

第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先生们，我们应当告诉你们，你们那些关于绝对自由的言论不过是一种伪善而已。在以金钱势力为基础的社会中，在广大劳动者一贫如洗而一小撮富人过着寄生生活的社会中，不可能有实际的和真正的“自由”。作家先生，你能离开你的资产阶级出版家而自由吗？你能离开那些要求你作诲淫的小说和图画、用卖淫来“补充”“神圣”舞台艺术的资产阶级公众而自由吗？要知道这种绝对自由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说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话（因为无政府主义作为世界观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思想）。生活在社会中却要离开社会而自由，这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的作家、画家和女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

我们社会主义者揭露这种伪善行为，摘掉这种假招牌，不是为了要有非阶级的文学和艺术（这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才有可能），而是为了要

用真正自由的、公开同无产阶级相联系的写作，去对抗伪装自由的、事实上同资产阶级相联系的写作。

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写作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过去的经验（从原始空想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成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在的经验（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之间经常发生相互作用。

动手干吧，同志们！我们面前摆着一个困难的然而是伟大的和容易收到成效的新任务：组织同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紧密而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广大的、多方面的、多种多样的写作事业。全部社会民主主义出版物都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一切报纸、杂志、出版社等等都应当立即着手改组工作，以便造成这样的局面，使它们都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完全参加到这些或那些党组织中去。只有这样，“社会民主主义的”出版物才会名副其实。只有这样，它才能尽到自己的职责。只有这样，它即使在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也能摆脱资产阶级的奴役，同真正先进的、彻底革命的阶级的运动汇合起来。

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1]

列宁（1906 年 5 月 20 日〔6 月 2 日〕）

编辑部收到一张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签署的传单：

“鉴于某些党组织提出了关于批评党代表大会的决定的自由的限度问题，中央委员会注意到，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总是要求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策略上达到高度一致，我们党的各部分在政治行动上的这种一致现在比任何时候更为必要，因此认为：

（1）任何人都享有在党的刊物和党的会议上发表个人的意见和维护自己特有的观点的充分自由；

（2）党员不得在广大群众性的政治集会上进行违反代表大会决定的鼓动；

（3）在这种集会上任何党员都不得号召进行违反代表大会的决定的活动，也不得提出与代表大会的决定不一致的决议案。”（黑体都是我们用的）

在实质上研究一下这个决议，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决议中的一些荒唐说法。决议说，享有“在党的会议上”发表个人的意见和提出批评的“充分自由”（第 1 条），而在“广大群众性的集会”上（第 2 条）“任何党员都不得号召进行违反代表大会的决定的活动”。请看结果就是：党员在党的会议上有权号召进行违反代表大会的决定的活动，——而在广大群众性的集会上不“享有”“发表个人的意见”的充分自由！！

决议的起草人完全错误地理解了党内的批评自由同党的行动一致的相互关系。在党纲的原则范围内，批评应当是完全自由的（不妨回忆一下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这个问题的发言[2]），不仅在党的会议上，而且在广大群众性的集会上都是如此。禁止这种批评或这种“鼓动”（因为批评和鼓动是分不开的）是不可能的。党的政治行动必须一致。不论在广大群众性的集

会上，不论在党的会议上或者在党的报刊上，发出任何破坏已经确定的行动一致的“号召”都是不能容许的。

可见，中央委员会对批评自由规定得不确切，规定得太狭窄了，而对行动一致也规定得不确切，规定得太宽了。

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代表大会决定了参加杜马选举。参加选举是完全确定了的行动。在选举的时候（例如目前在巴库），党员在任何地方提出任何不参加选举的号召都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在这个时候“批评”参加选举的决定也是不能容许的，因为这样做就会在事实上破坏选举鼓动的成就。相反，如果选举的日期还没有确定，在这种时候，党员在任何地方批评参加选举的决定都是容许的。当然，在实践中运用这个原则有时也会引起争执和误会，但是只有根据这个原则党才能很好地解决一切争执和一切误会。可是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却提出了某种无法实现的规定。

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实质上是错误的，也是违反党章的。民主集中制和地方机关自治的原则所表明的正是充分的普遍的批评自由，只要不因此而破坏已经确定的行动的一致，——它也表明不容许有任何破坏或者妨害党既定行动的一致的批评。

我们认为，中央委员会没有经过党的刊物和各个党组织事先的任何讨论就公布了有关这个重要问题的决议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事先的讨论本来是可以帮助它避免上述的这些错误的。

我们号召所有党组织现在来讨论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并且明确表示自己对这个决议的态度。

注释：

[1]1906 年 5 月 11 日（24 日），彼得堡市莫斯科区的工人社会民主党党员集会，讨论党的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总结。出席会议的约 300 人。列宁代表

布尔什维克、费·伊·唐恩代表孟什维克在会上作了报告。大会将结束时，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就是否允许在报刊上和群众集会上批评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孟什维克力图限制围绕代表大会决议所展开的思想斗争，认为只有在党的会议上才允许批评，并根据这种精神提出了决议案。列宁对决议案提出修正，指出不仅应当在党的会议上，而且应当在“社会民主党报纸上和群众集会上”讨论代表大会的全部决议。经列宁修改过的决议案获绝大多数的赞同而通过（只有 39 票反对）。对此，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列宁在本文中所批评的决议。几乎彼得堡的所有党组织都反对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这个决议。布尔什维克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也得到其他许多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支持。——128。

[2]指格·瓦·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普列汉诺夫在党的纲领通过时说：“我们党的党员必须承认党的纲领。当然这并不是说纲领一旦通过就不能批评。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承认批评自由。但是谁愿意始终是党员，他就应当甚至在进行批评时也始终站在纲领的基础上。”（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1959 年俄文版第 258 页）——129。

致俄共中央[1]

列宁（1918 年 5 月 4 日）

我请求把审判贪污案件（1918 年 5 月 2 日）的党员开除出党的问题列入议程，因为他们对案情属实、本人供认不讳的受贿者只判了半年监禁。

不枪毙这样的受贿者，而判以轻得令人发笑的刑罚，这对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来说是可耻的行为。这样的同志应该受到舆论的谴责，并且应该开除出党，因为他们应该是与克伦斯基之流和马尔托夫之流为伍，而不能跻身于革命的共产党人之列。

注释：

[1] 1918 年 5 月 2 日，莫斯科革命法庭审理了莫斯科侦查委员会 4 名工作人员被控受贿和敲诈勒索一案后，轻判了这些人。为此，列宁写了这封信。列宁先把这封信寄给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尼·瓦·克雷连柯，要他把犯人和法官的名字告诉党中央委员会。收到答复后，列宁把这封信寄给了中央。由于列宁的坚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重新审理了这个案件，其中 3 名被告各被判处 10 年徒刑。

在把信寄给中央的同时，列宁还给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斯基写了一个便条，要求他急速提出一项法令草案，规定对贿赂行为起码判处徒刑 10 年，外加强迫劳动 10 年。

人民委员会还根据列宁的倡议于 1918 年 5 月 5 日通过了一项决定，责成司法人民委员部制定一个法令草案，对受贿以及与受贿有牵连的行为规定一个比较高的最低惩处标准。司法人民委员部提出的《关于惩办受贿的法令》草案经人民委员会 5 月 8 日会议审查批准，列宁对草案作了修改（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59 年俄文版第 2 卷第 236—237 页和 240—242 页）。——263。

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

列宁（1919 年 10 月 11 日）

莫斯科征收党员周[1]是在苏维埃政权困难的时刻举行的。由于邓尼金的胜利，地主资本家和他们的朋友们拼命加紧阴谋活动，资产阶级竭力扰乱人心，千方百计想动摇苏维埃政权的决心。犹豫动摇的不自觉的庸人以及同他们在一起的知识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照例都更加动摇起来，而且最先被资本家吓倒了。

但是，我认为，莫斯科在困难时刻举行征收党员周对我们更有利，因为这对事情更有益处。我们举行征收党员周并不是为了炫耀一番。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我们曾不止一次地重新登记党员，以便把这种“混进党里来的人”驱除出去，只让有觉悟的真正忠于共产主义的人留在党内[2]。我们还用动员人们上前线和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办法，来清洗党内那些一心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而不愿肩负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重担的人。

目前正当加紧动员人们上前线的时候，举行征收党员周的好处是，不致对那些想混进党里来的人有什么诱惑力。我们只是号召大批普通工人和贫苦农民即劳动农民入党，而不是号召投机农民入党。我们不向这些普通党员许愿，说入党有什么好处，也不给他们什么好处。相反地，现在党员要担负比平常更艰苦更危险的工作。

这样更好。入党的将都是一些真心拥护共产主义的人，真正忠于工人国家的人，正直的劳动者，在资本主义下受过压迫的群众的真正代表。

只有这样的党员才是我们需要的。

我们需要新党员不是为了做广告，而是为了进行严肃的工作。我们号召他们加入党。我们向劳动者敞开党的大门。

苏维埃政权是为彻底推翻资本压迫而斗争的劳动者的政权。首先起来进行这种斗争的，是各城市和工业中心的工人阶级。它取得了第一次胜利，夺得了国家政权。

工人阶级把大多数农民团结到自己方面来。因为倾向于资本、倾向于资产阶级的，只是经商的农民，投机农民，而不是劳动农民。

最开展最觉悟的彼得格勒工人为管理俄国输送了最多的力量。可是我们知道，在普通工人和农民中，忠于劳动群众利益、能够做领导工作的人是很多很多的。在这些人当中，有很多是有组织才能和管理才能的，资本主义不让这些人发展，我们却尽力帮助他们，而且应当帮助他们涌现出来，让他们担负起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发现这些质朴的不知名的新人才是不容易的。吸收那些长期受地主资本家压迫和恐吓的普通工农来参加国家工作是不容易的。

但是，我们应该进行而且必须进行这种不容易的工作，以便更深入地从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中间发掘新人才。

非党的工人和劳动农民同志们，加入党吧！我们不向你们许愿，说入党有什么好处，我们号召你们来进行困难的工作，进行建设国家的工作。如果你们真心拥护共产主义，你们就应该大胆地担负起这种工作，不要怕工作生疏和困难，不要被那种陈腐偏见弄得惶惑不安，以为只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才能胜任这种工作。这是不对的。能够而且应当有愈来愈多的普通工人和劳动农民来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

劳动群众拥护我们。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可战胜的根源就在这里。多吸收群众中新的工作者入党，使他们独立参加建设新生活的工作，这就是我们克服一切困难的手段，这就是我们走向胜利的道路。

注释：

[1]指1919年10月8—19日莫斯科市党组织举行的征收党员周。

征收党员周是根据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举行的。在苏维埃共和国处于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的极其困难的时刻，俄共（布）彼得格勒党组织于1919年8月10—17日、莫斯科省党组织于同年9月20—28日相继举行了征收党员周。俄共（布）中央全会总结初步经验后，9月26日决定在各城市、农村和军队中举行征收党员周。9月30日，中央在给各级党组织的关于征收党员周的通告信中指出，在各地党组织已经完成党员重新登记的情况下，着手吸收新的党员是适时的。通告信要求在征收党员周期间只吸收工人、红军战士、水兵和农民入党。通过举行征收党员周，仅俄罗斯联邦欧洲部分38个省就有20多万人入党，其中50％以上是工人，在作战部队中被接受入党的约7万人。——215。

[2]俄共（布）根据该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于1919年5—9月进行了党员重新登记。俄共（布）中央于1919年4月24日在《真理报》上公布了重新登记的实施细则，其中说，全体党员重新登记是对各个党组织的全体人员进行的认真考核，其目的是清除党内的非共产主义分子，主要是那些混入执政党以便利用党员称号谋取私利的人。重新登记时，全体党员必须交回党证，填写履历表，呈交由两名具有半年以上党龄并被党委会认为可靠的共产党员出具的介绍书。在重新登记期间，停止接受新党员。凡是被揭发有不配党员称号的行为者（酗酒、腐化、以权谋私等）、临阵脱逃者、违反党的决议者、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党的会议者以及不交纳党费者，都应开除出党。重新登记期间，恰逢动员党员入伍，有些人动摇脱党，这大大帮助了各个党组织清除那些不合格分子。据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经过重新登记，党员人数减少了一半。——215。

莫斯科征收党员周的总结和我们的任务

列宁（1919 年 10 月 21 日）

在莫斯科征收党员周期间入党的有 13600 人。

这是一个巨大的完全没有料到的成绩。整个资产阶级，特别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包括那些为自己丧失“老爷的”特权地位而伤心的专家、官吏、职员在内，——所有这伙人恰巧在最近，恰巧在莫斯科征收党员周期间，拼命扰乱人心，预言苏维埃政权即将灭亡，邓尼金即将胜利。

这伙“知识分子”是多么善于巧妙地运用扰乱人心这个武器啊！要知道这已经成了资产阶级在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的真正武器。在我们所处的这种时候，小资产阶级总是要同资产阶级结成“反动的一帮”并且“死命地”抓住这个武器的。

莫斯科本来是商人势力特别大的地方，是剥削者、地主、资本家、食利者最集中的地方，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把大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集合到了一起的地方，是驻着中央政权机关因而官员特别密集的地方，——正是这个莫斯科是资产阶级造谣、诽谤、扰乱人心最方便的场所。邓尼金和尤登尼奇进攻得手的“时机”非常有利于资产阶级这种手段取得“成功”。

无产阶级群众看到了邓尼金的“成功”，并且知道在现在做一个共产党员会遭到多大的艰难困苦和危险，但是他们中间却有成千上万的人挺身而出，起来支援共产党，承担异常艰巨的国家管理工作的重担。

苏维埃政权的成就、我们党的成就简直是了不起的！

这个成就向首都居民，并且也向整个共和国和全世界证明并清楚地指出，正是在无产阶级中间，正是在劳动群众的真正代表中间蕴藏着苏维埃政权强大和稳固的最可靠的源泉。在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刻人们志愿申请入党，从这个成就可以

看到，无产阶级专政已实际地显示了为劳动解放事业的敌人深恶痛绝而为劳动解放事业的真正朋友最为珍视的那一方面，即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的）从道义上（从这个词的最好意义上讲）影响群众的特殊力量，无产阶级施加这种影响的方法。

掌握着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先进阶层以身作则，在整整两年期间（在我国政治发展极快的情形下，这是一个很长的时期）给劳动群众树立了这样的榜样：他们对劳动者的利益十分忠诚，他们同劳动者的敌人（剥削者，特别是“私有者”和投机者）斗争时十分坚决，他们在艰苦的时刻十分坚定，他们在反击世界帝国主义强盗时奋不顾身，这都说明只有工人和农民对自己先锋队的同情所产生的力量才能够创造奇迹。

这是奇迹，因为被饥饿、寒冷、破坏、破产折磨得无比痛苦的工人，不仅保持着蓬勃的朝气、对苏维埃政权的无限忠诚、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主义热情，而且不顾没有素养并缺乏经验，承担了驾驶国家航船的重担！而且这是在暴风雨最猛烈的时刻……

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充满了这样的奇迹。不论个别的考验多么严重，这样的奇迹将会导致而且一定会导致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完全胜利。

我们现在应该关心怎样正确地使用新党员。这个任务应该受到特别的重视，因为这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这是一个新的任务，靠老一套办法是解决不了的。

资本主义扼杀、压制、摧残了工人和劳动农民中的大批人才。这些人才在贫穷困苦、人格遭到侮辱的压迫之下毁灭了。现在我们的职责就是要善于发现这些人才，让他们担任工作。在征收党员周期间入党的新党员，大多数没有经验，不熟悉国家管理工作，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他们是被资本主义人为地压在下面、变成“底”层、没有抬头机会的那些社会阶层当中最忠实、最真诚、最有才能的人，

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他们比别的人更有力量，更富朝气，更耿直，更坚强，更真诚。

因此，一切党组织都应当对怎样使用这些新党员的问题作专门的研究。应该更大胆地把各种各样的国家工作托付给他们，应该更迅速地在实践中考验他们。

当然，所谓大胆，并不是马上就把重要的职务交给新手担任，因为担任重要职务所需要的知识，新手还没有掌握。要大胆，是说要大胆地同官僚主义作斗争，我们的党纲非常明确地提出为什么官僚主义会在某种程度上复活以及怎样防止的问题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要大胆，首先是说要大胆地让那些熟悉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及其疾苦和要求的新党员对职员、官吏和专家实行监督。要大胆，是说要立即给这些新手在广阔的工作领域中施展才能和一显身手的机会。要大胆，是说要大胆地打破常规（在我们这里，也有人——可惜还不少呢！——非常怕冒犯已经规定的苏维埃的陈规陋矩，虽然这些东西有时不是由自觉的共产党员而是由旧官吏和旧职员“规定”)；要大胆，是说要决心以革命的速度为新党员改变工作方式，以便更快地考验他们，更快地给他们找到适当的工作岗位。

在很多场合可以为新党员安排这样的工作，即让这些党员一方面监督旧官吏是否认真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另一方面很快能学会业务，并能独立地担当工作。在其他场合可以安排他们来更新、加强工农群众同国家机构的直接联系。在我们工业的“总管理局、中央管理局”里，在我们的“国营农场”里，还有很多很多的怠工者、潜藏的地主和资本家在千方百计地破坏苏维埃政权。中央和地方有经验的党的工作者的本领应该在加紧利用党的新生力量来同这种祸害作坚决的斗争方面表现出来。

苏维埃共和国应当成为一个统一的军营，它应该尽量发挥一切力量，尽量节省这些力量，尽量减少拖拉现象和繁文缛节，尽量精简机构，尽量使这个机构不仅知道群众的疾苦，而且能为群众所了解，能使群众独立参加这个机构的工作。

目前正在加紧动员老党员参加军事工作。这一工作无论如何不应削弱，而是应该不断加强。但是，为了争取战争的胜利，同时应该改善、精简、更新我们的非军事管理机构。

谁的后备多，谁的兵源足，谁的群众基础厚，谁更能持久，谁就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

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都超过白卫分子，超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英法帝国主义这个泥足巨人。我们超过他们，是因为我们能够从过去受资本主义压迫、不论在哪里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那些阶级中，也就是从工人和劳动农民中吸收力量，而且今后还要长期地愈来愈深入地从他们当中吸收力量。我们能够从这个大储备库中吸收力量，因为它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向我们提供最忠诚、受苦难生活锻炼最多、最接近工农的工农领袖。

我们的敌人，不论是俄国资产阶级还是世界资产阶级，都根本没有稍许与这个储备库近似的东西，他们的根基愈来愈动摇，工人农民中拥护过他们的人愈来愈离开他们了。

这就是全世界的苏维埃政权最终肯定胜利和必然胜利的原因。

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初稿

列宁（3 月 13 日或 14 日）

1．代表大会提请全体党员注意：目前许多情况正在加剧国内小资产阶级居民的动摇，在这个时候特别需要保持党的队伍的统一和团结，保证党员相互之间的完全信任，保证在工作中真正齐心协力，真正体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

2．但是，还在全党开展关于工会问题的辩论以前，党内就已经显露出派别活动的某些苗头，即产生了几个具有各自的纲领、力求在某种程度上自成一派并规定内部纪律的集团。这种派别活动的苗头已经出现，例如在莫斯科（1920 年 11 月）党代表会议和哈尔科夫党代表会议[1]上，在所谓“工人反对派”的活动中，局部地也在所谓“民主集中派”[2]的活动中已经表现出来。

必须使一切觉悟的工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任何派别活动都是有害的，都是不能容许的，因为即令个别集团的代表人物满心想要保持党的统一，派别活动事实上也必然会削弱齐心协力的工作，使混进执政党内来的敌人不断加紧活动来加深党的分裂，并利用这种分裂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

无产阶级的敌人极力利用一切背离共产主义的坚定路线的倾向，这种情形在喀琅施塔得叛乱这一实例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当时，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和白卫分子都急忙表示，只要能推翻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甚至情愿接受苏维埃制度的口号；当时，社会革命党人以至一切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在喀琅施塔得事件中都利用了这场似乎是为了维护苏维埃政权才反对俄国苏维埃政府的叛乱所提出的口号。这些事实充分证明，只要能削弱和推翻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柱，白卫分子都会竭力装扮而且善于装扮成共产主义者，甚至装扮成最左的共产主义者。喀琅施塔得叛乱前夜在彼得格勒发现的孟什维克传单也同样表明，

孟什维克利用俄共内部的意见分歧与某些派别活动的苗头事实上在怂恿和支持喀琅施塔得的叛乱者社会革命党人和白卫分子，口头上却标榜自己反对叛乱，拥护苏维埃政权，只不过要苏维埃政权作一些仿佛不大的修正。

3．关于这个问题的宣传，一方面应当从保持党的统一和实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是保证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基本条件这一观点出发，详细说明派别活动的害处和危险性，另一方面应当揭露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所采用的新的策略手法的特点。这些敌人已经知道公开打着白卫旗帜进行反革命活动是没有指望了，所以现在他们竭力抓住俄共内部的意见分歧，设法使政权转到表面上最象承认苏维埃政权的那些政治派别手中，用这种办法来推进反革命。

在宣传中还应当阐明历次革命的经验，当时反革命势力也总是支持那种既反对极端革命的政党又同这一政党最相似的派别，以求动摇并推翻革命专政，从而为资本家和地主的反革命势力以后取得完全胜利开辟道路。

4．在同派别活动进行实际斗争中，每一个党组织必须密切注意，决不容许发表任何派别言论。对党的缺点进行绝对必要的批评时，应当使一切实际的建议以尽量明确的形式毫不迟延地立刻提交党的地方和中央领导机关去讨论和决定。此外，每一个提出批评的人，在批评的形式上应当考虑到党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这一情况，而在批评的内容方面则应当通过自己直接参加苏维埃和党的工作，从实践中来检验如何纠正党或个别党员的错误。任何对党的一般路线的分析或对党的实际经验的总结，对党的决定的执行情况的检查，以及关于如何纠正错误的方法的探讨等等，都决不能事先交给按某种“纲领”等等形成的集团去讨论，而只能直接交给全体党员讨论。因此，代表大会决定更经常地出版《争论专页》[3]和专门文集，力求能就问题的实质来进行批评，而决不采取那种有助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的方式。

5．代表大会根本反对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对这种倾向已有专门的决议［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2 分册第 66—69 页。——编者注］加以分析），并责成中央委员会彻底消灭一切派别活动，同时，代表大会声明，在例如所谓的"工人反对派"特别关心的问题，即清除党内的非无产阶级分子和不可靠分子、反对官僚主义、发扬民主和工人的自主精神等等问题上，任何切实的建议，都应当十分认真地加以考虑，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检验。全党应当知道，我们由于遇到了种种障碍，在这些问题上并没有能够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应当知道，党在坚决反对不实事求是的和带有派别性的所谓批评的同时，也将继续不断地采取一切手段并试验各种新的办法，来反对官僚主义，扩大民主，发扬自主精神，检举、揭发和驱逐混进党内来的分子，如此等等。

6．因此，代表大会宣布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按这个或那个纲领组成的派别（如"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等），并责令立即执行。凡不执行代表大会这项决定者，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

7．为了在党内和整个苏维埃工作中执行严格的纪律，并取缔一切派别活动以求得最大程度的统一，代表大会授权中央委员会，在遇到违反纪律、恢复或进行派别活动的情况时，可以采取党内一切处分办法，直到开除出党；而对中央委员则可把他降为候补中央委员，甚至采取极端措施，把他开除出党。在对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采取这种极端措施时，应当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并请全体候补中央委员和全体中央监察委员参加。在这种党的负主要责任的领导者的全体会议上，如果有三分之二票数认为必须把某个中央委员降为候补中央委员或开除出党，那么这项措施就应当立即实行。[4]

注释：

[1] 指 1920 年 11 月在哈尔科夫举行的全乌克兰第五次党代表会议。参加这次代表会议的 316 名代表中有 23 名，即 7%，对工人反对派的纲领投了赞成票。——78。

[2] 民主集中派是俄共（布）党内的一个派别集团，1919 年初开始出现，1920 年最终形成，首领是季·弗·萨普龙诺夫、恩·奥新斯基、弗·米·斯米尔诺夫、弗·尼·马克西莫夫斯基等。民主集中派否认党在苏维埃和工会中的领导作用，反对在工业中实行一长制和厂长个人负责制，要求在党内有组织派别和集团的自由。民主集中派的代表主张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合并，要求取消地方政权机关对中央的从属关系。他们还反对中央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的统一，力图把组织局排除于政治领导之外。在 1920—1921 年的工会问题争论中，民主集中派曾公布该派的纲领。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解散一切派别集团后，该派某些成员仍继续进行反对党的总路线的活动。1923 年，他们同托洛茨基反对派结成联盟。1926 年，他们结成了以萨普龙诺夫和斯米尔诺夫为首的所谓“十五人集团”，参加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1927 年 12 月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把民主集中派分子共 23 人开除出党。——78。

[3] 《争论专页》（《》）是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不定期出版物，根据 1920 年 9 月举行的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创办。最初是文集，从 1923 年起是俄共（布）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附刊。一般在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前出版。刊物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党内批评，讨论有关党的战略、策略以及经济建设方面的问题。

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前，《争论专页》出了两期：1921 年 1 月的第 1 期和 1921 年 2 月的第 2 期。——82。

[4] 根据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的第 7 条当时没有公布。1924 年 1 月 17 日，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斯大林

在其《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报告》中宣读了这一条（见《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2页）。代表会议谴责了列·达·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的派别活动，在《关于争论总结和党内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决议》中建议中央委员会公布这一条文（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371页）。这一决议为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批准。——83。

关于清党

列宁（1921 年 9 月 20 日）

清党显然已经发展成为一项关系重大和极其重要的工作了。

有些地方的清党工作主要是依靠非党工人的经验和意见，以他们的意见为线索，尊重非党无产阶级群众代表的意见。这是最可贵、最重要的。如果我们真能这样自上而下、“不顾情面地”实行清党，那么革命的成就确实是会很大的。

因为现在革命的成就不可能和从前一样了。由于从军事战线转到经济战线，由于改行新经济政策，由于现在的情况要求首先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强劳动纪律，革命的成就也必然改变自己的性质。在这样的时候，革命的主要成就表现为不辉煌、不显眼、不是一眼就能看出的内部改善，即劳动情况、劳动组织和劳动结果的改善；所谓改善，就是要抵制既腐蚀无产阶级又腐蚀党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和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自发势力的影响。要达到这样的改善，就必须把脱离群众的分子清除出党（自然，更不用说那些在群众眼中玷污了党的分子了）。当然，不是群众所有的意见我们都得照办，因为群众有时——特别是在过重的负担和难熬的痛苦把人折磨得疲惫不堪的年代——也受到那种一点也不先进的思想的支配。但是在评价人的时候，在揭露“混进党的”、“摆委员架子的”、“官僚化的”人的时候，非党无产阶级群众的意见以及在许多场合下非党农民群众的意见是极其宝贵的。劳动群众非常敏感，很会识别谁是忠诚老实的共产党员，谁是那些靠辛勤劳动过活、没有任何特权、根本不会“讨好领导”的人所厌恶的共产党员。

进行清党时，重视非党劳动者的意见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这样能使我们收到很大的效果，能使党成为比以前坚强得多的阶级先锋队，成为同本阶级有更紧密的联系、更能在重重困难和危险中引导本阶级走向胜利的先锋队。

我还要指出，把过去的孟什维克清除出党是清党的一部分任务。我看，1918年初以后入党的孟什维克，应当留在党内的大约不超过百分之一，并且对每个留在党内的都要反复进行审查。为什么呢？因为孟什维克这个派别在 1918—1921年期间证明，他们有两个特点：第一，能巧妙地适应环境，“混到”在工人中占统治地位的派别里来；第二，能更巧妙地忠心耿耿为白卫分子效劳，口头上和它决裂，实际上为它效劳。这两个特点都是从孟什维主义的全部历史中产生出来的，只要回顾一下阿克雪里罗得的“工人代表大会”[1]和孟什维克在口头上和实际上对立宪民主党（以及对君主制）的态度等等就知道了。孟什维克“混到”俄国共产党里来，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由于他们奉行马基雅弗利主义[2]（虽然从 1903年以来，孟什维克已表明他们是要资产阶级外交手腕的头等能手），而是由于他们要“适应环境”。一切机会主义者都有善于适应环境的特点（但并非任何一种适应环境都是机会主义），而孟什维克这帮机会主义者可以说是“从原则上”来适应在工人中占统治地位的派别的，他们改换保护色，象兔子一到冬天就变成白色一样。应该懂得并估计到孟什维克的这个特点。所谓估计到这个特点，就是说，要把 1918 年以后即在布尔什维克可望胜利以及后来必胜无疑的时候参加俄国共产党的孟什维克的大约百分之九十九都清除出党。

必须把欺骗分子、官僚化分子、不忠诚分子和不坚定的共产党员以及虽然“改头换面”但内心里依然故我的孟什维克从党内清除出去。

注释：

[1]召开所谓“工人代表大会”的主张是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于 1905 年夏首次提出的，得到了其他孟什维克的支持。这一主张概括起来说就是召开各种工人组织的代表大会，在这个代表大会上建立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都参加的合法的“广泛工人政党”。这实际上意味着取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代之以非党的组织。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主张也得到了社会革命党人、无

政府主义者以及立宪民主党人和黑帮工人组织（祖巴托夫分子等）的赞同。190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谴责了这种主张（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1 分册第 201—202 页）。——146。

[2]马基雅弗利主义是指一种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无视一切道德规范的政治主张。尼·马基雅弗利是意大利政治思想家，1498—1512 年在佛罗伦萨共和国历任要职。他反对意大利的政治分裂，主张君主专制，认为君主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包括背信弃义、欺骗、暗杀等。——146。

关于清党和入党条件

给彼·安·扎卢茨基、亚·亚·索尔茨和全体政治局委员的信

列宁（1921 年 12 月 19 日）

致扎卢茨基、索尔茨和全体政治局委员

在清党问题上，我认为公布出来的许多事实充分证明，清党工作总的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虽然我们也犯了相当多的局部性的错误。我认为，在党代表会议的总结中，这两种情况都应该强调指出。我看，不必规定第二次清党的日期，这样，在哪一方面都不致束缚自己的手脚。

我倒主张党代表会议通过一项决定，把入党条件规定得更严些：工人（以前在大工厂里至少当过十年普通雇佣工人，现在又至少工作了两三年的人，才能算作工人）的预备期为一年半，其余的人为三年。

在特殊情况下，如果对党的忠诚和共产主义的坚忍精神得到充分的证明，处理本问题的各级党组织都以五分之四的多数确认，预备期可以缩短一半。

除留党察看一定时期的和犯了可耻罪行而被开除的以外，这次清党中被开除出党的人重新入党时，预备期同上。

请你们把这封短信给最接近的同志们看一看，如果不麻烦的话，请把意见简要地写一下，哪怕就在这封信上划出哪些你们同意，哪些你们不同意也行，寄给福季耶娃交我。

关于接收新党员的条件

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三封信

列宁（1922 年 3 月 9 日、24 日和 26 日）

1 致莫洛托夫同志

我不反对。[1]

由于提到的文件没有引用，许多地方看不清楚。[2]依我看，介绍工人入党的要有三年党龄，介绍农民和红军战士的要有四年，介绍其他人的是五年。

预备期（“入党者”？）的概念要规定得准确一些。

细节委托中央委员会制定。

2 致莫洛托夫同志

请把我的以下建议提交中央全会：

我认为，延长新党员的预备期是极端重要的。在季诺维也夫的提纲中规定工人入党的预备期为半年，其他人为一年。[3]我建议，只有在大工业企业实际做工不下十年的工人，预备期方得为半年。其他工人规定为一年半，农民和红军士兵规定为两年，其他各种人为三年。特殊的例外，须经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4]共同批准。

我认为，不改变季诺维也夫所提出的短预备期是极端危险的。毫无疑问，我们常常把丝毫没有受过严格锻炼，即大工业锻炼的人都算作工人。那些由于偶然的机会当了很短一段时间工人的十足的小资产者常常被划入工人之列。一切聪明的白卫分子都十分清楚地看到，我们党的所谓无产阶级性质实际上根本杜绝不了小业主在党内占优势，固然是短期内占优势的可能性。在我们普遍存在工作马虎、

杂乱无章的情况下，规定这样短的预备期，事实上就等于对预备党员不作任何认真的考查，无从知道他们是否真是经过一些考验的共产党员。我们党现在有 30—40 万党员，这个数目已过大，因为所有材料都表明现在的一些党员的修养水平很差。所以我极力主张必须延长预备期，同时责成组织局拟定一些条例并严格执行，这些条例应能真正使预备期成为极其严肃认真的考验，而不致流于形式。

我认为，代表大会应当特别仔细地讨论这一问题。

3 致莫洛托夫同志

请在代表大会讨论接收新党员的条件问题之前交全体中央委员一阅。

看了 3 月 25 日中央全会关于新党员的预备期问题的决定，我想在代表大会上对这项决定提出异议。[5]但是，我怕不能在代表大会上发言，因此，请看一下我的下列意见。

毫无疑问，目前我党就大多数党员的成分来说是不够无产阶级的。我想，谁也不能对此提出异议，因为只要查一下统计材料就能证实这一情况。自从战争爆发以来，俄国工厂工人属于无产阶级成分的，比从前少多了，因为在战争期间那些想逃避兵役的人进了工厂。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另一方面，同样毫无疑问，我们党要在这样困难的时刻，特别是在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迅速觉醒、投入独立的阶级政治的情况下真正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它目前的政治修养的一般水平和平均水平（拿绝大多数党员的水平来说）是不够的。其次，必须注意到，参加执政党的引诱力在目前是很大的。只要回顾一下路标转换派[6]的所有著作就会相信，连一点无产阶级气息都没有的人现在都对布尔什维克的政治成就心向神往了。如果热那亚会议使我们取得新的政治成就，那么小资产阶级分子和十分敌视整个无产阶级的分子涌进党里来的势头就会更猛烈。工人的半年预备期无论如何也阻挡不住这种势头，因为用伪装的办法混过这样短的预备期是再容易不过了，况且在

我们这种条件下，很多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加入工人队伍，简直没有任何困难。综上所述，我得出如下结论：我们必须大大延长预备期（白卫分子十分清楚地看到我们党的非无产阶级成分，我觉得这一点更可以证实这个结论），如果工人的预备期仍为半年，那么为了不自欺欺人，绝对必须确定“工人”这个概念，使这个概念只适用于那些确实由于自己的生活状况而必然具有无产阶级心理的人。如果不是在工厂一心一意呆上许多年，就不可能养成这种心理，它是由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般条件陶冶出来的。

只要不无视现实，那就应当承认，目前党的无产阶级政策不是取决于党员成分，而是取决于堪称党的老近卫军的那一层为数不多的党员所独有的巨大威信。只要这层党员中间发生小小的内部斗争，其威信即使不毁掉，也必定会削弱到不再起决定作用的地步。

因此必须：（1）延长各种预备期；（2）特别详细地规定，应当怎样使预备期真正起到作用，应当有哪些具体的切实的考查条件来保证预备期真正起到作用而不致流于形式；（3）在处理接收新党员问题的机关中必须规定一个法定的多数；（4）接收新党员不仅必须受省委决定的制约，而且必须受监察委员会决定的制约；（5）还应制定一些办法，使党易于除去那些根本够不上十分自觉地贯彻无产阶级政策的共产主义者的党员。我并不是建议再进行一次大清党，因为我认为这在目前是不切实际的，但必须找出一些在事实上进行清党的办法，即减少党员数量的办法，只要对此动动脑筋，我相信是可以找到一些可行的办法的。

如有可能，请看过这封信的中央委员给我一个答复，即使打电话简略地告诉人民委员会的一位女秘书也好。

注释：

[1]指格叶季诺维也夫受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委托为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准备的《关于巩固党》这一提纲的最初草案。根据 1922 年 3 月 8 日政

治局的决定，这份草案分发给了政治局委员们。草案规定，接收农民和红军战士入党应由有 3 年党龄的 3 名党员负责介绍，接收职员和其他人入党则应由有 5 年党龄的 5 名党员负责介绍。

列宁在 3 月 9 日的信中不反对把这份提纲草案作为讨论的基础予以通过，并就介绍人党龄问题和草案中未提到的预备期问题提了意见。

3 月 13 日，政治局在列宁没有出席的情况下批准了经补充修正的季诺维也夫提纲。3 月 17 日《真理报》第 62 号发表了这份提纲。提纲中关于入党条件这一节引起了列宁的强烈反对，他在 3 月 24 日的信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16。

[2]指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根据审查党员的经验巩固党的问题的决议》和俄共（布）区域委员会、区域局和省委员会书记会议决议《关于党的建设的组织问题的实际建议（对关于在清党以后巩固党的决议的补充）》（1921 年 12 月）。格叶季诺维也夫《关于巩固党》的提纲的最初草案中没有引用这两个决议。——16。

[3]指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的格叶季诺维也夫起草的提纲《关于巩固党和党的新任务》的第 5 条，其中写道："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决定修改党章（第 2 章第 7 条）：工人和农民的预备期应不短于 6 个月，其他人不短于 1 年。"（见《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61 年俄文版第 684 页）——17。

[4]中央监察委员会是俄共（布）的最高监察机关。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定是 1920 年 9 月 22—25 日召开的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1921 年 3 月 8—16 日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选出了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17。

[5]1922 年 3 月 25 日俄共（布）中央全会接受了列宁关于修改季诺维也夫提纲第 5 条的建议，但是没有考虑列宁的全部意见。关于接收新党员的条件，全会决定向代表大会提出下述条文："决不允许靠剥削他人劳动、投机倒把之类为生

的人入党，规定工人的预备期为 6 个月，红军战士为 1 年，农民及其他人为 1 年半，要让入党介绍人承担特别责任。”（见《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61 年俄文版第 737—738 页）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在《关于巩固党和党的新任务的决议》中规定，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之前，修改党章，按新的手续接收党员。接收入党的人分以下三类：1．工人和工农出身的红军战士；2．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农民（红军战士除外）和手工业者；3．其他（职员等等）。第一类人的预备期为 6 个月，第二类人为 1 年，第三类人和脱离其他政党的人为 2 年。接收第一、二类人入党，须由有 3 年党龄的 3 名党员介绍，并且第一类人须县委和区委批准，第二类人须省委批准。第三类人以及脱离其他政党的人则须由有 5 年党龄的 5 名党员介绍，并必须由省委批准。20 岁以下的青年入党须经过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红军战士除外）。要求入党者的名单应预先公布。

代表大会再次确认介绍人应对被介绍人负有极严格的责任，委托中央委员会制定承担责任的具体形式（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2 分册第 177—178 页）。——18。

[6]路标转换派是 1921 年在流亡国外的白俄知识分子中间出现的一种社会政治流派。路标转换派还得到一些没有离开苏俄的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支持。路标转换派因 1921 年在布拉格出版的《路标转换》文集而得名，文集的中心思想是：承认反苏维埃武装斗争彻底失败，苏维埃政权是唯一可能的俄罗斯国家政权；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在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上转换路标，为复兴俄国工作。路标转换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流亡国外的立宪民主党人Ｂ．克柳奇尼科夫、尼瓦乌斯特里亚洛夫、Ｃ．Ｃ．卢基亚诺夫、亚弗博勃里舍夫－普希金、Ｃ．Ｃ．查霍金、尤尼波捷欣等人。他们的刊物是《路标转换》杂志，该杂志于 1921 年 10 月—1922 年 3 月在巴黎出版。

国内战争的结束和新经济政策的实行，是路标转换派形成的决定性因素。路标转换派的社会基础是资本主义因素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而在苏维埃共和国有了某种程度的复活。路标转换派把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看作是苏维埃政权向恢复资本主义方向演变，指望苏维埃国家蜕化为资产阶级国家。他们号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苏维埃政权合作，并曾协助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返回祖国。路标转换派中也有不少人愿意真心诚意地和苏维埃政权一起工作，后来成为科学文化界的积极活动家，如历史学家叶维塔尔列、作家阿尼托尔斯泰等。俄共（布）第十二次全国代表会议（1922 年 8 月 4—7 日）在《关于反苏维埃的党派的决议》中指出："所谓路标转换派迄今起了而且还有可能起客观的进步作用。这一派别过去和现在都团结着那些同苏维埃政权'和解'并准备同它一起复兴祖国的侨民和俄国知识分子集团。就这一点来说，路标转换派过去和现在都是值得欢迎的。但同时一分钟也不能忘记，在路标转换派中资产阶级复辟的倾向也是很强烈的，路标转换派分子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样希望在经济上让步之后在政治上也会有向资产阶级民主方面的让步等等。"（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2 分册第 237—238 页）

列宁对路标转换派的评价见本卷第 91—93 页。——19。

就惩处犯罪的共产党员问题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1]

列宁（1922 年 3 月 18 日）

致莫洛托夫同志并转政治局委员

莫斯科委员会（包括捷连斯基同志）事实上包庇应该绞死的犯罪的共产党员，已经不是头一回了。

这样做说起来是由于犯了“错误”，但这个“错误”的危险性极大。我建议：

1．采纳季维尔科夫斯基同志的建议。

2．宣布给·包·庇共产党员（包庇的方式是成立特别委员会）的莫斯科委员会以严重警告处分。

3．向各省委重申，凡试图对法庭“施加影响”以“减轻”共产党员罪责的人，中央都将把他们开除出党。

4．通告司法人民委员部（抄送各省党委），法庭对共产党员的惩处必须·严·于非党员。

凡不执行此项规定的人民审判员和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应予撤销职务。

5．委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报上对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狠·狠训斥一下。

附言：执政党竟庇护“自己的”坏蛋！！真是可耻和荒唐到了极点。

注释：

[1] 这里说的是莫斯科苏维埃中央房产局舞弊一案。对该局舞弊行为的大量申诉中，有些是寄给列宁的，所以人民委员会办公厅（阿阿季维尔科夫斯基）直接参加了对该局的检查。检查证实，中央房产局的一些负责人伙同莫斯科公用事业局党员局长索韦特尼科夫徇私舞弊。但是，3 月 14 日俄共（布）莫斯科市常务委

员会召开有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参加的会议，却认为检查的结论缺乏根据，并决定将此案移交给新成立的党的特别委员会去重新审查。季维尔科夫斯基在 3 月 15 日给尼彼哥尔布诺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的信中，把这个决定称作是“以超等的手段葬送整个案件”。他着重指出，这个决定与列宁关于无情追究“官僚主义的匪徒行径，特别是如果干这种事的是混入党内的不良分子”的指示背道而驰。他请求取消这个决定，将罪犯交法庭审判。为此列宁写了这封信。在寄发时，列宁在信上批道：“瞿鲁巴和李可夫阅后交哥尔布诺夫立即转发”。——53。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

（1920 年 7-8 月）

世界无产阶级正处于决战的前夜。当今时代是一个内战迭起的时代。决定性的时刻就要来到了。几乎在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一切国家中，工人阶级在最近的将来就要手持武器去进行一系列的激烈战斗。

当前，工人阶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一个团结一致的组织。工人阶级必须珍惜每一刻宝贵时间，坚持不懈地为即将到来的决战做好准备。

如果巴黎公社时期（1871 年）工人阶级拥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共产主义政党，即使其人数不多，那么法国无产阶级的第一次英勇起义就会更加强大有力，很多错误和弱点也会得到避免。

由于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今天无产阶级所面临的斗争与 1871 年相比，将对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因此，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呼吁全世界革命工人注意下列各点：

1．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就是它的最先进、最有觉悟、因而也是最革命的一部分。共产党是通过选拔最优秀的、最有觉悟的、最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最有远见的工人建立起来的。共产党的利益与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完全一致。共产党不同于全体工人群众之处，在于它能洞察整个工人阶级的全部历史进程，并能在这一进程的各个转折关头努力捍卫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不是某些集团、某些行业的利益。共产党是一种组织上和政治上的推动力，借助于它，工人阶级最先进的部分能够引导全体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走上正确的道路。

2．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国家政权之前，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彻底巩固自己的统治、确保资产阶级不致复辟之前，共产党在其有组织的队伍中通常不会有很多的工人。在夺取政权之前和在过渡时期，如果情势有利，共产党可以从**思想上**

和政治上给予一切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以巨大的**影响**，但不能从组织上把他们联合在自己的队伍里。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剥夺了资产阶级诸如报刊、学校、议会、教会、管理机关等这样一些强大的施加影响的工具之后，只有在资产阶级制度的最终失败已为人们所认清之后，**全体**或**几乎全体**工人才会开始加入共产党的队伍。

3．应当把**党**和**阶级**这两个概念严格地区别开来。德国、英国及其他国家的“基督教”工会和自由工会的会员，无疑都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至今还在拥护谢德曼和龚帕斯之流的那批为数相当多的工人，无疑也都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工人阶级中可能会有一些人数众多的反动阶层。共产主义的任务并不是迁就工人阶级中的这些落后的部分，而是要把整个工人阶级提高到共产主义先锋队的水平。把**党**和**阶级**这两个概念混淆起来，就可能导致大的错误和造成混乱。例如，很明显，对于某一部分工人群众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曾抱有的情绪或偏见，工人政党就是应该坚决予以反对，以捍卫无产阶级的历史性利益。这种利益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以战争反对战争。

又如，1914 年帝国主义战争爆发时，各国背叛社会主义的政党为了援助“本国”资产阶级，总是说这是工人阶级的意志。但是它们忘记了，如果当时情况确实如此，无产阶级政党在这种情况下的任务，也应该是反对大多数工人的情绪，捍卫无产阶级的历史性利益。再如，在 20 世纪初，当时的俄国孟什维克（所谓“经济派”）反对同沙皇制度进行公开的政治斗争，其理由是，似乎整个工人阶级还没有成长到能理解政治斗争的程度。

德国的右翼独立党人也是这样，每当他们摇摆不定时，总是说这是群众的愿望，殊不知，政党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它要走在群众的前面，给群众指明道路。

4．共产国际坚定不移地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第二国际旧“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垮台说成是无产阶级一切政党的破产。直接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斗争的时代，必然要产生一个**新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

5．共产国际极其坚决地反对那种认为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独立政党也可以完成自己的革命的观点。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种斗争必然要变为国内战争，其目的是夺取政权。但是并非任何一个政党都能夺取、组织和掌握政权。如果无产阶级有一个有组织的、经过考验的、并在内外政策上具有非常明确的目标和当前具体行动纲领的政党作为其领导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夺取政权才不会是一个偶然的插曲，而会是无产阶级进行长期共产主义建设的出发点。

这种阶级斗争要求把各种各样的无产阶级运动形式（工会、合作社、工厂委员会、文化教育工作、选举等等）联合在一个核心的周围，并对其实行总的领导。这种共同的起联合和领导作用的核心，只能是政党。反对建立和巩固政党，拒不服从政党的领导，这就等于反对对活动于不同斗争场所的各个无产阶级战斗队实行统一的领导。最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要求有集中的宣传鼓动，以及用同一观点来阐明各个斗争阶段的情况，把无产阶级的注意力集中到各该时期整个阶级的某些共同任务上。如果没有一个集中统一的政治机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政党，这是无法做到的。因此，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和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的拥护者，宣传无须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这在过去和现在都只能在客观上帮助资产阶级和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工团主义者和产业主义者打算只以工会或某些不定型的“一般”工人协会来代替共产党，他们的这种反对建立共产党的宣传是与那些臭名昭著的机会主义者不谋而合的。例如：俄国孟什维克，在 1905 年革命失败以后若干年来，一直鼓吹以所谓工人代表大会来代替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英、美形形色色的黄色“工党分子”，一面在实践中公开实行资产阶级政策，一面向工人鼓吹建立不定型的工人协会或含糊不清的议会联

合组织，反对建立真正的政党。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和产业主义者想反对资产阶级专政，但不知道怎样干。他们没有理解到，工人阶级没有独立的政党，就等于是无头的躯干。

革命的工团主义和产业主义，只是同第二国际那种陈腐的反革命意识形态相比，才算是前进了一步。但是，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即同共产主义相比，却是后退了一步。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声明（他们在 4 月成立大会的纲领性宣言中所作的声明），他们要建立一个政党，“但不是一般传统意义上的政党”（《 Keiue Partei im überlieferten Sinne》）。这个声明乃是在思想上向工团主义和产业主义的反动观点投降。

工人阶级只靠总罢工和采取“观望”策略是不能彻底战胜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必须举行武装起义。谁懂得这一点，谁也就应当懂得，为达到这个目的，光有不定型的工人协会是不够的，一个有组织的政党必须建立。

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常常说，坚决革命的少数能够起巨大的作用。但实际上，工人阶级中坚决革命的少数，即立志采取行动，具有纲领，决心把群众组织起来的共产主义的少数，只能是**共产党**。

6．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其首要任务是要经常同最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

要做到这一点，共产主义者也应该在那些虽然不是政党的组织，然而拥有广大工人群众的团体（如各国的残废军人组织、英国的“不准干涉俄国”委员会、无产阶级房客协会等等）中工作。俄国的所谓非党工农代表会议这个实例，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种会议几乎在每个城镇、每个工厂区和每个农村都召开。即便是最落后的工人群众，也都广泛参加出席代表会议的代表的选举活动。在代表会议上讨论诸如粮食问题、住房问题、教育问题、军事形势、当前的政治任务

等等最迫切的问题。共产主义者在这些“非党”代表会议上全力发挥自己的作用，非常成功地为党做了工作。

共产主义者认为，在这些广泛的工人组织**内部**经常不断地进行组织工作和教育工作，是自己最重要的一项任务。但是，正是为了卓有成效地进行这项工作，为了不让革命无产阶级的敌人控制这些广泛的工人组织，有觉悟的工人共产主义者就必须建立自己独立的、纪律严明的共产党。这样的党能够始终进行有组织的活动，并在发生任何情况、采取任何运动形式时，都能捍卫共产主义的共同利益。

7．共产主义者对群众性的非党工人组织决不能采取回避态度。即使这种组织带有明显的反动黑帮性质（例如：黄色工会、基督教工会等等），共产党人在某些情况下也不能止步不前，而要参加这些组织，利用这些组织。所不同的是，共产党应当在这些组织的内部经常进行**自己的**工作，并坚持不懈地向工人说明资产阶级及其走狗把不参加党派的思想作为一项原则在工人中间有意散播，是为了诱使无产者脱离为实现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有组织的斗争。

8．把工人运动划分为政党、工会和合作社三种形式的这种旧的“经典”划分法，显然已经过时。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提出了工人专政的基本形式，即**苏维埃**。最近的将来，到处都将实行新的划分：（1）政党，（2）苏维埃，（3）产业工会。但是，对于苏维埃的工作，也和对于革命化的产业工会的工作一样，无产阶级政党即共产党，必须始终不渝地、经常不断地加以领导。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即共产党，对于整个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文化教育方面的斗争，必须同样地加以领导。共产党应当是产业工会、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其他一切形式的无产阶级组织的灵魂。

苏维埃是历史提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主要形式，它的产生丝毫没有降低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参看 1920 年 4 月 14 日“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签署的《告德国无产阶级书》）宣称，“党也应日益

顺应苏维埃思想，并具有无产阶级性质”《共产主义工人杂志》第 54 期)，这含糊其词地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似乎共产党应当**融合**在苏维埃里，似乎苏维埃可以**代替**共产党。

这种思想是极端错误和反动的。

在俄国革命史上我们看到有一个时期，苏维埃曾敌视无产阶级政党，支持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政策。在德国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况，在其他国家也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为使苏维埃能够完成它的历史使命，相反，倒需要有一个如此强大的共产党，这个党不单能“顺应”苏维埃，而且能对苏维埃政策起**决定性**的影响，使苏维埃本身不再“迁就”资产阶级和反动的社会民主党，并能通过苏维埃中的共产党党团**引导**苏维埃**跟着**共产党**走**。

谁主张共产党去“顺应”苏维埃，谁认为这种顺应会加强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谁就是对党和苏维埃帮了倒忙，谁就是既不理解党的作用，也不理解苏维埃的作用。我们在每个国家建立的共产党越强大，“苏维埃思想”就能越快地取得胜利。现在，有许多“独立”社会党人，甚至右翼社会党人，口头上也承认“苏维埃思想”。但是，只有当我们有了强大的共产党，能够**确定**苏维埃政策并引导苏维埃前进的时候，才能使这些社会党人不再歪曲苏维埃思想。

9．工人阶级不仅**在**夺取政权**之前**，不仅**在**夺取政权**时期**需要共产党，而且**在**掌握政权**之后**，也需要共产党。在一个大国执政三年的俄国共产党的历史表明，共产党在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之后所起的作用，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大大增强了。

10．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的第二天，它的党仍然只不过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这正是工人阶级中奠定胜利的那一部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俄国共产党 20 年来，以及德国共产党若干年来，不仅在同资产阶级进行的斗争中，而且在同那些向无产阶级传播资产阶级影响的“社会党人”进行的斗争中，不断地把

工人阶级中最坚强、最有远见、最先进的战士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只有有了这样一个由工人阶级优秀分子组成的团结一致的组织，才能克服工人专政在取得胜利之后所面临的一切困难。在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红军方面，在实际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代之以无产阶级新的国家机器方面，在反对某些工人集团的行会倾向方面，在反对地方性和区域性的“爱国主义”方面，在着手创建新的劳动纪律方面——在所有这些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员能通过自己生动的榜样来带领工人阶级的大多数。

11．只有在阶级完全消灭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才会失去存在的必要性。在走向共产主义最后胜利的道路上，现代无产阶级的三种基本组织形式（政党、苏维埃和产业工会）的比重，可能会发生变化，可能逐渐形成单一类型的工人组织。但是，共产党完全融合于工人阶级之中，只能是在共产主义不再成为奋斗目标，而整个工人阶级已成为共产主义的工人阶级的时候。

12．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不仅应当切实地阐明共产党的一般历史使命，而且应当为国际无产阶级指出（哪怕是概括地指出）我们所需要的**究竟是怎样的**共产党。

13．共产国际认为，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共产党必须建立在铁一般的无产阶级集中制的基础上。为了在即将到来的旷日持久的国内战争中成功地领导工人阶级，共产党本身就应当在自己的队伍内部建立铁的军事纪律。俄国共产党成功地领导工人阶级进行三年国内战争的经验证明，没有最严格的纪律，没有完备的集中制和一切党组织对党中央领导的同志般的绝对信任，工人要获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14．共产党必须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民主集中制的主要原则是，上级组织由下级组织选举产生，下级组织必须绝对执行上级组织的一切指示，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设有党内一切领导同志所公认的权威的党中央。

15．由于资产阶级对共产党人采取戒备措施，欧美各国许多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必须记住，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只得放弃严格执行选举的原则，党的领导机关可以自行遴选，就像俄国当时曾经做过的那样。在实际戒备状态下，共产党不仅不能就每一重大问题在全体党员中间采取民主表决方式（这是部分美国共产党人的建议），相反，应当让自己的中央领导机关在必要时能迅速地向全体党员作出重要的决定。

16．目前提倡某些地方党组织实行广泛的"自治"，只会削弱共产党的队伍，损害它的活动能力，纵容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离心倾向。

17．在资产阶级或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还执政的国家里，共产党应当学会有计划地把合法工作与非法工作结合起来，同时，合法工作应当始终受地下党的**实际**监督。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中的共产党议会党团，不论当时整个党处于合法地位，还是非法地位，都必须完全、绝对地服从整个共产党。凡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拒不服从党的领导的共产党议员，都必须开除出党。

合法的出版事业（报纸、出版社）必须无条件地完全服从整个党及其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在这方面不得作丝毫让步。

18．共产党全部组织工作中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在各处，即使在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人数不多的地方，都要建立**共产党组织**。在每个工人代表苏维埃里，在每个工会里，在每个合作社里，在任何一个作坊里，在每个居民委员会里，在每个国家机关里，只要有三个同情共产主义的人，共产党人都应当立即设立自己的组织。只有共产党人组织起来，工人阶级**先锋队**才能领导**整个工人阶级**。在非党组织里从事活动的一切共产党组织，不论当时党处于合法地位还是非法地位，都要绝对服从整个党组织。各种共产党组织，都应当按照严格的等级和尽可能明确的组织系统来确定相互间的从属关系。

19．各地的共产党，开始时几乎都是**城市**的党，即多半是居住在城市的产业工人的党。为使工人阶级更易于迅速地取得胜利，共产党不仅要成为城市的党，而且也要成为农村的党。共产党应当在雇农、小农和中农中间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共产党应当千方百计地设法在农村中建立共产党组织。

※ ※ ※

只有在那些有共产党人生活和战斗的国家里都确立起上述关于共产党的作用的观点，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才能得到巩固。凡承认第三国际原则并决心同黄色国际断绝关系的工会，共产国际都将邀请它们参加自己的代表大会。共产国际将为那些持共产主义立场的红色工会设立一个国际支部。共产国际不拒绝同每个非党工人组织合作，只要它愿意同资产阶级进行严肃的革命斗争。虽然如此，但是共产国际还是要向全世界无产者指出以下几点：

（1）共产党是工人阶级解放的主要的和基本的工具。现在，在**每个**国家里，我们所要建立的已经不是小组和派别，而是共产党。

（2）每个国家只应有一个统一的共产党。

（3）共产党必须按照最严格的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在国内战争时期，应当在自己的队伍内部制定一种军事纪律。

（4）在各地，即使那里只有 10 个无产者或半无产者，共产党也应设立自己的组织。

（5）在每个非党机关里都应当设有严格服从于全党的共产党组织。

（6）共产党要坚决地、不遗余力地维护共产主义的纲领和革命策略，同时要始终同广大工人组织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并把宗派主义当作一种无原则的现象加以克服。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及其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提纲）

（1921 年 6—7 月）

一、总则

1．党的组织应当适应于党的活动条件和目的。在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各个时期，以及在随后的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过渡的时期，共产党应成为领导无产阶级先进队伍的先锋队。

2．共产党不可能有一种绝对正确的、一成不变的组织形式。无产阶级从事阶级斗争的条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这就促使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经常寻求适当的组织形式。同样，各个国家在历史上形成的特点也要求各个党具有独特的组织形式。

但这种差别是有一定限度的。尽管在各个国家中，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各个阶段，无产阶级从事阶级斗争的条件各不相同，但所具有的共同因素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却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个共同因素也就成为在各国建立共产党的基础。

因此，必须力求现有的共产党在组织上能不断得到合理的发展，而不要考虑以新型的党来代替它，或者想寻求某种绝对正确的组织形式和尽善尽美的、章程。

3．对大多数共产党说，因而也就是对世界革命无产阶级的总的政党组织——共产国际来说，它们的共同任务是要同占据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战胜资产阶级，夺取资产阶级掌握的政权，是各国党最近期间最主要的任务。

因此，资本主义各国的共产党在进行各种**组织工作**时，要把主要注意力放到建立那种能保证无产阶级革命战胜有产阶级的组织上。

4. 要想取得成效，每一次行动都需要有坚强的**领导**。尤其是这个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斗争，更需要这种领导。共产党的组织就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实行共产主义领导的组织。

要想进行卓越的领导，党本身就需要有坚强的领导。因此我们的组织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建立组织，并由坚强可靠的共产党机关来培养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忠诚领导人。

5. 领导革命的阶级斗争要求共产党及其领导机关既要尽力提高战斗力，又要极其适应不断变化着的斗争条件。

此外，要想进行卓有成效的领导，就必须同**无产阶级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没有这种联系，领导人就不能**引导**群众前进，充其量也只不过是跟着群众走。

在共产党的组织中，这种有机的联系是通过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

二、关于民主集中制

6. 共产党组织的民主集中制，应当是集中领导和无产阶级民主的真正结合。这种结合，只有在整个党组织经常进行共同**活动**、经常进行共同**斗争**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共产党内的集中，并不是形式上的或机械的集中，而是**共产主义活动的集中**，即建成既强有力而又机智灵活的**领导**。

形式上的或机械的集中，乃是党内官僚集中掌握“权力”，用以统治党内其他成员或党外革命无产阶级群众。只有共产主义的敌人才会说，共产党企图通过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通过实行集中的共产主义领导来统治革命无产阶级。这是一派胡言。党内矛盾或争夺统治权的斗争，是与共产国际所通过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决不相容的。

在以往非革命工人运动的组织中，也同在资产阶级国家的组织中一样，盛行某种二元论，即“官吏”和“人民”之间的二元论。在资产阶级颓废思想的影响下，组织中出现了职能的明确划分现象，劳动者的有机联系完全被形式上的民主所代替，整个组织分裂成为积极的官吏和消极的群众。就连革命的工人运动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存在着形式主义和二元论的倾向。

共产党必须通过经常不懈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并经过**多次**改善和改组来彻底克服这种矛盾。

7．在把群众性的社会党改造成为共产党的时候，不应只限于把一切权力转交给党中央而不改变其整个旧的制度。为了使集中不致成为一种空谈而能真正实现，就必须使社会党成员感到，实现集中能**使他们的共同活动和战斗力得到真正加强和发展**。否则，集中就会被群众看作是党的官僚主义化，他们就会对一切集中、一切领导、一切严格纪律产生反感。官僚主义发展到极端就成了无政府主义。

单单形式上的民主，既不能消除组织中的官僚主义倾向，也不能消除无政府主义倾向，而实行形式上的民主，在工人运动中会滋长无政府主义倾向。

因此，如果我们想通过形式上的民主来求得组织的集中领导，即实现强有力的领导，那是办不到的。为此，首先必须既要发展和保持党的领导机关与党员之间的有机联系和相互关系，又要发展和保持党与党外无产阶级群众之间的有机联系和相互关系。

三、关于共产党人的工作义务制

8．共产党应成为**进行革命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工作机构**。党同党的各个机关和党员的有机联系，是通过党组织内的共同日常工作建立起来的。

在那些合法的共产党内，大多数党员至今还没有充分参加党的日常工作。这是这些党的主要缺点，也是它们不能稳步向前发展的原因。

9．工人政党在开展工作的初期，易于满足于接受共产主义纲领，满足于在宣传工作中以共产主义学说代替旧学说、以共产主义工作人员代替反共产主义的官僚。可是，党接受共产主义纲领，只能说明它愿意成为共产主义政党。如果没有共产主义行动，如果大多数党员依然抱消极态度，那么，党就连接受共产主义纲领后所应承担的最低要求也做不到了。要知道，实施纲领的最重要的要求，就是**吸引全体党员经常参与日常工作**。

共产党组织的工作要点是：调动一切力量来开展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合理地分配党员应进行的党务工作；通过党员经常吸引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参加革命运动；不是凭借力量，而是凭借毅力、经验、才干和智慧等方面的威望和优势，来保持对整个运动的坚强领导。

10．共产党要想拥有真正积极的党员，必须使他们每个人都能把当时条件下所具有的全部力量和全部时间用于党的工作，当然，加入共产党，除应具有共产主义信仰外，还必须办理正式登记手续，在某些情况下先作预备党员，然后才能成为正式党员；另外，要按时缴纳党费，订阅党报等等。但最重要的是，每一个党员都要参加党的日常工作。

11．为了参加日常工作，每个党员都得加入一个**较小的工作机构**，如委员会、工作组、小组、党团或支部。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正确地分配、执行和领导党的工作。

当然，党员必须参加地方组织的党员大会。在具备合法条件的情况下，不应以地方代表会议来代替这种定期的党员大会。正相反，**全体**党员都必须按时参加这种大会。但是，只做到这一点还是不够。要预先由较小的工作组或个别负责同志充分做好这种大会的准备工作，这同准备与卓有成效地发动公开的工人集会、游行示威和群众性行动的情况是一样的。只有人数不多的工作小组，才能仔细研究和缜密拟定这种活动的多方面的任务。如果许许多多工作小组中的党员没有经

常进行这种日常工作，那么，在参加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时，即使付出最大努力，也只能对斗争发生虚弱、无益的影响，而不能把一切旺盛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有战斗力的共产党。

12. 应当建立共产党的核心，以领导党的各种活动的日常工作，如家庭宣传、党校工作、报纸服务、推销书刊、情报工作、联络工作等等。

在工厂企业、工会、劳动组合和军队中，以及在即使只有几个党员或预备党员的一切地方，共产党支部是开展党的日常工作的基本核心。在同一企业或工会中，如果党员人数很多，支部应扩大成为党团，其工作由共产党的核心来领导：根据广义的一般^原则需要组织反对派时，或者需要参加原有党派的工作时，共产党人应通过自己的支部极力争取在其中起到领导作用。

共产党支部是否应当公开进行活动，或者打出共产主义旗帜来进行活动，应根据不同情况仔细研究利弊之后来决定。

13. 实行党内普遍的工作义务制和组织人数不多的工作小组，是群众性的共产党的一项特别艰巨的任务。这项工作苶能贸然从事，它要求沉着镇静、深思熟虑和坚决果断精神。

特别重要的是，在全面讨论这一问题之后，这项组织工作要根据新的原则非常审慎地进行。如果按照某一固定方案，把组织中的全体党员划分为若干人数不多的支部或小组，要他们参加党的一般日常工作，这当然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最好不要这样做，因为这会立即引起党员对这种新做法的不满和反感。

特别提示党的领导机关，要事先同许多优秀的组织者，即同那些洞悉国内各主要中心地区运动总形势的、忠诚可靠而又积极肯干的共产党人仔细商讨，然后再详尽拟定这种新做法的基本原则。接着，指导员、组织员或组织委员会要很好地准备当前的工作，选出第一批小组领导人，并着手开展活动。随后，要向各个组织、工作小组、支部和各个党员提出一些具体任务，并使他们认识到这种任务

是势在必行的、合情合理的和切实可行的。必要时，可以通过实例来说明应当如何执行这项任务。同时，要十分注意那些应加以特别防范的错误。

14．这项重新组织的工作应当切实地、逐步地来进行。因此，在各地方组织中，最初不应组织过多的新支部或工作单位。通过一段短期的实践，首先应做到：使大企业和工会中所建立的支部能完全正确地行使职能，在党的工作的其他方面安排好必要的工作组，而且使工作大致就绪（例如，在情报、联络、家庭宣传、妇女运动、散发报刊、失业者运动等方面）。在新的组织机构还没有安排好自己的工作之前，不应轻率破坏旧的组织形式。

但是，各地的共产党组织都必须竭尽全力地执行这一基本工作任务。这项重大的要求，不仅要向合法的党提出，而且也要向一切非法的党提出。只要无产阶级群众斗争的一切活动中心还没有广泛建立起共产党的小组、支部、党团和工作组，只要我们这个具有明确目标的强大的党的每个成员还没有参加日常的革命工作，还没有把参加这种工作变成自己的自觉行动，党就应当尽一切力量来执行这项任务。

15．这项基本的组织工作，要求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不断地、坚持不懈地直接领导党的工作，并且系统地指出党的工作方向。这就要求党机关的领导同志付出巨大的精力。共产党的领导机关不仅要使全体同志都有工作可做，而且要在特殊的工作条件中确切掌握方向，有计划而干练地帮助和指导他们的工作，注意发现自己工作中的错误，根据取得的经验改进工作方法，但决不能忽视斗争的目的。

16．我们整个党的工作就是进行实际斗争或理论斗争，或者是为这种斗争作准备。但进行这种斗争的专门技能，一直掌握得很差。在很多十分重要的工作部门中，党至今只是偶尔做了一些工作。例如，合法的党对政治警察进行的特殊斗争，就是这样。对党员同志的指导工作，通常只是偶尔进行一次，而且做得非常肤浅，以致很多党员对于党的大部分具有原则性的重要决议，甚至党纲和共产国

际的决议竟一无所知。所有党的组织、所有党的工作小组都要经常进行指导工作，并要不断争取提高进行斗争的专门技能。

17．汇报工作是共产党组织的一项职责。所有的党组织、党机关和各个党员都要承担这项职责。一般的工作报告，应在短时期内按时提交。此外，还应提交执行党的特殊任务的专门报告。经常汇报工作，使这项职责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固定不变的制度，是十分重要的。

18．党应当每隔三个月向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汇报一次工作。每个地区的党组织必须向其邻近的领导机关汇报工作（例如，地方组织每月要向有关的省党委汇报工作）。

每个支部、党团和工作组必须向其实际领导机关汇报工作。每个党员必须（例如每周一次）向他所在的支部或工作组（或组长）汇报工作，并向委派给他特殊任务的党机关汇报任务的执行情况。

只要遇到适当的机会，就应当立即提出汇报。如果党或委派任务的机关没有要求书面汇报，则可作口头汇报。汇报必须简短扼要、内容充实。听取汇报的人应对不得公开的材料负保密之责，并将重要的汇报材料**立即**转交党的有关领导机关。

19．这些汇报材料，当然并不仅限于阐述报告人本身的工作。汇报中还应当包括工作中所发现的对我们的斗争有利害关系的情况，特别是那些促使我们改变或改进我们未来活动的情况。还应当提出工作中所发现的必须加以改正的意见。在一切共产党支部、党团和工作组中，对于所接到的和所要提交的汇报，必须加以讨论。讨论汇报应成为一种工作制度。

支部和工作组应设法使个别党员或某些党员经常监视敌对组织的活动，特别是那些具有小资产阶级性质的工人组织、首先是社会党组织的活动，并提出这方面的报告。

四、关于宣传鼓动

20．在公开革命起义之前，我们最通常的任务是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这项活动和它的组织工作大都是按老一套方式来进行，即偶尔在群众集会上进行宣传鼓动，在演说和散发的小册子中并没有特别考虑到具体的革命内容。

共产党的宣传鼓动应扎根于无产阶级群众之中，应依据工人的具体生活、共同利益和愿望，特别是要依据他们的共同斗争来不断加强。

共产党人的宣传工作最重要的是要有革命的内容。从这一观点出发，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对具体问题提出的口号和采取的态度，都要非常慎重地加以考虑。为了对每个问题都能采取正确的态度，不仅要经常对专职的宣传员和鼓动员给予详尽的指导，而且对其他所有党员也应如此。

21．共产党的宣传鼓动的主要方式是：对个人的口头劝导，参加工人的工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通过党的报纸和书刊产生影响。无论合法的党或是非法的党，每个党员都应通过某种方式经常参加这项活动。

对个人的口头宣传是一项首要的有计划和有组织的鼓动工作，应由为此而专门建立的鼓动员小组到各家去进行。在地方党组织活动范围内的每户人家，都应受到这项鼓动工作的影响。在大城市，利用宣传画和传单专门组织的街道宣传鼓动工作，往往收到很好的效果。此外，企业和机关中的支部或党团，应结合散发书刊对个人经常进行宣传鼓动。

在居民中有少数民族的国家里，党有责任在少数民族的无产阶级阶层中进行必要的宣传鼓动工作。当然，这项工作要用该少数民族的语言来进行。为此，必须建立相应的党机关。

22．在那些大多数无产阶级群众还没有自觉革命愿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在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时，要不断探索好的工作方法，以便经常关注那些开始具有革命意识的工人，引导他们参加革命运动。共产党的宣传及其提出的各种口号，应

善于在各种不同情况下支持工人在反对资产阶级传统和意向中所认识到的日益成熟的革命倾向，虽然这种革命倾向还是不自觉的、动摇的和半资产阶级的。

此外，共产党的宣传不应满足于只提出无产阶级群众当前的、有限的、模糊不清的要求和希望。这种要求和希望的革命萌芽，只是扩大我们影响的一个必要的出发点。因为无产者有了这个出发点，才能自觉地去理解和接受共产主义。

23．共产党对无产阶级群众进行的宣传鼓动工作，应使斗争中的无产者把我们共产党组织看成是领导他们共同行动的勇敢的、有远见的、有毅力的和最可信赖的领袖。

为了做到这一点，共产党人应当参加**工人阶级的一切通常的冲突和运动**，要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有关劳动时间、工资、工作条件等等的一切冲突中**捍卫**工人的利益。此外，共产党人应当悉心研究工人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要帮助工人分析这些问题，让他们注意资本家胡作非为的勾当，帮助他们切实地弄清资本家提出的要求，尽力发挥工人的团结精神，使他们认识到工人利益的共同性，认识到国内全体工人作为统一的工人阶级（世界无产阶级大军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事业上的共同性。

只有通过这种日常必须进行的琐碎工作，通过经常奋勇地参加无产阶级的一切斗争，“共产党”才能变成共产主义政党。只有这样，它才有别于腐朽的、唱高调的、七拼八凑起来的社会党，而社会党的活动只不过是吸收党员，空谈改良和利用议会“不切实际的可能性”。全体党员群众自觉而又奋勇地参加被剥削者对剥削者每天进行的斗争和冲突，不仅是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先决条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先决条件。

只有**在反对资本暴力的日常斗争中对工人群众实行领导**，共产党才能离正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因为这样它才真正学会了领导无产阶级，并且自觉地做了彻底消灭资产阶级的准备。

24．特别是在罢工、同盟歇业和其他大量解雇工人的情况下，要把大批共产党人发动起来去参加无产阶级运动。

如果共产党人援引共产党纲领，认为只能进行最后的革命武装斗争，从而对工人争取稍微改善自己生活条件的日常斗争抱消极、蔑视、甚至反对的态度，那他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不管提出的要求多么微小，只要工人现已准备为此而对资本家进行斗争，共产党人就必须参与这一斗争。当然，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不应使人们认为，我们共产党人在盲目鼓动无谓的罢工和其他轻率的行动。共产党人在斗争着的工人眼中，应当是他们的最宝贵的战友。

25．工会运动的实践表明，有些共产党支部和党团对面临的一些最通常的问题，往往显得一筹莫展。它们**只是**宣传共产主义的**一般**原则，而在具体问题上则采取庸俗的工团主义的否定态度。这样做当然很容易，但不能收到任何效果。我们这样做只能是为阿姆斯特丹黄色工会领袖们效劳。

共产党人应依据每个具体问题的实际内容来确定自己的革命态度。例如，他们不应只满足于从理论上和原则上反对一切**工资合同**，而应首先直接反对阿姆斯特丹领袖们提出的工资率的实际内容。当然，一切压制无产阶级战斗决心的做法，都应加以谴责，并应同这种做法进行坚决的斗争；很明显，资本家及其阿姆斯特丹走狗企图用这种工资合同来捆住斗争着的工人的手脚，因而共产党人义不容辞地要向工人揭露他们的企图；通常，在进行这种揭露时，共产党人最好能提出使工人不受束缚的工资率。

对工会中的互助储金会和**救济机构**采取类似的态度，也是非常适当的。由互助储金会筹集斗争基金和资助罢工者，这样做本身是很可贵的。从原则上说，反对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只有阿姆斯特丹领袖们所要采取的那种筹集和使用资金的做法，才违背工人阶级的革命利益。

在工会的医疗互助会方面，共产党人要求取消另外缴费、取消对自愿资助的限制条件，是完全恰当的。但是，如果有些会员仍然愿意另外缴费，以便在患病时得到帮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过于阻止他们，会使他们产生误解。所以，首先必须大力进行个人宣传，使他们摆脱小资产阶级的意向。

26．对工会中的社会民主派领袖和其他小资产阶级领袖作斗争时，也同对各式各样工人政党作斗争时一样，不能指望劝说会对他们产生任何效果。必须坚决地开展对他们的斗争。但是，只有把他们的拥护者分化出来，使工人们相信这些背叛社会主义的领袖在为资本主义效力，才能制服他们，取得成果。因此，必须尽可能使这些领袖不得不显露原形，然后对他们发动坚决的进攻。

只是辱骂阿姆斯特丹领袖是“黄色”领袖是不够的。要经常用实例来证明他们的“黄色”本性。他们在劳工协会、国际联盟的国际劳动局、资产阶级内阁中的所作所为，他们在各种集会和议会中的背叛言论，他们在数百种报纸上发表的大量安抚性文章的主要论点，尤其是在准备和进行争取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运动时（即使运动的规模极小），他们的摇摆不定和犹豫不决的态度，以及他们提出的建议、作出的决议和发表的演说，都能说明和显露阿姆斯特丹领袖们反复无常的背叛行为，证明他们是十足的“黄色”领袖。

共产党支部和党团应经常进行实际的斗争。基层的工会官僚，由于自己软弱无力（有时虽然是出于善意），便用工会章程、工会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工会中央理事会的指示作为挡箭牌。但是他们的种种搪塞之词都不应成为阻挡共产党人勇往直前的障碍，而共产党人却应坚决要求基层的工会官僚明确回答如下问题：他们打算采取什么办法来排除这些显而易见的障碍，他们是否准备同工会会员一起为克服这些障碍而公开进行斗争。

27．共产党人参加工会组织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应由党团事先做好周密的准备工作，例如，应拟就自己的提案，选出报告人和发言人，提出有才干、有经验、精力充沛的同志作候选人等等。

共产党组织也应当通过自己的鼓动员小组，对敌对的党派所组织的一切公开的工人集会、竞选大会、游行示威、工人政治节日的活动等等，做好周密的准备工作。在共产党人召集公开的工人大会的地方，为数众多的鼓动员小组在大会召开之前以及在大会进行期间，都应尽可能按同一计划来进行共同活动，以便有组织地充分利用这次大会。

28．共产党人应经常设法使那些**没有组织起来的**、觉悟低的工人受到党的影响。我们应当通过支部和党团劝导他们参加工会和阅读我们的党报。还可以利用其他工人组织，如消费合作社、战争蒙难者组织、文教协会、科学小组、体育小组、戏剧小组等等，来传播我们的影响。在共产党必须秘密进行活动的地方，上述工人组织可以由党员、也可以由党外人士发起组成，但必须征得党的领导机关的同意并受其监督（作为同情者的组织）。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和**妇女**组织也可以通过开办讲习班，举行文艺晚会，组织旅行、庆祝会和野餐会等，使许多不关心政治的无产者、对一般组织生活发生兴趣，然后再使他们同组织建立密切联系，从而吸引他们进行有益于我们党的辅助工作《散发传单和党的报刊等等》。通过积极参加共同的活动，他们将易于摆脱小资产阶级的习性。

29．为了使劳动人民中的**半无产者阶层**同情革命无产阶级，共产党人应当利用他们同大地主、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殊阶级矛盾，并通过经常不断的宣传工作，使他们消除对无产阶级革命所抱的怀疑态度。这往往需要同他们保持长期的接触，热情关心他们的生活需要，向他们义务提供消息，在他们遇到需要克服的困难而自己又无能为力时，对他们给予帮助，吸收他们加入专为他们设立的免费教育机构。这样，就会加强他们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信任。同时，对于那些在

雇农、家仆和当地其他半无产者心目中享有威望的敌对组织和人员所起的影响，必须审慎地并坚持不懈地予以反击。对于劳动者根据自身体会已认清是剥削者的那些明显敌人，必须加以揭露，指出他们是万恶资本主义制度的代表和化身。日常生活中显示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民主和“法治国家”这两种理想之间的相左情况，在共产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中，应当积极地而通俗地加以阐述。

农业地区的每个地方组织都应当分派自己的党员去担任家庭宣传鼓动工作，并把这项工作普及到郊区的所有农村、庄园和各个农户。

30．至于资本主义国家陆海军中的宣传工作，每个国家都应自行寻求一套适当的办法。以和平主义精神进行反军国主义的宣传鼓动是极端有害的。这只会帮助资产阶级去解除无产阶级武装。无产阶级在原则上要摈弃资产阶级国家和整个资产阶级的一切军事组织，要极其坚决地同它们进行斗争，但同时，要尽量利用这种组织（军队、射击协会、民兵等等）来促进工人的军事训练，以准备进行革命战斗。这就是说，加强宣传鼓动工作不是为了反对青年和工人的军事训练，而是为了反对军国主义制度和军官的专横行为。必须坚决利用一切可使无产阶级掌握武器的机会。要使士兵认识清楚，在军官优越的物质享受、军官对待士兵的恶劣态度、士兵毫无社会保障等方面所显示出来的阶级矛盾。此外，在对士兵进行宣传鼓动时，必须向他们说明，他们的整个前途是与被剥削阶级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酝酿革命的初期，鼓动由陆海军士兵民主选举指挥人员，鼓动成立士兵苏维埃，会带来很大的好处，因为这可以摧毁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的支柱。在进行宣传鼓动时，要随时特别注意和竭力反对资产阶级的特种阶级部队，尤其要反对资产阶级招募来的武装匪徒。要根据他们的社会成分和堕落行为，于必要时着手有系统地对他们的队伍进行社会分化。对于那些具有同一阶级性的组织，例如军官大队，应在全体居民面前揭露他们，使大家都痛恨和鄙视他们，使他们内部发生瓦解，从而陷于完全孤立的地位。

五、关于政治斗争的组织工作

31．对于共产党来说，党的组织随时都要积极地进行政治活动，为了有组织地利用各种政治与经济形势及其发生的变化，必须在组织工作方面充分运用战略和策略。

不管党多么弱小，它总是可以利用那些激动人心的政治事件或影响整个经济生活的大罢工，来有步骤、有计划地组织和开展轰轰烈烈的宣传活动。当党决定这样做的时候，它就应当竭尽全力发动全体党员和党的一切工作部门投入这一活动。

首先必须利用党支部和工人小组在工作中建立的各种联系，在政治机构或罢工运动的各大中心组织群众集会，在会上，党的发言人应向与会者说明共产党为使他们摆脱困境而提出的口号。这种集会应由专门的工人小组周密、详尽地做好准备工作。如果党不能亲自召开这种集会，就应当派出适当的同志作为主要发言人和讨论参加者去出席罢工者大会，或无产阶级其他某种斗争方式的大会。

如果预料有可能争取到集会的大多数人或大部分人拥护我们的口号，那就应当设法把我们的口号变成条理清楚、论证透彻的提案和决议案。如果这种决议案在某处获得通过，那就应当力求在该地区或其他地区为开展这一蓬勃发展的运动而召开的一切集会上，大都能作出同样的或类似的决议，即使能在少数集会上争取到支持，也是好的。这样，我们就能使那些受我们思想影响的无产者阶层团结起来，使他们接受我们的领导。

在这种集会之后，从事集会筹备工作和实际参加集会的那些工人小组，应聚集在一起举行简短的座谈会，以便拟定向上级党委提出的报告，并总结出经验，从错误中吸取必要的教训，以利改进今后的工作。

我们的实际口号应根据具体情况以标语和小传单的形式传播给有关的工人阶层，或是向斗争中的工人散发传单。在传单中，我们要结合当前的形势和提出

的口号向他们阐述共产主义思想。为了妥善地张贴标语，必须专门组织一些人去寻找适当的张贴地点，并应妥善地选择合适的张贴时间。

在企业内部、企业的大门口和参加运动的工人的必经地点，在集合点、雇工办事处、火车站等处散发传单时，应尽可能作些简短而有力的讲话，以便抓住参加运动的工人群众的心，对他们产生影响。篇幅较长的传单，应当尽可能只张贴在房屋内，如企业、大厅、住宅或其他醒目的地方。在大力进行这种宣传的同时，还应当在一切充满运动气氛的工会大会和企业职工大会上从事相应的活动。我党同志必须协助召开这种大会，或者干脆自行组织这种大会，派出适当的人员在会上作报告和讲话。我们的党报应大量报道这些特殊的活动，并应提出充分的论证来维护这种活动。总之，党的整个组织机构在一定的时期内应完全致力于这一主要活动，而不能有任何动摇。

32．示威行动需要有极其机敏而又英勇的领导，因为领导上片刻都不能忘掉这个行动的目的，随时都要判断示威活动是否已经达到最高峰，在当时情况下是否可能进一步加强活动，把它扩大成为具有示威性罢工以至大罢工形式的群众行动。战时争取和平的示威运动向我们表明，即使在这种运动遭到失败以后，由于追求的目的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群众也必然会越来越关心真正战斗的无产阶级政党，尽管这个政党还处于非法地位，或者还十分弱小。因此，我们对所追求的目的不能稍有放松或停止不前。

举行街头示威，最好依靠大型企业。首先，我们的支部和党团要有计划地做好准备工作，再通过口头宣传和散发传单形成一种适应当时情势的统一意志。然后，上级党委应召集企业中我党的代表，即支部和党团领导人举行会议，商讨和确定举行示威的日期、路线、集合地点和时间，口号的性质，并说明激化示威运动的意向及其开始和结束的时机。党内一些经过锻炼的、有组织经验和工作能力的干部，应成为示威运动的骨干。他们彼此应能保持有机的联系，经常接到必要

的政治指示，而党的重要工作人员则应有系统地分布在示威人群当中。这样机智灵活地、在政治上有组织地领导示威运动，可为运动的蓬勃发展和转变为波澜壮阔的群众性行动创造良好的前提。

33．共产党如果已拥有一定的力量，即已拥有经过考验的干部和相当多拥护党的群众，它就应当通过开展广泛的运动来彻底消除那些背叛社会主义的领袖对工人阶级的影响，以便使大部分工人群众接受党的政治领导。组织这种运动的方式，要根据具体情况考虑当时的斗争条件是否能取得对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否能站到无产阶级的前列，是否需要暂时停止进行而有所不同。党员人数的多寡，对组织行动的方法也会有决定性的影响。

例如，德国统一共产党这个年轻的群众性政党，为了能比有些地区更加广泛地吸引广大无产阶级阶层，就利用了所谓《公开信》的这种手段。

在无产阶级日益贫困、阶级对立日益尖锐的时代，为了揭露背叛社会主义的领袖，共产党要接近其他无产阶级群众组织，以便要求它们面对着无产阶级公开做出回答：它们是否准备同共产党一起为反对无产阶级急剧贫困化、为满足他们的最低要求、为争取一小块面包而进行斗争，它们是否准备利用自己的所谓十分强大的组织来进行这一斗争。

在共产党开始采取这种行动的地方，它应当在组织上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使广大工人群众响应自己的行动。一切工厂中的党团和工会负责人中的党员，都应在最近召开的公开集会上，以及在最近举行的工厂工会大会上，对大会的各个方面做好周密的准备工作之后，提出包括无产阶级各项迫切要求的我们党的《公开信》问题。

凡是我们的支部或党团要争取群众赞同《公开信》的地方，为了培育或利用群众相应的情绪，都应巧妙地散发传单和张贴标语。在开展这一运动期间，我们的党报每天都要用固定的新观点阐述运动中的各项问题，有时作简短的说明，有

时则作详尽的论述。各级党组织必须向党报提供当前的有关材料，密切注意编辑人员不要在党报的版面上停止进行党的斗争。为了进行这种政治斗争，还要有计划地利用议会党团和市政机关中的党团。它们应根据党执行局的指示，向议会和工厂委员会说明这个业已开展起来的运动，以期该地区的一切单独行动以及正在开展的其他行动能汇合成为一个波澜壮阔的运动，使其越出个别职业利益的范围，提出某些共同的基本要求，以便通过一切组织的共同努力在该地区争取实现这些要求。在这种运动中，共产党要表明自己是决心进行战斗的无产阶级的真正领袖，而那挂反对进行这一有组织的共同行动的工会官僚和社会党官僚，不仅在政治思想方面，而且在实际组织工作方面，都将陷于身败名裂的境地。

34．在政治和经济冲突会引起新的行动和战斗的情况下，共产党要想掌握对群众的领导权，可以不提出某些特殊的要求，面在告人民书中直接向社会党党员和工会会员发出呼吁，号召他们不要逃避由于贫困和企业主加紧压迫而引起的冲突，即使他们的官僚主义领袖反对也要这样做，否则，他们就会沦于彻底毁灭。在这种运动中，党报特别是日报，每天都应给予支持，表明共产党人决心参加即将发生的或业已开始的贫困无产阶级的战斗，决心在当前的紧急关头竭尽全力支援一切被压迫者。每天都要评述，如果不进行这种斗争，工人阶级就不能为自己创造最起码的生活条件，而许多旧的组织却企图逃避或阻挠这种斗争。

工厂和工会的党团应当经常在会上向自己的伙伴说明，共产党人必须下定不怕牺牲的战斗决心，要一往直前。主要的是，要依据当时的情况，把业已发生的冲突和行动在组织上联合起来。已投入各行业和各企业斗争中的支部和党团，相互之间应当经常保持组织上的联系，而执行局也应当通过地区委员会和中央机构，立即动员负责人和党员干部参加一切行动，与斗争着的群众直接取得联系，以领导、扩大和加强运动，并组织统一的行动。各级党组织的主要工作是普遍探索各个冲突的共同点，把它提到首要地位上来，以便在必要时通过政治手段组织起共

同的战斗。随着战斗的发展和扩大，有必要建立领导斗争的统一机构。如果某些工会中的官僚主义领导人在罢工中过早地退出战斗，就要及时地由共产党人来代替他们，以便保证斗争能有坚定果敢的领导。如果许多单独的行动已联合起来，就应极力组织统一的领导，并应尽可能使共产党人占据领导地位。如果善于在组织上做好准备工作，那么，通过工会党团、企业党团、工厂委员会、工厂大会，特别是通过罢工者大会，往往可以很容易地建立起统一的领导。

如果由于运动已经扩展开来，或者由于企业主组织和政府当局进行干涉而使运动具有政治性质，那就应当开始宣传并在组织上准备轰轰烈烈的工人苏维埃的选举。在这种情况下，党的一切报刊都应大力宣传：只有依靠这种从工人斗争中直接产生的机关，工人阶级才能不顾工会官僚及其社会党中的同伙的反对，通过无情的斗争求得真正的解放。

35．已具备一定力量的共产党，特别是那些群众性的大党，应随时采取组织上的措施来准备进行群众性的政治行动。在举行游行示威和群众性的经济运动以及在开展一切局部性的行动时，要经常注意并坚持不懈地积累运动的组织经验，以便与广大群众建立日益紧密的联系。在有大中企业代表参加的党的重要干部扩大会议上，应反复讨论和评定近来一切大规模行动所取得的经验，以便通过企业代表建立更为坚强和牢固的联络网。党的领导人和重要干部同企业代表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建立的密切联系，是防止过早发起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有力保证，从而可以使运动只具有当时情况下和党的影响下所能具有的规模。

党组织如果不与大中企业中的无产阶级群众保持紧密联系，共产党就无法领导大规模的群众行动和真正的革命运动。去年在意大利，以占领工厂这种极为突出的形式举行了无疑是革命的起义，结果失败了。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一方面显然是由于工会官僚的背叛和政党领袖的无能，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党和工厂之间没有通过有政治联系的、关心党的生活的可靠人士同工厂建立组织上的联系。

同样，今年英国矿工的大罢工，显然也是由于这一缺点而丧失很大一部分政治意义。

六、关于党报

36．共产党的报刊应不断加以发展和改进。

任何一种报纸，如果不服从**党的指示**，就不能认为是共产党的机关报。这项原则，只要不违背党的报刊在科学、宣传或其他方面所负的使命，应适用于党的一切出版物，如杂志、报纸、小册子等等。

党应当多关心办好报，而不要只注意多办报。每个共产党首先要有一份办得很好的**中央机关报**，最好是日报。

37．共产党的报纸决不应变成资产阶级报纸以及所谓“社会主义”报纸那样的资本主义企业。我们的报纸应坚持**不受**资本主义信贷机关的约束。妥善地组织广告业务，对于维持报纸的生存至关重要，但对于合法的群众性政党来说，则决不应使报纸依靠大广告的收入来维持。相反，我们的机关报在一切无产阶级社会问题上坚持毫不妥协的立场，才有助于为自己建立崇高的威望。我们的报纸也不应投“大众”之所好，提供一些骇人听闻的或消闲解闷的消息；不应为了打入社交界而容忍小资产阶级作家和名记者的批评。

38．共产党的报纸首先要关心被剥削的工人和斗争中的工人的利益。它应当是我们的优秀的宣传员和鼓动员，是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导员。

我们的报纸应负的责任是：搜集全体党员的宝贵经验，并把这种经验作为指导方针下达给他们，以便不断检查和改进共产党的工作方法。在全国编辑人员会议上，必须交流这种经验，同时通过交换意见，使全党报刊尽可能在步调和方向上取得一致。这样，党的出版物和每一种报纸都将成为我们革命活动的优秀组织者。

如果共产党的报纸，特别是主要的报纸，没有自觉地进行这种总结性的组织工作，那么，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和合理的分工就未必能够实现，从而党的历史任务也就未必能够完成。

39. 共产党的报纸应力求使自己成为共产主义企业，即成为**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成为革命工人、报社全体固定职工、排字工人、印刷工人、行政人员、发行人员，搜集地方资料人员以及讨论和整理资料人员等等的集体。

为使党报成为这种战斗的组织和生气勃勃的共产主义集体，必须采取一系列的实际措施。

每个共产党人，只要对党报有所贡献，只要为党报进行工作，他就同整个报纸有了不可分割的关系，党报就是他日常使用的武器。但这件武器必须天天锤炼和反复磨砺，使之锐利适用。只有不断取得大量物质上和财政上的捐助，共产党的报纸才能生存下去。只要合法的群众性共产党的报纸还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还没有在组织上巩固起来，因而不能独立存在，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物质支柱，党员就应当不断关心为报纸筹集经费，使它得到组织上的巩固并有所改善。

但是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只是为报纸热心筹募经费和进行宣传鼓动，那是不够的，他还应当是报纸的得力工作人员。对于本企业的党团或支部中发生的一切事情，对于从社会观点或经济观点出发值得注意的一切事件，从工伤事故到工厂大会，从虐待徒工到企业工作总结，都应当尽可能迅速地通知报社。工会中的党团应当搜集工会大会和工会书记处的一切重要决议和措施，以及我们的敌人的特殊活动情况，并将它们通知报社。会场上和街道上的动态，能使细心的党的工作者观察和判断各种事物的细节，并在报纸上报导这种材料，也就可以使那些漠不关心政治的工人也能看清我们是真正关怀工人生活的需要。

编辑部应当满怀热情地处理有关工人生活和工人组织的材料，把它们以简明新闻的形式加以报道，使报纸成为密切联系生活的、生气勃勃的劳动集体，或者

是用这种材料作为实例来阐明共产主义学说，这是使广大工人群众了解伟大共产主义思想的一种最好方式。编辑部应尽可能安排时间，亲切地同那些来访的工人谈话，倾听他们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诉说生活上的苦难，并仔细记录下来用以充实报纸的内容。

显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我们的任何一种报纸都不能成为完善的共产主义劳动集体。但是，即使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也能根据类似的原则来组织革命的工人报纸。我们的俄国同志在 1912-1913 年办《真理报》的实例，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它实际上是当时帝俄各主要中心地区有觉悟的革命工人的一个非常活跃的组织。这些俄国同志在一起编辑、印刷和发行这份报纸，同时，他们大都要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钱来作经费。而报纸提供给他们的，则是他们所希望的东西，是他们在当时的运动中所需要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今天还有助于他们的劳动和斗争。对党员以及对其他许多革命工人来说，只有这种报纸才能真正成为“**自己的报纸**”。

40．直接参加党所领导的运动是战斗的共产主义报刊所固有的特点。当党的活动集中于某项运动的时候，党报应当在自己的版面上详尽报道这项运动，而不应只发表一些指导性的政论文章。编辑部应多处搜集材料来支持运动，并根据材料来调整和确定报纸的版面。

41．我们的报纸应经常不断地进行**征求订户**工作。首先必须善于利用一切时机，如工人参加运动的时候，或者由于某种政治或经济事件而使社会生活发生动荡的时候；又如，在发生较大的罢工或同盟歇业时，报纸曾公开大力保卫斗争中的工人的利益，而在罢工或同盟歇业结束之后，就必须立即着手向参加过罢工的工人逐一征求订户。在罢工期间不仅要向企业和工会的共产党党团散发订阅单和进行宣传，而且要尽可能对参加斗争的工人大力开展挨户宣传工作。

同样，在任何一次引起工人群众政治兴趣的选举运动结束之后，也要指派专人有计划地到无产阶级居住区进行挨户宣传。

在政治危机或经济危机虽丰爆发，但广大工人群众通过物价上涨和失业等现象已感到这种危机时，要善于在宣传上利用这种情况，尽可能通过工会中的党团得到参加工会的工人的详细名单，以便分别征求他们订阅党报。经验表明，这种经常性的征订工作，最好在每月最后一周内进行。每个地方小组，在一年内即使有一个月没有利用最后一周，也是一种严重的失误。

推广报纸的人员不应放过任何一次工人集会和示威运动的机会，要利用它们的开始、间断和结束期间进行征订工作。

在支部和工厂党团的每次会议上，以及在工厂大会上，工会党团也负有征求党报订户的责任。

42．党员还应经常保卫报纸，使它不受敌人的破坏。

全体党员应对资本主义报刊进行严厉的斗争，必须揭露和痛斥它的卑鄙行为、荒谬的论调和可耻的沉默态度。

必须经常对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发动攻势，以压制它们，但这种攻势不应变成浅薄的派别论战。必须揭露它们的背叛行为，因为它们企图用许多日常生活中的实例来抹煞大量的矛盾。我们在工会及其他组织中的党团，应竭力采取组织上的措施，使工会及其他工人组织的成员摆脱社会民主党报纸所产生的那种引起人们思想混乱和意气消沉的影响。无论是在工人住所，或者是在企业内，我们报纸的征订工作显然都是对社会主义叛徒的报刊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七、关于党组织的一般结构

43. 在扩大和巩固党的组织时，不应采取以地理区划为基础的形式主义方案，而要考虑到这一地区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真正特点，以及交通方面的技术条件。重点应放在**主要城市和工人群众聚众的大工业中心**。

在建党初期，往往从一开始就想立即在全国普遍建立起党的组织。虽然当时党的力量还极其有限，但却要把力量分散到全国各地去。这样做会削弱党的吸引力，妨碍党的发展。诚然，几年之后，党会建立起强有力的着重形式的体系，然而却往往不能在某一主要工业城市中奠定牢固的基础。

44. 为了使党的活动能达到高度的集中，按照公式化的阶梯方式建立党的领导机关，并设立许多层次的上下级机构是不适宜的。应当极力以每个大城市（即政治经济生活中心和交通枢纽）为出发点，向该城市周围地区及其所辖政治或经济地域发展组织网。主要城市中的党委，是这个地区党组织的领导机关，它领导该地区的全部组织工作，指导该地区党的政治活动，并要同主要城市内的党员劳动群众保持密切联系。

由地区党代表会议或地区党代表大会选出并经党中央批准的地区组织员，必须定期参加主要城市的党的生活。地区党委应经常从主要城市的党员中挑选党的干部，以便使该地区负责政治领导的党委同主要城市中的广大党员群众建立起紧密的有机联系。在进一步发展党组织的形式时，要力求担任领导工作的地区党委同时也是本地区主要城市的政治领导机构。这样一来，领导各个地区组织的党委就将与中央委员会一起，在整个党组织中起到真正领导机构的作用。

地区党委所辖的地域当然不一定要同本地区的境界相一致。主要的是使地区党委能统一领导本地区内的一切地方组织。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应把地区划分开，成立新的地区党委。

此外，在幅员辽阔的大国里，党当然还需要有一些一般的承上启下的机关，如中央委员会同各地区委员会之间设省委、州委，地区的领导机关同各地方组织之间设分区机关或分段机关，以资联络。诚然，在某些情况下，让某个联络机关（例如，党员人数众多的大城市的领导机关）担任领导工作，可能是合适的。但一般说来，应该避免这种地方分权的做法。

45．整个党要**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对于所属某一政党的指示和决议，应速交（1）该党中央委员会，或（2）通过中央委员会转达负责某项专门业务的中央机关，或（3）送交所有党组织。

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决议对于党、当然也对于每个党员是具有约束力的。

党的政策和日常活动，由领导机关通过自己的政治局和组织局负责指导。这个核心的领导机关应定期召开党中央领导机关全体会议，以便作出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决议。同时，为了确切掌握整个形势、党的实际情况、党的意志及其活动能力，在选举党中央机关时，必须照顾到全国各个地区都有适当的候选人。根据同样的理由，在中央机关的选举中，也不应压制策略上的重大不同意见；相反，应当让这种不同意见在中央机关里有所反映，应当让少数派意见的突出代表人物参加中央机关。但是，核心领导机关应当尽可能意见一致，以便不仅能凭借自己的威信，而且也能凭借中央领导机关内的一定的多数，甚至强大的多数来进行坚强可靠的领导。

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党中央机关，对于党来说，尤其是对于合法的群众性的党来说，有可能在严格遵守纪律和取得党员群众的绝对信任方面，在短期内为党中央奠定良好的基础。此外，还有可能迅速地发现党的重要干部当中发生的各种弊病和动摇现象，而立即予以纠正和克服。这样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防止这种病态在党内蔓延，也可以避免在将来的党代表大会上为清除这种病态而采取那种会产生惨重后果的措施。

46．党的中央机关（中央委员会或扩大中央委员会）对党的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负责。中央委员会以及核心领导机关，通常由党的代表大会选出，如代表大会认为适宜的话，可以委托中央机关从本身成员中选出核心领导机关：政治局和组织局。

47．一切担任领导工作的党委，应在自己的内部实行**合理的分工**，以便有效地领导党的工作。此外，许多工作部门可能还需要设立专门的领导机构（例如，领导宣传工作、定期报刊发行工作、工会斗争、妇女工作、政治性红十字会工作、情报工作，联络工作等等）。每个专门领导机构受中央领导机关领导，或受地区党委领导。

担任领导工作的地区党委，直至党的中央领导机关，都要对所属各级组织的活动、职能和人员进行监督。在党的工作部门中有固定职责的一切党员，由上级党委直接领导。专职党员（如编辑人员、宣传员、组织员等）变换工作和调动工作地区，是理所应当的，但不应过于影响党的工作。编辑人员和宣传员也应定期参加某一工人小组的党的活动。

48．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也要像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一样，随时可以要求一切共产党组织及其机关和个别党员提供详尽的情报。必须让中央领导机关的代表和特派员参加一切会议，并享有否决权和发言权。党的领导机关应经常派出特派员，以便对地区机关和分段机关发出指示和通知。他们不仅可以发布政治性和组织性的书面文件，也可以直接给予口头指示。

中央委员会和各地区委员会之下应设立由久经考验的、富有经验的党员组成的监察委员会，负责监督出纳和会计工作。他们应定期向扩大中央委员会汇报工作。

任何一个党组织和党机关以及个别党员，都有权随时直接向党或共产国际的中央领导机关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或申诉。

49．对于党的领导机关的指示和决议，下级组织和每个党员都必须遵行。

领导机关有责任防止领导人员玩忽职守和滥用职权，但对此只能在形式上作出部分的规定。领导机关的职责在形式上规定得越少（例如在非法的党内），它们就越加需要听取党员的意见，力求经常获得可靠的情报，而且只有在经过全面慎重的讨论后，才可作出自己的决定。

50．党员在公开发表言论时，必须**永远使自己体现出是战斗组织中的一个遵守纪律的成员**。如在某一问题上就做法是否正确有不同意见，应尽可能在公开发表言论之前，在党组织内求得解决，然后再根据决定行事。为了使党的每一项决议都能得到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贯彻执行，应当尽可能广泛吸引党员群众参加讨论和解决问题。各级党组织必须决定某一问题是否应由某些同志公开讨论（通过报刊、小册子），以及讨论的方式和范围。如果有些党员认为党组织或党的领导机关的决议是错误的，他们在公开发表谈话时也不应忘记：削弱或者**破坏队伍的团结**是最恶劣的**违反纪律现象**，是革命**斗争**中最严重的错误。

在共产主义的一切敌人面前捍卫共产党，特别是捍卫共产国际，是每个党员的崇高职责。谁要是忘掉这一点，甚至当众攻击党或攻击共产国际，谁就要被当作党的敌人来看待。

51．在制定党章时，必须考虑使它不致阻碍党的发展和壮大。

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党应毫不迟延地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即使需要修改党章和党以往作出的决议时，也要执行。

八、关于合法工作与非法工作的结合

52．在每个共产党的日常生活中，党的职能的改变是与革命进程的各阶段相适应的。但是，合法的党所应具有的组织结构与非法的党的组织结构，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党的组织形式应当使党能永远迅速适应战斗环境的变化。

共产党应当发展成为这样一个战斗组织：它既能避免与集中优势兵力于一点的敌人发生公开冲突，又能利用敌人的弱点对其进行突然的袭击。党组织只着眼于起义和巷战是极端错误的，而只着眼于遭受压抑的局面也是错误的，共产党人应当**在各种情况下**进行革命的准备工作，**经常做好战斗准备**，因为高潮或低潮时期往往几乎是难以预见；即使可以预见，也未必能利用这种预见来改变党的组织，因为变化往往发生在短促的时间内，甚至常常是完全出乎意料。

53．一般说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的共产党，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在认真准备革命起义、武装斗争以及一般非法斗争方面所应担负的任务。

整个党的组织形式只适应长期的合法活动，符合日常合法斗争的要求，这样做就过于片面了。

另一方面，非法的党往往没有充分利用合法活动的机会来建立与革命群众保持紧密联系的党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工作就陷于无效的图谋，劳而无功。

这两种做法都是错误的。每个合法的共产党都应善于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甚至在被迫进入地下状态时，也应如此。特别是在革命行动即将开始时，要做好这项准备工作。每个非法的共产党也应竭力利用合法的工人运动提供的一切机会，以便通过党的深入的工作，使自己成为广大革命群众的组织者和真正的领导者。不论是合法活动还是非法活动，其领导权应统一由党的中央机关掌握。

54．不论是在合法的党内，还是在非法的党内，往往有些人，把党的秘密组织工作理解为建立和保持一个同党的其他工作和组织隔绝的、极端严密的纯军事性组织。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正相反，在革命前的时期，我们的战斗组织大都是通过共产党展开全面工作建立起来的。整个党应**完全**成为进行革命的**战斗组织**。

在革命前过早建立的孤立的革命军事组织，易于遭到瓦解和丧失斗志，因为它们不能进行直接有利于党的工作。

55．对于一个非法的党来说，在一切具有重大意义的行动中，自然要掩护自己的党员和组织，不可因为进行登记、随便收党费和散发材料而把他们暴露出来。非法的党不能像合法的党那样，利用公开的组织形式来进行秘密活动。但是它可以不断学习这种做法。

为了防止可疑分子或不可靠分子钻入党内，必须采取一切预防措施。究竟采取什么措施为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是处于合法地位还是非法地位，它是在迅速发展还是停滞不前。在有些地方和在某种情况下，有一种效果良好的办法，那就是实行候补期制度。按照这种制度，申请入党的人经一名或两名党员介绍，先接收为预备党员，然后再根据他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的情况决定是否转为正式党员。

资产阶级必然会把间谍和奸细派入非法的党组织中。必须极其慎重和耐心地对这种情况进行斗争。

进行这种斗争的方法是把合法活动与非法活动密切结合起来。一般说来，通过长期的合法革命工作，可以很好地考验出谁是可靠、勇敢、忠诚、坚强而又机警的同志，足以担当起他所胜任的非法工作。

合法的群众性政党应当坚持不懈地极力准备应付意外事件，要武装起来，见机行事（例如，细心地隐瞒住址，按规定销毁信件，妥善地保存必要的文件，学会秘密进行联络工作，等等）。

56．可见，我们党的一般工作安排，在革命之前就要为适应现阶段革命需要的战斗组织打下牢固根基。特别重要的是，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在自己的工作中要**经常考虑到这种需要**，并且尽可能使自己对这种需要预先有一个**明确的概念**。诚然，这种预先的概念向来是不全面、不明确的。但决不能因此而忽视共产党领导机关组织工作中的这一要点。

由于在公开的革命行动中，共产党的职能在党的生活中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所以甚至一个组织得很完善的党，也会遇到一些极其艰难而复杂的任务，也许会出现这种情况：在几天之内，我们的党就要动员起来去采取军事行动，而且需要动员起来的不只是党，还有它的后备队，即同情者组织，也许还有全部“民兵〃，即没有参加组织的革命群众，这时还根本谈不上组织正规红军的问题。我们应当在没有建立起军队的情况下，单单依靠党所领导的群众来取得胜利；因此，我们党如果不预先很好地组织起来以应付这种局面，即使进行最英勇的斗争也可能无济于事。

57．在革命的形势下，往往会出现革命的**中央领导机关没有能力**执行自己任务的现象。在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在基层的组织工作方面会取得巨大成绩，而在大本营中，却呈现出一片混乱和惶恐不安的景象，甚至缺乏最起码的分工负责的情况。联络工作往往做得很差，因而弊端百出。当需要使用秘密邮递、秘密运输、秘密驻地和秘密印刷所时，往往是碰运气办事。这样，有组织的敌人所进行的任何挑拨行为都会大有成效。

如果领导革命的党事先没有为此建立起专门的机构，情况就必然会如此。军事侦察工作需要有专门的技能和专处知识；对付政治警察的反间谍工作也是如此。

一个秘密联络机构，只有经过长期不断的工作，才能迅速可靠地发挥作用。在所有这些专门从事革命工作的领域中，每个共产党都需要做好秘密准备工作，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准备也好。

在这些工作领域中，只要在组织活动时考虑到究竟应该设立怎样的机构，那么，这种必要的机构大都可以通过完全合法的活动得到发展。例如，秘密联络机构（专件传送、秘密邮递、秘密驻地、秘密运输等等），只要妥善地安排以合法方式散发传单、刊登广告和传递书信，也可以得到发展。

58．共产党的组织者从一开始就应当预见到每个党员、每个革命工作者的**未来历史作用**，把他看成是革命时期我们战斗组织中的一名战士。因此，党的组织者事先就要引导他们参加最适于他们未来战斗岗位的**队伍**和**工作**。

当然，他们今天进行的活动必须是有益的，必须是今天的斗争所需要的。硬要实际工作者死记今天所不能理解的教条是要不得的。但是，这种活动对于明天执行最后斗争的重大任务来说，却是一种锻炼。

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论党章第一条）

斯大林（1905 年 1 月 1 日）

大胆宣布“俄国是统一而不可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连小孩子也知道“统一而不可分的”俄国并不存在，它早就分成两个对立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现在谁都晓得这两个阶级间的斗争已变成我国现代生活所赖以旋转的轴心。

然而，在此以前这一点是难于看出的，其原因是由于当时只有个别集团在个别城市和个别角落里进行斗争，因此我们只看见斗争舞台上的个别集团，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作为两个阶级，当时还看不出来，也难以看出来。可是后来各个城市和各个区域联合起来了，无产阶级各个集团携起手来了，总罢工和示威运动爆发了，——于是在我们面前就呈现出两个俄国即资产阶级俄国和无产阶级俄国互相斗争的一幅壮丽的图画。在斗争舞台上出现了两支大军即无产者大军和资产者大军，这两支大军间的斗争已波及我国整个的社会生活。

既然军队没有领导者就不能行动，既然每支军队都有自己领路的先头部队，那么就很明显，和这两支大军一起行动的还应有各自的领导集团，即通常所说的政党。

于是出现了如下的情景：一边是自由主义政党率领的资产者大军，另一边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率领的无产者大军，每支大军都在自己的政党领导下进行阶级斗争。（作者注：我们完全没有讲到俄国其他各政党，因为要来阐明我们所分析的问题，根本没有讲到这些政党的必要。）

我们之所以提到这点，是为了把无产者政党和无产者阶级作个比较，从而简略地阐明无产者政党的一般面貌。

上述一切已经足以说明：无产者政党作为一个战斗的领导集团，第一，按成员数量来说，它应当比无产者阶级小得多；第二，按觉悟程度和经验来说，它应当比无产者阶级更高些；第三，它应当是一个团结一致的组织。

在我们看来，上述一切是用不着证明的，因为很明显，只要有必然使人民大众贫困落后的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整个无产阶级就不能提高到应有的觉悟程度，所以必须有一个觉悟的领导者集团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无产者大军，把这支大军联合起来，并在斗争中领导他们。同样很明显，一个以领导战**斗的**无产阶级为目的的政党，就不应当是单个人的偶然凑合，而应当是团结一致的集中的**组织**，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按照统一的计划指导党的工作。

简略说来，我们党的一般面貌就是如此。

先记住这一点，再来谈我们的主要问题：我们究竟能把什么人称为党员呢？本文所论的党章第一条就是讲这个问题的。

那么，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吧。

我们究竟能把什么人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呢？换句话说，党员的义务是什么呢？

我们党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党。这就是说，我们党有自己的纲领（运动的最近目的和最终目的），有自己的策略（斗争方式）和自己的组织原则（结合形式）。纲领观点、策略观点和组织观点的一致是我们党赖以建立的基础。只有这些观点的**一致**才能把党员结成一个集中的党。如果观点的一致被破坏了，党也就要瓦解的。所以只有完全接受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原则的人才能称为党员，只有足够理解和完全接受我们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观点的人才能参加我们党的队伍，同时也就是参加无产者大军的领导者队伍。

可是，就一个党员说来，是不是只**承认**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观点就够了呢？能不能把这样的人称为无产者大军的真正领导者呢？当然不能！第一，大家知道，

世界上有不少的空谈家很乐意“承认”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观点，可是除了讲空话以外，什么也不能做。如果把这种空谈家称为党员（即称为无产者大军的领导者），那就会亵渎党的神圣尊严！况且我们党又不是一个哲学学派或宗教教派。难道我们党不是一个斗争的党吗？既然我们党是一个**斗争**的党，它就不能满足于抽象地**承认**它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观点，它就一定要求自己的党员**实现**他所接受的观点，这难道不明白吗？这就是说，谁要想成为我们党的党员，谁就不能满足于接受我们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观点，而应该实行这些观点，实现这些观点。

但是，就一个党员说来，实现党的观点是什么意思呢？他什么时候才能实现这种观点呢？只有当他进行斗争的时候，当他和全党一起走在无产阶级大军前头的时候。能不能单独地、分散地进行斗争呢？当然不能！相反地，人们首先要联合起来，组织起来，然后再投入战斗。否则任何斗争都是不会有结果的。很明显，只有当党员结成一个团结一致的**组织**时，他们才能进行斗争，因而才能实现党的观点。同样很明显，党员愈能紧密地结成一个团结一致的组织，就愈能更好地进行斗争，因而也就愈能更完满地实现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观点。有些人说得对，我们党是领导者的**组织**，而不是单个人的凑合。既然我们党是领导者的**组织**，那么很明显，只有在这个组织中工作、认为自己的义务是把个人愿望同党的愿望融为一体并和党一起行动的人，才能算作这个党的一员，算作这个组织的一员。

这就是说，要做一个党员，就必须实现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观点；要实现党的观点，就必须为这种观点而斗争；要为这种观点而斗争，就必须在党的组织中工作并和党一起工作。显然，要做一个党员，就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作者注：正如任何复杂的有机体都是由无数最简单的有机体组成的一样，我们党作为一个复杂的总的组织，也是由许多区域的组织即地方组织所组成的；这些组织一经党代表大会或中央委员会批准，便可称为党的组织。由此可见，并不只是委员会才称为党的组织。中央委员会的成立是为了指导这些组织使它们按照统一计划

来工作；这些地方党组织通过中央委员会而组成一个巨大的集中的组织。）。只有当我们参加了党的一个组织、因而把我们个人的利益和党的利益融为一体的时候，我们才能成为党员，成为无产者大军的真正领导者。

既然我们党不是一些空谈家单个人的凑合，而是通过中央委员会来很好地引导无产者大军前进的领导者的**组织**，那么上述一切也就不言而喻了。

还要指出一点。

以前我们党很象一个好客的宗法的家庭，愿意把一切同情者都接纳进来。可是我们党在成了一个集中的**组织**以后，也就抛掉了那副宗法的面貌，完全变为一座只对够资格的人敞开大门的**堡垒**了。这对于我们是有重大意义的。正当专制政府竭力用“工联主义”、民族主义和教权主义[1]等等来腐蚀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的时候，同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又在竭力摧残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性、竭力想控制无产阶级的时候，我们应当非常警惕，决不应忘记我们党是一座只对经过考验的人敞开大门的**堡垒**。

我们已经阐明了做党员的两个必要条件（接受党纲和在党组织中工作）。如果再加上一个条件，即党员必须给党以物质上的帮助，那么有权取得党员称号的一切条件就完全具备了。

这就是说，只有接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给党以物质上的帮助并**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才能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

列宁同志（作者注：列宁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中杰出的理论家和实践家。）所提出的党章第一条的条文就是这样。

可见这个条文完全是从我们党是集中的**组织**而不是单个人的**凑合**这一观点产生的。

这个条文的最大优点就在这里。

然而，竟有一些同志把列宁的条文当做“狭隘的”和“不妥当的”条文而加以摈斥，并提出了想必是既不“狭隘”又非“不妥当的”条文。我们说的是马尔托夫（作者注：马尔托夫是《火星报》编辑之一。）的条文，现在我们来分析这个条文。

依据马尔托夫的条文说来，“凡是接受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且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都可以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可见这个条文中略去了做党员所必要的第三个条件，即党员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马尔托夫竟认为这个明确而必要的条件是多余的，并在自己的条文内加进了“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亲自协助党”这样一个含糊的语句来代替这个条件。这样说来，不参加党的任何一个组织（这象什么“党”呵！），不认为自己应该服从党的意志（这象什么“党的纪律”呵！）也可以成为一个党员！试问，党对于那些不参加党的任何一个组织、因而不认为自己应该绝对服从党的纪律的人，又怎能“经常地”加以领导呢？

马尔托夫提出的党章第一条的条文就在这个问题上碰得粉碎了，而这个问题在列宁的条文中却解决得很巧妙，因为列宁的条文肯定地认为**参加党的一个组织**是做党员所必要的第三个条件。

这样，我们只有把马尔托夫条文中“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亲自协助党”这个含糊而毫无意义的语句丢掉。如果丢掉这个条件，马尔托夫的条文中就只剩下两个条件（接受党纲和给予物质上的帮助），这两个条件本身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因为任何一个空谈家都可以“接受”党纲并给党以物质上的帮助，但这决不能使他享有做党员的权利。

看吧，这就是所谓“妥当的”条文！

我们说：真正的党员决不应该满足于只接受党纲，他们必须努力实现自己所接受的纲领。马尔托夫回答说：你们太严格了，因为就一个党员说来，如果他不

拒绝给党以物质上的帮助等等，那么实现他所接受的纲领就不那么需要了。马尔托夫好象怜悯某些“社会民主主义者”空谈家似的，不愿意对他们关上党的大门。

其次，我们说，因为要实现党的纲领，就必须进行斗争，而要进行斗争，就必须团结起来，所以愿意做党员的人必须加入党的一个组织，必须把个人愿望同党的愿望融为一体，必须和党一起去领导战斗的无产者大军，就是必须组成集中的政党的严整部队。马尔托夫回答说：不一定非要党员组成严整的部队，结成组织不可，各人单独进行斗争也可以。

我们要问：那么我们党究竟是什么呢？是单个人的偶然凑合呢，还是团结一致的领导者的组织？如果说它是领导者的组织，那么能不能把不参加这个组织、因而不认为自己必须服从其纪律的人算作这个组织的一员呢？马尔托夫回答说：党并不是一个组织，或者确切些说，党是一个**无组织的**组织（请看，这是什么“集中制”呀！）！

可见照马尔托夫看来，我们党不是一个集中的组织，而是由一些接受我们的党纲等等的地方组织和单个的“社会民主主义”分子凑合起来的。但是，如果我们党不是一个集中的组织，它也就不会是一座只对经过考验的人敞开大门的堡垒。的确，在马尔托夫看来，也正如他的条文所表明的那样，党并不是一座堡垒，而是一切同情者都可以自由参加的宴会。一个人只要有一点知识，只要表示一点同情，只要给一点物质上的帮助，那就成了，他就有充分权利算作一个党员了。马尔托夫给那些吓慌了的“党员”打气说：有些人认为党员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因而必须使个人愿望服从党的愿望，别听他们的话！第一，同意这些条件是很难的，因为使个人愿望服从党的愿望并不是好玩的呀！第二，我已经在自己的说明中指出过，这些人的意见是错误的。好吧，先生们，请光临……宴会吧！

马尔托夫好象是怜悯某些没有决心使个人愿望服从党的愿望的教授和中学生，于是他在我们党的堡垒上凿了一个洞，让这些可敬的先生有机会偷偷地钻进

我们党内来。他向机会主义大开方便之门，而且是在成千上万的敌人压制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时大开方便之门呢！

然而，还不止于此。问题在于马尔托夫那个成问题的条文使机会主义有可能在我们党内从另一方面产生出来。

我们知道，马尔托夫的条文只说到接受纲领，关于策略和组织却只字未提，其实为了保证党内的一致，不仅要有纲领观点的一致，同样还要有组织观点和策略观点的一致。有人会对我们说，列宁同志的条文也没有讲到这一点。不错！但是要知道，列宁同志的条文是没有必要讲到这一点的！一个人既在党的一个组织中工作，就必然和党在一起进行斗争，服从党的纪律，所以他除了遵循党的策略和党的组织原则而外，不能遵循其他的策略和其他的组织原则，难道这还不明白吗？然而对于一个只接受党纲而不参加党的任何组织的“党员”，你有什么可说呢？怎能担保这个“党员”所持的策略和组织观点就是党的策略和组织观点，而不是别的策略和组织观点呢！这就是马尔托夫的条文无法向我们说明的问题！接受了马尔托夫的条文，我们就不免会有一个奇怪的“党”，它的“党员”有同一的纲领（这还成问题！），而策略观点和组织观点却各不相同！真是妙不可言的多样性！我们的党又怎能不象一个宴会呢？

不过要问一问：究竟应当把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所嘱咐我们的、与马尔托夫条文根本矛盾的那个思想上和实践上的集中制置于何地呢？毫无疑问，如果一定要在两者之间选择一个，那么丢掉马尔托夫的条文是会正确一些。

请看，马尔托夫向我们提出的、和列宁同志的条文相对立的条文是多么荒谬！

我们认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马尔托夫的条文是考虑不周的结果；我们希望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一定能改正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错误并采纳列宁同志的条文。

现在把以上所说的再略述一遍。无产者大军已经走上了斗争舞台。如果说任何一支大军都要有自己的先头部队，那么无产者大军也应有这样一个部队。因此，就出现了无产阶级领导者集团，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个党既然是一定的大军的先头部队，第一，它就应当用自己的纲领、策略和组织原则武装起来；第二，它就应当是一个团结一致的组织。如果要问究竟应当把什么人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那么这个党只能给一个回答：只有接受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在党的一个组织中工作的人，才能称为本党党员。

列宁同志在他那个杰出的条文中所表达的正是这个十分明显的真理。

注释：

[1]教权主义是一种反动的政治思潮，主张以宗教神学理论为基础，由教会统治社会的政治和文化生活。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毛泽东（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这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的第一部分。中国人民军队的建设，是经过了艰难的道路的。中国红军（抗日时期是八路军、新四军，现在是人民解放军）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创始，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在这个时期内，红军中的共产党和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学到了许多东西，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毛泽东写的这个决议，就是这些经验的总结。这个决议使红军肃清旧式军队的影响，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这个决议不但在红军第四军实行了，后来各部分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这样就使整个中国红军完全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中国人民军队中的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以后有广大的发展和创造，现在的面貌和过去大不相同了，但是基本的路线还是继承了这个决议的路线。

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它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指出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地加以肃清。

关于单纯军事观点

单纯军事观点在红军一部分同志中非常发展。其表现如：

（一）认为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甚至还有说“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的，则更进一步认为军事领导政治了。

（二）以为红军的任务也和白军相仿佛，只是单纯地打仗的。不知道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三）因此，在组织上，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

（四）同时，在宣传工作上，忽视宣传队的重要性。在群众组织上，忽视军队士兵会[1]的组织和对地方工农群众的组织。结果，宣传和组织工作，都成了被取消的状态。

（五）打胜仗就骄傲，打败仗就消极。

（六）本位主义，一切只知道为四军打算，不知道武装地方群众是红军的重要任务之一。这是一种放大了的小团体主义。

（七）有少数同志囿于四军的局部环境，以为除此就没有别的革命势力了。因此，保存实力、避免斗争的思想非常浓厚。这是机会主义的残余。

（八）不顾主客观条件，犯着革命的急性病，不愿意艰苦地做细小严密的群众工作，只想大干，充满着幻想。这是盲动主义的残余[2]。

单纯军事观点的来源：

（一）政治水平低。因此不认识军队中政治领导的作用，不认识红军和白军是根本不同的。

（二）雇佣军队的思想。因为历次作战俘虏兵甚多，此种分子加入红军，带来了浓厚的雇佣军队的思想，使单纯军事观点有了下层基础。

（三）因有以上两个原因，便发生第三个原因，就是过分相信军事力量，而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

（四）党对于军事工作没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也是形成一部分同志的单纯军事观点的原因。

纠正的方法：

（一）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肃清单纯军事观点的理论根源，认清红军和白军的根本区别。同时，还要肃清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残余，打破四军本位主义。

（二）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特别是对俘虏成分的教育要加紧。同时，尽可能由地方政权机关选派有斗争经验的工农分子，加入红军，从组织上削弱以至去掉单纯军事观点的根源。

（三）发动地方党对红军党的批评和群众政权机关对红军的批评，以影响红军的党和红军的官兵。

（四）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

（五）编制红军法规，明白地规定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士兵会的权能及其和军事政治机关的关系。

关于极端民主化

红军第四军在接受中央指示之后，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减少了许多。例如党的决议比较地能够执行了；要求在红军中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等项错误主张，也没有人再提了。但是在实际上，这种减少，只是一时的和表面的现象，还不是极端民主化的思想的肃清。这就是说，极端民主化的根苗还深种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中。例如对于决议案的执行，表示种种勉强的态度，就是证据。

纠正的方法：

（一）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首先，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其次，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这种自由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上的和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根本不相容的。

（二）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其路线是：

1 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

2 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

3 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

4 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一点的，必须迅速地传达到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中去。其办法是开活动分子会，或开支部以至纵队的党员大会（须看环境的可能），派人出席作报告。

5 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经过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地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

关于非组织观点

四军党内存在着的非组织的观点，其表现如下：

甲　少数不服从多数。例如少数人的提议被否决，他们就不诚意地执行党的决议。

纠正的方法：

（一）开会时要使到会的人尽量发表意见。有争论的问题，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调和敷衍。一次不能解决的，二次再议（以不妨碍工作为条件），以期得到明晰的结论。

（二）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

乙　非组织的批评：

（一）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但是红军党内的批评有些不是这样，变成了攻击个人。其结果，不但毁坏了个人，也毁坏了党的组织。这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纠正的方法，在于使党员明白批评的目的是增加党的战斗力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不应当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

（二）许多党员不在党内批评而在党外去批评。这是因为一般党员还不懂得党的组织（会议等）的重要，以为批评在组织内或在组织外没有什么分别。纠正的方法，就是要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对党委或同志有所批评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提出。

关于绝对平均主义

红军中的绝对平均主义，有一个时期发展得很厉害。例如：发给伤兵用费，反对分伤轻伤重，要求平均发给。官长骑马，不认为是工作需要，而认为是不平

等制度。分物品要求极端平均，不愿意有特别情形的部分多分去一点。背米不问大人小孩体强体弱，要平均背。住房子要分得一样平，司令部住了一间大点的房子也要骂起来。派勤务要派得一样平，稍微多做一点就不肯。甚至在一副担架两个伤兵的情况，宁愿大家抬不成，不愿把一个人抬了去。这些都证明红军官兵中的绝对平均主义还很严重。

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不过一则见之于政治生活方面，一则见之于物质生活方面罢了。

纠正的方法：应指出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红军人员的物质分配，应该做到大体上的平均，例如官兵薪饷平等，因为这是现时斗争环境所需要的。但是必须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因为这不是斗争的需要，适得其反，是于斗争有妨碍的。

关于主观主义

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这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至于党内的主观主义的批评，不要证据的乱说，或互相猜忌，往往酿成党内的无原则纠纷，破坏党的组织。

关于党内批评问题，还有一点要说及的，就是有些同志的批评不注意大的方面，只注意小的方面。他们不明白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至于个人缺点，如果不是与政治的和组织的错误有联系，则不必多所指摘，使同志们无所措手足。而且这种批评一发展，党内精神完全集注到小的缺点方面，人人变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就会忘记党的政治任务，这是很大的危险。

纠正的方法：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三）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

关于个人主义

红军党内的个人主义的倾向有如下各种表现：

（一）报复主义。在党内受了士兵同志的批评，到党外找机会报复他，打骂就是报复的一种手段。在党内也寻报复；你在这次会议上说了我，我就在下次会议上找岔子报复你。这种报复主义，完全从个人观点出发，不知有阶级的利益和整个党的利益。它的目标不在敌对阶级，而在自己队伍里的别的个人。这是一种削弱组织、削弱战斗力的销蚀剂。

（二）小团体主义。只注意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不注意整体的利益，表面上不是为个人，实际上包含了极狭隘的个人主义，同样地具有很大的销蚀作用和离心作用。红军中历来小团体风气很盛，经过批评现在是好些了，但其残余依然存在，还须努力克服。

（三）雇佣思想。不认识党和红军都是执行革命任务的工具，而自己是其中的一员。不认识自己是革命的主体，以为自己仅仅对长官个人负责任，不是对革命负责任。这种消极的雇佣革命的思想，也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表现。这种雇佣革命的思想，是无条件努力的积极活动分子所以不很多的原因。雇佣思想不肃清，积极活动分子便无由增加，革命的重担便始终放在少数人的肩上，于斗争极为不利。

（四）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见于享乐方面的，在红军中也有不少的人。他们总是希望队伍开到大城市去。他们要到大城市不是为了去工作，而是为了去享乐。他们最不乐意的是在生活艰难的红色区域里工作。

（五）消极怠工。稍不遂意，就消极起来，不做工作。其原因主要是缺乏教育，但也有是领导者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或执行纪律不适当。

（六）离队思想。在红军工作的人要求脱离队伍调地方工作的与日俱增。其原因，也不完全是个人的，尚有一，红军物质生活过差；二，长期斗争，感觉疲劳；三，领导者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或执行纪律不适当等项原因。

纠正的方法：主要是加强教育，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再则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执行纪律要得当。并要设法改善红军的物质生活，利用一切可能时机休息整理，以改善物质条件。个人主义的社会来源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当进行教育的时候必须说明这一点。

关于流寇思想

由于红军中游民成分占了很大的数量和全国特别是南方各省有广大游民群众的存在，就在红军中产生了流寇主义的政治思想。这种思想表现在：一，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并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二，扩大红军，不走由扩大地方赤卫队[3]、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而要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三，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作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凡此一切流寇思想的表现，极大地妨碍着红军去执行正确的任务，故肃清流寇思想，实为红军党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应当认识，历史上黄巢[4]、李闯[5]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

纠正的方法：

（一）加紧教育，批评不正确思想，肃清流寇主义。

（二）对现有红军基本队伍和新来的俘虏兵，加紧反流氓意识的教育。

（三）争取有斗争经验的工农积极分子加入红军队伍，改变红军的成分。

（四）从斗争的工农群众中创造出新的红军部队。

关于盲动主义残余

红军党内对盲动主义已经做了斗争，但尚不充分。因此，红军中还有盲动主义思想的残余存在着。其表现如：一，不顾主观和客观条件的盲干。二，城市政策执行得不充分，不坚决。三，军纪松懈，特别是打败仗时。四，还有某些部队有烧屋行为。五，枪毙逃兵的制度和肉刑制度，也是带着盲动主义性质的。盲动主义的社会来源是流氓无产者的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的综合。

纠正的方法：

（一）从思想上肃清盲动主义。

（二）从制度上和政策上纠正盲动的行为。

注释：

[1]见本卷《井冈山的斗争》注〔5〕。

[2]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的短期间，在共产党内曾经出现一种“左”倾盲动主义倾向，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中国革命的形势是所谓“不断高涨”，因而不肯去组织有秩序的退却，错误地使用命令主义的方法，企图依靠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许多的地方起义。这种盲动主义的行动曾经在一九二七年底流行过，到了一九二八年初渐渐地停止了下来。但有些党员也还存在着这种情绪。盲动主义就是冒险主义。

[3]见本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注〔9〕。

[4]黄巢（？——八八四），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人，唐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公元八七五年，即唐僖宗干符二年，黄巢聚众响应王仙芝领导的起义。公元八七八年，王仙芝被杀后，黄巢收集王的余部，被推为领袖，号“冲天大将军”。他领导的起义队伍，曾经多次出山东流动作战，转战于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陕西等省。公元八八〇年，黄巢攻破潼关，不久占领长安，建立齐国，自称皇帝。后因内部分裂（大将朱温降唐），又受到李克用沙陀军及诸道军队的进攻，黄巢被迫退出长安，转入河南，由河南回到山东，于公元八八四年失败自杀。黄巢领导的农民战争持续了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农民战争之一。它沉重地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受到贫苦农民的拥护。由于黄巢起义军只是简单地进行流动的战争，没有建立过比较稳固的根据地，所以被封建统治者称为“流寇”。

[5]李闯即李自成（一六〇六——一六四五），陕西米脂人，明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一六二八年，即明思宗崇祯元年，陕西北部形成农民起义的潮流。李自成参加高迎祥的起义队伍，曾经由陕西入河南，到安徽，折回陕西。一六三六年高迎祥死，李自成被推为闯王。李自成在群众中的主要口号是“迎闯王，不纳粮”；同时他不准部下扰害群众，曾经提出“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妇如淫我母”的口号，来约束自己的部队。因此，拥护他的人很多，成为当时农民起义的主流之一。但他也没有建立过比较稳固的根据地，总是流动作战。他在被推为闯王后，率部入川，折回陕南，经湖北又入川，又经湖北入河南，旋占湖北襄阳、安陆等地，再经河南攻陕占西安，于一六四四年经山西攻入北京。不久，在明将吴三桂勾引清兵联合进攻下失败。

反对本本主义

毛泽东（一九三〇年五月）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而叫它做“本本主义”。*

一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1]

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末，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

要不得！

要不得！

注重调查！

反对瞎说！

二　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

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

许多做领导工作的人，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他恼火，请求调动工作，理由是“才力小，干不下”。这是懦夫讲的话。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2]，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一定要出门吗？也不一定，可以召集那些明了情况的人来开个调查会，把你所谓困难问题的“来源”找到手，“现状”弄明白，你的这个困难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三　反对本本主义

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

地成了反革命吗？就是明显的证据。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

四　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

你不相信这个结论吗？事实要强迫你信。你试试离开实际调查去估量政治形势，去指导斗争工作，是不是空洞的唯心的呢？这种空洞的唯心的政治估量和工作指导，是不是要产生机会主义错误，或者盲动主义错误呢？一定要弄出错误。这并不是他在行动之前不留心计划，而是他于计划之前不留心了解社会实际情况，这是红军游击队里时常遇见的。那些李逵[3]式的官长，看见弟兄们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顿。结果，犯事人不服，闹出许多纠纷，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干净，这不是红军里常见的吗？

必须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才能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任务。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

五　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

为什么要作社会经济调查？我们就是这样回答。因此，作为我们社会经济调查的对象的是社会的各阶级，而不是各种片断的社会现象。近来红军第四军的同志们一般的都注意调查工作了[4]，但是很多人的调查方法是错误的。调查的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账，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这种调查用处不大，不能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我们调查所要得到的结论，是各阶级现在的以及历史的盛衰荣辱的情况。举例来说，我们调查农民成分时，不但要知道自耕农[5]，半自耕农[6]，佃农，这些以租佃关系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我们尤其要知道富农，中农，贫农，这些以阶级区别阶层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我们调查商人成分，不但要知道粮食业、衣服业、药材业等行业的人数各有多少，尤其要调查小商人、中等商人、大商人各有多少。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的情况，尤其要调查各业内部的阶级情况。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要调查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

什么是调查时要注意的社会阶级？下面那些就是：

工业无产阶级

手工业工人

雇农

贫农

城市贫民

游民

手工业者

小商人

中农

富农

地主阶级

商业资产阶级

工业资产阶级

这些阶级（有的是阶层）的状况，都是我们调查时要注意的。在我们暂时的工作区域中所没有的，只是工业无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其余都是经常碰见的。我们的斗争策略就是对这许多阶级阶层的策略。

我们从前的调查还有一个极大的缺点，就是偏于农村而不注意城市，以致许多同志对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这二者的策略始终模糊。斗争的发展使我们离开山头跑向平地了[7]，我们的身子早已下山了，但是我们的思想依然还在山上。我们要了解农村，也要了解城市，否则将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

六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我们的斗争目的是要从民权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我们的任务第一步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发动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政权，完成民权主义革命。由这种斗争的发展，跟着就要执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这些伟大的革命任务的完成不是简单容易的，它全靠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倘若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是错误的，或者是动摇犹豫的，那末，革命就非走向暂时的失败不可。须知资产阶级政党也是天天在

那里讨论斗争策略的，他们的问题是怎样在工人阶级中传播改良主义影响，使工人阶级受他们的欺骗，而脱离共产党的领导，怎样争取富农去消灭贫农的暴动，怎样组织流氓去镇压革命等等。在这样日益走向尖锐的短兵相接的阶级斗争的形势之下，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8]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红军中显然有一部分同志是安于现状，不求甚解，空洞乐观，提倡所谓"无产阶级就是这样"的错误思想，饱食终日，坐在机关里面打瞌睡，从不肯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去调查调查。对人讲话一向是那几句老生常谈，使人厌听。我们要大声疾呼，唤醒这些同志：

速速改变保守思想！

换取共产党人的进步的斗争思想！

到斗争中去！

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

七　调查的技术

（1）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

只有这样才能近于正确，才能抽出结论。那种不开调查会，不作讨论式的调查，只凭一个人讲他的经验的方法，是容易犯错误的。那种只随便问一下子，不提出中心问题在会议席上经过辩论的方法，是不能抽出近于正确的结论的。

（2）调查会到些什么人？

要是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人也要，因为他们有进步的思想，有锐利的观察。以职业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有时兵士也要，流氓也要。自然，调查某个问题时，和那个问题无关的人不必在座，如调查商业时，工农学各业不必在座。

（3）开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

看调查人的指挥能力。那种善于指挥的，可以多到十几个人或者二十几个人。人多有人多的好处，就是在做统计时（如征询贫农占农民总数的百分之几），在做结论时（如征询土地分配平均分好还是差别分好），能得到比较正确的回答。自然人多也有人多的坏处，指挥能力欠缺的人会无法使会场得到安静。究竟人多人少，要依调查人的情况决定。但是至少需要三人，不然会囿于见闻，不符合真实情况。

（4）要定调查纲目

纲目要事先准备，调查人按照纲目发问，会众口说。不明了的，有疑义的，提起辩论。所谓“调查纲目”，要有大纲，还要有细目，如“商业”是个大纲，“布匹”，“粮食”，“杂货”，“药材”都是细目，布匹下再分“洋布”，“土布”，“绸缎”各项细目。

（5）要亲身出马

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

（6）要深入

初次从事调查工作的人，要作一两回深入的调查工作，就是要了解一处地方（例如一个农村、一个城市），或者一个问题（例如粮食问题、货币问题）的底里。深切地了解一处地方或者一个问题了，往后调查别处地方、别个问题，便容易找到门路了。

（7）要自己做记录

调查不但要自己当主席，适当地指挥调查会的到会人，而且要自己做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

注释：

[1]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日毛泽东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对“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论断作了补充和发展，提出“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2] 见《论语•八佾》。原文是：“子入太庙，每事问。”

[3] 李逵是《水浒传》中的一个英雄人物。他朴直豪爽，对农民革命事业很忠诚，但是处事鲁莽。

[4] 毛泽东历来重视调查工作，把进行社会调查作为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和决定政策的基础。在毛泽东的倡导下，红军第四军的调查工作逐渐地开展起来。毛泽东还把进行社会调查规定为工作制度，红军政治部制订了详细的调查表，包括群众斗争状况、反动派状况、经济生活情况和农村各阶级占有土地的情况等项目。红军每到一个地方，都首先要弄清当地的阶级关系状况，然后再提出切合群众需要的口号。

[5] 这里是指中农。

[6] 见本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注〔10〕。

[7] 这里所说的山头指江西、湖南边界的井冈山地区，平地指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一九二九年一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第四军的主力，自井冈山出发，向江西南部、福建西部进军，开辟赣南、闽西两大革命根据地。

[8] 指一九二八年六月至七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初，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曾经把这些决议案汇集印成单行本，发给红军和地方的党组织。

反对自由主义

毛泽东（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

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

但是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

自由主义有各种表现。

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结果是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这是第一种。

不负责任的背后批评，不是积极地向组织建议。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心目中没有集体生活的原则，只有自由放任。这是第二种。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这是第三种。

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这是第四种。

不是为了团结，为了进步，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确的意见斗争和争论，而是个人攻击，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这是第五种。

听了不正确的议论也不争辩，甚至听了反革命分子的话也不报告，泰然处之，行若无事。这是第六种。

见群众不宣传，不鼓动，不演说，不调查，不询问，不关心其痛痒，漠然置之，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把一个共产党员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这是第七种。

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愤恨，不劝告，不制止，不解释，听之任之。这是第八种。

办事不认真，无一定计划，无一定方向，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是第九种。

自以为对革命有功，摆老资格，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工作随便，学习松懈。这是第十种。

自己错了，也已经懂得，又不想改正，自己对自己采取自由主义。这是第十一种。

还可以举出一些。主要的有这十一种。

所有这些，都是自由主义的表现。

革命的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这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

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产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者以抽象的教条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他们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不准备实行之，或不准备完全实行之，不准备拿马克思主义代替自己的自由主义。这些人，马克思主义是有的，自由主义也是有的：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是自由主义；对人是马克思主义，对己是自由主义。两样货色齐备，各有各的用处。这是一部分人的思想方法。

自由主义是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冲突的。它是消极的东西，客观上起着援助敌人的作用，因此敌人是欢迎我们内部保存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性质如此，革命队伍中不应该保留它的地位。

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精神，克服消极的自由主义。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

一切忠诚、坦白、积极、正直的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反对一部分人的自由主义的倾向，使他们改变到正确的方面来。这是思想战线的任务之一。

改造我们的学习

毛泽东（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这篇报告和《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是毛泽东关于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在这些文章里，毛泽东进一步地从思想问题上总结了过去中国共产党内路线的分歧，分析了广泛存在于党内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风，主要是主观主义的倾向，宗派主义的倾向，和作为这两种倾向的表现形式的党八股。毛泽东号召开展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即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原则整顿作风的运动。毛泽东的这个号召，很快地在中国共产党内和党外引起了怎样以从实际出发的观点而不是以教条主义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怎样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以及怎样对待一九三一年初至一九三四年底这段时期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样一些重大问题的大讨论，巩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党内外的阵地，使广大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使中国共产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我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其理由如次：

一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则现在我们对于这些的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

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抗日战争以来，我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研究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是进一步了，研究中国历史也有某些开始。所有这些，都是很好的现象。

二

但是我们还是有缺点的，而且还有很大的缺点。据我看来，如果不纠正这类缺点，就无法使我们的工作更进一步，就无法使我们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

首先来说研究现状。像我党这样一个大政党，虽则对于国内和国际的现状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绩，但是对于国内和国际的各方面，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二十年来，一般地说，我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真理。

其次来说研究历史。虽则有少数党员和少数党的同情者曾经进行了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组织地进行过。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

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

其次说到学习国际的革命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

上面我说了三方面的情形：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

确实的，现在我们队伍中确有许多同志被这种作风带坏了。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具体情况，不愿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这种主观主义的作风，不是还在许多同志中间存在着吗？

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检来的。

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

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他们既然违背了这条原则，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在延安学了，到富县[1]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2]，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

当然，上面我所说的是我们党里的极坏的典型，不是说普遍如此。但是确实存在着这种典型，而且为数相当地多，为害相当地大，不可等闲视之的。

三

为了反复地说明这个意思，我想将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对照地讲一下。

第一种：主观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

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3]。我们的许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其中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的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

第二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4]。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如果有了这种态度，那就既不是“头重脚轻根底浅”，也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了。

四

依据上述意见，我有下列提议：

（一）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为此目的，就要引导同志们的眼光向着这种实际事物的调查和研究。就要使同志们懂得，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们懂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夸夸其谈地乱说一顿和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都是无用的。例如关于宣传工作，如果不了解敌友我三方的宣传状况，我们就无法正确地决定我们的宣传政策。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都必须先有情况的了解，然后才会有好的处理。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二）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

（三）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应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中心的材料。《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

我们走过了许多弯路。但是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在如此生动丰富的中国革命环境和世界革命环境中，我们在学习问题上的这一改造，我相信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注释：

[1] 富县在延安南面约八十公里。

[2] 边币是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银行所发行的纸币。法币是一九三五年以后国民党官僚资本四大银行（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依靠英美帝国主义支持所发行的纸币。毛泽东在本文中所说的，是指当时边币和法币之间所发生的兑换比价变化问题。

[3]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在这篇跋中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3 页）

[4] 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九部分《工作作风》（《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72—275 页）。

整顿党的作风

毛泽东（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

党校今天开学，我庆祝这个学校的成功。

今天我想讲一点关于我们的党的作风的问题。

为什么要有革命党？因为世界上有压迫人民的敌人存在，人民要推翻敌人的压迫，所以要有革命党。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说来，就需要一个如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如果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人民要想推翻敌人的压迫，简直是不可能的。我们是共产党，我们要领导人民打倒敌人，我们的队伍就要整齐，我们的步调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那末，敌人就不会被我们打倒。

现在我们的党还有什么问题呢？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是没有问题的，党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党有几十万党员，他们在领导人民，向着敌人作艰苦卓绝的斗争。这是大家看见的，是不能怀疑的。

那末，究竟我们的党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呢？我讲，还是有问题的，而且就某种意义上讲，问题还相当严重。

什么问题呢？就是有几样东西在一些同志的头脑中还显得不大正确，不大正派。

这就是说，我们的学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党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文风也有些不正的地方。所谓学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主观主义的毛病。所谓党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宗派主义的毛病。所谓文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党八股[1]的毛病。这些作风不正，并不像冬天刮的北风那样，满天都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现在已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作风了，这不过是一股逆风，一股

歪风，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笑声）但是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一种风，是不好的。我们要把产生这种歪风的洞塞死。我们全党都要来做这个塞洞工作，我们党校也要做这个工作。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三股歪风，有它们的历史根源，现在虽然不是占全党统治地位的东西，但是它们还在经常作怪，还在袭击我们，因此，有加以抵制之必要，有加以研究分析说明之必要。

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

现在我来讲一讲主观主义。

主观主义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它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它是和共产党不能并存的。我们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

现在有些糊涂观念，在许多人中间流行着，例如关于什么是理论家，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理论和实际联系等等问题的糊涂观念。

我们首先要问，我们党的理论水平究竟是高还是低呢？近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翻译的多了，读的人也多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否就可以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已经是提得很高了呢？确实，我们的理论水平是比较过去高了一些。但是按照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较起来，

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一般地说来，我们的理论还不能够和革命实践相平行，更不去说理论应该跑到实践的前面去。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你们看，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我们究有多少人创造了可以称为理论的理论，算得科学形态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理论呢？特别是在经济理论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一百年了，但是还没有产生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书。像在中国经济问题方面，能不能说理论水平已经高了呢？能不能说我党已经有了像样的经济理论家呢？实在不能说。我们读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能不能就算是有了理论家呢？不能这样说。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根据实际创造出来的理论，从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抽出来的总结论。我们如果仅仅读了他们的著作，但是没有进一步地根据他们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没有企图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我们就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如果我们身为中国共产党员，却对于中国问题熟视无睹，只能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的结论和个别的原理，那末，我们在理论战线上的成绩就未免太坏了。如果一个人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样是不是就算得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呢？这还是不能算理论家的。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我们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假如要作这样的理论家，那就要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真正领会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革命和中

国革命的学说，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家。

现在我们党的中央做了决定[2]，号召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这个责任是担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党校的同志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现在我们的党校也要定这个规矩，看一个学生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怎样看中国问题，有看得清楚的，有看不清楚的，有会看的，有不会看的，这样来分优劣，分好坏。

其次讲一讲所谓"知识分子"的问题。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文化不发达，所以对于知识分子觉得特别宝贵。党中央在两年多以前作过一个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决定[3]，要争取广大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是革命的，愿意参加抗日的，一概采取欢迎态度。我们尊重知识分子是完全应该的，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但是我们晓得，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于是有人说："哈！你弄颠倒了，乱说一顿。"（笑声）但是，同志，你别着急，我讲的多少有点道理。

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此外还有什么知识

呢？没有了。我们现在看看一些学生，看看那些同社会实际活动完全脱离关系的学校里面出身的学生，他们的状况是怎么样呢？一个人从那样的小学一直读到那样的大学，毕业了，算有知识了。但是他有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还没有参加任何实际活动，还没有把自己学得的知识应用到生活的任何部门里去。像这样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呢？我以为很难，因为他的知识还不完全。什么是比较完全的知识呢？一切比较完全的知识都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第一阶段是感性知识，第二阶段是理性知识，理性知识是感性知识的高级发展阶段。学生们的书本知识是什么知识呢？假定他们的知识都是真理，也是他们的前人总结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写成的理论，不是他们自己亲身得来的知识。他们接受这种知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必须知道，就一定的情况说来，这种知识对于他们还是片面性的，这种知识是人家证明了，而在他们则还没有证明的。最重要的，是善于将这些知识应用到生活和实际中去。所以我劝那些只有书本知识但还没有接触实际的人，或者实际经验尚少的人，应该明白自己的缺点，将自己的态度放谦虚一些。

有什么办法使这种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变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这样就可以达到目的。

我这样说，难免有些人要发脾气。他们说："照你这样解释，那末，马克思也算不得知识分子了。"我说：不对。马克思不但参加了革命的实际运动，而且进行了革命的理论创造。他从资本主义最单纯的因素——商品开始，周密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商品这个东西，千百万人，天天看它，用它，但是熟视无睹。只有马克思科学地研究了它，他从商品的实际发展中作了巨大的研究工作，从普遍的存在中找出完全科学的理论来。他研究了自然，研究了历史，研究了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这样，马

克思就成了一个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最完全的知识分子，他和那些仅有书本知识的人有根本的区别。马克思在实际斗争中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概括了各种东西，得到的结论又拿到实际斗争中去加以证明，这样的工作就叫做理论工作。我们党内需要许多同志学做这样的工作。我们党内现在有大批的同志，可以学习从事于这样的理论研究工作，他们大都是聪明有为的人，我们要看重他们。但是他们的方针要对，过去犯过的错误他们不应重复。他们必须抛弃教条主义，必须不停止在现成书本的字句上。

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斯大林曾经说过，脱离实际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4]。空洞的理论是没有用的，不正确的，应该抛弃的。对于好谈这种空洞理论的人，应该伸出一个指头向他刮脸皮。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但是许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却把它看成是死的教条，这样就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

另一方面，我们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如果误用了他们的经验，也是要出毛病的。不错，这样的人往往经验很多，这是很可宝贵的；但是如果他们就以自己的经验为满足，那也很危险。他们须知自己的知识是偏于感性的或局部的，缺乏理性的知识和普遍的知识，就是说，缺乏理论，他们的知识也是比较地不完全。而要把革命事业做好，没有比较完全的知识是不行的。

这样看来，有两种不完全的知识，一种是现成书本上的知识，一种是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识，这二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结合，才会产生好的比较完全的知识。

但是，我们的工农干部要学理论，必须首先学文化。没有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就学不进去。学好了文化，随时都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我幼年没

有进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5]一套，这种学习的内容虽然陈旧了，但是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何况现在不是学的孔夫子，学的是新鲜的国语、历史、地理和自然常识，这些文化课学好了，到处有用。我们党中央现在着重要求工农干部学习文化，因为学了文化以后，政治、军事、经济哪一门都可学。否则工农干部虽有丰富经验，却没有学习理论的可能。

由此看来，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必须使上述两种人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必须使两种人互相结合。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两者都是主观主义，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的东西。

所以，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他们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如果不注意，如果不知道这种片面性的缺点，并且力求改正，那就容易走上错误的道路。

但是在这两种主观主义中，现在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因为教条主义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把他们俘虏起来，充作自己的用人，而工农干部不易识破他们；也可以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我们如果把教条主义克服了，就可以使有书本知识的干部，愿意和有经验的干部相结合，愿意从事实际事物的研究，可以产生许多理论和经验结合的良好的工作者，可以产生一些真正的理论家。我们如果把教条主义克服了，就可以使有经验的同志得着良好的先生，使他们的经验上升成为理论，而避免经验主义的错误。

除了对于“理论家”和“知识分子”存在着糊涂观念而外，还有天天念的一句“理论和实际联系”，在许多同志中间也是一个糊涂观念。他们天天讲“联系”，实际上却是讲“隔离”，因为他们并不去联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

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说，你的教条一点什么用处也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反复地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些人偏偏忘记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话。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如果只是口头上讲联系，行动上又不实行联系，那末，讲一百年也还是无益的。我们反对主观地片面地看问题，必须攻破教条主义的主观性和片面性。

关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全党的学风的问题，今天讲的就是这些。

现在我来讲一讲宗派主义的问题。

由于二十年的锻炼，现在我们党内并没有占统治地位的宗派主义了。但是宗派主义的残余是还存在的，有对党内的宗派主义残余，也有对党外的宗派主义残余。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铲除这两方面的祸根，才能使党在团结全党同志和团结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行无阻。

什么是党内宗派主义的残余呢？主要的有下面几种：

首先就是闹独立性。一部分同志，只看见局部利益，不看见全体利益，他们总是不适当地特别强调他们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总希望使全体利益去服从他们的局部利益。他们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他们忘记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张国焘[6]是向党中央闹独立性的，结果闹到叛党，做特务去了。现在讲的，虽然不是这种极端严重的宗派主义，但是这种现象必须预防，必须将各种不统一的现象完全除去。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

闹这类独立性的人，常常跟他们的个人第一主义分不开，他们在个人和党的关系问题上，往往是不正确的。他们在口头上虽然也说尊重党，但他们在实际上却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把党放在第二位。刘少奇同志曾经说过，有一种人的手特别长，很会替自己个人打算，至于别人的利益和全党的利益，那是不大关心的。“我的就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大笑）这种人闹什么东西呢？闹名誉，闹地位，闹出风头。在他们掌管一部分事业的时候，就要闹独立性。为了这些，就要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资产阶级政党的庸俗作风也搬进共产党里来了。这种人的吃亏在于不老实。我想，我们应该是老老实实地办事；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实态度是根本不行的。什么人是老

实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是老实人，科学家是老实人。什么人是不老实的人？托洛茨基、布哈林、陈独秀、张国焘是大不老实的人，为个人利益为局部利益闹独立性的人也是不老实的人。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其实都是最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我们党校的学生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集中的统一的党，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都要清除干净。要使我们全党的步调整齐一致，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我们一定要反对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

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必须团结，必须反对宗派主义倾向。因为许多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新四军到后才创立的，许多地方工作是外来干部去后才发展的，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必须加以很好的注意。我们的同志必须懂得，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完全团结一致，只有本地干部大批地生长了，并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我党在根据地内才能生根，否则是不可能的。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必须互相取长补短，才能有进步。外来干部比较本地干部，对于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这些方面，总要差些。拿我来说，就是这样。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的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一些陕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我们到山西、河北、山东以及其它抗日根据地的同志，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不但如此，即在一个根据地内部，因为根据地内的各个区域有发展先后之不同，干部中也有外来本地之别。比较先进区域的干部到比较落后的区域去，对于当地，也是一种外来干部，也要十分注意扶助本地干部的问题。就一般情形说来，凡属外来干部负领导责任的地方，如果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弄得不好，那末，这个责任主要地应该放在外来干部的身上。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同志，其责任就更大些。现在各地对这个问题的注意还很不够，有些人轻视本地干部，讥笑本地干部，他们说：“本地人懂得什么，土包子！”这种人完全不懂得本地干部的重要性，他们既不了解本地干部的长处，也不了解

自己的短处，采取了不正确的宗派主义的态度。一切外来干部一定要爱护本地干部，经常帮助他们，而不许可讥笑他们，打击他们。自然，本地干部也必须学习外来干部的长处，必须去掉那些不适当的狭隘的观点，以求和外来干部完全不分彼此，打成一片，而避免宗派主义倾向。

军队工作干部和地方工作干部的关系也是如此。两者必须完全团结一致，必须反对宗派主义的倾向。军队干部必须帮助地方干部，地方干部也必须帮助军队干部。如有纠纷，应该双方互相原谅，而各对自己作正确的自我批评。在军队干部事实上居于领导地位的地方，在一般的情形之下，如果和地方干部的关系弄不好，那末，主要的责任应该放在军队干部的身上。必须使军队干部首先懂得自己的责任，以谦虚的态度对待地方干部，才能使根据地的战争工作和建设工作得到顺利进行的条件。

几部分军队之间、几个地方之间、几个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必须反对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本位主义的倾向。谁要是对别人的困难不管，别人要调他所属的干部不给，或以坏的送人，“以邻为壑”，全不为别部、别地、别人想一想，这样的人就叫做本位主义者，这就是完全失掉了共产主义的精神。不顾大局，对别部、别地、别人漠不关心，就是这种本位主义者的特点。对于这样的人，必须加重教育，使他们懂得这就是一种宗派主义的倾向，如果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问题。抗战以来，我党有广大的发展，大批新干部产生了，这是很好的现象。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老干部通常总是不多，比所需要的数量少，而且由于宇宙自然法则的关系，他们已部分地开始衰老死亡下去。”[7]他在这里讲了干部状况，又讲了自然科学。我们党如果没有广大的新干部同老干部一致合作，我们的事业就会中断。所以一切老干部应该以极大的热忱欢迎新干部，关心新干部。不错，新干部

是有缺点的，他们参加革命还不久，还缺乏经验，他们中的有些人还不免带来旧社会不良思想的尾巴，这就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残余。但是这些缺点是可以从教育中从革命锻炼中逐渐地去掉的。他们的长处，正如斯大林说过的，是对于新鲜事物有锐敏的感觉，因而有高度的热情和积极性，而在这一点上，有些老干部则正是缺乏的[8]。新老干部应该是彼此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以便团结一致，进行共同的事业，而防止宗派主义的倾向。在老干部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地方，在一般情形之下，如果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弄得不好，那末，老干部就应该负主要的责任。

以上所讲的局部和全体的关系，个人和党的关系，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关系，军队和军队、地方和地方、这一工作部门和那一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都是党内的相互关系。在这种种方面，都应该提高共产主义精神，防止宗派主义倾向，使我们的党达到队伍整齐，步调一致的目的，以利战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整顿党的作风，必须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我们如果不要主观主义，要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就必须扫除党内宗派主义的残余，以党的利益高于个人和局部的利益为出发点，使党达到完全团结统一的地步。

宗派主义的残余，在党内关系上是应该消灭的，在党外关系上也是应该消灭的。其理由就是：单是团结全党同志还不能战胜敌人，必须团结全国人民才能战胜敌人。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上，二十年来做了艰苦的伟大的工作；抗战以来，这个工作的成绩更加伟大。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所有的同志对待人民群众都有了正确的作风，都没有了宗派主义的倾向。不是的。在一部分同志中，确实还有宗派主义的倾向，有些人并且很严重。我们的许多同志，喜欢对党外人员妄自尊大，看人家不起，藐视人家，而不愿尊重人家，不愿了解人家的长处。

这就是宗派主义的倾向。这些同志，读了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之后，不是更谦虚，而是更骄傲了，总是说人家不行，而不知自己实在是一知半解。我们的同志必须懂得一条真理：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员相比较，无论何时都是占少数。假定一百个人中有一个共产党员，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中就有四百五十万共产党员。即使达到这样大的数目，共产党员也还是只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非党员。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和非党人员合作呢？对于一切愿意同我们合作以及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我们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一部分党员却不懂得这个道理，看不起愿意同我们合作的人，甚至排斥他们。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给了我们这样的根据吗？没有。相反地，他们总是谆谆告诫我们，要密切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中国共产党中央给了我们这个根据吗？没有。中央的一切决议案中，没有一个决议说是我们可以脱离群众使自己孤立起来。相反地，中央总是叫我们密切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所以，一切脱离群众的行为，并没有任何的根据，只是我们一部分同志自己造出来的宗派主义思想在那里作怪。因为这种宗派主义在一部分同志中还很严重，还在障碍党的路线的实行，所以我们要针对这个问题在党内进行广大的教育。首先要使我们的干部真正懂得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使他们懂得共产党员如果不同党外干部、党外人员互相联合，敌人就一定不能打倒，革命的目的就一定不能达到。

一切宗派主义思想都是主观主义的，都和革命的实际需要不相符合，所以反对宗派主义和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应当同时并进。

关于党八股的问题，今天不能讲了，准备在另外一个会议上来讨论。党八股是藏垢纳污的东西，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害人的，不利于革命的，我们必须肃清它。

我们要反对主观主义，就要宣传唯物主义，就要宣传辩证法。但是我们党内还有许多同志，他们并不注重宣传唯物主义，也不注重宣传辩证法。有些同志听

凭别人宣传主观主义，也安之若素。这些同志自以为相信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却不努力宣传唯物主义，听了或看了主观主义的东西也不想一想，也不发议论。这种态度不是共产党员的态度。这使得我们许多同志蒙受了主观主义思想的毒害，发生麻木的现象。所以我们要在党内发动一个启蒙运动，使我们同志的精神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间解放出来，号召同志们对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加以抵制。这些东西好像日货，因为只有我们的敌人愿意我们保存这些坏东西，使我们继续受蒙蔽，所以我们应该提倡抵制，就像抵制日货[9]一样。一切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货色，我们都要抵制，使它们在市场上销售困难，不要让它们利用党内理论水平低，出卖自己那一套。为此目的，就要同志们提高嗅觉，就要同志们对于任何东西都用鼻子嗅一嗅，鉴别其好坏，然后才决定欢迎它，或者抵制它。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最后，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一个人发了阑尾炎，医生把阑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

趁着今天党校开学的机会，我讲了这许多话，希望同志们加以考虑。（热烈的鼓掌）

注释：

[1] 八股文是中国明、清封建皇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它内容空洞，专讲形式，玩弄文字。这种文章的每一个段落都要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党八股是指在革命队伍中某些人在写文章、发表演说或者做其它宣传工作的时候，对事物不加分析，只是搬用一些革命的名词和术语，言之无物，空话连篇，也和上述的八股文一样。

[2] 指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这个决定要求全党采取具体措施，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的材料，加强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研究，并将这种调查研究、了解情况的工作，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密切联系起来。

[3] 指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即本书第二卷《大量吸收知识分子》。

[4] 见本书第一卷《实践论》注〔10〕。

[5] 这是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语录《论语》的开头一句话。

[6]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4〕。

[7] 这段话的新译文是："老干部总是少数，不能满足需要，而且由于自然界的天然规律，他们已经部分地开始丧失工作能力。"（《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60 页）

[8] 参见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第三部分第二节（《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60 页）。

[9] 抵制日货是中国人民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所常常采取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一种斗争方法。例如，在一九一九年五四爱国运动时期，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人民都曾经进行过抵制日货的运动。

反对党八股

毛泽东（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演。

刚才凯丰[1]同志讲了今天开会的宗旨。我现在想讲的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怎样拿党八股[2]做它们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它们还可以躲起来。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3]，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

一个人写党八股，如果只给自己看，那倒还不要紧。如果送给第二个人看，人数多了一倍，已属害人不浅。如果还要贴在墙上，或付油印，或登上报纸，或印成一本书，那问题可就大了，它就可以影响许多的人。而写党八股的人们，却总是想写给许多人看的。这就非加以揭穿，把它打倒不可。

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4]。我们为什么又叫它做党八股呢？这是因为它除了洋气之外，还有一点土气。也算一个创作吧！谁说我们的人一点创作也没有呢？这就是一个！（大笑）

党八股在我们党内已经有了一个长久的历史；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有时竟闹得很严重。

从历史来看，党八股是对于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

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总之，那时统治阶级及其帮闲者们的文章

和教育，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条式的。这就是老八股、老教条。揭穿这种老八股、老教条的丑态给人民看，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老教条，这就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个极大的功绩。五四运动还有和这相联系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大功绩；这个反对老八股、老教条的斗争，也是它的大功绩之一。但到后来就产生了洋八股、洋教条。我们党内的一些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则发展这种洋八股、洋教条，成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东西。这些就都是新八股、新教条。这种新八股、新教条，在我们许多同志的头脑中弄得根深蒂固，使我们今天要进行改造工作还要费很大的气力。这样看来，“五四”时期的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反对封建主义的老八股、老教条的运动，后来被一些人发展到了它的反对方面，产生了新八股、新教条。它们不是生动活泼的东西，而是死硬的东西了；不是前进的东西，而是后退的东西了；不是革命的东西，而是阻碍革命的东西了。这就是说，洋八股或党八股，是五四运动本来性质的反动。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但在共产党内也不是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发生偏向，马克思主义没有拿得稳，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这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这样看来，党八股这种东西，一方面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因素的反动，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或发展，

并不是偶然的东西。我们懂得这一点是有好处的。如果“五四”时期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是革命的和必需的，那末，今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也是革命的和必需的。如果“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这个工作，五四运动时期还不过是一个开端，要使全国人民完全脱离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统治，还须费很大的气力，还是今后革命改造路上的一个大工程。如果我们今天不反对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则中国人民的思想又将受另一个形式主义的束缚。至于我们党内一部分（当然只是一部分）同志所中的党八股的毒，所犯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如果不除去，那末，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拿不正确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恶习就不能肃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而对于老八股和老教条在全国人民中间的影响，以及洋八股和洋教条在全国许多人中间的影响，也就不能进行有力的斗争，也就达不到加以摧毁廓清的目的。

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种东西，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而是剥削阶级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在我们党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节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它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洋八股，或党八股。

要做对于这些东西的肃清工作和打扫工作，是不容易的。做起来必须得当，就是说，要好好地说理。如果说理说得好，说得恰当，那是会有效力的。说理的首先一个方法，就是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们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

现在来分析一下党八股的坏处在什么地方。我们也仿照八股文章的笔法[5]来一个“八股”，以毒攻毒，就叫做八大罪状吧。

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哪里还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负幼稚的人，在他们中间散布坏影响，造成坏习惯。去年六月二十二日，苏联进行那么大的反侵略战争，斯大林在七月三日发表了一篇演说，还只有我们《解放日报》[6]一篇社论那样长。要是我们的老爷写起来，那就不得了，起码得有几万字。现在是在战争的时期，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延安虽然还没有战争，但军队天天在前方打仗，后方也唤工作忙，文章太长了，有谁来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欢写长报告。他们辛辛苦苦地写了，送来了，其目的是要我们看的。可是怎么敢看呢？长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吗？也不好。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但是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或者有人要说：《资本论》不是很长的吗？那又怎么办？这是好办的，看下去就是了。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又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文章和演说也是这样。我们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调，不是说任何东西都以短为好。战争时期固然需要短文章，但尤其需要有内容的文章。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演说也是一样，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演说，是必须停止的。

党八股的第二条罪状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有些党八股，不只是空话连篇，而且装样子故意吓人，这里面包含着很坏的毒素。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还可以说是幼稚；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鲁迅曾经批评过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7]科学的东西，随便什么时候

都是不怕人家批评的，因为科学是真理，决不怕人家驳。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东西，表现在党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却生怕人家驳，非常胆怯，于是就靠装样子吓人；以为这一吓，人家就会闭口，自己就可以“得胜回朝”了。这种装腔作势的东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的。凡真理都不装样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地说下去和做下去。从前许多同志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常常有两个名词：一个叫做“残酷斗争”，一个叫做“无情打击”。这种手段，用了对付敌人或敌对思想是完全必要的，用了对付自己的同志则是错误的。党内也常常有敌人和敌对思想混进来，如《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四条所说的那样。对于这种人，毫无疑义地是应该采用残酷斗争或无情打击的手段的，因为那些坏人正在利用这种手段对付党，我们如果还对他们宽容，那就会正中坏人的奸计。但是不能用同一手段对付偶然犯错误的同志；对于这类同志，就须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这就是《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五条所说的方法。从前我们那些同志之所以向这些同志也大讲其“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一方面是没有分析对象，一方面就是为着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论对什么人，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因为这种吓人战术，对敌人是毫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这种吓人战术，是剥削阶级以及流氓无产者所惯用的手段，无产阶级不需要这类手段。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至于以装腔作势来达到名誉和地位的目的，那更是卑劣的念头，不待说的了。总之，任何机关做决定，发指示，任何同志写文章，做演说，一概要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要靠有用。只有靠了这个才能争取革命胜利，其它都是无益的。

党八股的第三条罪状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早几年，在延安城墙上，曾经看见过这样一个标语：“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日胜利。”这个标语的意思并

不坏，可是那工人的工字第二笔不是写的一直，而是转了两个弯子，写成了“—ㄣ—”字。人字呢？在右边一笔加了三撇，写成了“[人彡]”字。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学士的学生是无疑的了，可是他却要写在抗日时期延安这地方的墙壁上，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大概他的意思也是发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则就很难得到解释。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许多人常常以为自己写的讲的人家都看得很懂，听得很懂，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他写的和讲的是党八股，人家哪里会懂呢？“对牛弹琴”这句话，含有讥笑对象的意思。如果我们除去这个意思，放进尊重对象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讥笑弹琴者这个意思了。为什么不看对象乱弹一顿呢？何况这是党八股，简直是老鸦声调，却偏要向人民群众哇哇地叫。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吗？我们和无论什么人做朋友，如果不懂得彼此的心，不知道彼此心里面想些什么东西，能够做成知心朋友吗？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

党八股的第四条罪状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8]。上海人叫小瘪三的那批角色，也很像我们的党八股，干瘪得很，样子十分难看。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吗？一个人七岁入小学，十几岁入中学，二十多岁在大学毕业，没有和人民群众接触过，语言不丰富，单纯得很，那是难怪的。但我们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言，那就办不好。现在我们有许多做宣传工作的同志，也不学语言。他们的宣传，乏味得很；他们的文章，就没有多少人欢喜看；他们的演说，也没有多少人欢喜听。为什么语言要学，并且要用很大的气力去学呢？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

现实际生活的。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我们不是硬搬或滥用外国语言，是要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于我们适用的东西。因为中国原有语汇不够用，现在我们的语汇中就有很多是从外国吸收来的。例如今天开的干部大会，这“干部”两个字，就是从外国学来的。我们还要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由于我们没有努力学习语言，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现在中党八股毒太深的人，对于民间的、外国的、古人的语言中有用的东西，不肯下苦功去学，因此，群众就不欢迎他们枯燥无味的宣传，我们也不需要这样蹩脚的不中用的宣传家。什么是宣传家？不但教员是宣传家，新闻记者是宣传家，文艺作者是宣传家，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也都是宣传家。比如军事指挥员，他们并不对外发宣言，但是他们要和士兵讲话，要和人民接洽，这不是宣传是什么？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只要他不是哑巴，他就总有几句话要讲的。所以我们的同志都非学习语言不可。

党八股的第五条罪状是：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你们去看一看中药铺，那里的药柜子上有许多抽屉格子，每个格子上面贴着药名，当归、熟地、大黄、芒硝，应有尽有。这个方法，也被我们的同志学到了。写文章，做演说，着书，写报告，第一是大壹贰叁肆，第二是小一二三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还有大 ABCD，小 abcd，还有阿拉伯数字，多得很！幸亏古人和外国人替我们造好了这许多符号，使我们开起中药铺来毫不费力。一篇文章充满了这些符号，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不表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说来说去还是

一个中药铺，没有什么真切的内容。我不是说甲乙丙丁等字不能用，而是说那种对待问题的方法不对。现在许多同志津津有味于这个开中药铺的方法，实在是一种最低级、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是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来分类，不是按照事物的内部联系来分类的。单单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使用一大堆互相没有内部联系的概念，排列成一篇文章、一篇演说或一个报告，这种办法，他自己是在做概念的游戏，也会引导人家都做这类游戏，使人不用脑筋想问题，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质，而满足于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既有问题，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你就得把问题提出来。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这里所讲的分析过程，是指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常常问题是提出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明晰，还不能做综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决问题。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这样，就不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能济事。因为这种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形式主义的方法，在我们党内很流行，所以必须揭破它，才能使大家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所办的事才能办好，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胜利。

党八股的第六条罪状是：不负责任，到处害人。上面所说的那些，一方面是由于幼稚而来，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责任心不足而来的。拿洗脸作比方，我们每天都要洗脸，许多人并且不止洗一次，洗完之后还要拿镜子照一照，要调查研究一番，（大笑）生怕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你们看，这是何等地有责任心呀！我们写文章，做演说，只要像洗脸这样负责，就差不多了。拿不出来的东西就不要拿出来。须知这是要去影响别人的思想和行动的啊！一个人偶然一天两天不洗脸，固然也不好，洗后脸上还留着一个两个黑点，固然也不雅观，但倒并没有什么大危险。写文章做演说就不同了，这是专为影响人的，我们的同志反而随随便便，这就叫做轻重倒置。许多人写文章，做演说，可以不要预先研究，不要预先准备；文章写好之后，也不多看几遍，像洗脸之后再照照镜子一样，就马马虎虎地发表出去。其结果，往往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仿佛像个才子，实则到处害人。这种责任心薄弱的坏习惯，必须改正才好。

第七条罪状是：流毒全党，妨害革命。第八条罪状是：传播出去，祸国殃民。这两条意义自明，无须多说。这就是说，党八股如不改革，如果听其发展下去，其结果之严重，可以闹到很坏的地步。党八股里面藏的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毒物，这个毒物传播出去，是要害党害国的。

上面这八条，就是我们申讨党八股的檄文。

党八股这个形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这种文风，早已存在，但尚未充实，尚未得到普遍的发展。我们破坏了洋八股和党八股之后，新的文风就可以获得充实，获得普遍的发展，党的革命事业，也就可以向前推进了。

不但文章里演说里有党八股，开会也有的。“一开会，二报告，三讨论，四结论，五散会”。假使每处每回无大无小都要按照这个死板的程序，不也就是党八股

吗？在会场上做起“报告”来，则常常就是“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部”，会是常常从早上开到晚上，没有话讲的人也要讲一顿，不讲好像对人不起。总之，不看实际情形，死守着呆板的旧形式、旧习惯，这种现象，不是也应该加以改革吗？

现在许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了，这很好。但是“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有些人则连“少许”还没有实行，却在那里提倡“化”呢！所以我劝这些同志先办“少许”，再去办“化”，不然，仍旧脱离不了教条主义和党八股，这叫做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没有结果的。例如那些口讲大众化而实是小众化的人，就很要当心，如果有一天大众中间有一个什么人在路上碰到他，对他说：“先生，请你化一下给我看。”就会将起军的。如果是不但口头上提倡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

今天会场上散发了一个题名《宣传指南》的小册子，里面包含四篇文章，我劝同志们多看几遍。

第一篇，是从《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上摘下来的，讲的是列宁怎样做宣传。其中讲到列宁写传单的情形：“在列宁领导下，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第一次在俄国开始把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当某一个工厂里爆发罢工时，‘斗争协会’因为经过自己小组中的参加者而很熟悉各企业中的情形，立刻就印发传单、印发社会主义的宣言来响应。在这些传单里，揭露出厂主虐待工人的事实，说明工人应如何为自身的利益而奋斗，载明工人群众的要求。这些传单把资本主义机体上的痈疽，工人的穷困生活，工人每日由十二小时至十四小时的过度沉重的劳动，工人之毫无权利等等真情实况，都揭露无余。同时，在这些传单里，又提出了相当的政治要求。”

是“很熟悉”啊！是“揭露无余”啊！

“一八九四年末，列宁在工人巴布石金参加下，写了第一个这样的鼓动传单和告彼得堡城塞棉尼可夫工厂罢工工人书。”

写一个传单要和熟悉情况的同志商量。列宁就是根据这样的调查和研究来写文章做工作的。

“每一个这样的传单，都大大提高了工人们的精神。工人们看见了，社会主义者是帮助他们、保护他们的。”[9]

我们是赞成列宁的吗？如果是的话，就得依照列宁的精神去工作。不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不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也不是自以为是，夸夸其谈；而是要照着列宁那样地去做。

第二篇，是从季米特洛夫[10]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报告中摘下来的。季米特洛夫说了些什么呢？他说：“应当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而用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们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这些战士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都反映出千百万群众的思想和情绪。”

“如果我们没有学会说群众懂得的话，那末广大群众是不能领会我们的决议的。我们远不是随时都善于简单地、具体地、用群众所熟悉和懂得的形象来讲话。我们还没有能够抛弃背得烂熟的抽象的公式。事实上，你们只要瞧一瞧我们的传单、报纸、决议和提纲，就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常常是用这样的语言写成的，写得这样地艰深，甚至于我们党的干部都难于懂得，更用不着说普通工人了。”

怎么样？这不是把我们的毛病讲得一针见血吗？不错，党八股中国有，外国也有，可见是通病。（笑）但是我们总得照着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指示把我们自己的毛病赶快治好才行。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切实领会下面这条起码的规则，把它当作定律，当作布尔什维克的定律：当你写东西或讲话的时候，始终要想到使每个普通工人都

懂得，都相信你的号召，都决心跟着你走。要想到你究竟为什么人写东西，向什么人讲话。”[11]

这就是共产国际给我们治病的药方，是必须遵守的。这是“规则”啊！

第三篇，是从《鲁迅全集》里选出的，是鲁迅复北斗杂志[12]社讨论怎样写文章的一封信。他说些什么呢？他一共列举了八条写文章的规则，我现在抽出几条来说一说。

第一条：“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

讲的是“留心各样的事情”，不是一样半样的事情。讲的是“多看看”，不是只看一眼半眼。我们怎么样？不是恰恰和他相反，只看到一点就写吗？

第二条：“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

我们怎么样？不是明明脑子里没有什么东西硬要大写特写吗？不调查，不研究，提起笔来“硬写”，这就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第四条：“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

孔夫子提倡“再思”[13]，韩愈也说“行成于思”[14]，那是古代的事情。现在的事情，问题很复杂，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还不够。鲁迅说“至少看两遍”，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

第六条：“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我们“生造”的东西太多了，总之是“谁也不懂”。句法有长到四五十个字一句的，其中堆满了“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许多口口声声拥护鲁迅的人们，却正是违背鲁迅的啊！

最后一篇文章，是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论宣传的民族化。六届六中全会是一九三八年开的，我们那时曾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说，必须反对空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活的共产党员，必须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

“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15]

这里叫洋八股废止，有些同志却实际上还在提倡。这里叫空洞抽象的调头少唱，有些同志却硬要多唱。这里叫教条主义休息，有些同志却叫它起床。总之，有许多人把六中全会通过的报告当做耳边风，好像是故意和它作对似的。

中央现在做了决定，一定要把党八股和教条主义等类，彻底抛弃，所以我来讲了许多。希望同志们把我所讲的加以考虑，加以分析，同时也分析各人自己的情况。每个人应该把自己好好地想一想，并且把自己想清楚了的东西，跟知心的朋友们商量一下，跟周围的同志们商量一下，把自己的毛病切实改掉。

注释：

[1]凯丰（一九〇六——一九五五），又名何克全，江西萍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2]见本卷《整顿党的作风》注〔1〕。

[3]“将一军”是中国象棋中的术语。中国象棋采取两军对战的形式，而以一方攻入对方堡垒捉住“将军”（主帅）作为赢棋。凡是一方走了一着棋，使对方的将军有立即被捉的危险时，就叫做向对方“将军”。

[4]反对新旧八股是鲁迅作品里一贯的精神。鲁迅曾在《伪自由书•透底》一文中说："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一来是考官嫌麻烦——他们的头脑大半是阴沉木做的，——什么代圣贤立言，什么起承转合，文章气韵，都没有一定的标准，难以捉摸，因此，一股一股地定出来，算是合于功令的格式，用这格式来'衡文'，一眼就看得出多少轻重。二来，连应试的人也觉得又省力，又不费事了。这样的八股，无论新旧，都应当扫荡。"洋八股是五四运动以后一些浅薄的知识分子发展起来的东西，并经过他们的传播，长时期地在革命队伍中存在着。鲁迅在《透底》附录"回祝秀侠信"中批判这种洋八股说："八股无论新旧，都在扫荡之列，……例如只会'辱骂''恐吓'甚至于'判决'，而不肯具体地切实地运用科学所求得的公式，去解释每天的新的事实，新的现象，而只抄一通公式，往一切事实上乱凑，这也是一种八股。"(《鲁迅全集》第 5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03—106 页)

[5]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52〕。

[6]《解放日报》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六日在延安创刊，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七日终刊。

[7]这是鲁迅《南腔北调集》中一篇文章的篇名，一九三二年作。(《鲁迅全集》第 4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51 页)

[8]解放以前，上海人称城市中无正当职业而以乞讨为生的游民为瘪三，他们通常是极瘦的。

[9]以上三段引文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一章第三节（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18—19 页)。

[10]季米特洛夫（一八八二——一九四九），保加利亚人。一九二一年任工会国际中央理事会理事，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三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回国后，任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

[11]以上三段引文见季米特洛夫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三日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结论《为工人阶级团结一致反对法西斯主义而斗争》的序言和第六部分《仅仅只有正确的路线还是不够的》。

[12]《北斗》杂志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间出版的文艺月刊。《答北斗杂志社问》载鲁迅《二心集》。（《鲁迅全集》第 4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64—365 页）

[13]参见《论语•公冶长》。

[14]韩愈（七六八——八二四），中国唐代著名的大作家。他在《进学解》一文中说："行成于思，毁于随。"意思是：作事成功由于思考，失败由于不思考。

[15]以上两段引文见《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本书第 2 卷第 534 页）。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毛泽东（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所写的决定。*

（一）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二）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它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例如一九四二年的各地整风，凡有成绩者，都是采用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凡无成绩者，都是没有采用此种方法。一九四三年的整风，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和地委，除提出一般号召（全年整风计划）外，必须在自己机关中和附近机关、学校、部队中，选择二、三单位（不要很多），深入研究，详细了解整风学习在这些单位的发展过程，详细了解这些单位中若干个（也不要很多）有代表性的工作人员的政治经历、思想特点、学习勤惰和工作优劣，并亲自指导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具体地解决各该单位的实际问题，借以取得经验。一机关、一学校、一部队内部也有若干单位，该机关、该学校、该部队的领导人员也须这样去做。这又是领导人员指导和学习相结合的方法。任何领导人员，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这一方法必须普遍地提倡，使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学会使用。

（三）一九四二年的整风经验又证明：每一单位的整风，必须在整风过程中形成一个以该单位的首要负责人为核心的少数积极分子的领导骨干，并使这一领

导骨干和参加学习的广大群众密切结合，才能使整风完成任务。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故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凡属真正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领导骨干，必须是从群众斗争中逐渐形成，而不是脱离群众斗争所能形成的。在多数情形下，一个伟大的斗争过程，其开始阶段、中间阶段和最后阶段的领导骨干，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完全同一的；必须不断地提拔在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来替换原有骨干中相形见绌的分子，或腐化了的分子。许多地方和许多机关工作推不动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缺乏这样一个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经常健全的领导骨干。一个百人的学校，如果没有一个从教员中、职员中、学生中按照实际形成的（不是勉强凑集的）最积极最正派最机敏的几个人乃至十几个人的领导骨干，这个学校就一定办不好。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个条件的第九条中所说建立领导核心问题[1]，我们应该应用到一切大小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和农村中去。这种领导骨干的标准，应当是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中所举的四条干部标准（无限忠心，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2]。无论是执行战争、生产、教育（包括整风）等中心任务，或是执行检查工作、审查干部和其它工作，除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以外，都须采取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

（四）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

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五）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在组织中在斗争行动中发生正确关系的思想，正确的领导意见只能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思想，在领导意见见之实行时要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互相结合的思想，都必须在这次整风中普遍地加以宣传，借以纠正干部中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观点。许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团结积极分子组成领导核心，不注重和不善于使这种领导核心同广大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因而使自己的领导变成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领导。许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而欢喜主观主义地自作聪明地发表许多意见，因而使自己的意见变成不切实际的空论。许多同志，满足于工作任务的一般号召，不注重和不善于在作了一般号召之后，紧紧地接着从事于个别的具体的指导，因而使自己的号召停止在嘴上、纸上或会议上，而变为官僚主义的领导。这次整风，必须纠正这些缺点，在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中学会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并在以后应用此种方法于一切工作。

（六）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同志们在这次整风中应该这样去做，在任何工作中也应该这样去做。比较好的领导，就是从比较善于这样去做而得到的。

（七）对于任何工作任务（革命战争、生产、教育，或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或宣传工作、组织工作、锄奸工作等等）的向下传达，上级领导机关及其个别部门都应当通过有关该项工作的下级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使他们负起责

任来，达到分工而又统一的目的（一元化）。不应当只是由上级的个别部门去找下级的个别部门（例如上级组织部只找下级的组织部，上级宣传部只找下级的宣传部，上级锄奸部只找下级的锄奸部），而使下级机关的总负责人（例如书记、主席、主任、校长等）不知道，或不负责。应当使总负责人和分负责人都知道，都负责。这样分工而又统一的一元化的方法，使一件工作经过总负责人推动很多干部、有时甚至是全体人员去做，可以克服各单个部门干部不足的缺点，而使许多人都变为积极参加该项工作的干部。这也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一种形式。例如审查干部，如果仅仅由组织部这个领导机关的少数人孤立地去做，必不可能做好；如果通过某一机关或某一学校的行政负责人，推动该机关该学校的许多人员、许多学生，有时甚至是全体人员、全体学生都参加审查，而上级组织部的领导人员则正确地指导这种审查，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原则，审查干部的目的就一定能完满地达到。

（八）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因此，一个地区的总负责人，必须考虑到该处的斗争历史和斗争环境，将各项工作摆在适当的地位；而不是自己全无计划，只按上级指示来一件做一件，形成很多的“中心工作”和凌乱无秩序的状态。上级机关也不要不分轻重缓急地没有中心地同时指定下级机关做很多项工作，以致引起下级在工作步骤上的凌乱，而得不到确定的结果。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这也是在运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这些原则时，必须注意解决的领导方法问题。

（九）领导方法问题上的各个细节问题，这里不一一说到，希望各地同志根据这里所说的原则方针自己去用心思索，发扬自己的创造力。斗争愈是艰苦，就

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要求密切地相结合，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密切地相结合，而彻底粉碎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不知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原则，极大地妨碍党的工作的发展。为了反对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必须广泛地深入地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

注释：

[1] 见斯大林《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13 页）。

[2] 见季米特洛夫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三日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结论《为工人阶级团结一致反对法西斯主义而斗争》的第七部分《干部问题》。

关于建立报告制度

毛泽东（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这个指示中所规定的报告制度，是中共中央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无纪律无政府倾向的长期斗争在新条件下的一个发展。这个问题在这时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革命形势已经有了极大的进展，许多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许多城市已经解放或者即将解放，人民解放军和人民解放战争的正规性程度大为提高，全国胜利已经在望。这种情况，要求党迅速克服存在于党内和军队内的任何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把一切必须和可能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建立严格的报告制度，就是中共中央为此目的而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关于这个问题，参看本卷《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第六部分和《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的第四点。*

为了及时反映情况，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后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争取革命战争更加伟大的胜利起见，从今年起，规定如下的报告制度。

（一）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该区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动态，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对于这些问题和倾向的解决方法。报告文字每次一千字左右为限，除特殊情况外，至多不要超过两千字。一次不能写完全部问题时，分两次写。或一次着重写几个问题，对其余问题则不着重写，只略带几笔；另一次，则着重写其余问题，而对上次着重写过的只略带几笔。综合报告内容要扼要，文字要简练，要指出问题或争论之所在。写发综合报告的日期是单月的上旬，报告用电报发来。这是各中央局、分局书记个人负责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的经常性的报告和请示。书记在前线指挥作

战时，除自己报告外，指定代理书记或副书记作后方活动的报告。此外，各中央局和分局向中央所作的临时性的报告和请示，照过去一样，不在此内。

我们所以规定这项政策性的经常的综合的报告和请示的制度，是因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仍然有一些（不是一切）中央局和分局的同志，不认识事先或事后向中央作报告并请求指示的必要和重要性，或仅仅作了一些技术性的报告和请示，以致中央不明了或者不充分明了他们重要的（不是次要的或技术性的）活动和政策的内容，因而发生了某些不可挽救的、或难以挽救的、或能够挽救但已受了损失的事情。而那些事前请示、事后报告的中央局或分局，则避免了或减少了这样的损失。从今年起，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改正对上级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各中央局和分局是受中央委任、代表中央执行其所委托的任务的机关，必须同中央发生最密切的联系。各省委或区党委，同各中央局和分局也须密切联系。当此革命已进入新的高潮时期，加强此种联系，极为必要。

（二）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并且照过去规定，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从今年起，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此项报告和请示的内容是：关于该军纪律，物质生活，指战员情绪，指战员中发生的偏向，克服偏向的方法，技术、战术进步或退步的情况，敌军的长处、短处和士气高低，我军政治工作的情况，我军对土地政策、城市政策、俘虏政策的执行情况和克服偏向的方法，军民关系和各阶层人民的动向等。此项报告的字数、写作方法以及发报时间，和各中央局、分局报告的办法相同。如规定的写报告时间（逢单月的上旬）恰在作战紧张的时候，则可提前或推迟若干天，但须申明原因。其中关于政治工作部分，由该军政治部主任起草，经司令员、政治委员审查修改，并且共同署名。报告用电报发给军委

主席。我们规定此项政策性综合报告的理由，和上述中央局、分局应作综合报告的理由相同。

关于健全党委制

毛泽东（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日）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关于这个文件的意义，邓小平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六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说："在我们党内，从长时期以来，由党的集体而不由个人决定重大的问题，已经形成一个传统。违背集体领导原则的现象虽然在党内经常发生，但是这种现象一经发现，就受到党中央的批判和纠正。中央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对于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尤其起了重大的作用。……这个决定在全党实行了，并且直到现在仍然保持着它的效力。……这个决定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总结了党内认真实行集体领导的成功的经验，促使那些把集体领导变为有名无实的组织纠正自己的错误，并且扩大了实行集体领导的范围。"*

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近查有些（当然不是一切）领导机关，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甚为浓厚。重要问题的解决，不是由党委会议做决定，而是由个人做决定，党委委员等于虚设。委员间意见分歧的事亦无由解决，并且听任这些分歧长期地不加解决。党委委员间所保持的只是形式上的一致，而不是实质上的一致。此种情形必须加以改变。今后从中央局至地委，从前委至旅委以及军区（军分会或领导小组）、政府党组、民众团体党组、通讯社和报社党组，都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当然不是无关重要的小问题或者已经会议讨论解决只待执行的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地委、旅委以下的党委亦应如此。高级领导机关的部（例如宣传部、组织部）、委（例如工委、妇委、青委）、校（例如党校）、室（例如研究室），亦应有领导分子的集体会议。当然必须注意每次会议时间不可太长，会议次数不可太频繁，不可沉溺于细小问

题的讨论，以免妨碍工作。在会议之前，对于复杂的和有分歧意见的重要问题，又须有个人商谈，使委员们有思想准备，以免会议决定流于形式或不能做出决定。委员会又须分别为常委会和全体会两种，不可混在一起。此外，还须注意，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军队在作战时和情况需要时，首长有临机处置之权。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

一、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党的委员会有一二十个人，像军队的一个班，书记好比是“班长”。要把这个班带好，的确不容易。目前各中央局、分局都领导很大的地区，担负很繁重的任务。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党委要完成自己的领导任务，就必须依靠党委这“一班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书记要当好“班长”，就应该很好地学习和研究。书记、副书记如果不注意向自己的“一班人”作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不善于处理自己和委员之间的关系，不去研究怎样把会议开好，就很难把这“一班人”指挥好。如果这“一班人”动作不整齐，就休想带领千百万人去作战，去建设。当然，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这同班长和战士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这里不过是一个比方。

二、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不仅“班长”要这样做，委员也要这样做。不要在背后议论。有了问题就开会，摆到桌面上来讨论，规定它几条，问题就解决了。有问题而不摆到桌面上来，就会长期不得解决，甚至一拖几年。“班长”和委员还要能互相谅解。书记和委员，中央和各中央局，各中央局和区党委之间的谅解、支持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这一点过去大家不注意，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在这方面大有进步，友好团结关系大大增进了。今后仍然应该不断注意。

三、“互通情报”。就是说，党委各委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这对于取得共同的语言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不是这样做，而是像老子说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1]，结果彼此之间就缺乏共同的语言。我们有些高级干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上也有不同的语言，原因是

学习还不够。现在党内的语言比较一致了，但是，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例如，在土地改革中，对什么是“中农”和什么是“富农”，就还有不同的了解。

四、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有些文件起草出来压下暂时不发，就是因为其中还有些问题没有弄清楚，需要先征求下级的意见。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2]，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各中央局、各前委处理问题的时候，除军事情况紧急和事情已经弄清楚者外，都应该这样办。这不会影响自己的威信，而只会增加自己的威信。我们做出的决定包括了下面干部提出的正确意见，他们当然拥护。下面干部的话，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听了以后要加以分析。对正确的意见，必须听，并且照它做。中央领导之所以正确，主要是由于综合了各地供给的材料、报告和正确的意见。如果各地不来材料，不提意见，中央就很难正确地发号施令。对下面来的错误意见也要听，根本不听是不对的；不过听了而不照它做，并且要给以批评。

五、学会“弹钢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它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钢琴有人弹得好，有人弹得不好，这两种人弹出来的调子差别很大。党委的同志必须学好“弹钢琴”。

六、要“抓紧”。就是说，党委对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什么东西只有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才能抓住。抓而不紧，等于不抓。伸着巴掌，当然什么也抓不住。就是把手握起来，但是不握紧，样子像抓，还是抓不

住东西。我们有些同志，也抓主要工作，但是抓而不紧，所以工作还是不能做好。不抓不行，抓而不紧也不行。

七、胸中有“数”。这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例如，要进行土地改革，对于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这些数字就必须了解，才能据以定出正确的政策。对于何谓富农，何谓富裕中农，有多少剥削收入才算富农，否则就算富裕中农，这也必须找出一个数量的界限。在任何群众运动中，群众积极拥护的有多少，反对的有多少，处于中间状态的有多少，这些都必须有个基本的调查，基本的分析，不可无根据地、主观地决定问题。

八、“安民告示”。开会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样，让大家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并且早作准备。有些地方开干部会，事前不准备好报告和决议草案，等开会的人到了才临时凑合，好像“兵马已到，粮草未备”，这是不好的。如果没有准备，就不要急于开会。

九、“精兵简政”。讲话、演说、写文章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会议也不要开得太长。

十、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不论在地方上或部队里，都应该注意这一条。对党外人士也是一样。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汇集拢来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们当中还有犯过很大错误的人，不要嫌这些人，要准备和他们一道工作。

十一、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没有犯过大错误，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

十二、划清两种界限。首先，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是延安还是西安[3]？有些人不懂得要划清这种界限。例如，他们反对官僚主义，就把延安说得好似“一无是处”，而没有把延安的官僚主义同西安的官僚主义比较一下，区别一下。这就从根本上犯了错误。其次，在革命的队伍中，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例如，成绩究竟是三分还是七分？说少了不行，说多了也不行。一个人的工作，究竟是三分成绩七分错误，还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必须有个根本的估计。如果是七分成绩，那末就应该对他的工作基本上加以肯定。把成绩为主说成错误为主，那就完全错了。我们看问题一定不要忘记划清这两种界限：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记着这两条界限，事情就好办，否则就会把问题的性质弄混淆了。自然，要把界限划好，必须经过细致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对于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都应该采取分析研究的态度。

我和政治局的同志觉得，要有以上这些方法，才能把党委的工作搞好。除了开好代表大会以外，党的各级委员会把自己的领导工作做好，是极为重要的。我们一定要讲究工作方法，把党委的领导工作提高一步。

注释：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

[1]见《老子》第八十章。原文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2]见《论语·公冶长》。原文是："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3]延安是一九三七年一月至一九四七年三月中共中央的所在地，西安则是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北的统治中心。毛泽东以此来比喻革命和反革命。